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 毛泽东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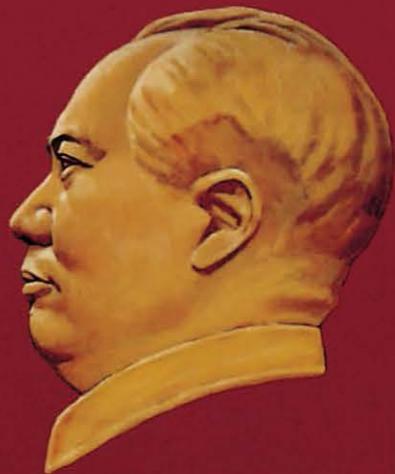
张迪杰 主编 第37卷 润东出版社



润东出版社

#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7卷



#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7卷

张迪杰 主编 第37卷

毛泽东全集

润东出版社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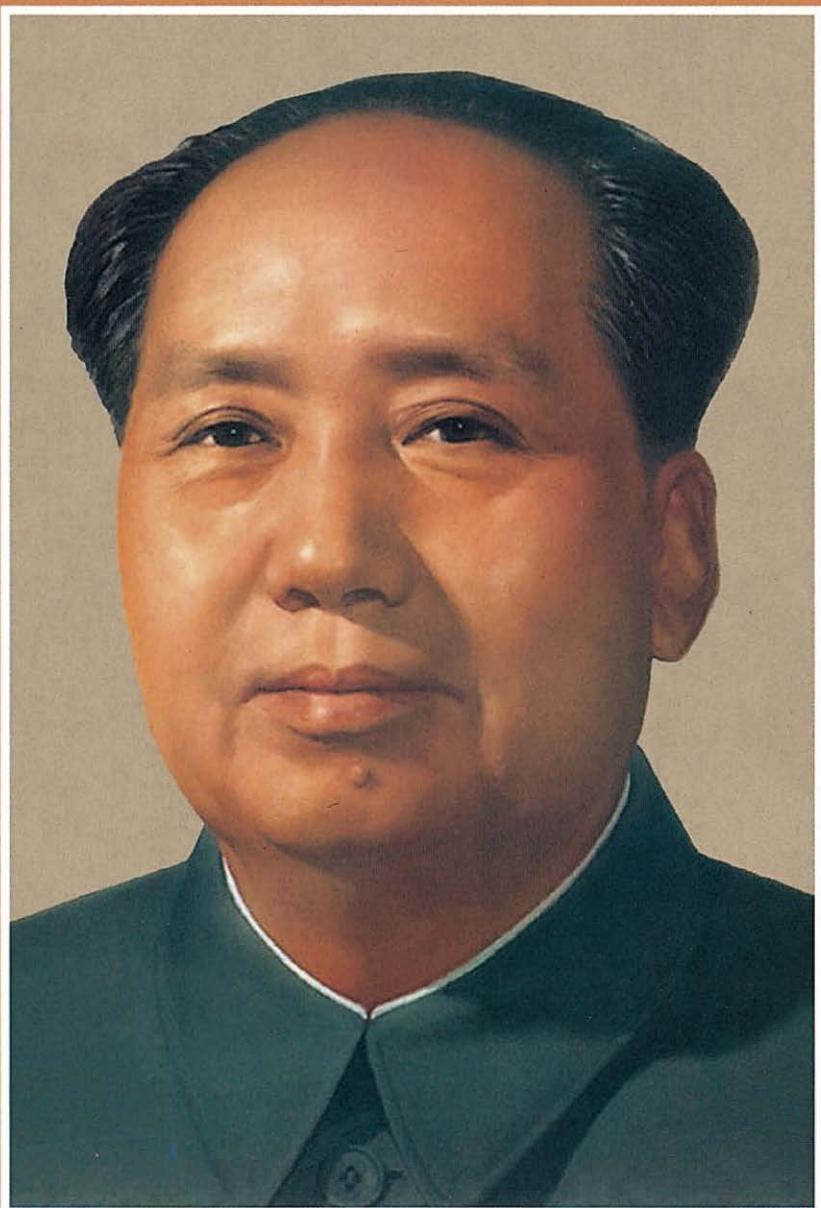
9 789881 290700



马恩百科（资料库）工作组  
[www.MEBK.org](http://www.MEBK.org)

收集 · 整理

感谢ZhuChengrui同志赞助购买本套《毛泽东全集》



毛 泽 东 同 志

#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7卷

润东出版社





MAO ZE DONG QUAN JI

# 毛泽东全集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 任 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 凡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利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 目 录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	1
(1956年9月15日)	
接受埃及大使拉加卜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	10
(1956年9月17日)	
中国人民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 .....	12
(1956年9月17日)	
给黄炎培的信 .....	15
(1956年9月17日)	
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令 .....	16
(1956年9月18日)	
对周扬在中共八大发言稿的批语 .....	17
(1956年9月21日)	
关于讨论和修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决议草案的批语 .....	24
(1956年9月24日、27日)	
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的谈话和印发谈话记录的批语 .....	28
(1956年9月、12月)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	37
(1956年9月24日)	
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 .....	48
(1956年9月25日)	

对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祝贺中尼协定签订的电报的复电	54
(1956年9月25日)	
关于公布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组织简则的命令	55
(1956年9月26日)	
在欢迎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宴会上的讲话	56
(1956年9月29日)	
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	58
(1956年9月30日)	
在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宴会上的讲话	73
(1956年10月2日)	
在苏加诺总统为印尼建军十一周年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	76
(1956年10月5日)	
为日本商品展览会题词	78
(1956年10月)	
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谈话	80
(1956年10月12日)	
给戴毓本的信	85
(1956年10月13日)	
对金日成关于志愿军赴朝参战六周年贺电的复电	93
(1956年10月27日)	
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九周年的电报	94
(1956年11月6日)	
关于合作社养猪问题的批语	96
(1956年11月)	
为“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题名	98
(1956年11月11日)	

纪念孙中山先生.....	103
(1956年11月12日)	
关于团结党外军人问题的批语.....	105
(1956年11月13日)	
国家预算要保证重点建设又要照顾人民生活.....	106
(1956年11月13日)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发言.....	109
(1956年11月15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10
(1956年11月15日)	
对关于目前沿海军事斗争的几项规定的批语和修改.....	129
(1956年11月21日)	
关于土特产品收购工作和统战工作的批语.....	131
(1956年11月24日)	
对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军队缩编等问题的批语.....	133
(1956年11月25日)	
在中央给周恩来的电报稿上加写的话.....	134
(1956年11月30日)	
为《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册》题词.....	135
(1956年11月)	
为“孙中山生平事迹展览会”题名.....	136
(1956年11月)	
对《民建一届二中全会批评章乃器的一些情况》的批语 .....	137
(1956年12月)	
对邓子恢关于龙岩县农业合作社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39
(1956年12月3日)	

给黄炎培的信	140
(1956年12月4日)	
给周世钊的信	144
(1956年12月5日)	
给贺果的信	146
(1956年12月5日)	
和民建、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	148
(1956年12月7日)	
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	154
(1956年12月8日)	
对浙江执行侨务政策情况报道的批语	164
(1956年12月8日)	
给杨开智的信	165
(1956年12月13日)	
给毛春秀的信	167
(1956年12月13日)	
关于军事系统向中央汇报工作问题的批语	168
(1956年12月14日)	
对中央关于西藏问题复电稿的修改和批语	169
(1956年12月16日)	
转发南京军区党委关于密切军队和地方关系的报告的批语	171
(1956年12月16日)	
给黄炎培的信	172
(1956年12月16日)	
给杨开英的信	173
(1956年12月16日)	

对邓子恢关于撤区并乡试验情况报告的批语	176
(1956年12月21日)	
关于上海天主教工作的批语	177
(1956年12月21日)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问题的批语	178
(1956年12月24日)	
对中央转发统战部关于加强地方政协工作意见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	179
(1956年12月24日)	
对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退社问题报告的批语稿的修改	181
(1956年12月24日)	
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的批语	182
(1956年12月26日)	
给周世钊的信	184
(1956年12月29日)	
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	186
(1956年12月)	
和周恩来应对联	189
(1956年)	
为《农村工作通讯》杂志题名	190
(1956年)	
为光荣亭题写亭名	191
(1956年)	
为清华大学题名	192
(1956年)	
为鲁迅迁葬墓碑题词	193
(1956年)	

关于登载高士文章的批语	197
(1957年1月3日)	
印发江苏省委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报告的批语	200
(1957年1月4日)	
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进行肃反工作的意见	201
(1957年1月5日)	
对《评艾森豪威尔主义》一文的批语	203
(1957年1月5日)	
邀请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的信	204
(1957年1月6日)	
印发《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的批语	205
(1957年1月7日)	
给臧克家等的信	206
(1957年1月12日)	
为刘胡兰烈士陵园重写的题词	208
(1957年)	
对撤销公安军的批语	210
(1957年1月22日)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211
(1957年1月)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汇集	242
(1957年1月)	
为洞头岛烈士墓纪念碑题词	251
(1957年1月)	
在公安部关于处理在押病残战犯报告上的批语	253
(1957年2月2日)	

对邓子恢关于按原定计划动工修建三门峡水库的报告的批语	254
(1957年2月6日)	
给黄炎培的信	255
(1957年2月11日)	
对中央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稿的批语	257
(1957年2月15日)	
给《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的信	259
(1957年2月15日)	
在颐年堂的讲话	260
(1957年2月16日)	
对日本战犯榎原秀夫亲属来信的批语	270
(1957年2月21日)	
关于调查河北涿县尚庄乡联盟农业合作社问题的批语	271
(1957年2月24日)	
对彭德怀关于外出检查军事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272
(1957年2月25日)	
对军委关于军事系统向中央汇报工作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273
(1957年2月25日)	
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	274
(1957年2月)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281
(1957年2月27日)	
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作结束语的提纲	320
(1957年3月1日)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	322
(1957年3月1日)	

关于中央负责同志的肉食供应问题的批语	334
(1957年3月4日、4月6日)	
复班禅额尔德尼电	336
(1957年3月6日)	
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谈话	348
(1957年3月6日)	
关于同意甘孜藏族自治州继续进行民主改革的批语	360
(1957年3月7日)	
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361
(1957年3月7日)	
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	365
(1957年3月8日)	
对《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修正稿)的批语和修改	376
(1957年3月8日)	
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	379
(1957年3月10日)	
在宣传会议上讲话(提纲)	385
(1957年3月12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88
(1957年3月12日)	
对《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的批语	403
(1957年3月16日)	
关于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给周恩来等的信	405
(1957年3月17日)	

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408
(1957年3月17日)	
在山东省级机关党员干部会上的报告	423
(1957年3月18日)	
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	442
(1957年3月19日)	
在南京部队和江苏、安徽二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446
(1957年3月20日)	
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468
(1957年3月20日)	
中国外交方面的某些政策问题	478
(1957年3月、9月)	
在中宣部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上的批注	480
(1957年3月)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十二周年的电报	490
(1957年4月3日)	
欢迎和感谢波兰政府代表团访华的讲话	492
(1957年4月8日、9日)	
对整风运动决定草案的批语和中央关于试行这一决定草案的通知稿	494
(1957年4月)	
关于请胡乔木阅读《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一文的批语	496
(1957年4月)	
给张维暨夫人的信	497
(1957年4月15日)	
欢迎、欢送伏罗希洛夫的四次讲话	498
(1957年4月、5月)	

#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1956年9月15日)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从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十一年间，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全体起立，默哀）

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热烈鼓掌）

在七次大会以来的十一年中，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热烈鼓掌）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热烈鼓掌）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热烈鼓掌）我们各方面

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我们的工作是做得正确的，但是也犯过一些错误。在这次大会上，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

就国内的条件来说，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并且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进行伟大的建设工作，在我们的面前，摆着极为繁重的任务。虽然我们有一千多万党员，但是在全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在我们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员来做。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

在国际范围内，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热烈鼓掌）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热烈鼓掌）现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是更加有利了。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国的人民也需要和平。渴望战争、不要和平的，仅仅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发财的垄断资本集团。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不断努力，国际的局势已经趋向和缓。（鼓掌）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热烈鼓掌）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热烈鼓掌）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热烈鼓掌）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热烈鼓掌）我们必须使帝国主义的制造紧张局势和准备战争的阴谋彻底破产。（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许多年来，特别是从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在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现在，比起整风运动以前，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步。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鼓掌）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给苏联共产党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学习，再学习<sup>[1]</sup>。苏联的同志们，苏联的人民，按照列宁的指示做了。他

---

[1] 参见列宁《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再学习。”（《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8页）又见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为了革新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6页）

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极其灿烂的成就。（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长时间热烈的鼓掌）

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鼓掌）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鼓掌）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热烈鼓掌）

同志们，我和大家都相信：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又有伟大的盟国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鼓掌）我们又有世界上一切兄弟党的支持，（鼓掌）又有世界上一切同情者的支持，（鼓掌）我们并没有孤立的感觉，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热烈鼓掌）我们这次大会，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的前进，将要起很大的推动作用。（鼓掌）

今天在座的有五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长时间热烈的鼓掌）他们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和我们有一种共同的语言。（鼓掌）他们走了很长的路程来到我国，以崇高的友谊参加我们党的这次代表大会。这对于我们是一个

很大的鼓舞和支持。（热烈鼓掌）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今天在座的还有我们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热烈鼓掌）他们是和我们一道工作的亲密的朋友。（鼓掌）他们一向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鼓掌）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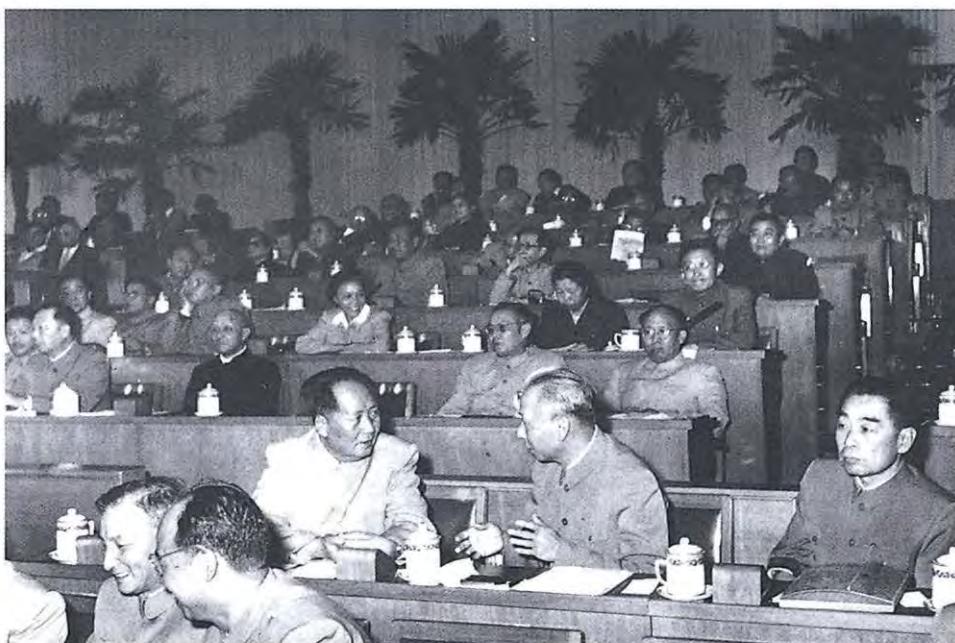
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召开。图为出席中共八大的代表步入会场。



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致开幕词。



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



1956年9月，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在中共八大会议上。



1956年9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共八大上投票。



1956年9月，毛泽东和人大代表在一起。

# 接受埃及大使拉加卜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6年9月17日)

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阁下被任命为第一任埃及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并且感谢阁下对我本人的友好祝贺。我愿意趁此机会通过贵大使向纳赛尔总统表达中国人民和我本人的真诚的敬意。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英勇斗争，并且相信在这一斗争中埃及人民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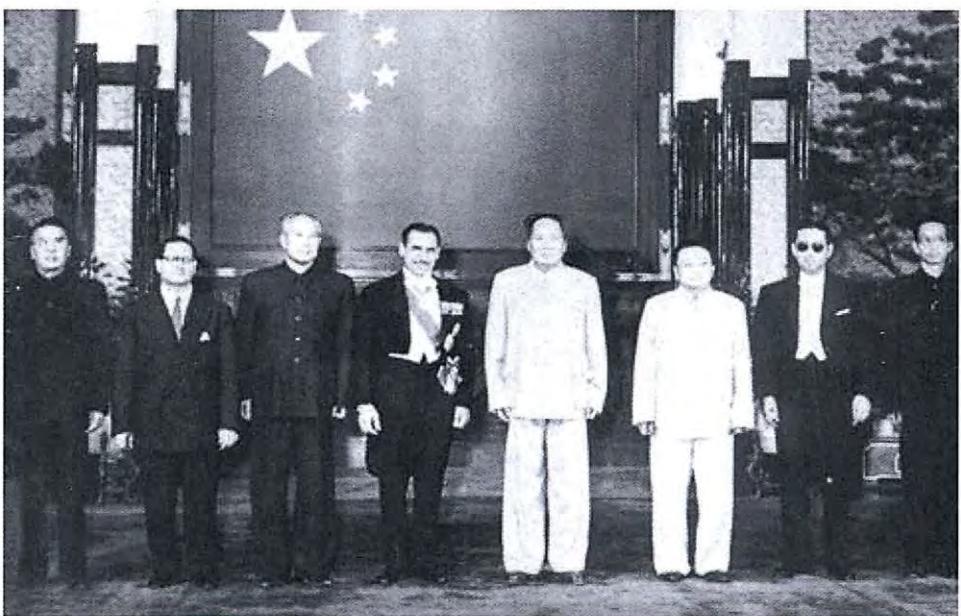
中埃两国都是世界上文化最古老的国家。我们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诚如阁下所指出的，有着悠久的历史。殖民主义者曾经阻碍过中埃传统关系的发展，但是赢得了各自的民族独立的中埃人民，又建立起了新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人民珍重同埃及人民的这种友好合作关系，并且相信，这种关系必将日益巩固和发展。作为亚非两个爱好和平国家的中国和埃及间的友好合作，无疑地将对维护和巩固亚非和平和世界和平作出重大的贡献。

大使先生，我热烈地欢迎阁下出任埃及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在贵大使为发展中埃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将会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充分协助。

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纳赛尔总统阁下健康！



1956年9月17日，毛泽东接受埃及共和国首任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递交国书。



1956年9月17日，毛泽东和埃及首任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等合影。

# 中国人民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sup>[1]</sup>

(1956年9月17日)

我们一看到埃及人就觉得高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隔阂。埃及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全中国人民都支持埃及，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人民都支持埃及。全世界最少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支持埃及，只有一小部分国家反对埃及，另外有一部分国家采取中立。

据我看，美国也同意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它不会帮助英国从埃及手里把运河夺回去，这样对美国也没有好处。美国另外有它的目的。对美国说来，运河在英、法手里和在埃及手里没有什么区别。它本来就不期望实现“杜勒斯计划”。美国是想借这机会把英、法从中东赶出去，以便建立它自己的势力。苏联、阿拉伯国家、印度和科伦坡国家都支持埃及，有苏联在，英国、美国、法国就不敢轻易行动。这次埃及巧妙地利用了帝国主义国家间、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间、帝国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间的矛盾。你们还要利用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是不统一的。

你们的国王做了坏事，所以被人民推翻了，但他还是个埃及人。现在全埃及人民、全阿拉伯人民和全亚非人民都团结起来了，他也应该讲点爱国主义，不要发表不利于埃及的言论，不要做帝国

---

[1] 这是毛泽东和埃及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的谈话。

主义的走狗，你们应该对他做点工作。中国地主的土地土改时都被没收了，但是在抗美援朝的时候，他们也赞成打美国人。

埃及团结了八千万阿拉伯人民，组成了一条坚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线。在这条战线上，埃及是处在最前哨。中国是在另一条反帝战线的最前哨。有了你们，我们就好办了。如果你们垮台，我们这里也不好办。在埃及的外国企业很多，在中东还有很多的外国石油企业，要一下子把这些企业全部收回是不可能的，要一步步地去做。收回苏伊士运河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纳赛尔总统最近最好不要到没有警戒的地方去，因为帝国主义的计划失败后，他们会采取各种手段，像暗杀等。西方国家骂纳赛尔总统是个野心家，是个希特勒，说他想统治阿拉伯世界。但是我们认为，纳赛尔总统是亚非地区的民族英雄，因此帝国主义才不喜欢他。纳赛尔总统的做法很聪明，他有时硬，有时软，有时用一种很和平的办法。这次和“五国委员会”的会谈，他就用很和平的声调把他们送回去了。

你在中国要到什么地方去，就可以去，完全没有限制。你如果要看陆军、空军、海军、工厂、学校、农村等，都可以看。你可以随便找人谈话，可以直接找工人、农民等谈话。你可以多拜会些民主党派的领袖，他们也很支持埃及，你去拜会，他们会很高兴的。你也可以拜会我们各部门的负责人，需要什么资料，可以向他们要。我们外交部会给你一切帮助和便利。你可以研究一下中国的情况，中国的情况是很值得研究的。在北京，现在埃及人是最受欢迎的。

苏联会全力帮助埃及的。中国也愿意尽力帮助埃及，我们的帮助没有任何条件。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能力所及，一定帮助。我们对你们的帮助，你们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我们可以

给无代价的援助。当然，埃及是个有民族自尊心的国家，如果接受我们的援助还是要还，那末现在可以记帐，以后再说，或者过了一百年以后再还吧。埃及现在遭受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我们也经历过这种封锁，深知埃及人民的艰苦。中国在抗美援朝时，花了不少钱，死了不少人，现在没有战争了，可以尽力帮助埃及。



1956年9月17日，毛泽东和埃及首任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亲切交谈。

# 给黄炎培的信

(1956年9月17日)

任之先生：

画册<sup>[1]</sup>、叙诗和另诗三首均已收到，十分感谢！张先生是否生活上有困难？是否愿意接受援助，请便告知。<sup>[2]</sup>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九月十七日

---

[1] 画册，指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张叔通所作的书画册，由黄炎培代呈毛泽东。黄炎培1956年9月9日在为送画册和诗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八大’快要召开，这一时期想紧张得很。希望缓和些紧张，谨奉上书画册一本，公余流览一下，可能增进些神情的潇洒。这书画册，是一位八十岁老画师一年画成，每幅自加跋语的。我在这上边写了一首长古，为他介绍，他和我是新闻记者同事二十年，他在抗日时期，吃了很大的苦，他的爱国热情是可敬的。他能画而很少作画，惜墨如金，最近为了农村和工商界对领导上一片颂声而作。——最近工商界接受种种新的措施，特别是五厘定息，大、中、小皆大欢喜。——他是本着极高度诚意而写出来，特代陈，乞赐教；我的诗附求赐教！”

[2] 黄炎培收到毛泽东的这封信后，于同年9月19日复信毛泽东，告知张叔通生活穷困，江苏省文史馆每月给他生活费50元。黄炎培认为，如果政府给他照顾，他会接受的。同年12月16日，毛泽东写信给黄炎培，托他转送张叔通500元。

# 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令<sup>[1]</sup>

(1956年9月18日)

中国政府一向鼓励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令，不要从事政治活动，并且鼓励他们把他们的人力和财力为所在国的利益服务。当然，也可能有些华侨做了些不利于印尼利益的事，但是这和中国政府是毫无关系的。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和印尼政府应该很好地合作，对他们进行教育。对华侨包括华侨商人的正当利益应该加以保护，但是对那些不法的、欺骗和敲诈人民的奸商则应该加以惩罚。我们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就曾经对奸商严厉地惩罚过。我们现在和新加坡还没有外交关系，如果将来建立了关系，我们也可以对当地的华侨进行些教育工作。

---

[1] 这是毛泽东和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谈话的一部分。

# 对周扬<sup>[1]</sup>在中共八大发言稿的批语

(1956年9月21日)

即退周扬同志：

此件<sup>[2]</sup>看过，可用。只是引证我的话觉得多了一点，减少一些为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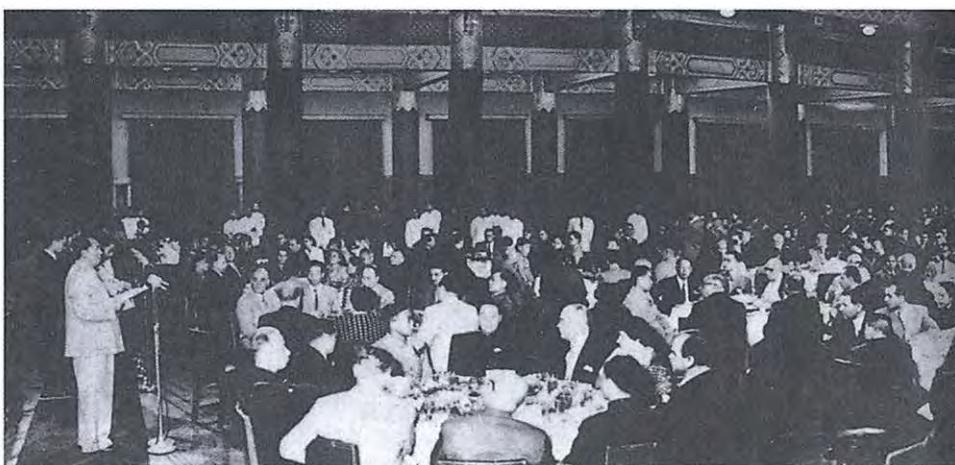
毛泽东

九月廿一日五时

---

[1]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

[2] 指周扬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稿。在1956年9月2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时，题为《让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1956年9月，5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应邀列席中共八大。图为毛泽东在欢迎参加中共八大的各兄弟代表团的宴会上讲话。



1956年9月，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国友人。



1956年9月，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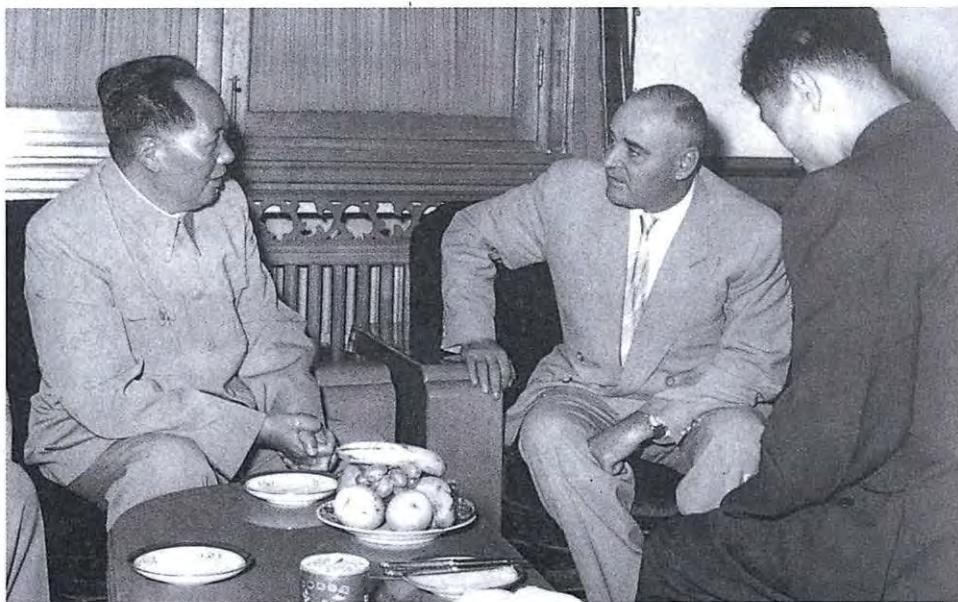
1956年9月，法国共产党代表团政治局委员雅克·杜克罗向毛泽东赠送巴黎公社时期的报纸。



1956年9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团长、中央委员约凡·维塞林诺夫向毛泽东赠送礼物。



1956年9月，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侯赛因·沙希德·苏拉瓦底，并观赏他赠送的礼品。



1956年9月，毛泽东会见罗马尼亚工人党总书记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



1956年9月，毛泽东会见西班牙共产党主席伊巴露丽。



1956年9月，毛泽东在宴会上。

# 关于讨论和修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 决议草案的批语

(1956年9月24日、27日)

—

尚昆<sup>[1]</sup>同志：

请于今日早晨用电话通知各代表团长和各省市区的小组长，立即阅读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并于今日下午二时以前各开小组会讨论一次，将修改意见注在草案上，送交秘案〈书〉处。请秘书处于今日下午将各组修改意见加以汇总送交胡乔木<sup>[2]</sup>同志，以便修改。

毛泽东

九月廿四日五时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2]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

二

即送胡乔木同志：

照此付印，付翻译。我在第五页上加了“各人民民主国家”几个字。

毛泽东

九月廿七日二时



1956年9月27日，中共八大闭幕。图为大会主席台。左起：张闻天、董必武、彭真、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陈云、朱德、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



1956年9月27日，中共八大胜利闭幕，毛泽东步出会场时，受到大会代表和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



1956年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

# 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的谈话 和印发谈话记录的批语

(1956年9月、12月)

## 一 谈话记录

时间：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参加人：蒙方：达姆巴<sup>[1]</sup>（团长）、曾德、奥其尔巴特（大使）、哈什冈白、策热布桑巴  
中方：王稼祥<sup>[2]</sup>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这几天你们很累了吧？

达姆巴（以下简称达）：不，不累，我们很舒服。

毛：蒙古同志是好同志，好朋友。你们是友好的国家，友好的党！

（接着主席就问候泽登巴尔<sup>[3]</sup>同志）

达：他很好，他跟桑布<sup>[4]</sup>同志向您问候呢！

---

[1] 达姆巴，当时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2] 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3] 泽登巴尔，当时任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4] 桑布，当时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

毛：谢谢！请你们替我向他们问候！

达：谢谢！我们感谢你们对我们的援助。

毛：不，不要这样！中国是个大国，这是我们的义务，是你们的权利。我经常听到你们这样讲，同时经常看到文件上也这样写，我觉得心里不舒服。我们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因为三百年来我们的祖先曾剥削过你们、压迫过你们，他们曾留下了不少的债务，因此，今天我们要还这些债务。过去我国国内少数民族也同样受过压迫，我们对他们也要还债，这是我们的义务。

我国藏族人口的一百二十万人直接属于拉萨，其他一百万人口分布于青海、云南、四川、甘肃等地。蒙古的宗教情况怎样？喇嘛多不多？总人口多少？

达：过去很多，现在非常少了。在革命初期，有些喇嘛干过坏事情，将他们处理了。有一些参加了劳动以及其他工作。现在还有极少数的喇嘛。我国总人口八十万。

毛：蒙古工农业的发展情况如何？

达：革命前我们是个很落后的国家，在革命的年代里，由于苏联的热情帮助，我国人民在工业方面、牧畜业方面以及文化教育方面都有了很好的进展。

毛：蒙古农业也很发展了吧？

达：今年刚刚开始发展农业。

毛：水够不够？

达：在我国，水是很缺乏的。

毛：雨量如何？

达：平均年雨量是一百二十至三百毫米（其中森林地带是三百毫米，而沙漠地区是一百二十毫米）。

毛：打井怎样？

达：沙漠地区打井困难。

毛：那么，建设一些蓄水库，储下水来，以供使用，这样不可以吗？

达：在沙漠地带很困难，水储不下，很快渗入地下。

毛：你们境内有哪些大河流？

达：色楞河、鄂嫩河、克鲁伦河等。

毛：向西北方向流去的是哪一条河？

达：鄂嫩河、克鲁伦河。

毛：蒙古历史、文化的发源地是哪里？

达：鄂嫩河、克鲁伦河一带。

毛：你们不可以在这些河流上建筑一些水闸、水库、蓄洪沟等工程吗？

达：人民和我们都迫切要求那样做，但力量达不到。

毛：现在我们也有些困难。但几年之后，我们在这方面帮助你们。

达：谢谢。

毛：今年河北闹水灾，三千万亩农田遭到了水祸。中国的水利工作，至今还没有能够很大发展，再有十年之久可能解决。不过，我们在这方面对你们的援助，用不了等十年之久。

达：去年你们给予了我们很多的援助，派了一万三千工人和技术员，这在工业和其他建设方面起了推动作用。并且今年还给了无偿的一亿六千万卢布。因此，蒙古老百姓非常欢欣鼓舞。

毛：不，不，上边已经说过，这是我们的义务。那些数目是太少了，你们一提，我就觉得惭愧。

达：集二线<sup>[1]</sup>对我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蒙古的农业现在怎样？

达：现在较过去有了一些发展，但由于人力缺乏，很大一块土地至今还未开垦。

毛：这样不好，应该开荒。你们定居了吗？

达：定居对我国农牧业发展，有很大好处，但现在还未定居下来。

毛：这不是一下子办得到的，要逐步地办到，因为一个地方的草，是有限制的。我国有的省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定居下来，还可以种菜，种庄稼，这样人口才能增加。

达：对！（指曾德说）他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任。您的这些建议，对我国将来的计划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毛：发展农业、牧畜业，首先要发展水利工作，这里包括水闸、蓄水库、水沟等工程。另一方面，牧草是很重要的，对你们来讲，“草就是油”。因此，你们应当培植牧草，应当采用深耕的方法，这样牧草就能长得又高又多，然后定居下来就有条件了。

达：是的！我们重视您的这些谈话。

毛：你们可以早一些开始水利工程的准备工作。这方面包括地质勘察工作、人力、物力等等，而财力还不算那么重要，最重要、最要紧的是人力。

你们应该先着手进行最迫切需要的工作。例如，由乌兰巴托到西部国境，这一段路的中间，你们修了一条近代化的大马路，但很少用它。这是不很需要的。

---

[1] 集二线，指内蒙古自治区的集宁至二连浩特的铁路。这条铁路北出国境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铁路相接。

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只有七年之久。在这以前，我们两国人民不大来往。虽然我国革命成功已有三十五年，但由于我国过去很落后，所以在这三十五年内未能很好地发展起来（虽然有成绩）。因此我国工农业可以说是没有很好地发展。

毛：你们应该自给自足。

达：现在许多日用品都不能自己生产。

毛：这是不好的，应该扩大这方面的工业。

达：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也影响了这一方面的发展。

毛：你们还有多少军队？

达：将近一师。

毛：这已够用了。现在，你们周围没有敌人。

达：现在我们正在将这支部队的复员人员培养成为司机、建筑工人等。

毛：这是很好的。这是生产军！那么文字怎样呢？

达：现在都用新（俄）文字，成年人都已识字了。

毛：很好，内蒙古也正在这样做。

达：据说是那样。在文字方面，我们也可以帮助内蒙古。

毛：对，很需要这样。你们跟内蒙古有直接联系吗？

达：现在没有直接联系呢！只是通过中央取得联系。

毛：不需要直接联系吗？

达：需要直接联系，但未办正式手续。

毛：你们可以办的。你们可以到内蒙古建立自己的领事馆。这样做，用不了什么费用！你们从自己的大使馆抽出几个人来，就可以了。苏联也这样办的。在天津、上海、沈阳、广州等地都有他们的领事馆。

不过，上述这些事，是我个人的说法，也许不正确，因为我未与政府、外交部负责人商量；同样，你们也是未与自己的政府商量过。但我认为，这些事情是能够实现的。

达：谢谢！历史上的“债务”，我们连想也没想过。我们只是感谢你们。

毛：不！要还债的，这是我们在追还祖先们的债务。

毛：你们蒙古族是第三个民族。第一个民族是匈奴。它占了新疆、黄河北部的土地，有的已渡过了黄河。第二个民族是突厥，它占领了阿美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埃及、希腊等十几个民族，建立了大帝国。但这一民族后来被蒙古族打败了。因此，蒙古是第三个民族。我们至今还没有搞清你们的祖先的来源。是不是在西伯利亚？

奥其尔巴特：噢！据说是那样！

毛：西伯利亚那里曾有一个高车族，据说他们都坐在高大的车子上。高车族是不是你们的祖先？

达：老人们都说，古代的祖先搬家时都用很高的车拉上所有的东西。

毛：你们有没有关于这一方面的记载？

达：关于十二世纪以前的记载，现在还没有，十三世纪以后的有些记载。这一方面的工作苏联帮助着我们。十三世纪以前的蒙古历史，跟中国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将来我们在这方面，可能还要跟你们一起进行研究。

毛：很好，今天我们谈了许多有关历史的事情。

达：我们的前途很宽广，因为有苏联和中国的兄弟般的援助。今后，我们更要好好努力工作。

毛：应该好好发展。

达：我再一次表达我们内心的感激，你们对我们的援助是兄弟般的伟大的援助。我们不能把它当做“债务”来看待。

毛：但他是这样想的。我们同任何国家都以平等共处，过去我们压迫了你们，因此现在要向你们认错。不仅对你们这样，而且对国内少数民族也是这样的。过去，我们压迫了他们，因此，如果我们现在不认错，就不能根除大汉族主义思想，实现民族平等。这是有根据的，这不是漂亮话。是不是？过去我们压迫过你们，但你们现在一句怨言都没有。我们给你们的援助是小小的，这是在还债，不是援助。这样才能互相信赖。你们说是援助，这也好，你们这样说也表示平等。

达：我们对你们所给予我们的过去的和将来的一切援助表示感谢！中蒙两国劳动人民一向是友好的，反动阶级所干的事情是另一回事。

毛：有些中国工人去蒙古了。你们应该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以免他们犯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毛病，以免他们称王称霸。

那里的中国工人或工作人员如果犯错误，你们应该向我们反映。

达：大多数的人都很好，少数人虽有时犯毛病，但那也不是有意识的。同时，谁都会有一些缺点的。

毛：应该教育他们，如果有人犯严重错误，就应当依法处分。你们应以主人翁的态度站起来，教育他们。

达：我们那里中国工人中有二百名党员，他们带领着其他工人很好地工作着。

毛：好！工人一共有多少？

达：连家属一共一万三千人。过去的华侨一部分已回国，现在

只剩下四五千人，但这些人都已年老了。

毛：蒙古人指挥他们吗？

曾德：是的！蒙古人以主人翁的态度指挥着他们。

毛：中国工人中有做木工活的吗？

达：有。此外还有制砖的，以及其他各种行业。

毛：让他们带蒙古徒弟吗？

达：他们分别地带着徒弟呢！

毛：以后在农业方面，我们可以用人力援助你们，其数目可以是十万，也可以是二十万，甚至也可以达到三十万。其中某些人也可以帮助你们搞牧畜业。

达：对，不过事先我们应该充分做好准备工作和计划工作。不然，接到那些人后，住宅等各方面要发生困难的。

毛：对！应该逐步地进行这些工作。你们有八十万人口，因此可以发展农业、兴修水利了。

达：我们有五万二千多工人。

毛：八十万人口中有五万多工人，这数目不算小了。有使用机器的吗？

达：使用着半自动机器。

毛：有没有自动化的？

达：没有。

毛：那么将来可以装置一些。关于这一问题，将来我们互相可以谈一谈。

达：由于你们的援助，我们现在有了火柴厂、瓷器厂，但火柴厂所需要的火柴盒等都是用手工制作。

毛：火柴生产的数目多少？

达：全国总共需要两千万盒火柴，明年生产可以达到这一数目。但在国内销路不太好。

毛：你们的市场怎样？

达：市场，有是有，但很小。

毛：今天我们谈得很好。

达：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怀，感谢您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我们，感谢您对我们提出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建议，感谢您对我们讲了很有益的话。我们回去后，把您今晚所讲的话，当做今后工作上的指针。当我们分手之际，我再一次代表我党中央和全体人民向您致衷心的敬意。

## 二 印发谈话记录的批语

外交部：

这个谈话，应抄送我驻蒙使馆，内蒙自治区党委，及各省、市、区党委阅看，因为各省市区都有少数民族问题，另抄给统战部和民委党组。以上请会同尚昆同志办理<sup>[1]</sup>。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六日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于1956年12月16日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发给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驻蒙古大使馆。

#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sup>[1]</sup>

(1956年9月24日)

我们欢迎你们来到中国。你们来，我们很高兴。我们得到你们的支持，得到各国兄弟党的支持。当然，我们也支持你们，支持所有的兄弟党。现在世界上马列主义的共产党的阵线，不管是在取得胜利的地方，或者是在尚未取得胜利的地方，都是团结一致的。但是也有过不团结的时候。我们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过去听了情报局<sup>[2]</sup>的意见，我们虽然没有参加情报局，但对它也很难不支持。这是一九四八年的事。一九四九年情报局骂你们是刽子手、希特勒<sup>[3]</sup>

---

[1] 这是毛泽东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

[2] 情报局，指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是1947年9月在波兰华沙举行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南斯拉夫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成立的。1948年6月和1949年11月，情报局会议先后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掌握中》的决议。1956年4月情报局宣布停止活动。

[3] 希特勒（1889—1945），德国法西斯首领、纳粹党党魁。1933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积极扩军备战。1939年9月派德军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年6月大举进攻苏联。1945年4月在苏军解放柏林时自杀。

分子，对那个决议我们没表示什么。一九四八年我们写过文章<sup>[1]</sup>批评你们。其实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该和你们商量。假如你们有些观点是错了，可以向你们谈，由你们自己来批评，不必那样急。反过来，你们对我们有意见，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采取商量、说服的办法。在报纸上批评外国的党，成功的例子很少。这次事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取得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你们吃了亏，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说来，却取得了犯错误的教训。要充分认识这个错误。

你们承认新中国，我们没有回答，也没有反对。当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反对，而且也没有理由反对。英国帝国主义承认我国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反对，你们社会主义国家承认的时候，又有什么理由反对呢？

那时没有回答你们，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苏联朋友不愿意我们和你们建交。那末中国是不是独立国呢？当然是独立国。既然独立，为何要听他们的话呢？同志！那时苏联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们不同意也很难办。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sup>[2]</sup>，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当然没有作出决议说毛泽东就是铁托。我对苏联

---

[1] 指1948年1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

[2] 铁托（1892—1980），前南斯拉夫主要领导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不结盟运动创始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领导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1945年创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63年后改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1948年6月28日，由保、罗、匈、波、苏、法、捷、意八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的情报局会议，通过《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对南共进行公开的指责，并把南共开除出情报局。

同志讲过，你们怀疑我是半个铁托，现在他们不承认。从何时起才摘下半个铁托的帽子呢？从抗美援朝打击了美帝国主义以后，才摘下了这个帽子。

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几乎搞垮了百分之百。少奇同志在八大的报告中也谈到这一点。为什么不公开说明这就是斯大林的路线呢？这也有原因。苏联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我们公开批评就不那么好。我们应该和苏联搞好关系。也许过一些时候可能公开提出。世界上的事总是这样，事实就是事实。那时第三国际做了许多错事。第三国际前后两段还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sup>[1]</sup>负责的时候也较好。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

这是我们第一次吃斯大林的亏。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sup>[2]</sup>，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

[1] 季米特洛夫（1882—1949），保加利亚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1935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2] 指王明1937年12月25日在武汉擅自发表的《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战争必须实现的六项任务（也被称为六大纲领），这六大纲领取消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关于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等项主张，并提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要接受国民党政府的“统一指挥”。这就放弃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和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对“十大纲领”的严重倒退。

纲领<sup>[1]</sup>，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第三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sup>[2]</sup>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当时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sup>[3]</sup>上作出的。斯大林把这件事告诉了铁托，在铁托自传中有这段谈话。

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比较自由些。这以前，我们已经开始批评机会主义，开展整风运动，批评王明路线。整风实际上也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但是关于斯大林和

---

[1] 指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2] 罗斯福（1882—1945），美国民主党人，1933年至1945年任美国总统。丘吉尔（1874—1965），英国保守党人，1940年至1945年任英国战时联合内阁首相。

[3] 雅尔塔会议也称克里米亚会议，1945年2月4日至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协调了最后击败德国的军事计划，讨论了欧洲的战后安排和对日作战等问题，签署了《苏美英三国克里米亚会议公报》，就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和管制德国的问题以及波兰问题等达成了协议。会上秘密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简称《雅尔塔协定》），规定苏联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二或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美、英方面承诺维持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恢复1905年日俄战争后俄国丧失的领土及其在中国东北的各项权益；将千岛群岛归于苏联。会上苏联表示准备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友好同盟协定。

第三国际我们是一字未提。不久的将来也许要提。过去不提的原因有二：一、既然中国人听了他们的话，那末中国人自己就应该负责。谁叫我们去听他们的话呢？谁叫我们去犯“左”倾、右倾的错误呢？有两种中国人：一种是教条主义者，他们就听斯大林那一套；另一种中国人就不听那一套，并且批评教条主义者。二、我们和苏联的关系中不愿引起不愉快。第三国际没有检讨这些错误，苏联也没有提到这些错误，我们提出批评就如同他们闹翻的。

第四次，就是说我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不仅苏联，就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有相当一些人曾经怀疑中国是否真正的革命。

你们可能不很了解，为什么现在中国还挂斯大林的像。莫斯科的同志通知我们，他们不挂斯大林的像了，游行的时候只拿列宁及其他活着的领袖的像，当然没说也让中国照办。我们很为难。斯大林的四条错误，中国人民并不知道，就我们整个的党来说也是不知道的。这和你们的情况不同，你们的事人民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党内知道两次王明路线的错误，但人民并不知道这是来自斯大林的错误。至于斯大林不让中国革命和怀疑我是半个铁托的错误，只有我们党中央知道。

我们支持苏联作为中心，这对社会主义运动有利。这一点你们也许不同意。赫鲁晓夫<sup>[1]</sup>批评斯大林，你们从上到下都欢迎，而我们就不同，我们人民不满意。因此，中国不挂斯大林像不行。过去我们游行中拿着马、恩、列、斯的像，拿着几个中国人——毛、刘、周、朱<sup>[2]</sup>的像和兄弟党领袖的像。现在我们采取了“打倒一

[1] 赫鲁晓夫（1894—1971），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2] 毛，指毛泽东。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

切”的办法：谁的像都不拿。今年“五一”波波维奇大使在北京，你看游行时不是没有拿像吗？但是有五个死人——马、恩、列、斯、孙<sup>[1]</sup>的像，和一个活人——毛泽东的像，还挂着。挂就挂吧。你们南斯拉夫人可能说，苏联都不挂斯大林的像了，你们中国人还挂。

到现在还有人怀疑我们社会主义建不成功，说我们是假共产党，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些人吃完饭，睡完觉，就在那里宣传，说什么中国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中国建不成社会主义，要建成那才怪呢！看吧，中国也许要变成一个帝国主义，除了美、英、法帝国主义以外，又出现了第四个帝国主义——中国！现在中国没有工业，没有资本，可是过一百年以后，那才厉害呢！成吉思汗复活，欧洲又要吃亏，也许要打到南斯拉夫去！要防范“黄祸”呀！

绝不会如此！中国党是个马列主义的政党，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我们认为，侵略就是犯罪，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在国际上，我们反对大国主义。我们工业虽少，但总算是大国，所以就有些人把尾巴翘起来。我们就告诉这些人“不要翘尾巴，要夹紧尾巴做人”。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就常常教育我“夹紧尾巴做人”。这句话很对，现在我就时常对同志们讲。

在国内，我们反对大汉族主义。这种倾向危害各民族的团结。大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都是宗派主义。有大国主义的人，只顾本国的利益，不顾人家。大汉族主义，只顾汉族，认为汉族最高级，就危害少数民族。

---

[1] 孙，指孙中山。

以前有人认为，中国人不愿和别人友好，要和苏联分裂，要成为祸害。现在，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这样的人少了，从抗美援朝起开始减少。而帝国主义则不同了，中国愈强大，他们就愈怕。但他们也知道中国工业不发达，只靠人多力量大，没什么可怕。他们第一怕苏联，第二才怕中国，怕我们的政治，怕我们在亚洲起影响。所以他们就经常说，中国不得了，将要侵略，等等。

我们非常谨慎小心，不盛气凌人，遵守五项原则<sup>[1]</sup>。我们自己曾是被欺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受。你们可能也有同感吧？

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

腐化、官僚主义、大国主义、骄傲自大，中国都可能犯。现在中国人有谦虚的态度，愿意向别人学习，这也是有原因的，我们没有本钱：一、我们原先没有马列主义，这是学别人的；二、我们没

[1] 五项原则，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3年12月至1954年4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这五项原则是谈判开始时周恩来总理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出的，后来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

有十月革命，是在十月革命三十二年以后才在一九四九年取得革命胜利的；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是一个支队，不是主力军；四、我们没有工业化，主要是农业和破烂的手工业。因此，就是有人想翘尾巴，也没有本钱，顶多翘一两公尺。但是我们要预防将来，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危险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更危险了。

同志们，我劝你们也要注意这一点。你们工业化程度比较高，发展比较快，斯大林整了你们，但是有理的是你们，真理在你们这一方面。这都可能成为你们的包袱。

上面讲的斯大林对我们犯的四条错误，也可能变成为我们的包袱。中国过几十年在工业化后，翘尾巴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你们回去以后，请告诉你们的下一代，将来中国如果翘尾巴，翘到一万公尺以上，就批评它。要监督中国，要全世界都来监督中国。那个时候我就不在了，去找马克思开代表大会了。

我们过去对不起你们，欠了你们的账。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们写过文章批评你们，为什么现在还要沉默呢？在批评斯大林以前，有些问题不能说得这样清楚。过去我和波波维奇谈话时只是说：苏联不批评斯大林，我们就不好批评；苏联不与南斯拉夫恢复关系，我们也不好和你们建交。现在就可以讲了，关于斯大林的四条错误，我就和苏联朋友讲过，和尤金<sup>[1]</sup>讲过，将来见到赫鲁晓夫时也要对他讲。你们是同志，所以也和你们讲了，但是现在还不能登报，不能让帝国主义知道。以后也许有一两条错误要公开讲的。我们和你们不同，你们在铁托自传中提到斯大林的错误，因为你们和苏联断绝了关系。

斯大林提倡辩证唯物主义，有时也缺乏唯物主义，有点形而上

---

[1] 尤金，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

学；写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做的常是历史唯心主义。他有些做法走极端，个人神化、使人难堪等等，都不是唯物主义的。

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文章<sup>[1]</sup>、《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

我曾写过一些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共三篇<sup>[2]</sup>：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六十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报》要我写的。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不成？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延安的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写，但理智上不这样不行。

莫斯科批评斯大林以后，我们就可以讲这些情况了。今天把他的四条错误讲给你们听了，但是为了和苏联保持关系，不便在报纸

[1] 指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一文（《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1～309页）。

[2] 指1939年12月20日在《新中华报》上发表的《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1949年12月21日《在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上的祝词》和1953年3月9日为悼念斯大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最伟大的友谊》。

上公开讲。在赫鲁晓夫的报告<sup>[1]</sup>中关于斯大林对我们犯的错误，只提到一个糖厂的问题，所以我们还不便公开讲。矛盾的事情还是有的。

苏联一般来说，总的是好的。他们有四个好：马列主义、十月革命、主力军、工业化。他们也有阴暗面，有些错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敌人利用对斯大林的批评在全世界展开攻势，我们应该支持苏联。他们的错误是会纠正的。对南斯拉夫的错误已由赫鲁晓夫纠正了。对于王明的错误，他们已经了解了，而过去我们批评王明，他们就不愿意。他们也取消了“半个铁托”的帽子，一共取消了一个半铁托。取消了给铁托戴的帽子，我们很高兴。

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现在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是父子党，还是兄弟党？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那时的思想控制很严，胜过封建统治。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能听，而过去有些开明君主是能听批评的。你们南斯拉夫想来也有过这样的君主，别人指着鼻子骂他都行。资本主义社会就比封建时代进了一步，美国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可以相互骂架。

---

[1] 指赫鲁晓夫1956年2月25日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

我国很少有人公开批评我，我的缺点和错误人们都原谅。因为我们总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我们虽然也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但是人民觉得我们做的好事总比坏事多，因此人民就多予歌颂，少予批评。这样就造成偶像，有人批评我，大家就反对他，说是不尊重领袖。我和中央其他同志平均每天都能收到三百封信，其中总有几封信是批评我们的，但这都不署名，或署假名。他们并不怕我整他，而是怕周围的人整他。

你们提到的《论十大关系》，这是我与三十四个部长进行一个半月座谈的结果。我个人能提出什么意见呢？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不是我的创造。制造任何东西都要有原料，也要有工厂。但我已不是一个好工厂了，旧了，要改良，要重新装备，像英国的工厂需要改装一样。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sup>[1]</sup>等同志。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在1956年9月28日举行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

# 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sup>[1]</sup>

(1956年9月25日)

美帝国主义是你们的对头，也是我们的对头，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对头。美帝国主义要干涉我们比干涉你们是困难一些。美国离我们很远，这是一种因素。但是，美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很长，伸到我国的台湾，伸到日本、南朝鲜、南越、菲律宾等地。美国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冰岛、西德都驻了兵，在北非和中近东也有它的军事基地。它的手伸到全世界。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它是全世界人民的反面教员。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在各个地方砍断它的手。每砍断它的一只手，我们就舒服一点。

中国过去也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我们的情况很接近。一个国家，农村人口多，存在封建势力，有不好的一面，但是，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来说，又是好事，使我们有农民这个广泛的同盟军。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有严重的封建主义，布尔什维克党<sup>[2]</sup>因为有广大农民的支持，革命取得了胜利。我国更其如此。我国是农业国，有五亿多的人口住在农村。过去打仗主要是依靠农民。现在我国城市资产阶级很快地服从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因

---

[1] 这是毛泽东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的一部分。

[2] 布尔什维克党，原苏联共产党的前身，1912年正式建立。

为农民组织起来了，农业合作化了。因此，党在农民中的工作非常重要。

照我看来，封建主义严重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政党要到农村中去找农民。知识分子下乡找农民，如果态度不好，就不能取得农民的信任。城市的知识分子对农村事物、农民心理不大了解，解决农民问题总是不那么恰当。根据我们的经验，要经过很长的时期，真正和他们打成一片，使他们相信我们是为他们的好处而斗争，才能取得胜利。绝不能认为农民一下子就会相信我们。切记不要以为我们帮助一下农民，农民就会相信我们。

农民是无产阶级最主要的同盟军。我们党开始也是不懂得农民工作的重要性，把城市工作放在第一位，农村工作放在第二位。我看，亚洲有些国家的党，农村工作也没有搞好。

我们党做农民工作，开头没有成功。知识分子有一点气味，就是知识分子气。有这种气味，就不愿到农村中去，轻视农村。农民也看不惯知识分子。我们党当时也还没有找到了解农村的方法。后来再去，找到了了解农村的方法，分析了农村各阶级，了解了农民的革命要求。

第一个时期，我们没有看清农村。当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抛弃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就是说，不懂得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后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原来农村不是平面的，而是有富的，有贫的，也有最贫的，有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之分。在这个时期，我研究过农村，办过几期农民运动讲习所<sup>[1]</sup>，虽

---

[1]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曾先后担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和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常务委员。

然有些马克思主义，但是看得不深入。

第二个时期，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这个时期很长，十年内战，跟他打了十年，那就非得研究一下农村不可。这十年的头几年对农村了解还是不那么深刻，后来才比较了解，了解得也比较深刻。这个时期，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我们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我们党在农村中的大部分根据地搞垮了。

以后，是第三个时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我们同国民党停战，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这个时候，我们的同志可以公开到国民党地区的城市里去了。原来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王明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他先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最“左”的方针，这时他又执行了最右的方针。他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教育了我们党。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就是李立三。他们当时的主要错误，就是教条主义，硬搬外国的经验。我们党清算他们的错误路线，真正找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路。因此，才有可能在第四个时期，在蒋介石进攻我们的时候，把蒋介石打倒，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革命的经验，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经验，对你们许多国家不一定都适用，但可供你们参考。我奉劝诸位，切记不要硬搬中国的经验。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要争取和依靠农民，就要调查农村。方法是调查一两个或几个

农村，花几个星期的时间，弄清农村阶级力量、经济情况、生活条件等问题。像党的总书记这样主要的领导人员，要亲自动手，了解一两个农村，争取一些时间去做，这是划得来的。麻雀虽然很多，不需要分析每个麻雀，解剖一两个就够了。总书记调查一两个农村，心中有数了，就可以帮助同志们去了解农村，弄清农村的具体情况。我看很多国家的党，总书记不重视解剖一两个“麻雀”，对农村懂是懂得一点，但是不深刻，因此，发出的指示不很符合农村情况。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的负责同志，也要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两个“麻雀”。这就叫做“解剖学”。

调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走马看花，一种是下马看花。走马看花，不深入，因为有那么多的花嘛。你们从拉丁美洲到亚洲来，是走马看花的。你们国家有那么多的花，看一看望一望就走，这是很不够的，还必须用第二种方法，就是下马看花，过细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

在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里，有两种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你们的国家有没有这两种资产阶级？大概都有的。

买办资产阶级始终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革命的对象。买办资产阶级又分属于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对买办集团的斗争，要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首先对付其中的一个，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例如，过去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有亲英、亲美的和亲日的。我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就利用英、美和日本的矛盾，首先打倒日本侵略者和依附于它的买办集团。然后，再去反对美、英侵略势力，打倒亲美、亲英的买办集团。地主阶级里头也是有派别的。最反动的是少数，那些爱国的，赞成反对帝国主义的，就不要放在一起打。还必须分别大地主和小

地主。在一个时候，打击的敌人不能太多，要打少数，甚至对大地主也只打击少数最反动的。什么都打，看起来很革命，实际上为害很大。

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冤家。中国有句俗话：“不是冤家不聚头。”中国革命有一条经验，对付民族资产阶级要谨慎。他们同工人阶级对立，同时又同帝国主义对立。鉴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个敌人不打倒，人民就不能解放，因此，我们一定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兴趣，因为他们和地主阶级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又是压迫和剥削工人的。因此，我们要同他们作斗争。但是，为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跟我们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对他们的斗争要适可而止，要有理、有利、有节。就是斗争要有道理，要有胜利的把握，取得适当胜利的时候要有节制。为此，要调查双方面的情况，要调查工人的情况，也要调查资本家的情况。只了解工人，不了解资本家，我们就无法同资本家开谈判。在这方面也要作典型调查，解剖一两个“麻雀”，也要用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个方法。

在整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时期内，我们要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使他们站在人民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在一定时期还要和他们保持联盟。这样做，有利于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利于发展生产、稳定市场，有利于争取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你们现在还没有取得政权，你们准备夺取政权。对民族资产阶级要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团结他们一起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他们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行；对他们反工人阶级的、反共的反动言行，进行适当的斗争。只有一个方面是错误的：只有斗

争，不要团结，是“左”倾错误；只有团结，不要斗争，是右倾错误。这两种错误我们党都犯过，经验很痛苦。后来我们总结了这两种经验，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必须斗争的就作斗争，可以团结的就团结起来。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团结他们，取得反对帝国主义的胜利。

在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无产阶级政党要把民族旗帜拿在自己手里，必须有民族团结的纲领，团结除帝国主义走狗以外的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让全国人民看到，共产党多么爱国，多么爱好和平，多么要民族团结。这样做，有利于孤立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共产党人不要怕犯错误。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如果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是成功之母？错误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过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物极必反”，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

# 对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 祝贺中尼协定<sup>[1]</sup>签订的电报的复电

(1956年9月25日)

加德满都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陛下：

值此中尼协定签订之际，承致祝贺，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陛下、尼泊尔王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祝中尼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在这一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的协定的基础上日益巩固和发展。祝国王陛下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6年9月25日

---

[1] 指1956年9月20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载于1956年9月24日《人民日报》。

# 关于公布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组织简则的命令

(1956年9月26日)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组织简则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第四十七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 在欢迎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 宴会上的讲话

(1956年9月29日)

毛泽东主席在宴会开始时致词，对阿查里雅首相和他的夫人以及同他一道来中国的朋友们表示热烈欢迎。毛泽东主席说：尼泊尔同中国有长久的历史关系，两国人民间有深厚的友谊。我们两国之间有一座山，这座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这座山不仅连结着中国和尼泊尔，而且也连结着中国和印度。所以，印度、尼泊尔和中国是连结在一起的，我们都是近邻。毛泽东主席接着举杯祝尼泊尔国王陛下的身体健康，祝尼泊尔王国首相阿查里雅阁下和他的夫人以及同他一道来中国访问的朋友们的身体健康，祝在座的印度朋友们的身体健康，祝中国、尼泊尔和印度三国团结一致，祝尼中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和最近签订的协定。



1956年9月，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访问中国。图为毛泽东在观赏阿查里雅赠送的象牙。

# 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 合法席位问题<sup>[1]</sup>

(1956年9月30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万隆会议<sup>[2]</sup>是一次很好的会议，万隆会议真了不得。一年多来，整个世界有很大的变化。是不是？

苏加诺（以下简称诺）：是的，的确如此。我不论到哪里，大家都提到万隆会议。

毛：从前大家都同时提日内瓦会议<sup>[3]</sup>和万隆会议。现在，日内

---

[1] 这是毛泽东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谈话。

[2] 万隆会议，即亚非会议，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5个发起国，以及阿富汗、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等，共29个亚非国家。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反殖民主义斗争、世界和平以及与会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发表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

[3] 日内瓦会议，指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中、苏、美、英、法五国参加所有两项议题的讨论。朝鲜北南双方及美、英、法以外的其他12个侵略朝鲜北方的国家参加了朝鲜问题的讨论，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和南越政权参加了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分别达成关于在印度支那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总称日内瓦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

瓦会议和日内瓦精神，大家都不大提了，剩下来的只有万隆会议。

读了你在美国的演说，我们都特别高兴。在那样的国家，讲那样的话，非常好。你代表了整个亚洲。

苏：我自己也认为是代表亚洲说话的。

毛：实际上，你是代表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美国招待得还好吧？

苏：一般地说，美国人的欢迎还是相当热烈的。但是，美国政府的领导人员大多不很高兴，因为我说的话，是他们不喜欢听的。不论他们喜欢不喜欢，事实我还是要说出来的。

在美国不论到哪里，记者都问，印尼对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我们的答复是很坚决的，中国必须参加联合国。我们还补充说，如果联合国没有代表六亿人民的中国参加，那末联合国就变成了演滑稽戏的场所。

毛：你认为中国进入联合国，是早一点好还是迟一点好？

苏：越早，对联合国越好。

毛：我们曾经想过另外一方面，不参加也不坏。

苏：印尼认为，越早越好。

毛：早参加或者迟参加，这两条我们都要准备。

苏：要快才好。

毛：我们觉得慢一点好。

苏：很想了解主席的想法。

毛：我们公开说要参加，朋友们也在这方面帮我们的忙，这是我们的权利。六亿人民的代表不参加，台湾却参加了，这是不公平的。现在不是我们在联合国代表台湾，而是台湾代表我们，这是不妥当的。在日内瓦的谈判中，我们也对美国提到这一点，指出他们

不对。但是，这不是日内瓦谈判的一个题目。日内瓦谈判的题目是：平民遣返问题，解除禁运问题，人民来往问题，更重要的是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苏：希望主席谈谈为什么中国不急于参加联合国。

毛：英国、美国、法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我们迟一点在国内给它们合法地位，就好一些。

苏：但是，问题是这三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抱有坏的企图，如果在联合国里没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参加，那末，帝国主义国家会更猖狂。

毛：我们可以在联合国以外反对。

苏：我还是不太了解。

毛：英国急于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叫做谈判，就如何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一谈就谈了五年。这期间，英国在中国的是谈判代表，而不是合法的外交官员。英国在联合国投蒋介石的票，而不投我们的票。这样，我们就更有理由，指责英国在两边搞。现在，我们和英国之间是半正式的外交关系。

苏：但是，主席还没有谈到联合国的问题。

毛：我正在讲这个道理。

法国、西德这些国家，我们也不急于同它们建交。它们既然不急，我们也不急。至于要拖多少年，那就看吧！它们要拖多少年，就拖多少年，美国也是这样。

美国现在是不想同中国建交，这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好的。美国天天骂我们，我们的耳朵已经听惯了。这就说到联合国了。美国是不赞成我们进入联合国的，它是要阻挠的。

苏：这个问题可以分开来谈。

中国同英国、法国、西德、美国建交的问题和中国参加联合国的问题，是两回事。帝国主义国家想控制联合国，中国参加了以后，就可以反对这种企图。

毛：问题是台湾。

苏：台湾问题可以搁在一边，台湾和中国是一回事，控制大陆的应该代表中国。

毛：这是你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但是，美国和追随美国的国家不这样想。

苏：问题可以这样解决：一个国家提出要中国参加联合国，其他的国家支持。这是要经过斗争的，印尼愿意参加这个斗争。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了联合国，代表台湾的人当然就没有权了。

毛：这样的提案需要过半数，还是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

苏：三分之二的多数。如果大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安理会不能否决。

毛：提案被大会通过以后，我们能不能进入安理会？安理会里是有否决权的，五大国<sup>[1]</sup>是需要一致的。在这五大国中，一大国曰美国，二大国曰蒋介石。

苏：不管安理会有没有否决权，提出来以后，就会引起斗争，这总是好的。

毛：这个我们赞成，但是最后还是难于解决。

苏：但是世界舆论就会不同。例如，大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安理会里如果有一个大国否决，那就做了一件笨事，一定会引

---

[1] 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即苏联、中国、美国、英国、法国。1956年，中国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仍被台湾国民党当局非法窃据。

起反感。

毛：好的，作为斗争，这是应该做的。但是，联合国里只能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而那个中国是我们。那末，我刚才已经说过要准备两条，我们就要准备进去，同你们一起，多一票。

苏：由一个中国代表整个中国，另外由台湾集团代表台湾，作为过渡的办法，主席认为这样一个策略如何？

毛：这个办法不妥。我们要借这个题目做文章。只要在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就不进去。

苏：但是，这只是作为一个过渡阶段，正像西伊里安<sup>[1]</sup>和印尼的关系一样。

毛：西伊里安不代表印尼。相反地，在联合国里，印尼有代表，西伊里安没有。

苏：中国和台湾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弄成像印尼和西伊里安的问题一样，那就是说，把台湾作为中国将要收复的领土？

毛：在联合国里有没有西伊里安的代表？

苏：我建议的只是过渡的办法呀！

毛：我们要借这个题目做文章。如果联合国里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

苏：那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蒋介石就要退

---

[1] 西伊里安，指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岛西部及其近海岛屿，今伊里安查亚省。1949年印度尼西亚独立时，荷兰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继续霸占这一地区。印尼政府曾多次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西伊里安问题，却屡遭阻挠和破坏。为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印尼人民展开声势浩大的收复西伊里安运动和反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迫使荷兰政府同意进行谈判。1963年5月1日荷兰政府将西伊里安主权交还印度尼西亚。

出，没有台湾代表的地位。

毛：对。

（面向黄镇<sup>[1]</sup>大使）中国京剧团到印尼去表演过没有？演出过《雁荡山》没有？

黄镇：演出过。

毛：在这个戏里，两派作战。保守派守城，革命派把城围住，后来飞进城去。英国报纸画了一幅漫画，说中国进入联合国，就像《雁荡山》一样，要飞进去，也就是说，我们要打进去。

苏：已经参加联合国的会员国可以联合起来，要求把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列入议程。

毛：赶走蒋介石的代表。

苏：这是最终要达到的目标。

毛：如果蒋介石的代表不走，我们就不去。我们还有很多文章好做。

苏：我这样提出问题，是为了要了解中国的态度。

毛：我们就是这样的态度。如果联合国大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提案，而我们却不能进入安理会，那我们就有了斗争目标，就还有时间。对我们来说，最好再等五六年。六年之后，我们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最好是等十一年，那时候我们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现在，我们是弱国，不是强国。美国怕苏联，但是不怕我们，它知道我们的底子。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是一个强国，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六亿人口。人家看我们不起，而且他们手里还有一个大东西，叫做原子弹。我们连一个大的都没有。

---

[1] 黄镇（1909—1989），安徽桐城人。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因此，何必急呢？

苏：刚才主席说，美国不怕中国。其实不是这样，美国是怕中国的，但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已经工业化，或者有原子弹。

毛：它是怕我们的政治。

苏：是的，怕中国的政治，怕中国的思想意识。

毛：怕我们去散布，对它不利。

苏：美国不赞成中国进入联合国，就是因为美国怕中国。

毛：美国是有一点怕中国。说老实话，我们也有点怕美国。

苏：澳大利亚也有点怕印尼。这不是因为印尼已经工业化了，而是因为印尼如果收回西伊里安，东伊里安也会成问题。

毛：你说的这个道理很对。

你认为我们做工作，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应该放在三大洲，那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剩下来的，只有小半个欧洲，半个美洲，一个澳洲。他们不赞成我们，我们准备等候他们一百年。

苏：哪些国家不赞成中国？

毛：英国，它现在还投蒋介石的票。只要它一天如此，我们就一天不同它建交。它一百年投蒋介石的票，我们就一百年不同它建交，只是交换代办。法国、比利时也不承认我们，还有葡萄牙、西班牙。

苏：正如我昨天在乌兰巴托的演说中提到的，世界上大多数人，几乎是全部，都赞成中国进入联合国。如果有些国家提出议案，要求联合国接纳中国，并且附上一个条件说，中国必须参加联合国，否则联合国就变成演滑稽戏的场所，这些国家就要退出。这样，美国如果反对，它就做了一件笨事。

毛：我们完全赞成这样做，但是不必退出联合国，可以在联合国里进行斗争。

苏：这个斗争是复杂的，我们需要互相商量。

毛：对的。最后，斗争的结果是蒋介石走路。到那时候，我们就飞进联合国了，戏就唱完了。但是，我们必须准备第二条，那就是，多少年不让我们进去。

苏：这同我们收回西伊里安的问题几乎相同。在印尼，一部分人主张把西伊里安问题撇在一边，先考虑如何建设，等到我们强大以后，西伊里安自然会回来。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我认为，应该一方面进行建设，另一方面要为收回西伊里安而斗争。

毛：这同台湾问题一样。一方面，我们要把自己建设强大，另一方面要尽快收回台湾。台湾和西伊里安一样，有两个收回的时间。第一是早一点，这当然是最好的。第二是迟一点，这也可以，我们也可以睡觉，不致于失眠。

苏：但是，这样会不会影响人民的斗争情绪呢？

毛：问题不是全靠我们来解决的，对我们来说，当然最好是早一点。

苏：是不是应该考虑到，人民的斗争情绪像火一样，不扇的话，就会熄灭？

毛：火是在烧的，但是，仍然有两个时间：一个是早一点，另一个是迟一点。

苏：从这一点来说，我是同意的。我们应该一方面进行建设，同时还要继续斗争。

毛：早一点当然最好，迟一点也可以。

苏：当然不是一两天可以办到的。

毛：不是一两天，也不是一两年，而是十年八年，甚至还要多。

苏：这一点我同意。收回西伊里安不是五六年之内的事，还要更长的时间。但是，对人民说话的时候，我们必须说，要继续斗争，要在明年收回西伊里安。

毛：我百分之九十九同意你。我们也是每天宣传收回台湾，只是我们不讲明天或者明年。我们天天要求进入联合国，但是我们不讲时间。我们天天说要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建交，包括美国在内，但是我们不讲时间。中国人办事，就是不讲时间的。有些人讥笑我们，说中国人总是慢慢来。我们恰好就是这一条。

苏：这是一种策略。

毛：不是，的确是如此。问题的解决，不决定于我们这一方面，要对方改了才成。

苏：对方是谁？

毛：英国、美国、法国、台湾、西伊里安、荷兰。问题是它们的参谋长是它们自己的人，而不是我们的人。如果阿卜杜加尼外长去作美国的外长，那就好了。

苏：现在西德的人也是这样说。他们说，阿登纳<sup>[1]</sup>下台的话，整个西德就会变。

毛：如果它变了，并且提议同我们建交，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了。

苏：主席的话很有味道，都是实实在在的。

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中国方面认为，我们应该早一点还是迟一点在联合国提出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

---

[1] 阿登纳（1876—1967），当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

毛：早提。

苏：这就好了。

毛：每年都要提一次，哪年成功就算完事。

苏：要成功的话，还要经过斗争。早提有很多好处，这样可以使各国表明立场，阵线分明。

毛：完全对。

禁运的问题也是这样。我们天天要求解除禁运，但是迟一点解除也可以。实际上，最好是再迟几年解除。说老实话，我们没有好多东西，无非是一些苹果、花生、猪鬃、大豆。

不解除禁运，我们也睡得着，吃得饱。我们可以等六年，等十一年。到那时候，解除了禁运，承认了中国，让中国进入联合国，然后他们到中国来一看，他们会后悔的，也就是说，他们发现已经无能为力了。

苏：难道他们对中国的发展不了解吗？

毛：了解是了解的，但是，他们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说现在这样做是上当了，但是他们还有另一方面的困难，使他们要同我们顶。因为这个口子是决不得的，一决以后，黄河的水就要流。对他们来说，面子就很不好看。我们的想法是，早一点承认也好，迟一点承认更好。到那时候，他们到中国来，就悔之已晚，就将无能为力。而且，我们还有第二条，那就是，要他们在全世界面前丢脸。因为是他们不承认我们，而不是我们不承认他们。我们天天要同他们建交，而他们不同我们建交。不是我们不进入联合国，而是他们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天天要他们解除禁运，但是他们不解除。结果，就会使美国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一切理由都抓在我们手里，都抓在我们朋友手里。对付美国人是要有一点办法的，要有两

条，一条不行。第一是坚决斗争，每天都要叫，这是你的办法。二是不要着急，这一条是不登报的。

我们同蒋介石也是这样微妙的关系。我们要同他恢复友好和合作的关系。我们过去合作过两回，为什么不能合作三回呢？但是蒋介石反对。他每天反对，我们就每天说要同他合作。这样就使我们的蒋委员长很难处，他的内部正在分化。

苏：美国人民和美国的统治阶级也不一致。美国国会里也有人赞成中国进入联合国。

毛：不是多数赞成。

苏：但是已经有人赞成。

毛：我们看到有人赞成就高兴。这次中国共产党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在政治报告和决议中都说，愿意同一切国家建交。但是，在这些报告和决议里，都没有我刚才向你讲的第二条的内容。因为我们是好朋友，所以我让你知道这个底子。



1956年9月3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机场迎接印度尼西亚代表。



1956年9月30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北京机场迎接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一行。



1956年9月30日，毛泽东和苏加诺通过北京街道，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1956年9月30日，毛泽东和苏加诺乘坐敞篷汽车前往中南海，沿途受到几十万群众的热烈欢迎。



1956年9月3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



1956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检阅庆祝国庆节的群众队伍。

# 在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 宴会上的讲话

(1956年10月2日)

总统阁下，印度尼西亚的贵宾们，  
女士们，  
先生们：

我们热烈地欢迎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苏加诺总统前来我国访问。我们感谢苏加诺总统给我们带来了八千二百万印度尼西亚人民兄弟般的友谊。

印度尼西亚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对印度尼西亚人民和苏加诺总统怀有最大的敬意。曾经被殖民主义统治了三百五十年的印度尼西亚，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以后，终于赢得了民族的独立。现在，印度尼西亚人民正在为维护民族团结、逐步肃清殖民主义的残余势力和保卫世界和平而进行着勇敢的斗争。苏加诺总统在这些斗争中所起的卓越作用，和最近在欧美各国访问期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民同声赞扬的。印度尼西亚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和要求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是正义的，中国人民坚决地支持你们。

印度尼西亚执行积极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无论对印度尼西亚人民，对世界和平，都有很大好处。万隆会议已经产生了广泛而

深远的影响，印度尼西亚对这次会议的召开曾经作了重大的贡献。印度尼西亚在国际事务上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爱好自由和独立的人民，都在反对殖民主义。在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问题上，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必须继续对埃及的正义斗争给予坚决的支持。殖民主义者希望我们不团结，不合作，不友好。我们必须用加强团结、加强友好合作来回答它们，我们必须使殖民主义者的阴谋彻底破产。

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历来就是很好的朋友。近年来，我们两国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中的友谊，更加加强了。我深信，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建立在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上的友好合作关系，今后必将更加巩固和日益发展。

我建议大家举杯，  
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友谊，  
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世界的和平，  
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  
为苏加诺总统的健康，  
干杯！



1956年10月2日，毛泽东宴请印尼总统苏加诺。



1956年10月，毛泽东和陈毅、苏加诺在北京。

# 在苏加诺总统为印尼建军十一周年 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

(1956年10月5日)

总统阁下，朋友们，同志们：

在印度尼西亚建军十一周年这个重要的节日，我首先要向苏加诺总统、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表示衷心的祝贺。我祝贺英勇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在争取实现印度尼西亚人民理想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什么是印度尼西亚人的理想呢？苏加诺总统在最近对我们所作的几次重要的演说中，已经说得很明白，那就是：独立的理想、和平的理想、新世界的理想。这些也正是中国人民的理想。为了争取实现这些理想，中国人民同印度尼西亚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而且永远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忠实的战友。

总统阁下，六天来，你已经看到了中国人民对你的欢迎和敬爱。你的访问已经使我们两国人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明天，你就要离开北京，不久以后，你就要离开中国。虽然我们又将要相隔几千公里，但是，我们的心，我们两国人民的心，将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我建议：

为我们两国人民永恒的友谊，

在苏加诺总统为印尼建军十一周年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

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苏加诺阁下的健康，

干杯！

# 为日本商品展览会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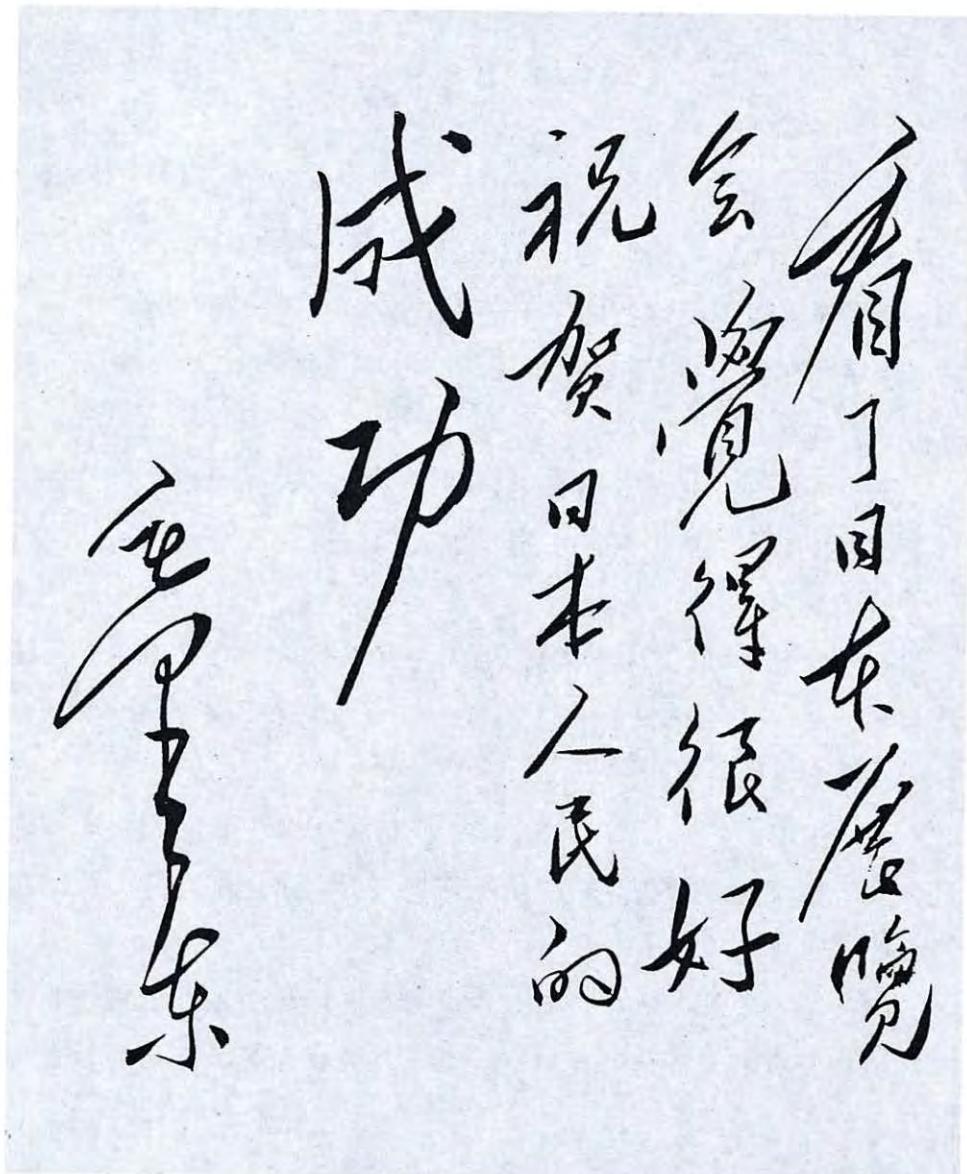
(1956年10月)

看了日本展览会<sup>[1]</sup>，觉得很好。祝贺日本人民的成功。

毛泽东

---

[1] 毛泽东于1956年10月6日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村田省藏等的陪同下参观了日本商品展览会。这是毛泽东为展览会写的题词。



毛泽东为日本商品展览会的题词。

# 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谈话

(1956年10月12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在南斯拉夫，妇女的权利怎么样？

申特尤尔茨<sup>[1]</sup>（以下简称申）：南斯拉夫宪法规定妇女和男子享有同样的权利。

毛：宪法还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实际的执行同宪法的条文还有差别。不知在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里，妇女的权利是否同男子一样？

波波维奇<sup>[2]</sup>（以下简称波）：美国和英国的妇女同男子享有同样的权利，她们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在有些国家，例如瑞士，妇女就没有被选举权。

毛：在中国，参加政府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妇女毕竟也是少数。妇女的权利在宪法中虽然有规定，但是还需要努力执行才能全部实现。

申：毛主席讲得很对。例如在南斯拉夫解放初期，国民议会候选人的联合名单上有一半是妇女，那是因为联合名单是南斯拉夫共

---

[1] 申特尤尔茨，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团长，当时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副主席。

[2] 波波维奇，当时任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

产党<sup>[1]</sup>提出来的，名单上的那些妇女一般都能当选。后来实行了个别提名，当选的妇女就减少了。那是因为在某些政治上落后的地区，也就是人民政治觉悟不高的地区，人们不愿意提名妇女为候选人。目前，南斯拉夫妇女在人民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工会和工人自治管理机关内，还是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毛：在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百分之十二是妇女；在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中，女代表占百分之十七。在北京、上海、天津三个中央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女代表占百分之二十。

申：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sup>[2]</sup>中，女代表占百分之六。在各个联邦共和国的议会中，女代表占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五。例如在斯洛文尼亚的议会中，女代表占百分之二十五。在一些基层的立法机构中，女代表占百分之三十。

毛：将来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各占百分之五十。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过了男同志，也没有什么坏处。这个目标只能在全世界不打仗了，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那时生产有了高度的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才可以完全实现。不尊重妇女权利的情况，是在阶级社会产生后才开始的。在阶级社会出现以前，有一个女权时代，妇女是占统治的地位，听说那时候她们不需要打扮，而相反地男人却要打扮，以获得她们的欢喜。只有当阶级社会不存在了，笨重的劳动都自动化了，农业也都机械化了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农业合作化以后，妇女

---

[1] 南斯拉夫共产党成立于1919年，在1952年11月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2] 1963年4月7日通过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将联邦国民议会改称联邦议会。

们参加了生产，在经济上显出了能力。过去她们搞家务多，搞农业生产少，现在她们参加农业生产，权利也增加了。但是合作化后，农业生产还是主要靠体力劳动，妇女又要兼顾家务，所以只有当农业机械化以后，才能根本改变这种情况。现在，在重工业部门中，主要还是男同志从事劳动，轻工业部门中女同志比较多。

申：在南斯拉夫也有同样的问题。在一些重工业集中的地区男工占多数，因此他们结婚就成了问题。目前，我们也开始在重工业地区设立一些轻工业，使女工人数有所增加。

毛：在中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在南斯拉夫是否实行计划生育？

波：南斯拉夫是一个小国家，人口不多，因此南斯拉夫政府一直很重视人口的增加。

申：我们已经开始设立一些儿童福利会，它的主要职责是在母亲们工作的时候，照顾她们的孩子。最初这种组织只是设立在工厂或大的地区，现在也开始努力在一般的居民区设立这种组织。此外，我们还有服务站，主要是帮助工作太多的母亲们兼管家务。服务站的工作，使主妇们减轻了很多家务负担，使她们能更积极地参加政治和文化活动。有一些女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工作很繁忙，但是又要照料家务，因此过度疲劳，影响了正常的工作。通过服务站的帮助，可以减轻她们家务的负担。

毛：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不知服务站的工作项目是哪一些？

申：服务站的工作根据各地区的情况而有不同的项目。主要的项目有洗衣服、熨衣服，打扫房间，照料小孩，缝纫，代做饭菜，送牛奶、面包、水果，等等。服务站主要是南斯拉夫妇联创办的。对妇女的政治教育工作，就主要由工会和社会主义联盟来进行。

毛：在南斯拉夫，有没有因为孩子太多而父母的收入不够维持生活的情况？

申：没有这种困难，因为每生一个孩子国家就发给补贴金。但是有些父母不把补贴金用于孩子的福利，在这种情况下，妇女组织、工会和党的组织就要指导孩子的父母如何来使用这笔补贴金。在南斯拉夫，我们也为节育提供便利，我们设立了一些节育指导站，人们在节育方面有什么问题，可以同他们研究。

毛：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我们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sup>[1]</sup>，他就提倡节育。

波：请问在中国究竟是工人还是知识分子比较赞成节育？

毛：不论是工人还是知识分子，只要是孩子多的、家庭负担重的都赞成节育。

申：在南斯拉夫我们也宣传避孕的知识，这种宣传主要是妇联来做的，我们也研究和制造避孕的药品。此外，还用一些办法来限制生育，那就是对孩子多的父母，多收孩子的托儿费，不知在中国是否也可采取这种办法？

毛：这种办法在我们这里恐怕行不通。孩子多的父母，本来就有经济上的困难，如果再增收他们的托儿费，那末经济上就会更困

---

[1] 邵力子（1882—1967），浙江绍兴人。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

难了。我们的干部过去是享受供给制待遇，他们的一切费用都由公家包了。现在实行了薪金制，孩子的托儿费要干部自己负担，这在客观上也是对多生孩子的一个限制。

申：感谢毛主席今晚的接见，我们能有机会同你谈话，觉得很高兴。在中国期间，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看到了生产力的发展，也看到了工人们高度的热情。你们对工人福利的关怀，对母亲和孩子的照顾，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们是到了一个友好的和同志般的国家，在各地受到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妇女的热烈欢迎，就好像置身在老同志和老战友之间。我们同中国妇联的同志们进行了座谈，交流了经验。我们也会见了一些革命经历很长的女同志，在一起交流了革命斗争中的经验。我们有着这些坚固的联系，这将帮助我们把社会主义建设成功。我们要感谢中国妇联的领导同志们，她们促成了这次访问，并且把访问日程安排得很好，使我们有机会看到每一样希望看到的东西。

波：我也要感谢毛主席和其他在座的同志们。每一个南斯拉夫的代表团来到北京时，毛主席总是予以接见，南斯拉夫政府的领导人和人民深切感谢毛主席这一盛情的表示，他们非常懂得这种表示的意义。

毛：我们今天谈得很好，特别是接触到了人类生活本身的一些问题。

# 给戴毓本<sup>[1]</sup>的信

(1956年10月13日)

毓本同志：

给我的信收到，甚为感谢。很久以前的一信，也早已收到，因忙未复，幸谅。希望你继续努力工作，争取光明的前途。敬祝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

以习梅<sup>[2]</sup>现在所处地位，似可不必再有检举。

---

[1] 戴毓本，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同学，曾在毛泽东等在长沙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当时是北京苏联红十字会医院医生。

[2] 习梅，即彭习梅，戴毓本的丈夫。当时任湖南省参事室参事。



1956年10月，毛泽东接见少数民族参观团。



1956年10月，毛泽东接见云南省少数民族参观团。



1956年10月，毛泽东接见广西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参观团。



1956年10月，毛泽东接见贵州少数民族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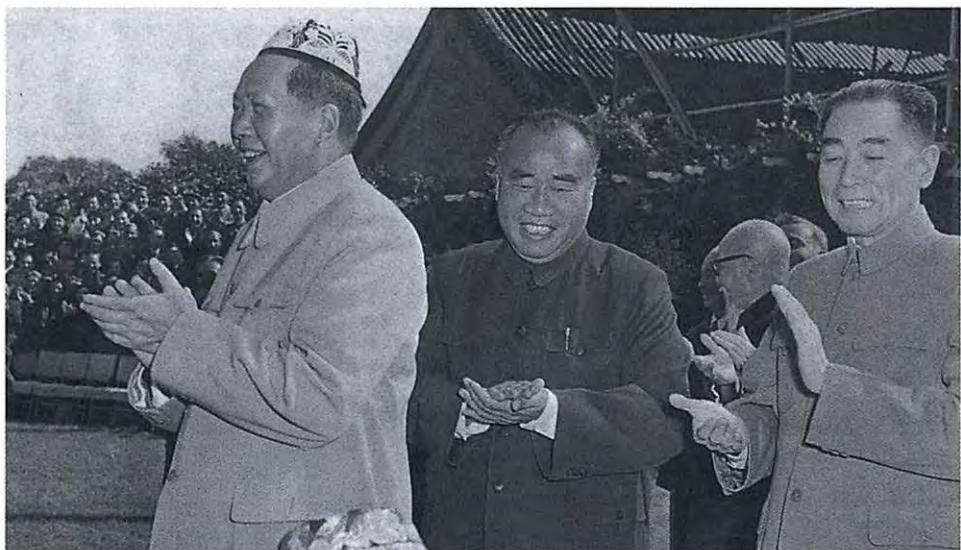
1956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观看各族人民敬献的礼品。



1956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观看各族人民敬献的礼品。



1956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观看各族人民敬献的礼品。



1956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接见少数民族代表并观看他们敬献的礼品。



1956年，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张闻天在中南海颐年堂前交谈。



1956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宋庆龄、陈毅、张闻天在中南海。



《永远跟着共产党 永远跟着毛主席》(油画)

# 对金日成关于志愿军赴朝参战六周年贺电的复电

(1956年10月27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参战六周年之际，承来电祝贺，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向你，并且通过你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中朝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通过保卫和平的正义斗争和两国经济、文化关系的增进正日益巩固和发展。我们谨祝你们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毛泽东

1956年10月27日

# 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三十九周年的电报

(1956年11月6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布尔加宁同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长德·特·谢皮洛夫同志：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九周年的時候，我們代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向你們，並且通過你們向兄弟的蘇聯政府和蘇聯人民致衷心的、熱烈的祝賀。

一年來，蘇聯人民在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領導下，在共產主義建設事業中以及在爭取和緩國際緊張局勢的鬥爭中，都獲得了顯著的成就。這些成就鼓舞了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和為爭取美好未來而鬥爭的各國人民。

蘇聯和社會主義各國的團結和合作也有了新的發展。我們高興地看到，最近蘇聯政府發表了關於發展和進一步加強蘇聯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誼和合作的基礎的宣言<sup>[1]</sup>。這個宣言充分地表現了

---

[1] 指1956年10月30日發表的《蘇聯政府關於發展和進一步加強蘇聯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誼和合作的基礎的宣言》。這一宣言，載于1956年11月1日《人民日報》。

苏联忠于社会主义各国伟大团结的共同利益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毫无疑问，苏联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步骤将会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团结和友好关系，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的共同的经济高涨。

中苏两国的伟大友谊和合作已经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中国人民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深知中苏两国的永恒友谊是符合于我们两国人民和全体进步人类的根本利益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个友谊将会极大地增强和平、民主、社会主义的力量，并且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祝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永恒的兄弟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1956年11月6日于北京

# 关于合作社养猪问题的批语<sup>[1]</sup>

(1956年11月)

—

请尚昆办。

此文印发八届二中全会各同志阅看。请各省市区负责同志注意：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把这篇文章印发一切农业合作社，以供参考，并且仿照办理。要知道，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可是这一带没有喂猪的习惯。这个合作社改变了这种习惯，开始喂猪。第一年失败，第二年成功，第三年发展，第四年大发展，平均每人约有猪二头，共计二万头。这个合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九日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看了山东省阳谷县石门宋乡农业生产合作社副主任宋保恩的《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后写的批语，这篇文章和批语（去掉抬头和第一句话）后来发表于1956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本篇二写在陈云1956年11月15日关于拟将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草案）下发征求意见给邓小平的信上；本篇三写在国家计委1956年11月14日报送的商业局一位副处长关于江苏省昆山县同心社养猪办法的报告上。

二

即退陈云同志：

在第五页和六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sup>[1]</sup>，请酌定。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一日三时

三

少奇、陈云、小平阅，此件<sup>[2]</sup>似可转各省市区党委参考，请小平酌处。

毛泽东

十一月卅日

---

[1]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草案）第五页“今后收购的肥猪，每头给养猪农民留肉十斤到十五斤”一句后，加写了“（其中应有猪油四斤到五斤）”；将第六页上“除大城市外，中小城镇各机关、部队、学校的伙食单位，凡有条件的都可以养猪”一句，改为“除大城市城区以外，大城市郊区和中小城镇各机关、部队、学校的伙食单位，凡有条件的都可以养猪”。

[2] 指国家计委商业局一位副处长关于江苏省昆山县同心社养猪办法的报告。报告说，这个社养猪的特点是：（一）由社里划出一定耕地来种菜做饲料。（二）每头猪只喂到毛重120斤，每亩可养7头。（三）一年养两次，每头只养半年。这种办法在有条件的地方是值得提倡的。195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发了这一报告。

# 为“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 纪念大会”<sup>[1]</sup>题名

(1956年11月1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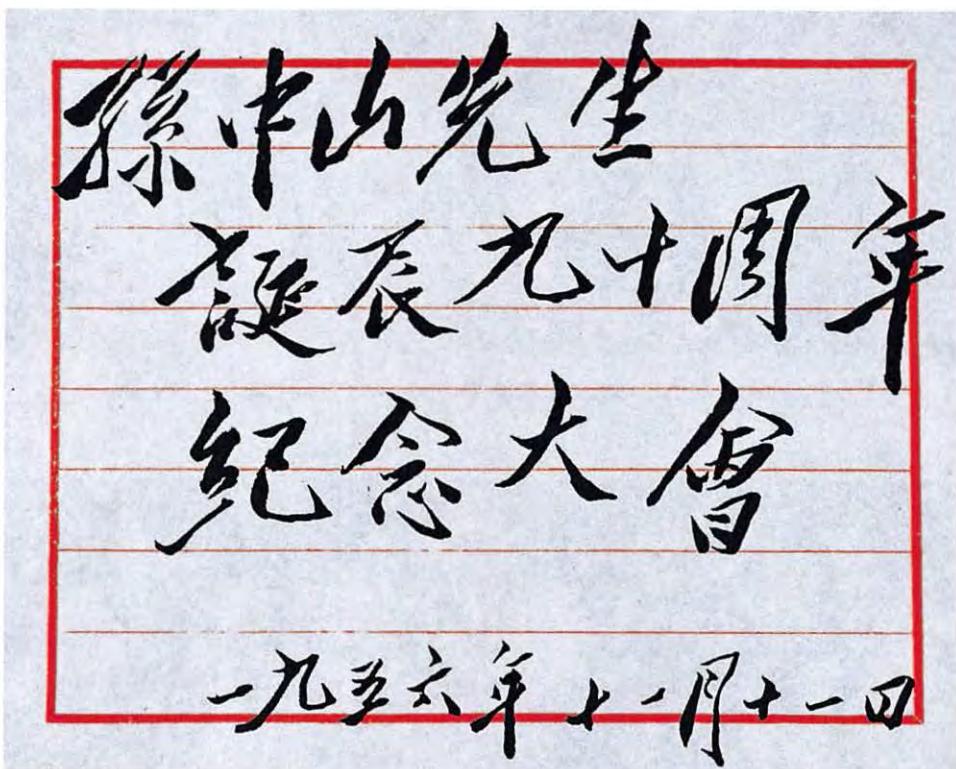
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

[1] 1956年11月11日北京举行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的隆重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了大会。这是毛泽东为大会题写的会名。

为“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题名



毛泽东为“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题写的会名。



1956年11月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缅甸领导人吴努。



1956年11月5日晚，毛泽东在北京体育馆观看苏联国家马戏团的表演。演出人员休息时，毛泽东亲切会见马戏团的艺术家们。



1956年11月6日，毛泽东等和来访的意大利社会党农业考察团合影。



1956年11月11日，毛泽东观看叙利亚议员代表团赠送的礼物。



1956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接受印度记者夏尔玛的采访。

# 纪念孙中山先生<sup>[1]</sup>

(1956年11月12日)

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

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

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

---

[1] 这是毛泽东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写的文章。

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四十五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孙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的。

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 关于团结党外军人问题的批语<sup>[1]</sup>

(1956年11月13日)

各同志阅。退彭德怀<sup>[2]</sup>同志。

转发各军区、各军事学校以及有同样统战问题的军或师的党委阅读，加以讨论，仿照办理，认真解决团结党外军人问题。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三日

---

[1] 这是毛泽东转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五军政治委员王振乾1956年10月29日关于团结该军军长陈明仁一起工作问题给广州军区党委的报告的批语。报告谈了军党委常委在同陈明仁相处中存在的缺点，以及为团结他一起工作采取的具体改进措施。通过相见以诚，多次找他个别恳谈和集体交换意见，并改进领导制度，从而增强了团结。陈明仁表示对他帮助很大，希望今后大家常谈心。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 国家预算要保证重点建设 又要照顾人民生活<sup>[1]</sup>

(1956年11月13日)

(一) 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生产都有所增长。

(二) 一九五六年的国家建设事业是有成绩的。一九五六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其他事业开支，大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不正确。在308亿元（旧价<sup>[2]</sup>）的预算开支中，有20亿元到30亿元用得不恰当或者用多了，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约占15亿元左右。

(三) 一九五六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有所增加，人民是高兴的。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

(四) 一九五七年的预算，收支各为308.65亿元（其中包括自筹资金2.15亿元。308.65亿元折合旧价为317.65亿元）。在预算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为157.26亿元，社会文教支出为39.3亿元，国防支出为57亿元，行政支出为25亿元，债务支出为8.42亿元，援外和其他支出为6.41亿元，国家物资储备支出为5亿元，信贷资金为5亿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发言要点。

[2] 指1955年的价格。

元，总预备费为5.26亿元。在经济、文教、国防、行政支出中，基本建设投资合计为126.73亿元（折合旧价约为135.73亿元），其中自筹资金2.15亿元。一九五七年度预算是平衡的，但是打得较紧，并且应该使它与现金平衡相结合。

（五）钱和材料只有这样多，一九五七年的年度计划，在某些方面必须比一九五六六年作适当压缩，以便既能保证重点建设，又能照顾人民生活需要。压缩的重点在中央，地方也应尽可能地压缩。虽然如此，总的说来，我们的建设事业还是前进的，因为一九五七年的收支均比今年有所增加，收入增加22.5亿元，即增长8.2%；支出增加9.53亿元，即增长3.2%。关于压缩问题，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物资不足，应该首先支持必要的生产，同时注意平衡。

（六）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发动一个增产节约运动。<sup>111</sup>增产必须在原料有保证和社会需要的条件下进行，同时必须保证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节约是有希望的，必须在不降低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的条件下讲求节约。在企业、事业和行政开支方面，必须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厉行节约。在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必须节约原材料，适当降低成本和造价，厉行节约。

[1] 1957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指示提出：对1957年建设的规模作适当的调整，对原定在一九五七开工的建设项目，应当进行具体分析，重新排队；把那些在今年和明年都有可能和有必要施工的项目，列入年度计划，对去年已经施工的项目，也应当进行排队，把那些在今年还有可能和有必要继续施工的项目，列入年度计划。在工业、农业的生产中，在运输、邮电和商业的经营中，都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广泛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克服各种浪费现象。大量节减行政管理费用，严格限制人员的增加，合理调整现有的机构和人员，逐步改变某些不合理的工资福利制度，并且彻底地消灭铺张浪费现象。

(七) 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的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

#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发言<sup>[1]</sup>

(1956年11月15日)

毛泽东同志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他表示完全同意全会所采取的各项方针和措施。毛泽东同志号召全体国家工作人员、经济工作人员首先是各方面的负责工作人员，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与群众同甘共苦，反对铺张浪费现象，并且采取整风方法，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他要求全党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国际交往中坚决反对大国主义。他着重指出：只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密切依靠人民群众的原则，反对一切形式的脱离群众的作风，我们和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力量，就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而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

[1] 这是新华社报道的毛泽东的讲话。

#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956年11月15日)

我讲四个问题：经济问题，国际形势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大民主小民主问题。

## —

我们对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进还是退，上马还是下马，都要按照辩证法。世界上，上马和下马，进和退，总是有的。那有上马走一天不下马的道理？我们走路，不是两个脚同时走，总是参差不齐的。第一步，这个脚向前，那个脚在后；第二步，那个脚又向前，这个脚在后。看电影，银幕上那些人净是那么活动，但是拿电影拷贝一看，每一小片都是不动的。《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

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虽然有下马，总是上马的时候多。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根本还是促进的。社会总是前进的，前进是个总的趋势，发展是个总的趋势。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不是正确？我赞成这种意见，就是说，前四年的情况可以看得清楚，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将来搞了几个五年计划，有了经验，是不是还会犯错误呢？还会犯的。经验是永远学不足的。一万年以后，搞计划就一点错误不犯？一万年以后的事情我们管不着，但是可以肯定，那个时候还是会犯错误的。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sup>[1]</sup>，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一部分是苏联帮我们设计的，大部分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你看中国人不行？我们也行。但是，也要承认我们还有点不行，因为有一部分自己还不能设计。前几年建设中有一个问题，就象有的同志所说的，光注意“骨头”，不大注意“肉”，厂房、机器设备等搞起来了，而市政建设和服务性的设施没有相应地搞起来，将来问题很大。我看，这个问题的影响，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而

---

[1] 这里是指孔子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参见《论语·为政第二》。

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也许还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否正确，现在可以作一点结论，明年也可以作一点结论，我看要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期才能完全作出结论。这里头不犯一点主观主义是不可能的。犯一点错误也并不坏。成绩有两重性，错误也有两重性。能够鼓励人，同时会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总的说来，现在看不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什么大错，有什么根本性质的错误。

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有些人曾经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那个时候有个“促退委员会”。后头我们说不应当泼冷水，就来一个促进会。本来的安排是用十八年时间基本完成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促进就很快。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上写的一九五八年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现在看样子今冬明春就能实现。虽然毛病也不少，但是比那个促退会好，农民高兴，农业增产。没有这个合作化，今年这样大的灾荒，粮食就不可能增产两百多亿斤。在灾荒区，有合作社，生产救灾也方便。要在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根本条件下，批评他们的缺点，批评我们自己的缺点，这样，他们就有一股劲了。群众要求办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群众解释清楚，也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每年国家预算要三榜定案。就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还有一些有关同志，开三次会，讨论定案。这样就使大家都能了解预算的内容。不然，总是经手的同志比较了解，而我们这些人就是举手，但是懂不懂呢？叫作又懂又不懂，不甚了了。用三榜定案的办法，你就那么十分懂？也不见得，还是跟经手的同志有距离。他们好比是戏台上的演员，会唱，我们好比是观众，不会唱。但是，

如果我们看戏看久了，那个长，那个短，就可以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戏唱得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要改正演员的错误，还是靠看戏的人。观众的高明处就在这个地方。一个戏，人们经常喜欢看，就可以继续演下去。有些戏，人们不大高兴看，就必须改变。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内部又有专家同非专家的矛盾。专家有专家的长处，非专家有非专家的长处。非专家可以鉴别正确和错误。

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报告中说过“稳妥可靠”这个话，我建议以后改为“充分可靠”。今年一月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时候，我曾经提过要“充分可靠”。稳妥和可靠，意思是重复的。用稳妥形容可靠，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限制什么。形容词一面是修饰词，一面是限制词。说充分可靠，这就在程度上限制了它，不是普通可靠，是充分可靠。要做到充分可靠是不容易的。今年六月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预算的时候，大家都说是可靠的。现在看起来，这个预算有不到十分之一不可靠，有的项目安排得不对，有的项目用钱多了。所以，以后要注意安排好预算中的项目。项目到底安排得好不好，要靠专家注意，同时也要靠我们，特别是省一级的同志注意。当然，大家都要注意。

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要抓财政，抓计划。以前有些同志没有大抓。粮食、猪肉、鸡蛋、蔬菜等问题，请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相当大。从去年冬季以来，集中搞粮食，忽略了副业和经济作物。后头又纠正这个偏差，来搞副业和经济作物，特别是二十项、三十项比价一定，什么棉粮比价，油粮比价，猪粮比价，烟粮比价，等等，这样一来，农民对副业、经济作物就大有味道，而粮食不行了。开头一偏到粮食，再一偏到副业、经济作物。谷贱伤农，你那个粮价那么便宜，农民就不种粮食了。

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

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棚子，我看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

要抓报纸。中央，各级党委，凡是出版报纸的地方，都要把办报看成大事。今年这一年，报纸上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而对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这些东西，很少宣传，以后报纸的宣传重点要放到这方面来。广播电台讲的那些东西，恐怕也是从报纸上来的。所以，要把新闻记者、报纸工作人员和广播工作人员召集起来开会，跟他们交换意见，告诉他们宣传的方针。

这里还讲一个镇压反革命的问题。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无非是唱对台戏。这个戏，我们就是老跟民主人士唱得不对头。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们一个不杀。但是，那些“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生产力就是两项：劳动者和工具。不镇压反革命，劳动人民不高兴。牛也不高兴，锄头也不高兴，土地也不舒服，因为使牛、使锄头、利用土地的农民不高兴。所以，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

二

国际形势，总的看来是好的。几个帝国主义算什么呢？再加几十个帝国主义也不怕。

现在有两个地方发生问题，一个是东欧，一个是中东。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sup>[1]</sup>，英、法武装侵略埃及，我看这些坏事也都是好事。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许多人看到那个“事”字上边有一个“坏”字，就认为它只是坏。我们说还有一个意义，它又是好事，这就是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凡是失败的事，倒霉的事，错误，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好的结果。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烧起来好，还是不烧起来好？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出了一个贝利亚，就不得了，怎么社会主义国家出贝利亚？出了一个高岗，又是大为一惊。我们就要从这些事情中得到教育。这类事情是题中应有之义，永远也会有的。

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

---

[1] 指1956年6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发生的骚乱事件和同年10月在匈牙利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事件。

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上层建筑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所谓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君子动口不动手”，最好的办法是用口。善讲不听，就会武讲。没有武器了，怎么搞呢？劳动者手里有工具，没有工具的可以拿石头，石头都没有，有两个拳头。

我们的国家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拿法庭来说，它是对付反革命的，但也不完全是对付反革命的，要处理很多人民内部闹纠纷的问题。看来，法庭一千年都要。因为在阶级消灭以后，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人们之间还会有斗争，还会有打架的，还可能出各种乱子，你不设一个法庭怎么得了呀！不过，斗争改变了性质，它不同于阶级斗争了。法庭也改变了性质。那个时候上层建筑也可能出问题。比如说，象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你说没有这种事呀？我看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的。

### 三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不同性质的对立的东西的统一。比如水，是由氢和氧两种元素结合的。如果没有氧，光有氢，或者没有氢，光有氧，都不能够搞成水。听说现在已经定下名称的化合物就有一百多万种，没有定名称的还不知道

多少。化合物都是不同性质的东西的对立统一。社会上的事情也是这样。中央和地方是对立统一，这个部和那个部也是对立统一。

两个国家也是对立统一。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都叫社会主义，有不同没有？是有的。苏联和中国的民族不同。他们那里三十九年前就发生十月革命了，我们取得全国政权只有七年。至于所作的事，那有很多不同。比如，我们的农业集体化经过几个步骤，跟他们不同；我们对待资本家的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的市场物价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处理农业、轻工业同重工业的关系，跟他们不同；我们军队里头的制度和党里头的制度也跟他们不同。我们曾对他们说过：我们不同意你们的一些事情，不赞成你们的一些做法。

有一些同志就是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其实，中国的东西也好，外国的东西也好，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每个省的工作也是一样，有成绩，有缺点。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总是有两点，有优点，有缺点，不是只有一点。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sup>[1]</sup>。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是一点论。现在，一点论在相当一些同志中间还不能改。他们片面地看问题，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一切照搬，不应当搬的也搬来了不少。那些搬得不对的，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的东西，必须改过来。

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是有

---

[1] 参见《周易·系辞上》。

许多事实证明了的。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揭露高岗的中央会议上，我曾经宣布说，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火。他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

我们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的人（不多）里通外国。这是不好的。我希望同志们在党组、党委里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一级，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说清楚，这样的事就不要干了。我们不赞成苏联的一些事情，党中央已经跟他们讲过好几次，有些问题没有讲，将来还要讲。要讲就经过中央去讲。至于情报，不要去通。那个情报毫无用处，只有害处。这是破坏两党两国关系的。干这种事的人，自己也搞得很尴尬。因为你背着党，心里总是有愧的。送过情报的讲出来就完了，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给适当的处分。

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象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

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那些地方发展了呢？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我们学的就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我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我们搞阶级斗争是从十月革命学来的。十月革命，无论城里、乡里，都是充分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现在苏联派到各国去当专家的那些人，十月革命的时候不过几岁、十几岁，他们很多人就忘记了。有的国家的同志说，中国的群众路线不对，很高兴学那个恩赐观点。他要学也没有办法，横直我们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我们不企图去领导任何别的国家，我们只领导一个地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了。

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

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列宁的脚没有了，或者还有一个头，或者把列宁的两只手砍掉了一只。我们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写了那么多东西，列宁写了那么多东西嘛！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

## 四

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

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斗资产阶级，狠狠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前几天群众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去示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开大会，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这也是大民主，是反对帝国主义。这样的大民主，我们为什么不爱好呢？我们的确是爱好的。这种大民主是对付谁的呢？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对付资本主义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要废除小生产私有制，就它的性质来

说，也是对付资本主义的。我们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动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主要是贫农下中农首先组织起来，上中农也只好赞成。至于资本家赞成社会主义改造，敲锣打鼓，那是因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来，工人群众又在底下顶他们，逼得他们不得不这样。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

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现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再来一个“五反”，他们是不赞成的。他们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教授是不是喜欢大民主？也难说，我看他们有所警惕，也怕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这里再讲个达赖的问题。佛菩萨死了二千五百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sup>[1]</sup>，而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出现这种坏的情况，我也高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我们就是那几个兵，横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们总是不要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它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跑掉一个达赖，我就伤心？再加九个，跑掉十个，我也不伤心。我们有经验一条，就是张国焘跑了并不坏。捆绑不成夫妻。他不爱你这个地方了，他想跑，就让他跑。跑出去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没有什么坏处，无非是骂人。我们共产党是被人家骂了三十五年的，无非是骂共产党“穷凶极恶”“共产共妻”“惨无人道”那一套。加一个达赖，再加一个什么人，有什么要紧。再骂三十五年，还只有七十年。一个人怕挨骂，我看不好。有人怕泄露机密，张国焘还不是有那么多机密，但是没有听见因为张国焘泄露机密，我们的事情办坏了。

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我们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土生土长，联系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我们有这么一

---

[1] 噶伦堡，是印度东北部的边境城镇，靠近我国西藏的亚东。

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要有这个信心。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学生上街？但是，在我们党员中有一部分人怕大民主，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官僚主义者，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你就要改。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如果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凡是贪污了的，要承认错误，在这期间把它退出来，或者以后分期退还，或者连分期退还也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免了，都可以。但是总要承认错误，自己报出来。这就是给他搭一个楼梯，让他慢慢下楼。对于其他错误，也是采取这个办法。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有人说，如果用这个办法，到下半年，恐怕就没有什么好整了。我们就是希望达到这个目的，希望在正式整风的时候，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都大为减少。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首先要保护

他，因为他不是反革命。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都用保护他又批评他的方法，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我赞成在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跟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是完全平均主义。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一个苹果不吃，饿死人没有呢？没有饿死，还有小米加酸菜。在必要的时候，在座的同志们要住棚子。在过草地的时候，没有棚子都可以住，现在有棚子为什么不可以住？军队这几天开会，他们慷慨激昂，愿意克己节省。军队这样，其他的人更要艰苦奋斗。不然，军队就将你的军了。在座的有文有武，我们拿武来将文。解放军是一个好军队，我是很喜欢这个军队的。

要加强政治工作。不论文武，不论工厂，农村，商店，学校，

军队，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各方面都要极大地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水平。



1956年11月16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和公安军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全体代表合影。



1956年11月16日，毛泽东接见全国烈属、军属、残废军人、复员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代表，和彭湃烈士的母亲周凤（中）、黄继光烈士的母亲邓芳芝（右）握手。



1956年11月，毛泽东等接见参加国防工程整治工作会议的全体干部。



1956年11月，毛泽东和华东军区炮兵副司令陈锐霆亲切交谈。

# 对关于目前沿海军事斗争的 几项规定的批语和修改<sup>[1]</sup>

(1956年11月21日)

—

退彭。有几处小的修改，请酌定。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一日

—

我们对帝国主义好战分子和蒋介石、李承晚<sup>[2]</sup>集团最近的军事示威、挑衅和寻找制造国际紧张局势借口的阴谋活动，必须提高警惕，加强戒备。必须遵照中央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既定方针，严守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6年11月21日报告的批语。本篇二和三是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目前沿海军事斗争的几项规定中的两段文字。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2] 李承晚，当时任大韩民国总统。

自卫的立场，采取特别慎重的步骤，决不主动惹事，以免政治上陷于被动，即使在某种情况下失去某些战机，也决不上敌圈套。

### 三

对越入我国大陆边缘上空的外国运输机，我海（边）防部队不要向其攻击，但应严密监视并即上报。如深入我大陆纵深，在确认为军用机而非民航机时，或发现进行空投特务、散发传单等活动时，则应迫其降落或歼击之。

# 关于土特产品收购工作 和统战工作的批语

(1956年11月24日)

—

送陈云、李维汉<sup>[1]</sup>同志阅，退毛。

请陈云同志看建屏一条消息<sup>[2]</sup>，我看这种情况，在全国是相当多的，应当统一加以处理。请维汉看武汉的一条消息<sup>[3]</sup>。

毛泽东

十一月廿四日

---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商业部部长。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2] 指新华社《内部参考》1956年11月21日第二〇五七期上刊载的河北省建屏县贸易系统有些单位，在收购农民土特产品时压秤压价，非法营利，引起农民不满的消息。

[3] 指同期《内部参考》刊载的武汉民主人士就匈牙利事件对我统战工作提出意见的消息。消息说，武汉民主人士希望中共从匈牙利事件中接受经验教训，进一步改进统战工作，采取措施改变“五统五不统”的现象。

二

请李维汉同志电话询问武汉什么叫五统五不统<sup>[1]</sup>。并要你改善工作。

---

[1] 这是当时武汉民主人士中对中共统战工作的意见的一种说法。五统五不统，是指统上不统下、统大不统小、统工商不统党派、统进步不统落后、统政治不统思想。

# 对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讨论 军队缩编等问题的批语<sup>[1]</sup>

(1956年11月25日)

刘、朱、陈、邓<sup>[2]</sup>即阅。退彭照办。<sup>[3]</sup>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6年11月23日报告的批语。

[2]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彭德怀呈送的中共中央军委《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通知》说：决定于1957年1月初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军队缩编问题和1957年的军队训练工作。随《通知》附送的《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草稿）》说：“军委决定：在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原则下，把我军的现有的员额裁减三分之一，即从三百八十三万人中裁减一百三十万人左右，保持二百五十万人或者更少一些的常备军队。”

# 在中央给周恩来的电报稿上加写的话<sup>[1]</sup>

(1956年11月30日)

苏方邀请书似以在十二月中旬或下旬发出较为适宜。此外请你看形势，对于西方在匈牙利组织颠覆活动一点，在适当时机加以揭露，你以为如何？

---

[1] 中共中央1956年11月30日给周恩来的电报，是由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转交的，当时周恩来正在印度进行国事访问。电报说：二十九日，尤金大使约见刘少奇时，口头转达赫鲁晓夫的意见，希望周恩来在访问阿富汗后能到莫斯科一谈，并问是否需要由苏方发出正式的邀请书。中央政治局常委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由苏联正式邀请访问是必要的。你的意见如何，请考虑电复，以便中央再行考虑决定后，答复苏共中央。毛泽东审阅电报稿时，在末尾加写了这段话。

# 为《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册》题词<sup>[1]</sup>

(1956年11月)

纪念孙中山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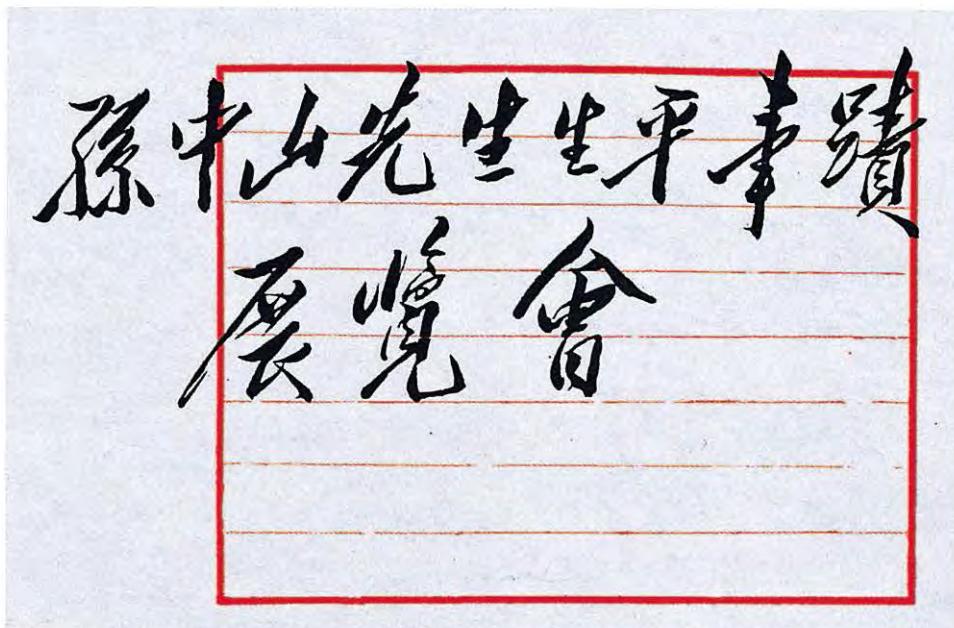
---

[1] 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发行了《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册》。毛泽东在其封面上题词：纪念孙中山先生。

# 为“孙中山生平事迹展览会”题名

(1956年11月)

孙中山先生生平事迹展览会



毛泽东为“孙中山生平事迹展览会”的题写的会名。

# 对《民建一届二中全会批评章乃器的一些情况》<sup>[1]</sup>的批语

(1956年12月)

---

[1] 指新华社《内部参考》1956年12月3日第二〇六八期刊登的《民建一届二中全会批评章乃器的一些情况》。文内说，不久前闭幕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对章乃器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会议通过的《关于讨论当前几个重要原则问题的决议》，就是针对章乃器的错误论点的。这个决议已由新华社摘要报道（见1956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但章乃器的意见未公开发表。文内还简要介绍了章乃器的主要论点和有关情况。章乃器说，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全行业合营后，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至于思想作风上的两面性，那是长时期的思想改造问题。不单是工商界要这样，许多人都要这样。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已经不存在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已经基本上消灭了；留下来只是残余或者尾巴罢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成为一个革命阶级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说它是红色资产阶级是说不到什么夸张的。”他还说：“各民主党派发出号召学习‘八大’文件是‘歌功颂德’，是‘礼多人不怪’。”“工商界进入社会主义，能交出企业而无所留恋，比那些赤手空拳、喊口号、贴标语的人进入社会主义要好些。”民建一届二中全会批评了章乃器的上述错误论点，指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还是存在的。否定或者不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消极的一面的想法和说法，在实际上必然会模糊当前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区别，从而使人忽略当前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将足以影响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进一步接受教育和改造，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不利的。”

少奇、陈云<sup>[1]</sup>同志阅，退毛。

此件第一篇关于章乃器<sup>[2]</sup>的，值得一阅。

---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2] 章乃器，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粮食部部长。

# 对邓子恢关于龙岩县农业合作社若干问题的报告<sup>[1]</sup>的批语

(1956年12月3日)

少奇、陈云、尚昆<sup>[2]</sup>阅，请尚昆转发各省市区党委作参考。

毛泽东

十二月三日

---

[1]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1956年11月27日关于福建省龙岩县农业生产合作社若干问题的报告说，中共龙岩县委最近召开了农业合作社社长会议，反映了合作社存在的以下问题。一、社员收入，各社多少不一。收入多的主要是搞好了副业，收入少的主要是靠种粮食。这种余粮社收入少的结果已引起农民重副业轻粮食生产。二、关于副业问题。社员分散搞副业影响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求除饲养家畜家禽、种菜及某些家庭手工业外，其他一般副业由社统一经营。三、公益金少留，无法解决困难户的困难，公益金不能少于全年收入的2%。四、关于办社规模问题。龙岩是山区，县委拟将现有的700多个社合并到300个左右，平均每社120户左右。五、关于生产计划，区乡政府只按照上级交代任务往下分摊，并未征求各社意见，这样机械地分配任务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六、贫农基金贷款太少，今春发下的双铧犁差不多99%不能用。七、干部配备上老农的比重过低。八、交通条件差，阻碍了山区生产的发展。

[2]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 给黄炎培<sup>[1]</sup>的信

(1956年12月4日)

任之先生：

惠书敬悉。

你们的会议<sup>[2]</sup>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

[1]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江苏川沙（1993年并入上海浦东新区）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指中国民主建国会1956年10月召开的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和同年11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

国际间麻烦问题不少，但是总有办法解决的。我是乐观主义者，我想先生也会是这样的。

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

去年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词<sup>[1]</sup>，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

### 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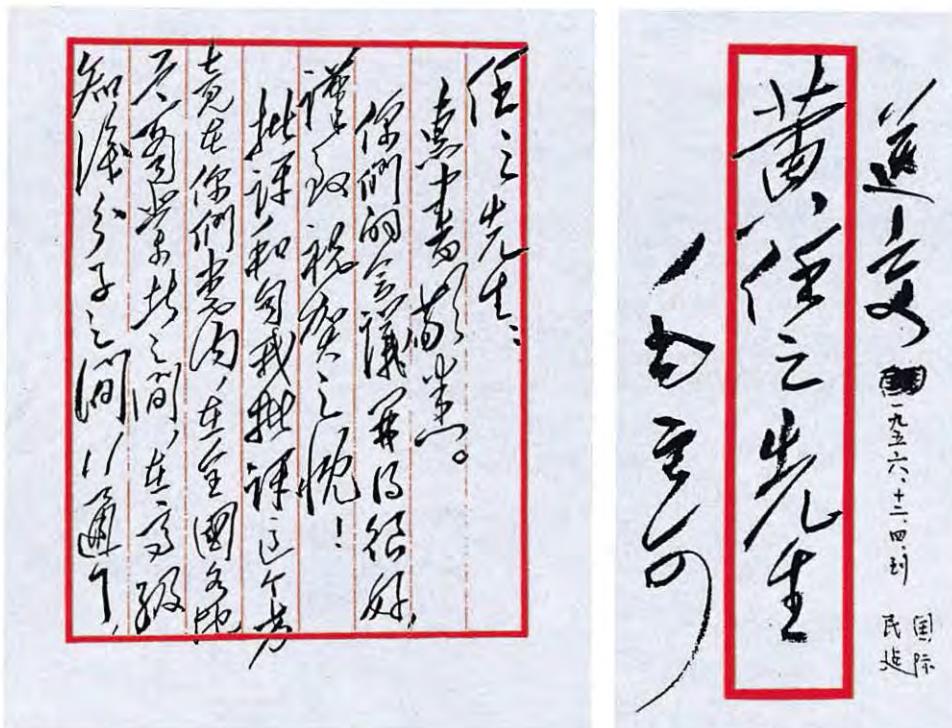
---

[1] 这里的“去年”应为“前年”，即1954年，《浪淘沙·北戴河》是毛泽东这一年夏天填的。《水调歌头·长江》是1956年6月填的，1957年《诗刊》1月号发表时，改题为《水调歌头·游泳》。词中的“逝者如斯乎”，在1956年12月16日给黄炎培的信中，更正为“逝者如斯夫”；“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在同年12月5日将这首词抄录给周世钊时，改为“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 水调歌头·长江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毛泽东致黄炎培信的手稿。



毛泽东致黄炎培信的手稿。

# 给周世钊<sup>[1]</sup>的信

(1956年12月5日)

惇元兄：

两次惠书均已收到，情意拳拳，极为高兴。告知我省察形情，尤为有益。校牌仍未写，因提不起这个心情，但却时常在念，总有一天要交帐的。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sup>[2]</sup>，无以为答。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录陈审正。

## 水调歌头·长江<sup>[3]</sup>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

[1] 周世钊，字惇元，当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2] 指周世钊1950年9月下旬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路过许昌时所作的《过许昌》一诗。全诗如下：“野史闻曹操，秋风过许昌。荒城临旷野，断碣卧斜阳。满市烟香溢，连畦豆叶长。人民新世纪，谁识邺中王！”

[3] 《水调歌头·长江》一首词，毛泽东写于1956年6月。词中的“逝者如斯乎”，在同年12月16日给黄炎培的信中，更正为“逝者如斯夫”。这首词的题目，1957年《诗刊》1月号发表时改为《水调歌头·游泳》。

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暂时不会出国，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

问好！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

# 给贺果<sup>[1]</sup>的信

(1956年12月5日)

贺果兄：

惠书敬悉。告我以中小学形情，极为有益。我暂时不会出国，请放心。情意勤恳，极为感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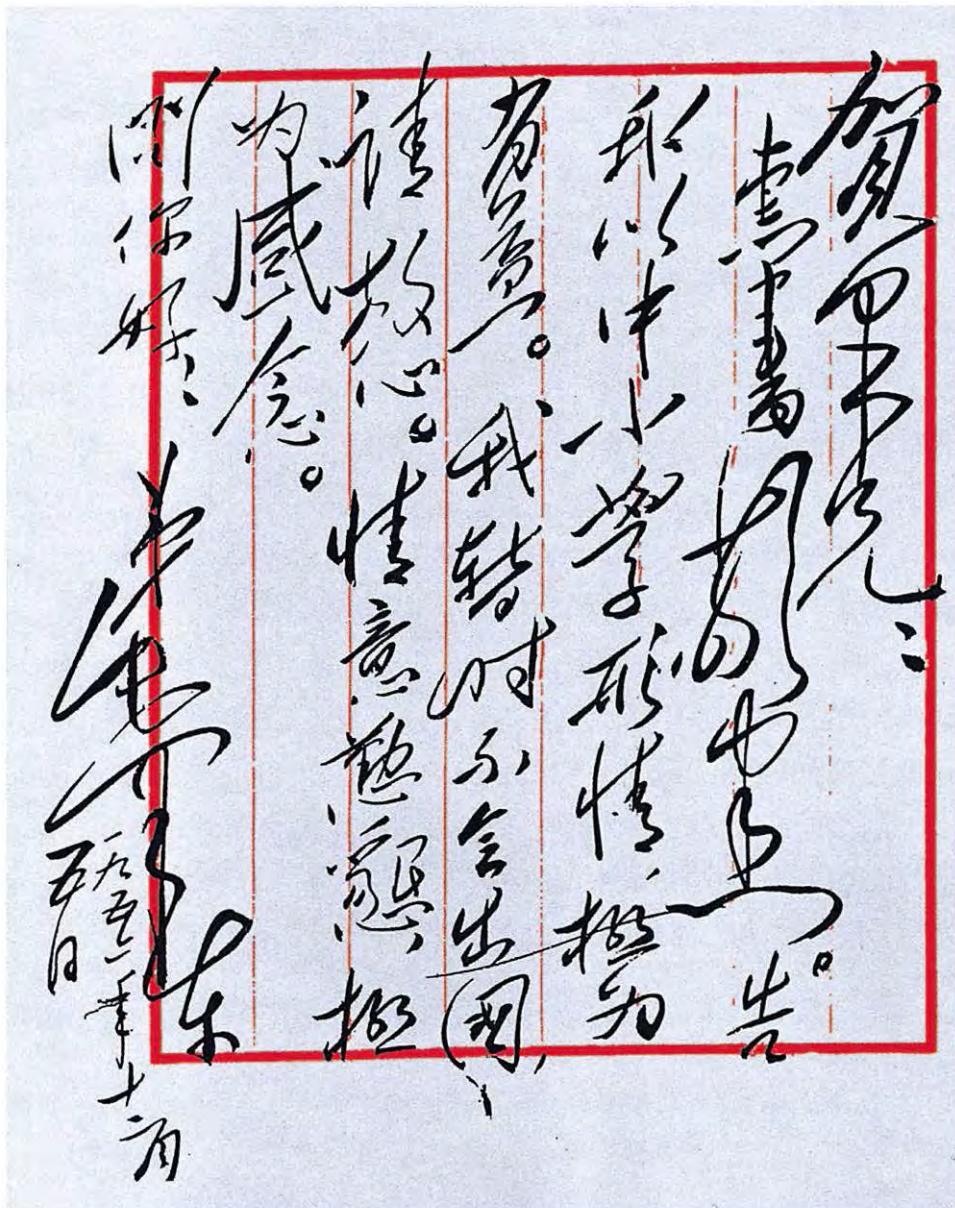
问你好！

弟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

---

[1] 贺果，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和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贵州省贵阳市副市长。



毛泽东致贺果信的手稿。

# 和民建、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

(1956年12月7日)

大家提了一些问题，现在我讲一讲。

在一九五五年十月的工商界座谈会上，我曾说：《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临走时还爱惜家具是有道理的。后来我去济南、徐州调查，还到曲阜、宿县、蚌埠、南京、苏州、上海、松江、杭州等地调查，他们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部完成，不是到一九六二年的问题，几个月就差不多了。上海的马天水<sup>[1]</sup>说，工商界两头小，中间大，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各占百分之二十、六十、二十。苏州的一位女副市长，她先讲工商界有四条优点，再说缺点，先鼓励后批评，又鼓励又批评，很好。据山东济南对二千六百个工商户的统计，先进的占百分之二十五，中间的占百分之五十，落后的占百分之二十五。当地的同志还很不满意，说中间的、落后的这么多。我就很满意，落后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嘛。今年一月杭州会议<sup>[2]</sup>上，发现了“三反”“五反”<sup>[3]</sup>以后大家心里有些害

[1] 马天水（1911—1988），河北唐县人。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

[2] 杭州会议，指1956年1月4日至9日在杭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会议。

[3] “三反”，指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五反”，指1952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怕。有个公股代表开会回来晚了，老板娘煮了一碗面条给他吃，公股代表不敢吃，怕挨批评。我们一些同志对资产阶级只批评不鼓励，不认识资产阶级这几年有很大进步，对资产阶级应该采取又批评又鼓励的方针。我一月南下到杭州开会，搞出四十条<sup>[1]</sup>。回来后开最高国务会议，我讲三年左右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八大<sup>[2]</sup>会议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我讲的不同，说是今年上半年基本完成的。谁讲得对？八大报告讲得对。基本完成说的是公私合营，不是国有化，国有化是全部完成。三年左右，可左可右。对我的这句话有人发生误会，想到是不是要取消定息<sup>[3]</sup>了。取消定息，那是全部完成，不是基本完成。

北京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英雄聚集一处，坏处是不出知识。要出知识就要地方上来人。你们工商联也是一样，空空的几条。地方上来人一吹就出知识。住在北京的人一年要下去半年。北京有理论，有原则，但缺乏实际；地方上有实际，但缺乏全面情况的了解。两者配合起来就好了。

定息拿多长的时间？这个问题，应当说八大已经解决了。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原则是要解决问题，时间服从原则。这问题处理得好坏，影响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宗教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国际上也有影响。共产党不想在这

[1] 四十条，指《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2] 八大，即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3] 定息，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即不论企业盈亏，统一由国家每年按照合营时清产核资确定的私股股额，发给资本家固定的利息（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从1956年开始支付定息，1966年9月停止支付。

上面省几个钱，要说服工人，向他们说明定息的时间长比短好。可以虎头蛇尾，七年虎头，五年蛇尾，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如果还需要延长，到第四个五年计划还可以拖下去。

取消定息不好搞什么高潮，一搞高潮就是整拿定息较多的人，而他们大都是先进核心分子。想快点摘帽子的是中小资本家，他们有些人拿的定息是很少的。小的资本家如果七年的时间等不了，是否可以先“开饭”，先取消定息，先摘掉帽子？我看两三年要求摘的可以先摘，我们一不提倡，二不搞高潮，三不登报。可以开“流水席”，有先有后。这个“开席”问题，是等齐了再开，还是开“流水席”，由民建和工商联讨论和掌握。中心问题不是在工商业资本家中的百分之九十，而是在百分之十。十三万工商户中，经济上起重大作用的，只有几千户、万把户。解决问题不能从人数来看，代表资产阶级的是大的资本家。

民建主要代表大的资本家。我们团结的主要对象、定息的主要对象是大的资本家，这些人是主客不是陪客。小的资本家是附属性质，替大的资本家加工订货，不起主导作用。我们不要使对国家经济起重要作用的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提出中小路线是没有把问题搞清楚。当然，中小资本家也有作用，也要照顾。

现在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还是反革命的阶级？不能说是反革命的阶级。他们有选举权，历来反对帝国主义，同政府合作，遵守宪法。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还是非对抗性的？妥协了，还有什么对抗。民族资产阶级遵守《共同纲领》<sup>[1]</sup>，

---

[1] 《共同纲领》，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它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拥护宪法，接受公私合营，没有对抗了。资产阶级在“三反”“五反”中只是部分的对抗，只有完全违法户才是对抗的。最近几年，更融洽了。现在是我们的工作跟不上，不能怪下级，只能怪上面，比如公私关系，不敢吃面条，不敢讲话，“左”的空气。座谈会<sup>[1]</sup>证明资产阶级的进步是主要的，但还有缺点错误，还要继续改造。资产阶级中，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是个别的，整个阶级不能说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现在有些文章太“左”了。合营了，没有对抗了，合营前已经没有对抗。民建、工商联、民主党派同我们是合作的，看不到对抗。要组织人写这方面的文章。

但是，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一面进步，一面落后。如果认为只有一面性，那就不需要改造了，说只有一面性，是不利于改造和进步的。我们的任务是又鼓励又批评，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自然界和社会的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对立统一的。又鼓励又批评，一万年也是这样。我过去说过两句话：人是可以分析的，不犯错误是没有的。资产阶级可以分析，共产党也可以分析。

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

---

[1] 指1956年7月6日至9日国务院第四办公室、第五办公室和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的有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民主建国会和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会上，工商界代表就公私关系、人事安排、工资待遇、定股定息以及小商小贩的安排等有关私营工商业改造方面的问题，反映了很多情况，并提出了不少的批评和建议。

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sup>[1]</sup>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这样定息也有出路。重庆的低质产品，旺季不合规格，淡季合规格了，是因为旺季社会需要太大，供应不足。供应不足是长期的，是好现象，是因为购买力增长。要想办法。定息时间要相当长，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公私合营有优越性，比不合营好，工人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方的态度也改变了。

国家积累主要靠工业，不靠农业。国家预算收入平均每年二百七十亿元，农业只有三十亿，加上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也不过七十亿左右。我们为什么保存资本家？因为国家有需要，对人民有利益，可以增加工业品。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同盟，才能巩固同农民结成的同盟，因为农民需要工业品进行交换。同时，还能比较好地稳

---

[1] 新经济政策，是苏俄1921年开始实行的用于代替“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主要内容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发展商业，在一定程度内允许自由贸易和私商存在；在国营企业中实行经济核算制，并以租让、租赁等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

定物价，保证市场供应。在过渡时期保存资产阶级，有极大的作用。八大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中讲了这方面的理由。

工商联将来怎么办？也可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定息取消了，资本家也还要改造。工商联这个名称可以保存下来。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瑞蚨祥、同仁堂<sup>[1]</sup>一万年要保存。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把《申报》<sup>[2]</sup>取消了，我不高兴。《解放日报》可以恢复为《申报》。党报也可以用原来的名字。我年青时到乡下走亲戚，那里都叫卖《申报》，可见深入人心。内容改变，名称保存。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sup>[3]</sup>要永远保存下去。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名称是封建时代的也可以。“长城”和“省”，就是从元朝开始这样叫的。

韩愈<sup>[4]</sup>有一篇文章叫《送穷文》，我们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将穷鬼送走。

---

[1] 瑞蚨祥，指北京瑞蚨祥绸布店，1870年前后开业。同仁堂，指北京同仁堂药店，1669年开业。

[2] 《申报》，1872年在上海创刊，1949年上海解放时停刊。

[3] 王麻子，指北京王麻子刀剪铺，1651年开业。东来顺，指北京东来顺饭庄，1903年开业。全聚德，指北京全聚德烤鸭店，1864年开业。

[4] 韩愈（768—824），河南河阳（今孟州）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

# 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

(1956年12月8日)

今天你们提出的许多问题，很好，对我帮助很大。你们要解决的问题，政府会和你们商量，协商一个办法。凡是能够解决的总要解决。有些问题我没有研究，不能答复。你们把问题都提出来，政府来研究，陈云副总理来考虑，解决一些能够解决的问题。

我看公私合营以来，工商界有很大进步，我们感觉比过去更加熟悉了，更加靠拢了。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只剩下了定息问题，在社会上的名誉也不同了，并且学习的热情很高，学习政治，学习本事，学习技术和管理方法。听说各地都办了学习班，每个城市一期有几百人，上海一期九千人，十期就有九万人，学习班里大、中、小资本家都有。这表现出很大的爱国主义，愿意为新的国家做工作。我对资本家的看法比过去有了进步，从前认为改造很困难，你们自己也可能没料到变化会这样快，学习中还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去年工商联开会时，许多人作了自我检讨。自我批评是我们共产党的办法，后来想在民主党派中试行。现在民主党派内搞开了，民建最近的一次会议，也用了这个办法，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人民内部解决问题的方法。共产党、政府、民主党派、工人、农民、工商界，包括恢复了选举权的地主，都属于人民内部。在人民内部，有缺点，有问题，要从团结出发，用批评和自我批评

的方法，提出意见，提出要求，解决问题，达到团结。

我们有两次革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过去了，问题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但还没有最后完成，在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合作化、公私合营等方面，都还有很多问题。将来社会主义改造全部完成了以后，也还会有许多问题。问题是层出不穷的，比如生活问题、工作问题、经济性质的问题、政治性质的问题、文化性质的问题。所谓问题，就是矛盾，世界是充满了矛盾的。今天你们提的问题，就是矛盾，就是不协调，摆得不平衡。

我现在谈谈时局。你们看，社会主义搞得成搞不成？你们是不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社会主义恐怕搞不成吧？社会主义阵营要崩溃吧？我看就是崩溃了，也没有什么大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社会主义阵营最重要的国家，是苏联和中国。中国同苏联靠拢在一起，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但现在还有人怀疑这个方针，说不要靠在一起，并认为可以采取中间立场，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做个桥梁。我们认为，站在中间这个办法并不好，对民族是不利的。因为一边是强大的帝国主义，我们中国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如果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间，看起来很好，独立了，其实是不会独立的。美国是不好依靠的，它可能会给你一些东西，但不会给你很多，帝国主义怎么会给我们国家吃饱呢？帝国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压迫的，压迫了几十年、几百年，从来不给它们吃饱过。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曾烧了我们的圆明园，夺走了我们的香港、台湾。香港是我们中国的，为什么他们要夺走？万隆会议为什么能够团结这么许多亚非国家？就是因为帝国主义是侵略压迫人家的。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幻想处在苏联和美国之

间做桥梁而有所得益，这种想法是不适当的。大工厂我们还不会设计，现在谁替我们设计的呢？例如化工、钢铁、炼油、坦克、汽车、飞机等工厂，谁给我们设计的呢？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替我们设计过。在我国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宗教界、工商界中，甚至在一部分无产阶级中，也还有人幻想美国会帮助我们，英国会帮助我们。这是不会的。

究竟“一边倒”对不对？我们一边倒是和苏联靠在一起，这种一边倒是平等的。我们信仰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我们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是硬搬苏联的经验。硬搬苏联经验是错误的。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农业的合作化是跟苏联不同的。苏联农业集体化后几年是减产的，而我们农业合作化后是增产的。今年灾荒比去年大，但粮食比去年可以增产二百三十亿斤，其他好几种经济作物也是增产的。这是因为我们的农业合作化是采取逐步渐进的办法，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分三步走。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把所有的人都包下来。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人都包下来了。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起了积极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现代化的，不是手工业的。在政治上是要求反对帝国主义的，有两面性，有要求革命的一面。人民政权建立以来他们是同政府合作的，企业又公私合营了。做了这样一些好事，不能说资产阶级对国家是无用的，应该说是有用的，而且是很有用的。这一点工人是不大了解的，因为他们在厂里从前是跟资本家作斗争的，我们应该对工人说清楚。工商界的习学高潮以来，你们愿意学习，工人是对你们改变观感的。在资本家中要宣传把个

人的事情和国家的事情联系起来，提倡爱国主义，总要想到国家的事情。在农村里过去曾提过“要发家，种棉花”的口号，结果大家只管家了，后来觉得这个口号提得不对，改为“爱国发家，多种棉花”，这就把家和国联系起来了。你们也要把家和国联系起来，这个国家你们也是有份的。

你们这个会<sup>[1]</sup>的中心是要讨论你们自己的事情，同时也要联系到国家的事情，回去宣传教育时也要联系到国家的事情。我们要提倡爱国主义。为什么要搞公私合营，要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便于把国家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我们在经济上是不独立的，大的机器不能做，精密的机器也不能做，只能做不大不小的机器。飞机才刚刚开始出厂，汽车才刚刚开始生产。什么国家替我们设计的呢？是苏联替我们设计的，我们应该同苏联合作。在我们的国家里，没有发生像有的国家那样一种反苏潮流，工商界当中也没有，青年大学生当中也没有。大学生中百分之七十是资产阶级的子弟，要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建设人才，我们是完全信任他们的。他们是你们的子弟，解决你们的问题对他们也会产生影响。至于入学、助学金、入团和戴红领巾这些问题，要一视同仁，只看条件如何，不要看家庭出身。如果成绩不够的，就是工农子弟也不能录取，资本家子女成绩够的就应该录取。助学金应该看学习成绩和家境情况来决定，大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就不要补助了，中小资本家出身而家境寒微的就应该补助。入团、入党都应该以是否具备条件作为标准。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爱国的阶级，但是不要说是红色资产阶

---

[1] 指1956年12月10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

级。民族资产阶级中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颜色不一，思想状态不一，并且有两面性，有进步的一面，有落后的一面，这是合乎事实的。因此，就有一个任务，就是学习。如果说都是好的，那就不符合事实了，也就不要学习了，变成圣人了。一个人不要满足，世界上的事情有很多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要加紧学习。我们承认自己的缺点，这是有好处的，这样我们就有个任务，要学习。

匈牙利事件<sup>[1]</sup>是出了好，还是不出好呢？既然有问题就不能不出，出了反而好，有脓包总要出脓。匈牙利事件主要是因为本国的工作没有做好，一概硬套苏联的办法，没有照顾到本国的具体情况。因此得出一条教训，我们要根据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来办事。我们提过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口号，但我们从来没有提过学习他们落后经验的口号。总的来说，中国政治上是好的，社会主义阵营也是好的，匈牙利事件也基本上解决了。当然，世界上还会出乱子的，中国也会出乱子的。但不要以为出了一个高岗，出了一个贝利亚<sup>[2]</sup>，斯大林犯了错误，就不得了，就睡不着觉了。我们政府的性格，你们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是跟工人、农民、资本家、民主党派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我们不是板起面孔专门教训人的，不是意见提得不对就给他一棒子，打得他头向下、脚朝天。我们叫人民政府，你们有话尽可

---

[1] 匈牙利事件，指匈牙利1956年10月至11月发生的反政府政治事件。

[2] 贝利亚（1899—1953），曾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部长等职。1953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认定他犯有“反党叛国”罪，决定将他开除出党。12月，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秘密审理了贝利亚案件，并发布了《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关于审理贝利亚等人叛国案件的通告》。贝利亚被判处死刑。

以讲，不会借故整人的。

我再来谈谈经济问题。你们关心的是大中小资本家的问题如何解决，定息问题如何解决。大、中、小应该分阶层。我现在提一点意见，是否对，请你们考虑。我主张把占百分之九十的中小资本家不划入资产阶级范围，拿到的定息只够买几包香烟的，就叫他们小资产阶级。资方代理人也是属于小资产阶级范围，叫上层小资产阶级。过去我们也这样搞过，在土改当中，有种小地主，就叫他小土地出租者，不叫他地主。资方代理人或拿定息很少的资本家，如果一定不愿意干，要劳保，可以把他们划出来，但不是今年，是明年、后年，以免百分之九十的人不要定息，使那百分之十拿定息的人过不去。是否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建议，请你们考虑，政府也要考虑。中小资本家愿意放弃定息就放弃，不愿意放弃的就让他拿下去。

关于定息的时间问题，大家很关心。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原则，就是要解决问题，不要损害资本家的利益，特别是不要损害大资本家的利益。是大资本家对国计民生的作用大，还是中小资本家对国计民生的作用大？中小资本家人数多，占资本家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但他们对国家经济生活的作用不大，对国家经济生活作用大的，还是大资本家。你们会说我照顾大资本家，不照顾中小资本家，是右倾机会主义。不是不照顾中小资本家，中小资本家人数很多，不注意安排是错误的，要替他们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我们党内有过中小路线，应当承认中小路线是不对的。对中小资本家必须照顾，现在我们把他们放在小资产阶级范围内来解决。农民是小资产阶级，是乡村的小资产阶级，城市也有小资产阶级，其中就包括中小资本家。从公私合营和国有化来说，大资本家对国家的意义更大。所谓大也是比较而言的，并不是说中小资本家就没有意义了。

没有中小资本家，没有手工业，我们就不能生活。没有农民我们就没有饭吃。不对大资本家很好地照顾，占百分之九十的中小资本家都摘掉了帽子，剩下的占百分之十的大资本家就会感到面子上不光彩，说别人都是红色的，我们还是白色的，不好看。我们不能这样做。

定息到底搞多长时间，中共中央讨论过，认为时间太短了不好，赎买就要真正的赎买，不是欺骗的。花不了多少钱。有人问究竟还有多少年？大家都很关心。我们以七年为期，即今年明年加上第二个五年计划共计七年。八大文件里已经有这个意思，现在和你们商量。工人可能会反对，中小资本家也可能会反对。工人会说太便宜了资本家，照工人的想法最好马上就取消定息。中小资本家认为搞一二年就行了，为什么要那样长。所以有两个抵触，第一个是工人，第二个是占百分之九十的中小资本家。这就需要说服。要赎买就要赎买到底，不要半赎买、半没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本钱也不大，工业私股资金只有十七亿元，折合美金七亿元不到，只有那么一点。我们国家怎么会不受欺侮呢？帝国主义欺侮我们是有理由的，民族资本只有这么一点嘛。要赎买就全部赎买，不要省这几个钱，不要虎头蛇尾，有始无终。要说服工人，不要损害大资本家的利益，这对整个国家是有利的。我说还可以拖一个尾巴，拖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你们看怎么样？七年是虎头虎身，如果还没有解决问题，还可以拖长一点，总要天理人情讲得过去。中小资本家人数多，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大资本家人数少，但他们的资本多，比中小资本家对国家的作用来得大，所以中小路线是不对的，应该是大中小路线。工商联大会的代表中，中小资本家占多数，要向他们说明不要损害大资本家的利益，损害他们的利益，对工人、

农民、中小工商业者都不见得有利。中小资本家的利益是尽早摘掉帽子，大资本家的利益则是定息时间拖长一些。可以各搞各的，要早摘掉帽子的就早摘，虎头虎身七年，愿意拿定息的还可以继续拿。这样做可以不可以？现在没有法律规定，大家可以商量，到了七年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再拖一个尾巴也可以。

要对工人说清楚，我们采取这个政策对整个民族是有利的，对工人、农民、中小工商业者都是有利的，这个利他们一时还可能不了解。大学生中百分之七十是资产阶级的子弟，他们是不要继承权的，但是对政府这样对待资本家他们是会满意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上层领袖、宗教界也都会满意的。很快地取消定息，他们会不满意的。还有外国人，他们到中国来都要到上海看看荣毅仁<sup>[1]</sup>先生，看看他有几部汽车，一部还是两部，房子里有没有钢琴。有一个法国资本家看过以后说，只要法国共产党这样做，他就放心了。我们这样做，对亚非国家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的影响也很大。所以，急于取消定息是没有好处的。实际上定息没有几个钱，一年只有一亿二千五百万元，有人还说只有一亿一千万，七年总计不到八个亿。这个钱没有送给日本人、美国人，是送给中国人的。总之肥水没有落入外人田，是“楚弓楚得”<sup>[2]</sup>，是国家的购买力，也是公债推销的对象，还可以用来开工厂，可以从各方面来考虑。我们做事要“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

[1] 荣毅仁，1916年生，江苏无锡人。当时任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

[2] 典出《说苑·至公》：“楚共王出猎而遗其弓，左右请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

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就者也”，<sup>[1]</sup>这是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说的。我们的革命就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工作，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革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经济制度加以改变，把政府、意识形态、法律、政治、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但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七年来我们发展了一些，还很少。现在我们只有四百多万吨钢，明年有五百万吨，再搞五年也只有一千多万吨钢。我们国家有六亿人口，这点钢不算事，同日本、法国比可以超过它们，要赶上美国一亿吨钢，还要四五十年才有希望。请大家把目标转向这个方面。过去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工商联开会，民建开会，大家学习，为的什么？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除了钢，我们还要别的东西，还要办学校，全国人民至少要初中毕业，再过多少年，扫马路的人、大厨师以及所有的人都要能够大学毕业，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我们一切的工作就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希望各位朋友引导参加会议的这一千多人，把目标向着生产方面。我们要有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在生产上、科学上、文化上翻身，所以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

[1] 参见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8页）。



1956年12月10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图为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见会议代表。

# 对浙江执行侨务政策情况报道的批语

(1956年12月8日)

罗瑞卿<sup>[1]</sup>同志：

111页上关于浙江省的一条消息<sup>[2]</sup>值得一看。

毛泽东

十二月八日

---

[1] 罗瑞卿，当时任公安部部长。

[2] 指新华社《内部参考》1956年12月6日第二〇七一期刊登的《浙江省许多地区在执行侨务政策中存在不少严重缺点》。文内说，出席浙江省最近召开的侨眷、归侨代表会议的代表反映，浙江各地（特别是农村）在对待侨眷和归侨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不少青年由于亲属在国外不能入团，甚至入工会也受阻碍；国外来信被拆阅以至传阅；干涉侨汇使用，强迫借贷、捐款和购买公债；一些公安部门对归国观光、探亲的华侨出国多方限制、留难。代表们认为，政府的政策是很好的，但宣传工作做得不够，下面执行得不好，要求大力开展对侨务政策的宣传，重视贯彻侨务政策的问题。

# 给杨开智<sup>[1]</sup>的信

(1956年12月13日)

子珍兄：

历次惠书并寄照片均已收到，甚谢。敬问老太太<sup>[2]</sup>及阖家安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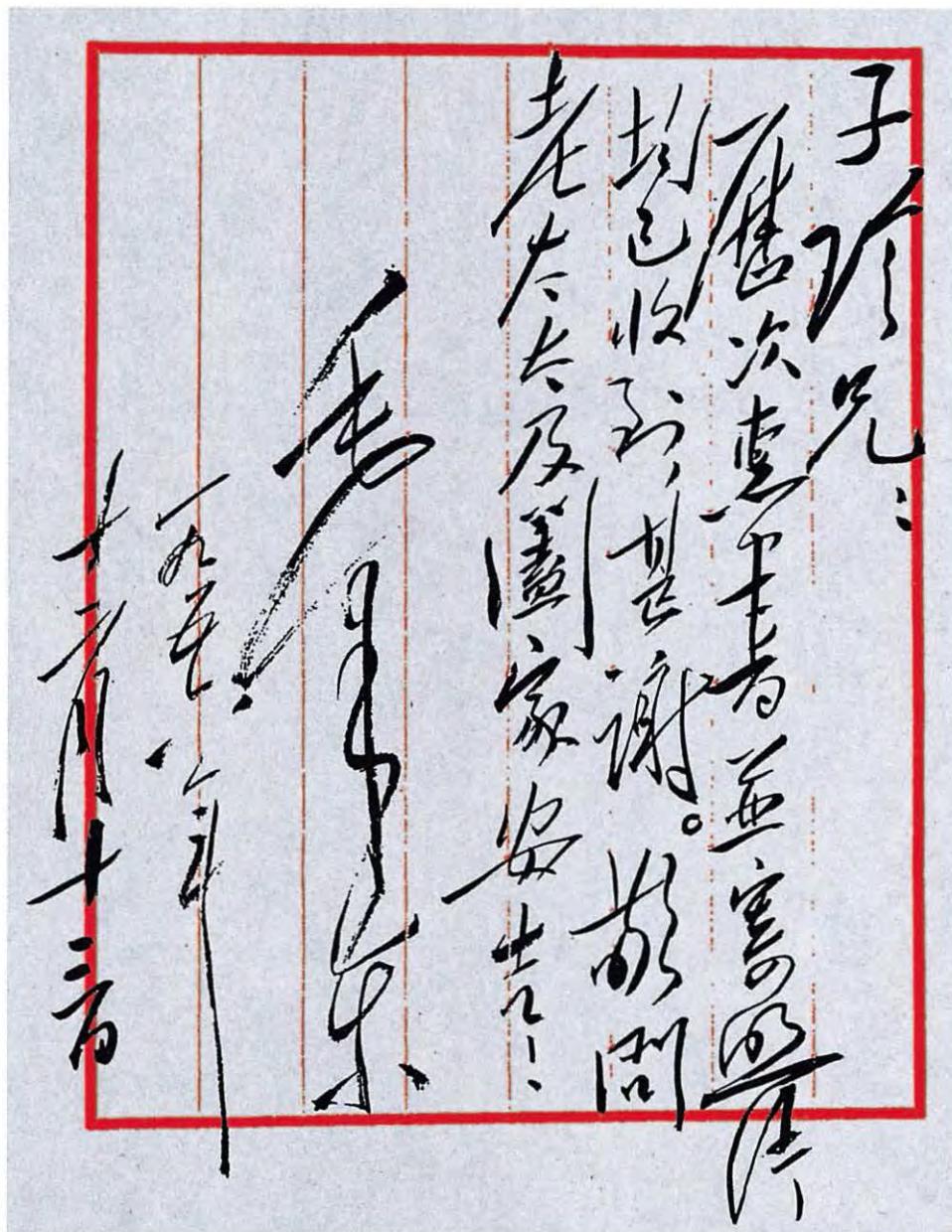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

[1] 杨开智，字子珍，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之兄。

[2] 指杨开智和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



毛泽东致杨开智信的手稿。

# 给毛春秀<sup>[1]</sup>的信

(1956年12月13日)

春秀同志：

给我的信早已收到，多年不见，甚为高兴。

调你儿子做财经工作一事，我不能办，要在当地所属机关自己申请，乞谅为荷！

祝好！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

[1] 毛春秀，毛泽东的姑母。

# 关于军事系统 向中央汇报工作问题的批语<sup>[1]</sup>

(1956年12月14日)

退彭德怀<sup>[2]</sup>同志：

可以准备在春季或春夏之间了解几个军事部门的工作情况。

毛泽东

十二月十四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彭德怀1956年12月13日关于军事系统向中央汇报工作问题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上。报告说，你在今年夏季说过两次，军事系统各部，也要照政府各部一样，系统地向中央汇报一次工作。我认为这不仅对于中央政治局或常委会的同志了解国防建设是必要的，同时对于军事系统各部、各军种、兵种的同志也是一次很大的鼓励。因八大前后事情很忙，这项工作未能进行，可否在明年1月初旬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进行汇报。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 对中央关于西藏问题复电稿的修改和批语<sup>[1]</sup>

(1956年12月16日)

—

中央和毛主席历来认为改革一定要得到达赖、班禅<sup>[2]</sup>和僧侣领导人的同意，要各方条件成熟，方能实行。现在无论上层和人民条件都不成熟，所以目前几年都不能实行改革，中央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但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

---

[1] 中共西藏工委1956年12月12日电告中央，西藏拉萨等地可能发生暴乱。中央统战部于15日为中央代拟了关于西藏可能发生暴乱对策问题的复电。这份电报原只发给西藏工委，毛泽东审阅时在电头加写了“并发驻缅甸大使馆转周总理，另发驻印度大使馆知悉”等文字。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央复电稿集中修改的一段，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

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sup>[1]</sup>，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目前应把在六年内不改革的方针在党内在藏族上层普遍加以传达，工委可以在最近约自治区筹委会和噶厦的主要官员座谈，向他们说清上述中央的方针。

二

少奇阅，即刻发，再送朱、陈、彭、谭、徐冰、洛甫、汉夫<sup>[2]</sup>阅。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六日

---

[1] 指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有十七条。

[2] 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谭，指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洛甫，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汉夫，即章汉夫，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 转发南京军区党委关于密切军队 和地方关系的报告的批语

(1956年12月16日)

请总政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将此件<sup>[1]</sup>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军区党委及志愿军党委，一律仿照办理，并以结果上报。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

[1] 指南京军区党委1956年11月16日关于进一步密切军队和地方关系问题的建议给中央军委、总政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提出在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的关系上还存在着某些不够协调的情况。例如，有些部队对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地方全面工作照顾、配合不够，向地方提出的有些要求偏高偏急，而有些地方工作同志因对部队情况缺乏了解，对其特点和需要也照顾不够，等等。为了进一步密切军队与地方党政的关系，解决现存的一些问题，报告建议在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月期间，请地方各级党委主持召开有驻军党委同志参加的会议，检查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商讨今后密切联系、加强团结的措施，研究如何共同努力加强治安工作，搞好新兵征集、复员转业等项工作。

# 给黄炎培<sup>[1]</sup>的信

(1956年12月16日)

任之先生：

惠书敬悉。前信<sup>[2]</sup>无甚深意，以不发表为妥。水调歌头：逝者如斯乎的“乎”错了，请改为“夫”字。赠吴湖帆先生、张叔通先生<sup>[3]</sup>各五百元，敬请转致为荷。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指毛泽东1956年12月4日给黄炎培的信。

[3] 吴湖帆，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张叔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江苏省和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 给杨开英<sup>[1]</sup>的信

(1956年12月16日)

开英同志：

很久以前接你一信，甚为高兴。拖延未复，以后查不到你的地址了。近日毛世美<sup>[2]</sup>他们来看我，知道你在大连的育英中学做教务长，又说你仍患肺病，甚为系念。寄上一点钱以供医药之用。如有所需，尚望告我。我的情况尚好。杨老太太<sup>[3]</sup>及杨子珍夫妇<sup>[4]</sup>和我仍有联系。便时望以你的情况见告。

祝好！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1] 杨开英，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堂妹。当时任大连第三中学副教导主任。

[2] 毛世美，现名毛臻，毛泽东的远房侄孙。

[3] 指杨开智和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

[4] 即杨开慧之兄杨开智（字子珍）和他的夫人李崇德。

开英同志：  
你信中所提问题甚为高见。  
在你未便渡江之前，你的地址  
已由毛岸英寄来。我知  
道在大連的清华大学你身体  
一直不好，你患肺病甚重。  
希望你上医院治疗。  
此致  
毛泽东

我的情况尚好。杨太太  
及杨之父来信都很好。  
望。往常以你的情况  
祝好。  
毛泽东  
十一月廿六日

毛泽东致杨开英信的手稿。



1956年，毛泽东和毛泽青等在中南海合影。

# 对邓子恢关于撤区并乡 试验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6年12月21日)

震林、尚昆同志：

此件<sup>[1]</sup>请书记处加以讨论，如大家赞成的话，则转发各地仿办<sup>[2]</sup>。

毛泽东

十二月廿一日

---

[1] 指邓子恢1956年12月18日关于福建省龙岩县白土区撤区并乡试验情况给邓小平转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今年5月龙岩县委并区并乡时将白土区撤销，合并于附城区（5个小区合成的大区），将原属7个乡并为3个乡，将原来乡干部中较强的调到县区工作。结果，乡的范围扩大了，任务加重了，干部的力量却削弱了，乡干部成天忙于日常事务，不能深入下层。针对这个情况，今年11月在白土进行撤区并乡试验，将3个乡并为1个乡，将原来区里的主要干部调回去，并将原3个乡的干部12人合并，名称叫乡，实际上是区，干部相当强，可以独立工作。改编之后一般反映较好，有利于减少层次，发挥乡的积极性，加强乡的领导。

[2] 1956年12月28日，中央批转了邓子恢的报告。批语指出，中央认为龙岩县白土区撤区并乡的经验是好的，可供各地参考。但目前对全国撤区并乡问题还不能作出统一的规定，各地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和自己的经验，自行决定撤区（或撤销全部、或撤销大部分、或撤销一部分）或不撤区，并乡或不并乡，以及何时撤区并乡。凡撤区并乡的地方，应根据乡的范围大小，配备较强的干部，并注意总结经验。

# 关于上海天主教工作的批语<sup>[1]</sup>

(1956年12月21日)

—

陆定一<sup>[2]</sup>同志：

天主教事现在是否仍归你管理？上海的天主教工作值得加以研究，将那里的有关管理和接触天主教的干部和天主教中的进步分子加以教育，使他们善于做工作。

毛泽东

十二月廿一日

—

此条<sup>[3]</sup>可以一阅。

阅后退毛。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一个内部刊物的封面上。

[2]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3] 指这期刊物刊载的《上海市卢湾区宗教界人士的思想情况》这条消息。

#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问题的批语<sup>[1]</sup>

(1956年12月24日)

此件送陈叔通先生一阅<sup>[2]</sup>，退还陈云副总理。

我在这里<sup>[3]</sup>讲的是“大约三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讲三年全部完成。所谓基本完成，在工商业就是公私合营，但不是三年而是半年即完成了，我多估计了两年半。所谓全部完成，就是国有化，即取消定息，那是至少需要七年的。

毛泽东

十二月廿四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高智1956年12月23日关于遵陈云之嘱将同年1月26日《人民日报》送给毛泽东审阅的报告上。

[2]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看了毛泽东这一批语后，于1956年12月25日写了以下一段话：各报均如此登载，我们各级工商业联合会亦是照此传达，只是未曾再加一句：即是走上高级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而不是国有化。因此，有些人不懂基本两字，懂的亦不免怀疑，说三年结果去冬今春已走上国家资本主义，可能再两年即转变为国有化。这次毛主席说明定息七年还可能拖一个尾巴，大家就安心了。陈云将陈叔通写的这一段话报送毛泽东。

[3] “这里”，指高智送阅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毛泽东1956年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讲话中说：“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

# 对中央转发统战部关于加强 地方政协工作意见的指示稿的 批语和修改

(1956年12月24日)

## —

在中央指示<sup>[1]</sup>的末尾加了一段，请少奇、徐冰<sup>[2]</sup>同志再阅，交尚昆<sup>[3]</sup>办。

## 二

大约在一九五七年夏季，中央将召开一次专门讨论全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会议，请你们早作准备，将所属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包

---

[1] 指中共中央1956年12月24日为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加强政协地方委员会工作的意见》给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并转各地委、市委、县委的指示。毛泽东在审阅这一指示稿时，在末尾加写了一段话，即本篇二。

[2] 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括少数民族工作）加以认真的检查和安排。对于有些在党外人士面前爱摆老爷架子，宗派主义作风极为严重的同志，应当认真地给以批评和教育，端正他们的态度和作风。



1956年，毛泽东在北京西郊机场和女青年们在一起。

# 对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退社问题 报告的批语稿的修改<sup>[1]</sup>

(1956年12月24日)

各地合作社对于富裕中农急急忙忙叫他们入社，或者让他们入社，本来是不策略的。按照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报告<sup>[2]</sup>所规定的策略，是首先让一部分觉悟了的贫农下中农入社，然后让后觉悟的大部分贫农下中农入社（分批分期），不要忙于动员富裕中农入社。后来在合作化潮流高潮中富裕中农勉强入社，就有些人来说，当时也很难劝阻。今年分配所得，他们的收入一般都有些减少，因此怨言甚多，有些人要求退社。中央认为让一部分（不是大部分，更不是全部）坚决要求退社的富裕中农退社，不但无害，而且有益。请你们考虑这个政策是否可行。如果认为可行，就下决心让一部分人退社。

---

[1] 这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转发广东省委1956年12月4日关于退社问题报告的批语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同年12月24日，中央转发了广东省委的这一报告。

[2] 指毛泽东1955年7月3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 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的批语<sup>[1]</sup>

(1956年12月26日)

—

刘、朱、陈、闻天<sup>[2]</sup>阅，退彭<sup>[3]</sup>。

---

[1] 这个批语写在彭德怀1956年12月12日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上。彭德怀在报告中说，7日埃及大使来访，声称埃军在西奈半岛作战中，虽然部队损失不大，但军事装备损失很多。现在英法军队虽然被迫撤退，但战争危险并未消失。为了坚持长期的斗争，埃军总部希望知道中国除了在政治上、道义上的支援以外，在军事装备方面能够给予何种援助及其条件。我当即说明我国军事装备生产的情况，并告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只要埃及需要的，我国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并愿意援助，至于条件则可商量，通过协议的方式、贷款的方式或无偿援助的方式均可，这主要看埃及方面觉得哪种方式合适即采取哪种方式。

[2]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闻天，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

[3]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二

筹划的两项<sup>[1]</sup>，可以进行筹划。具体援助事项，须经国务院统筹酌定。

毛泽东  
十二月廿六日

---

[1] 指彭德怀在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已告总参谋部筹划的两件事情：一、具体研究一下我国生产的轻武器有哪些可以出口，以便为政府以后商谈援助埃及问题做好准备。二、我国生产并可出口的步兵轻武器样品，准备给埃及大使参观一下。

# 给周世钊<sup>[1]</sup>的信

(1956年12月29日)

东园兄：

信及诗收读，甚快。我尚好。某先生楚辞，甚想一读。请你代候蒋竹如<sup>[2]</sup>兄。又请你代候曹子谷<sup>[3]</sup>先生，谢谢他赠诗及赠南岳志。

顺祝平安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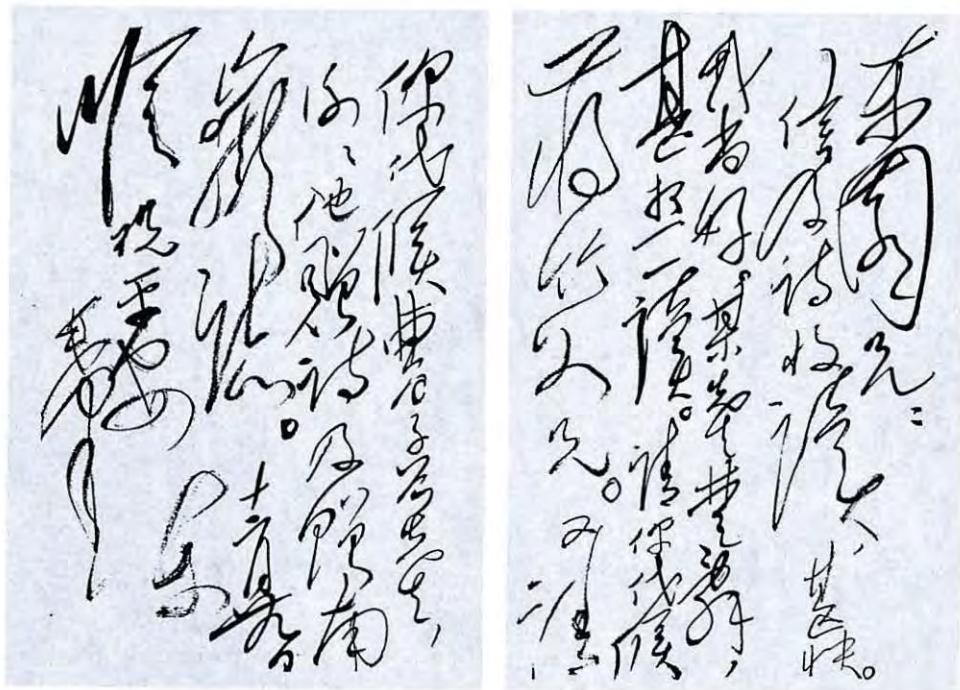
十二月廿九日

---

[1] 周世钊，又名东园，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2] 蒋竹如，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3] 曹子谷，即曹籽谷，解放前担任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湖南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政协常委、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毛泽东致周世钊信的手稿。

# 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sup>[1]</sup>

(1956年12月)

—

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

—

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在目前

---

[1]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发表于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在起草过程中作过多次修改。本篇收入的是毛泽东审阅第三、四、五、六稿时作了较多修改的四段文字，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改写和加写的。此外，在第六稿第1页上论述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同全世界人民力量对立问题的一段文字旁边，毛泽东写了“与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缓和紧张局势的必要和可能，应〔在〕全文末尾写一小段”的批语。后来公开发表的这篇文章中，在第四节末尾增加了这样的内容。在第六稿第9页上，他还删去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习苏联经验的结果”一句，并在旁边写了“中国建设事业的方针是否正确，还待将来证明，这里不说为宜”的批语。

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者声言要“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他们所要改变的正是这条革命道路。几十年来，一切修正主义者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修正意见，所传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也正是想避开无产阶级解放的这一条必由之路。一切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团结无产阶级，团结人民群众，坚决地击退帝国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世界的猖狂进攻，坚决地沿着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前进。

### 三

我们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动的时候，必须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功绩和错误。只要我们是全面地观察问题，那么，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尽管在某些时候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而对这些错误加以强调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作出正确的估价，不使人们发生误解起见，将这些错误放在适当的地位也是必要的。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

### 四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间，教条主义者否认中国的特点，照抄苏联的某些经验，曾经使我国的革命

力量遭到严重的失败。这个失败深刻地教训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在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五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经彻底地清算了一条为害严重的教条主义路线，团结了全党同志，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内，发展了人民的力量，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如果不是这样做，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克服了教条主义路线，我们的党现在在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的时候，才有可能比较地少犯一些错误。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改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引用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的思想。

# 和周恩来应对联<sup>[1]</sup>

(1956年)

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毛泽东）  
天心阁，阁中鸽，鸽飞阁不飞。（周恩来）

---

[1] 1956年，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到湖南视察。一天他们同乘一辆轿车，行至湘江橘子洲头岸边，毛泽东追忆青年时代在这里读书和从事革命活动的情景，不由豪兴勃发，提出和周恩来对对子助兴。毛泽东即景咏出上联。周恩来正在思索时，小车驶到当年毛泽东常和同学们谈论天下大事的天心阁。这时，一群鸽子从阁内飞出。周恩来灵机一动，忙说：“主席，对子的下联我对出来了。”接着念出了下联，毛泽东会心地微笑着。

# 为《农村工作通讯》杂志题名<sup>[1]</sup>

(1956年)

农村工作通讯



毛泽东为《农村工作通讯》杂志题写的刊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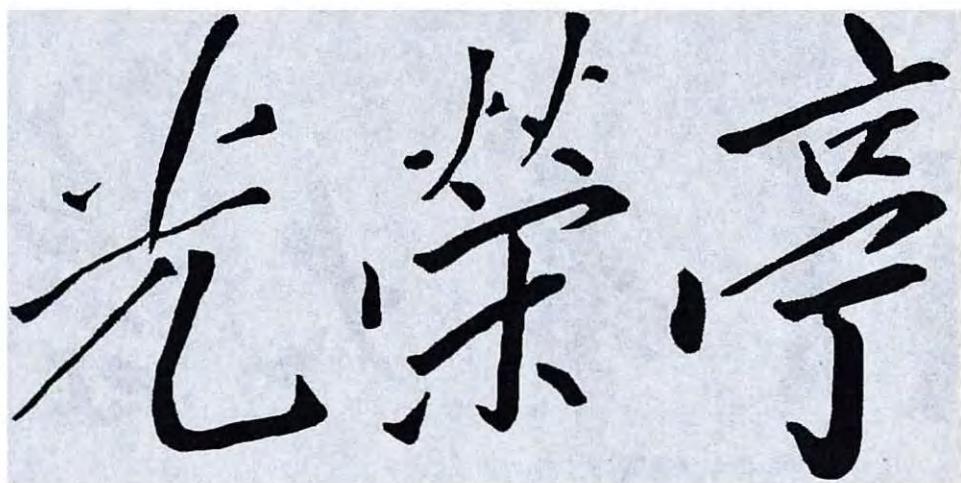
---

[1] 《农村工作通讯》创刊于1956年5月，由毛泽东提议创办并题写刊名，先后作为中央农村工作部、国家农委、农业部的机关刊，是唯一一本专注于“三农”问题的国家级新闻期刊。

# 为光荣亭题写亭名<sup>[1]</sup>

(1956年)

光荣亭



毛泽东为光荣亭题写的亭名。

[1] 1956年，光荣亭重建，毛泽东亲笔为这座新建的光荣亭题写亭名。

# 为清华大学题名

(1956年)

清华大学



毛泽东为清华大学题写的校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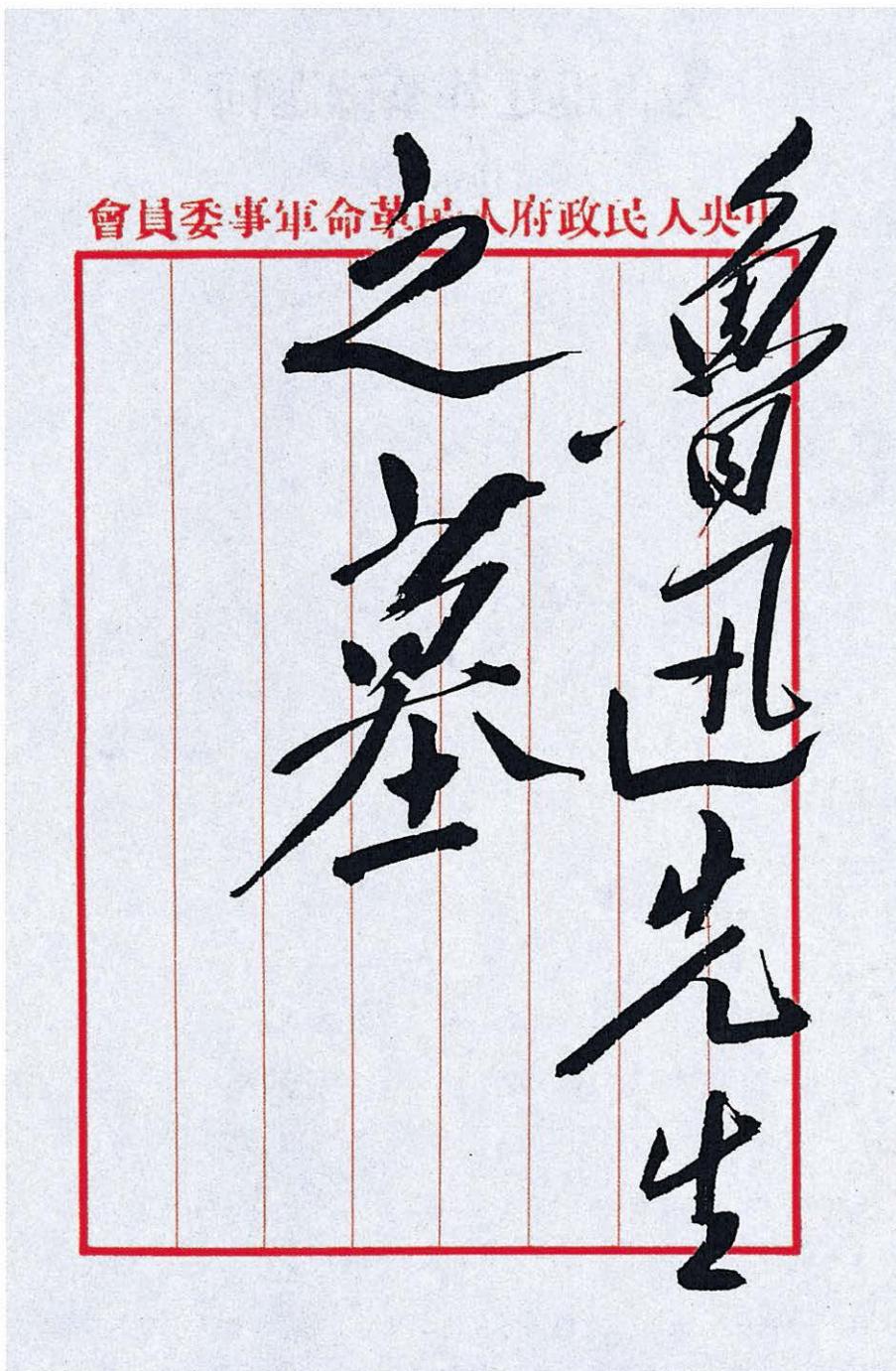
# 为鲁迅迁葬墓碑题词<sup>[1]</sup>

(1956年)

鲁迅先生之墓。

---

[1] 鲁迅墓，原在上海西郊万国公墓内，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前夕迁葬于四川北路146号鲁迅公园（原虹口公园）内西北隅。毛泽东为其墓碑题词：鲁迅先生之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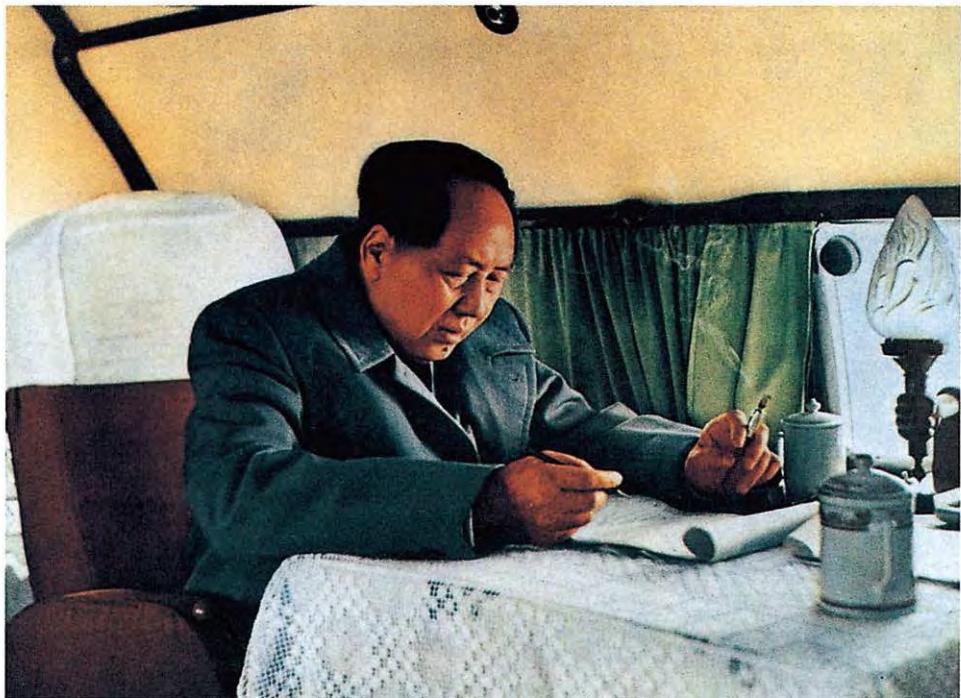


毛泽东为鲁迅迁葬墓碑的题词。

---

# 1957

---



1957年3月19日，毛泽东在飞机上学英语。

# 关于登载高士文章<sup>[1]</sup>的批语

(1957年1月3日)

退陆定一同志：

此件<sup>[2]</sup>看过。高士文章也看过，可以登世界知识。我已〔转〕胡乔木、田家英二同〔志〕一阅，大概不久就可以退还你了。

毛泽东

一月三日

---

[1] 指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阿约艾·高士写的《论印度的发展道路》一文。1956年，苏联《新时代》杂志第二十八期和第三十二期先后发表了经济学博士摩德斯特·鲁宾斯坦的《论不发达国家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和《再论不发达国家的非资本主义道路》两篇论文，在印度等许多国家中引起了各种反响。这两篇文章主要论述了印度总理尼赫鲁关于在印度制止垄断资本继续生长，通过和平方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高士认为，这不符合印度的实际情况。他在印度《新世纪》月刊1956年第十期上发表这篇文章批评鲁宾斯坦的观点。《世界知识》1957年第二期转载了鲁宾斯坦的第一篇文章和高士的文章。

[2] 指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加拉赫和阿诺德1956年10月26日关于《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问题的意见。他们说，目前的英译本不能令人满意，译本和原著的重要性不相称，毛泽东出色的文体也未能得到体现。建议本着信、达、雅的原则，组织精通中、英文和具有将作者的特性翻译过来的特殊才能的人对这一译本进行修订。



1957年1月1日，宝（鸡）成（都）铁路全线通车。



1957年，中国交通事业迅速发展。图为行驶在川藏公路上的车队。

# 印发江苏省委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报告的批语

(1957年1月4日)

请尚昆<sup>[1]</sup>注意，待省市委书记到京时将此件<sup>[2]</sup>印发给他们。

毛

此件请乔木看一下，退尚昆办。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中共中央1957年1月4日转发的江苏省委1956年12月22日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情况和部署的报告。报告说，目前省级机关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相当严重，铺张浪费现象也较过去有了发展。突出的表现是，机构极为庞大，结果造成会议多、文件多、刊物多、长途电话多、管理和服务人员多，相互之间扯皮也多，致使领导人员高高在上，不能深入基层，处理问题，层层批转，迟迟不能解决，对下面的工作，则管得多，管得死，影响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因此，必须精简机构，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报告对江苏省的增产节约运动作了全面部署：一、广泛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的宣传教育。二、基本建设和各种经费开支不再增加新的项目，冻结现有机构和人员编制。三、调查研究，制订整编方案，省级机关先行一步。中央在批转江苏省委的这一报告时指出：现有编制应冻结起来，任何机关目前不得增设机构，吸收新人员；在没有找到妥善安置办法以前，不要把精简人员从现在工作岗位上减出去。这两点请各地特别注意。

# 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进行 肃反工作的意见<sup>[1]</sup>

(1957年1月5日)

—

增加一条，这是在中央会议上谈过的，并已向陈叔通、荣毅仁<sup>[2]</sup>及各省市资本家代表宣布过。

毛泽东  
一月五日

—

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进行肃反工作的问题，不但应吸收那些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转发天津市委关于1957年肃反规划的批语稿时，对增写一条所作的说明；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央批语稿中增写的第三条。

[2] 陈叔通，当时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荣毅仁，当时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

自愿参加的资方人员参加，而且应和工商联及民建会协商，取得他们同意，方可进行。对于资方人员中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在结案时也要有工商联民建会参加审查，得其同意，方可结案。各省市目前是否在私方人员中进行肃反，由各省市自己决定。

# 对《评艾森豪威尔主义》一文的批语

(1957年1月5日)

定一<sup>[1]</sup>同志：

国际问题文章<sup>[2]</sup>内容和文字均无弊病，可以不要修改了。

毛泽东

一月五日夜

---

[1] 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2] 指《人民日报》社论稿《评艾森豪威尔主义》，发表于1957年1月8日《人民日报》。

# 邀请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的信

(1957年1月6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敬爱的伏罗希洛夫同志：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热烈地邀请你，敬爱的主席同志来我国进行访问。我深信，你的访问必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亲密合作和伟大友谊。如你同意，请将你认为合适的访问日期<sup>[1]</sup>，通知我们。我和全中国的人民以十分愉快的心情期待着你的光临。谨向你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7年1月6日于北京

---

[1] 1957年1月18日，伏罗希洛夫复信毛泽东。信中说：“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您的邀请。如果对您方便的话，我准备在1957年4月15日至5月5日期间访问兄弟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 印发《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 几点意见》<sup>[1]</sup>一文的批语

(1957年1月7日)

尚昆同志：

请将此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及月中到会各同志。

毛泽东

一月七日

---

[1] 指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1957年1月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文章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有些人认为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只需要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可以不必强调了。过去一年中一直在大张旗鼓地反对“公式化、概念化”，但在反对中有些界线不清的地方，被一些人误认为或者利用来作为反对艺术应为政治服务、艺术应有高度思想性、艺术应作为教育广大人民的武器的借口。文章还说，百花齐放的方针使我们的文学艺术在过去一年中放出了一些令人喜爱的花朵，但百花中最主要的应该是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在人民新的生活土壤上开出的花朵，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于开老花，不注意开新花。不注意培植和保护新花的百花齐放是不完全正常的。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多次提出了批评，说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7年8月21日，陈其通、陈亚丁在《人民日报》发表《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反右派斗争》一文，对此作了自我批评。

# 给臧克家<sup>[1]</sup>等的信

(1957年1月12日)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

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

[1] 臧克家，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



毛泽东致臧克家等信的手稿。

# 为刘胡兰<sup>[1]</sup>烈士陵园重写的题词<sup>[2]</sup>

(195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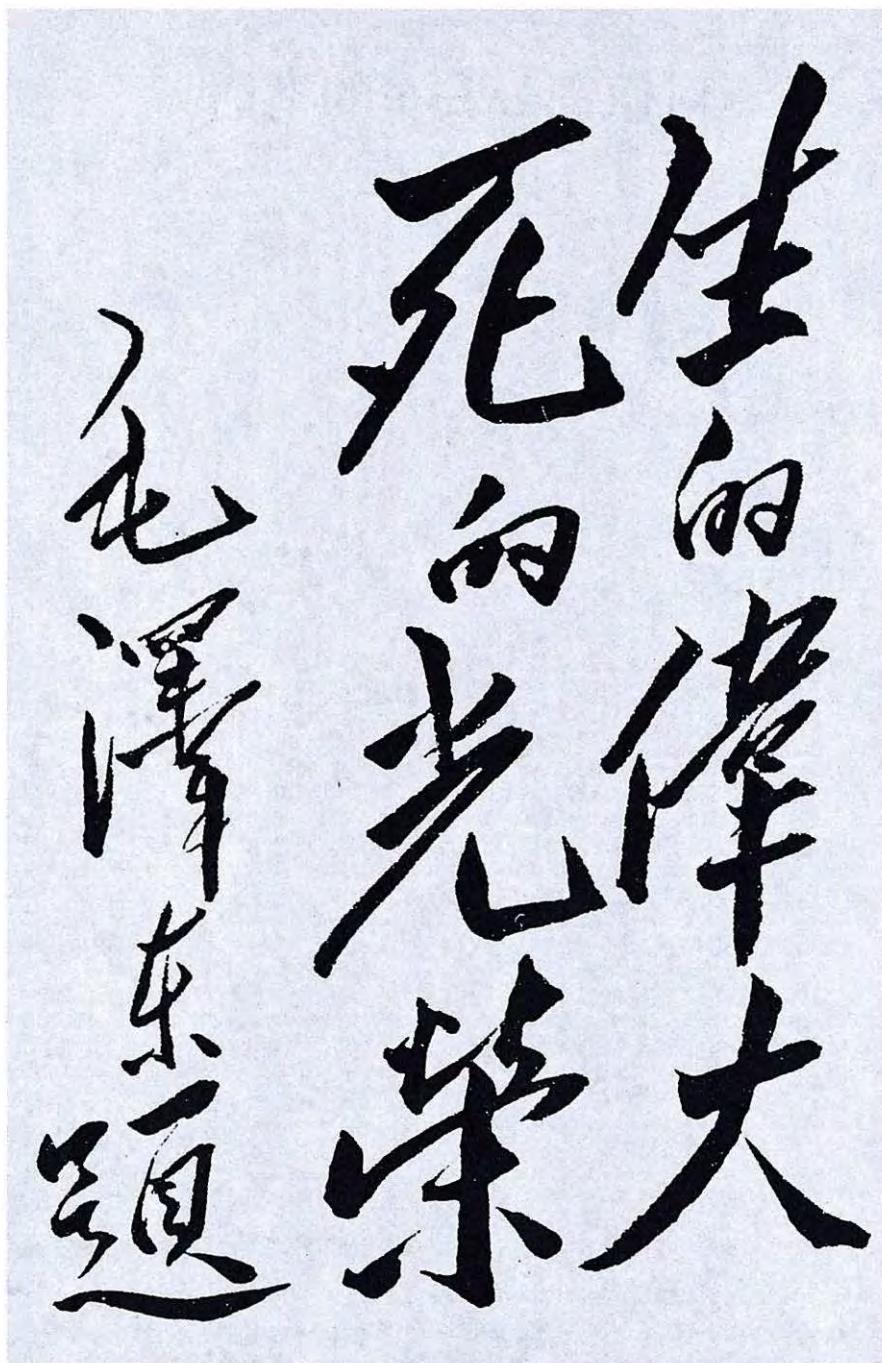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毛泽东题

---

[1] 刘胡兰，山西省文水县人。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1月12日被捕，英勇就义。生前曾任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区妇救会干事。

[2] 1947年3月，毛泽东得知刘胡兰的事迹后，曾题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字。这一题词后来在战争中丢失。1957年为纪念刘胡兰牺牲十周年，修建刘胡兰烈士陵园，毛泽东为陵园重写了这一题词。



毛泽东为刘胡兰烈士陵园重写的题词。

# 对撤销公安军的批语<sup>[1]</sup>

(1957年1月22日)

照办。<sup>[2]</sup>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黄克诚1956年12月28日呈送的《关于公安军问题小组会议记录》的批语。

[2] 黄克诚呈送的《关于公安军问题小组会议记录》说：关于公安军问题，经过专门小组三次会商，大家一致同意撤销公安军的番号，并撤销管理公安军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1957年1月17日批示：“请主席批示，刘、陈阅后退黄克诚。”

#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1957年1月)

## 一 一月十八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要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三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今天我讲一讲思想动向问题。

思想动向问题，我们应当抓住。这里当作第一个问题提出来。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有一种问题是自己家里出的。比如，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在评级过程中，有那样的人，升了一级不够，甚至升了两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三级才起床。他这么一闹，就解决了一个问题，什么干部评级，根本不评了，工资大体平均、略有差别就是了。以前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头当了广东中山县的县长。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类思想在党内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

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

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去年这一年，丰收的地方没有问题，重灾区也没有问题，就是那种灾而不重、收而不丰的合作社发生了问题。这类合作社，工分所值，原先许的愿大了，后头没有那么多，社员收入没有增加，甚至还有减少。于是议论就来了：合作社好不好，要不要？这种议论也反映到党内的一些干部中间。有些干部说，合作社没有什么优越性。有些部长到乡下去看了一下，回到北京后，放的空气不妙，说是农民无精打采，不积极耕种了，似乎合作社大有崩溃灭亡之势。有些合作社社长抬不起头来，到处挨骂，上面批评，报纸上也批评。有些党委的宣传部长不敢宣传合作社的优越性。农业部的部长廖鲁言，又是党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据他讲，他自己泄了气，他下面的负责干部也泄了气，横直是不行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不算数了。泄了气怎么办？这个事情好办，你没有气，给你打点气就是了。现在报纸上的宣传转了一下，大讲合作社的优越性，专讲好话，不讲坏话，搞那么几个月，鼓一点气。

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说的这个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我们的干部中间刮起了这么一股风，像台风一样，特别值得注意。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社不行，长不了。富裕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层，他们的单干思想现在又在抬头，有些人想退社。我们干部中的这股风，反映了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思想。

合作化一定能化好，但是一两年内不可能完全化好。要向党、

政、军、民各界的同志们讲清楚。合作社只有这么一点历史，大多数合作社只有一年到一年半的历史，经验很少。搞了一辈子革命的人还会犯错误，人家只搞了一年到一年半，你怎么能要求他一点错误都不犯呢？一有点风，有点雨，就说合作化不行了，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个大错误。事实上，多数合作社是办得好的和比较好的。只要拿出一个办得好的合作社，就可以把反对合作化的一切怪论打下去。为什么这个社能办好，别的社就不能办好？为什么这个社有优越性，别的社就没有优越性？你就到处大讲这个社的经验。一个省总可以找出这样一个典型嘛！要找那个条件最差，地势不好，过去产量很低，很穷的社，不要找那个本来条件就好的社。当然，你搞几十个也可以，但是，你只要搞好一个，就算胜利。

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石家庄一个学校，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照他们讲来，共产党是法西斯，我们这些人都要打倒。他们提出的口号那样反动，工人不同情，农民不同情，各方面的群众都不同情。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这一“家”也出来了。邓小平同志去这个大学讲了一次话，他说，你要杀几千几万人，我们就要专政。

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但是需

要时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倒是乡下的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没有跳出来说要杀几千几万人。对于他们的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听他们的，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变，一个原子弹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烂，这些人不起变化呀？那就难说了。那时，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要分化。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几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枝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

去年这一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在这几次风潮中，欧洲美洲有些党受的影响和损失相当大，东方各国的党受的影响和损失比较小。苏共“二十大”一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

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斯大林问题牵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党都牵涉到了。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多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应。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后头帝国主义几棍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几棍子，连赫鲁晓夫的腔调都不得不有所改变，他们又摇过来了。大势所趋，不摇过来不行。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

台风一刮，动摇分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我劝大家注意这个问题。有些人摇那么几次，取得了经验，就不摇了。有那么一种人，是永远要摇下去的，就像稻子那一类作物，因为秆子细，风一吹就要摇。高粱、玉米比较好些，秆子比较粗。只有大树挺立不拔。台风年年都有，国内国际的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政党就是一种社会，是一种政治的社会。政治社会的第一类就是党派。党是阶级的组织。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主要是由工人和半无产阶级的贫农出身的人组成的。但是，也有许多党员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

身，或者是富裕中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中间有相当多的人，虽然艰苦奋斗多少年，有所锻炼，但是马克思主义学得不多，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还是跟稻子一样，风一吹就要摇。

有些党员，过去各种关都过了，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有这样典型的人，薛迅就是一个。她原来是河北省的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她是什么时候动摇的呢？就是在开始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她却坚决反对，无论如何要反对。还有一个，就是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他上书言事，有一封信，也坚决反对统购统销。实行农业合作化，党内也有人起来反对。总而言之，党内有这样的高级干部，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是动摇的。这类事情结束没有呢？没有。是不是十年以后这些人就坚定起来，真正相信社会主义呢？那也不一定。十年以后，遇到出什么问题，他们还可能说，我早就料到了的。

发给同志们一个材料，是反映某些军队干部的思想动向的。这些干部的意见中虽然有某些合理的部分，比如说有些干部的工资太高，农民看不惯，但是，他们的意见总的方向不妥，根本路线不对。他们批评我们党的政策是农村“左”了，城市右了。中国虽然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但是合共只有两块地方，一块叫农村，一块叫城市。照他们这一讲，都错了。

所谓农村政策“左”了，就是说农民收入不多，比工人少。这要有分析，不能光看收入。工人收入一般是比农民多，但是他们生产的价值比农民大，生活必需的支出也比农民多。农民生活的改善，主要依靠农民自己努力发展生产。政府也大力帮助农民，比如兴修水利，发放农贷，等等。我们的农业税，包括副业的税收，约占农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很多副业没有抽税。我们统购粮食，

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国家在工业品和农业品交换中间从农民那里得到的利润也很少。我们没有苏联那种义务交售制度。我们对于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是缩小剪刀差，而不是像苏联那样扩大剪刀差。我们的政策跟苏联大不相同。所以，不能说我们的农村政策“左”了。

在我们军队的高级干部中间，有些人可能是自己回家，或者是接了亲属来，听到富裕中农、富农、地主的那些话，受了触动，于是就替农民叫苦。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替农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应，好像只有他们这两部分人才代表农民，才知道农民的疾苦。至于我们党中央，在他们看来，那是不代表农民的，省委也是不代表的，党员的大多数都是不代表的。江苏作了一个调查，有的地区，县区乡三级干部中间，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替农民叫苦。后头一查，这些替农民叫苦的人，大多数是家里比较富裕，有余粮出卖的人。这些人的所谓“苦”，就是有余粮。所谓“帮助农民”“关心农民”，就是有余粮不要卖给国家。这些叫苦的人到底代表谁呢？他们不是代表广大农民群众，而是代表少数富裕农民。

至于说城市政策右了，看起来也有点像，因为我们把资本家包了下来，还给他们七年的定息<sup>[1]</sup>。七年以后怎么办？到时候还要看。最好留个尾巴，还给点定息。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政策，中央是仔细考虑过的。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

---

[1] 定息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的一种形式。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国家按照资本家的资产，在一定时期内，每年付给他们固定息率的股息，叫做定息。定息仍然属于剥削的性质。

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所以，也不能说我们的城市政策右了。

我们的农村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城市政策也是正确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无非是少数人这里闹一下，那里闹一下，要搞所谓大民主。大民主也没有什么可怕。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你们不同，你们有些同志好像很怕。我说来一个大民主，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那些坏人在搞所谓大民主的时候，一定要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杀几千几万人”，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吗？能得到大多数人同情吗？“打倒法西斯”“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公然违反宪法吗？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有优越性，这都是宪法里头讲了的，是全国人民公认的。“要战争不要和平”，那好呀！你来号召战争，统共那么几个人，你的兵就不够，军官也没有训练好。这些娃娃们发疯了！石家庄那个学校，把那三个口号一讨论，七十个代表，只有十几个人赞成，有五十几个人反对。然后，又把这几个口号拿到四千学生里头去讨论，结果都不赞成，这十几个人就孤立了。提出和坚持这几个口号的极反动分子，只有几个人。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

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几个学生娃娃一冲，党政军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们这些人完全是饭桶。所以，不要怕大民主。出了乱子，那个脓包

就好解决了，这是好事。帝国主义，我们从前不怕，现在也不怕。我们也从来不怕蒋介石。现在怕大民主？我看不要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

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田里长着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一种叫杂草。杂草年年要锄，一年要锄几次。你说只要放香花，不要放毒草，那就等于要田里只能长粮食，不能长一根草。话尽管那样讲，凡是到田里看过的都知道，只要你不去动手锄，草实际上还是有那么多。杂草有个好处，翻过来就是肥料。你说它没有用？可以化无用为有用。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所谓锻炼出来的，就是奋斗出来的。你草长，我就锄。这个对立面是不断出现的。杂草一万年还会有，所以我们也要准备斗争一万年。

总而言之，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

## 二 一月二十七日的讲话

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要足够地估计成绩。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也有。有那么多成绩，夸大是不行的，但是估低了就要犯错误，可能要犯大错误。这个问题，本来八届二中全会已经解决了，这次会上还多次谈到，可见在一些同志思想上还没有解决。特别在民主人士里头有一种议论：“你们总是讲成绩是基本的，这不解决问题。谁不知道成绩是基本的，还有缺点错误呀！”但是，确实成绩是基本的。不肯定这一点，就泄气。对合作化就有泄气之事嘛！

第二点，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在延安的时候，就采取这个方针。一九四四年八月，《大公报》作社评一篇，说什么不要“另起炉灶”。重庆谈判期间，我对《大公报》的负责人讲，你那个话我很赞成，但是蒋委员长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向蒋介石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要各得其所。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包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军政人员都包下来，连跑到台湾去的也可以回来。对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杀的，都加以改造，给生活出路。民主党派保留下，长期共存，对它的成员给予安排。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比如统购统销，一切城市人口和农村里头的缺粮户，我们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

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要向大家说清楚。

柯庆施<sup>[1]</sup>同志讲，要想尽一切办法。这个话很好，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困难。这个口号应当宣传。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长征途中，在过了大渡河以后，究竟怎么走呢？北面统是高山，人口又很少，我们那个时候提出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什么叫千方百计呢？千方者，就是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百计者，就是九十九计加一计。现在你们还没有提出几个方几个计来。各省、中央各部究竟有多少方多少计呀？只要想尽一切办法，困难是可以解决的。

第三点，国际问题。在中东，出了一个苏伊士运河事件。一个人，叫纳赛尔，把运河收归国有了；另外一个人，叫艾登，出一支兵去打；接着，第三个人，叫艾森豪威尔，要赶走英国人，把这个地方霸起来。英国资产阶级历来老奸巨猾，是最善于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妥协的一个阶级。现在它把中东搞到美国人手里去了。这个错误可大啦！这样的错误，在它历史上数得出多少呀？这一回为什么冲昏头脑犯这个错误呢？因为美国压得太凶，它沉不住气，想把中东夺回去，阻止美国。英国的矛头主要是对埃及的吗？不是。英国的文章是对付美国的，美国是对付英国的。

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当然，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争什么地盘呢？争亚洲非洲十亿人口的

---

[1] 柯庆施（1902—1965），安徽歙县人。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地盘。目前他们的争夺集中在中东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埃及苏伊士运河地区。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现在帝国主义争夺的主要场所是亚洲非洲。在这些地区都出现了民族独立运动。美国采用的办法，有文的，也有武的，在中东就是这样。

他们闹，对我们有利。我们的方针应当是，把社会主义国家巩固起来，寸土不让。谁要我们让，就一定要跟他斗争。出了这个范围，让他们去闹。那末，我们要不要讲话呢？我们是要讲话的。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就是要支持。

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支持他们那里的人民革命，他们在我们这里搞颠覆活动。他们里头有我们的人，就是那里的共产党，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人士。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还有地主阶级。现在这些人看起来还听话，还没有闹事。但是假使原子弹打到北京来了，他们怎么样？不造反呀？那就大成问题了。至于那些劳改犯，石家庄那个学校闹事的领袖人物，北京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消化掉，要把地主、资本家改造成为劳动者，这也是一条战略方针。消灭阶级，要很长的时间。

总之，对于国际问题的观察，我们认为还是这样：帝国主义之间闹，互相争夺殖民地，这个矛盾大些。他们是假借跟我们的矛盾

来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这是关系我们对外方针的一件大事。

讲一讲中美关系。我们在会上印发了艾森豪威尔给蒋介石的信。我看这封信主要是给蒋介石泼冷水，然后又打点气。信上说需要冷静，不要冲动，就是说不要打仗，要靠联合国。这是泼冷水。蒋介石就是有那么一点冲动。打气，就是说要对共产党继续采取强硬的政策，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出乱子上。在他看来，乱子已经出了，共产党是没有办法阻止它的。各有各的观察吧！

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这比较有利。苏联跟美国建交，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十七年。一九二九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持续到一九三三年。这一年，德国是希特勒上台，美国是罗斯福上台，这个时候，苏美才建交。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十八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末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账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无及。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变了，房子打扫干净了，“四害”也除了，他们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点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很不稳定，乱，人心不安。世界各国都不安，中国也在内。但是，我们总比他们安一点。

你们研究一下看，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之间，究竟谁怕谁？我说都怕。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有这么一个倾向：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点。作这样的估计也许有个危险，就是大家都睡觉去了，一睡三天不醒。因此，总要估计到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坏的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要发疯。帝国主义是不怀好心的，总是要捣鬼的。当然，现在帝国主义要打世界大战也不那么容易，打起来的结果如何，他们要考虑。

再讲一讲中苏关系。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他们想问题做事情的方法，他们的历史习惯，跟我们不同。因此，要对他们做工作。我历来说，对同志要做工作。有人说，既然都是共产党员，就应当一样好，为什么还要做工作呀？做工作就是搞统一战线，做民主人士的工作，为什么还要做共产党员的工作呀？这种看法不对。共产党里头还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些人组织上进了党，思想上还没有通，甚至有些老干部跟我们的语言也不一致。所以，经常要谈心，要个别商谈或者集体商谈，要开多少次会，做打通思想的工作。

据我看，形势比一些人强，甚至比大官强。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周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

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厉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去臭骂他一顿。这回周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这样好，当面扯清楚。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想影响他们。我们也没有一切都捅穿，法宝不一次使用干净，手里还留了一把。矛盾总是有的，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那些不同的将来再讲。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

在我们自己方面，对外宣传不要夸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把尾巴夹紧一些。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但要有选择地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学落后的东西。对落后的东西是另一种学法，就是不学。他错误的东西，我们知道了，就可以避免犯那个错误。他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一定要学。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个地方去找，就单调了。

第四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在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提出来的，我看还是对的，是合乎辩证法的。

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sup>[1]</sup>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解释，我们现在解释太

---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少了。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列宁还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sup>[1]</sup>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

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苏联现在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说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存在。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唯心主义，都有形而上学，都有毒草。苏联那里的许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义出现的，那里的许多怪议论，都戴着唯物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帽子。我们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香花和毒草的斗争。这种斗争，要永远斗下去，每一个阶段都要前进一步。

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

---

[1] 参见列宁《关于辩证法问题》。

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这样。他们努力学习和研究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并且教人们也这么做。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斯大林就比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个时期，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作这样一个结论，就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他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sup>[1]</sup>的书也不应当读了。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

[1] 克劳塞维茨（1780—1831），著名的德国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主要著作有《战争论》。斯大林对克劳塞维茨的评论，参见斯大林《给拉辛同志的复信》。

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

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sup>⑩</sup>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

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比如，我们和蒋介石国民党就是根本对立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结果，我们和国民党的地位都起了变化，他们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我们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不过十分之一，留在大陆上的

---

[1] 参见列宁《战争与革命》。

有十分之九。留下来的这一部分，我们正在改造他们，这是在新的情况下的对立统一。到台湾去的那十分之一，我们跟他们还是对立统一，也要经过斗争转化他们。

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我们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

有些现象在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来以后就有办法了。比如，过去把剧目控制得很死，不准演这样演那样。现在一放，什么《乌盆记》《天雷报》，什么牛鬼蛇神都跑到戏台上来了。这种现象怎么样？我看跑一跑好。许多人没有看过牛鬼蛇神的戏，等看到这些丑恶的形象，才晓得不应当搬上舞台的东西也搬上来了。然后，对那些戏加以批判、改造，或者禁止。有人说，有的地方戏不好，连本地人也反对。我看这种戏演一点也可以。究竟它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还有多少观众，让实践来判断，不忙去禁止。

现在，我们决定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从两千份扩大到四十万份，使党内党外都能看到。这是共产党替帝国主义出版报纸，连那些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也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这一条我们跟苏联的做法不同。为什么要种牛痘？就是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

疫力。

对于一些有害的言论，要及时给予有力的反驳。比如《人民日报》登载的《说“难免”》那篇文章，说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并不是难免的，我们是用“难免”这句话来宽恕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一种有害的言论。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应当准备及时反驳，唱一个对台戏。我们搞革命和建设，总难免要犯一些错误，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就是个大难免论。我们的同志谁愿意犯错误？错误都是后头才认识到的，开头都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我们不要因为错误难免就觉得犯一点也不要紧。但是，还要承认工作中不犯错误确实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要犯得少一些，犯得小一些。

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无论党内也好，民主人士中间也好，青年学生中间也好，凡是歪风，就是说，不是个别人的错误，而是形成了一股风的，一定要打下去。打的办法就是说理。只要有说服力，就可以把歪风打下去。没有说服力，只是骂几句，那股歪风就会越刮越大。对于重大问题，要作好充分准备，在有把握的时候，发表有充分说服力的反驳文章。书记要亲自管报纸，亲自写文章。

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可以比作原子里面的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一个原子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

一部分叫电子。原子核很小，可是很重。电子很轻，一个电子大约只有最轻的原子核的一千八百分之一。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不过结合得比较牢固。电子可有些“自由主义”了，可以跑掉几个，又来几个。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有主有次。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的了。

第五点，闹事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

社会上的事情总是对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少数人闹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的方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对立的阶级，对立的人们，对立的意见。

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们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我们说，共产党能够管科学，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这样的人北京有，石家庄有，其他地方也有。

社会上还有那样的人，骂我们的省委是“僵尸”。省委是不是“僵尸”？我看我们的省委根本就没有死，怎么僵呢？骂省委是“僵

尸”跟我们说省委不是“僵尸”，也是对立的。

在我们党内，也有各种对立的意见。比如，对苏共“二十大”一棍子打死斯大林，就有反对和拥护两种对立的意见。党内的不同意见是经常发生的，意见刚刚一致，过一两个月，新的不同意见又出来了。

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对立的。我看哪一年都会有主观主义。一万年以后，就一点主观主义都没有呀？我不相信。

一个工厂，一个合作社，一个学校，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总之，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对立的方面。所以，社会上少数人闹事，年年都会有。

对于闹事，究竟是怕，还是不怕？我们共产党历来对帝国主义、蒋介石国民党、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不怕，现在倒怕学生闹事，怕农民闹社，这才有点怪哩！对群众闹事，只有段祺瑞怕，蒋介石怕。此外，匈牙利和苏联也有些人怕。我们对于少数人闹事，应当采取积极态度，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就是说不怕，要准备着。怕是没有出路的。越怕，鬼就越来。不怕闹，有精神准备，才不致陷于被动。我看要准备出大事。你准备出大事，就可能不出，你不准备出大事，乱子就出来了。

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你说今年会太平，也许会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

从那个地方来的。我们已经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请我们回延安怎么办？大家就呜呼哀哉，痛哭流涕？当然，我们现在并没有打算回延安，来个“虚晃一枪，回马便走”。“七大”的时候，我讲了要估计到十七条困难，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灾荒，没有饭吃，所有县城都丢掉。我们作了这样充分的估计，所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发生少数人闹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再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少数人闹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这又是个难免论。但是，只要不犯大的路线错误，全国性的大乱子是不会出的。即使犯了大的路线错误，出了全国性的乱子，我看也会很快平息，不至于亡国。当然，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历史走一点回头路，有点回归，这还是很可能的。辛亥革命就走了回头路，革掉了皇帝，又来了皇帝，来了军阀。有问题才革命，革了命又出问题。我相信，假如出一次全国性的大乱子，那时总会有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人物来收拾时局，也许是我们，也许是别人。经过那样一次大乱子，脓包破了以后，我们的国家只会更加巩固。中国总是要前进的。

对于少数人闹事，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是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要请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谁想闹谁就闹，想闹多久就闹多久，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你急于收场，总有一天他还是要闹。凡有学生闹事的学校，不要放假，硬是来它一场赤壁鏖兵。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

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炼，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人闹输。

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一种是闹得对的，我们应当承认错误，并且改正。一种是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闹得有道理，是应当闹的；闹得无道理，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再有一种是闹得有对有不对的，对的部分我们接受，不对的部分加以批评，不能步步后退，毫无原则，什么要求都答应。除了大规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乱必须武装镇压以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惨案，就是用开枪的办法，结果把自己打倒了。我们不能学段祺瑞的办法。

对闹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数人、少数人区别开来。对多数人，要好好引导、教育，使他们逐步转变，不要挫伤他们。我看什么地方都是两头小中间大。要把中间派一步一步地争取过来，这样，我们就占优势了。对带头闹事的人，要有分析。有些人敢于带头闹，经过教育，可能成为有用之材。对少数坏人，除了最严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关，不要开除。要留在原单位，剥夺他的一切政治资本，使他孤立起来，利用他当反面教员。清华大学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我们邓小平同志去讲话，就请他当教员。这样的人，又没有武装，又没有手枪，你怕他干什么？你一下把他开除，你那里很干净了，但是不得人心。你这个地

方开除了，他就要在别的地方就业。所以，急于开除这些人不是好办法。这种人代表反动的阶级，不是个别人的问题，简单处理，爽快是爽快，但是反面教员的作用没有尽量利用。苏联大学生闹事，他们就开除几个领袖人物，他们不懂得坏事可以当作教材，为我们所用。当然，对于搞匈牙利事件那样反革命暴乱的极少数人，就必须实行专政。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像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将在斗争中取得经验，受到锻炼，这是很有益处的。

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这一点，现在很多同志还不清楚。坏事里头包含着好的因素。把坏人坏事只看成坏，是片面地形而上学地观察问题，不是辩证地观察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坏人坏事一方面是坏，另一方面有好的作用。比如，像王明这样的坏人，就起着反面教员的好作用。同样，好事里头也包含

着坏的因素。比如，解放以后七年来的大胜利，特别是去年这一年的大胜利，使有些同志脑筋膨胀，骄傲起来了，突然来了个少数人闹事，就感到出乎意料之外。

对闹事又怕，又简单处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

按照辩证法，就像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那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

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如果一万年以后地球毁灭了，至少在这一万年以内，还有闹事的问题。不过我们管不着一万年那么远的事情，我们要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认真取得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

要加强我们的工作，改正我们的错误和缺点。加强什么工作呢？工、农、商、学、兵、政、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大家搞业务，搞事务，什么经济事务，文教事务，国防事务，党的事务，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现在我们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亲自出马到清华大学作报告，也请你们大家都出马。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同志，都要亲自出马做政治思想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共产党，东欧一些国家的党，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联系，这些他们都不讲了，空气不浓厚了。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每个省市自治区都要把理论工作搞起来，有计划地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评论家。

要精简机构。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阶级不等于国家，国家是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出一部分人（少数人）组成的。机关工作是需要一点人，但是越少越好。现在国家机构庞大，部门很多，许多人蹲在机关里头没有事做。这个问题要解决。第一条，必须减人；第二条，对准备减的人，必须作出适当安排，使他们都有切实的归宿。党、政、军都要这样做。

要到下面去研究问题。我希望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这样做。听说现在许多负责同志不下去了，这不好。中央机关苦得很，在这个地方一点知识也捞不到。你要找什么知识，蹲在机关里是找不到的。真正出知识的地方是工厂、合作社、商店。工厂怎么办，合作社怎么办，商店怎么办，在机关里是搞不清楚的。越是上层越没有东西。要解决问题，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第一不下去，第二不请下面的人上

来，就不能解决问题。我建议，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兼一个县委书记，或者兼一个工厂或学校的党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要兼一个下级单位的书记。这样可以取得经验，指导全局。

要密切联系群众。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匈牙利的领导人，没有调查研究，不了解群众情况，等到大乱子出来了，还不晓得原因在什么地方。现在我们有些部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不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有人酝酿闹事，酝酿暴动，根本不知道，出了事就措手不及。我们一定要引为鉴戒。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年总要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等基层单位去跑一跑，进行调查研究，搞清楚群众的情况怎样，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各有多少，我们的群众工作做得如何，做到心中有数。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农下中农，依靠先进分子，总要有个依靠。这样，才有可能避免出匈牙利那样的事件。

第六点，法制问题。讲三条：一定要守法，一定要肃反，一定要肯定肃反的成绩。

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并不是只要你民主人士守法。

一定要肃反。没有完成肃反计划的，今年要完成，如果留下一点尾巴，明年一定要完成。有些单位进行过肃反，但是肃而不清，必须在斗争中逐步肃清。反革命不多了，这一点要肯定。在闹事的地方，广大群众是不会跟反革命跑的，跟反革命跑的只是部分的、暂时的。同时也要肯定，还有反革命，肃反工作没有完。

一定要肯定肃反的成绩。肃反的成绩是伟大的。错误也有，当然要严肃对待。要做肃反工作的干部撑腰，不能因为一些民主人士一骂就软下来。你天天骂，吃了饭没有别的事做，专做骂人的事，那由你。我看越骂越好，我讲的这三条总是骂不倒的。

共产党不晓得挨了多少骂。国民党骂我们是“共匪”，别人跟我们通，就叫“通匪”。结果，还是“匪”比他们非“匪”好。自古以来，没有先进的东西一开始就受欢迎，它总是要挨骂。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从开始就是挨骂的。一万年以后，先进的东西开始也还是要挨骂的。

肃反要坚持，有反必肃。法制要遵守。按照法律办事，不等于束手束脚。有反不肃，束手束脚，是不对的。要按照法律放手放脚。

第七点，农业问题。要争取今年丰收。今年来一个丰收，人心就可以稳定，合作社就可以相当巩固。在苏联，在东欧一些国家，搞合作化，粮食总要减产多少年。我们搞了几年合作化，去年大搞一年，不但没有减产，而且还增产了。如果今年再来一个丰收，那在合作化的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就是没有先例的。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首先，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这个农民自给的部分，数量极大。比如，去年生产了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商品粮包括公粮在内，大约是八百多亿斤，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归农民。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就稳定了。

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的

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要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商品率。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

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

第四，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比如，化学肥料，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部分的电力、煤炭、石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为农业服务。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无论是发展轻工业还是发展重工业，农村都是极大的市场。

第五，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

第六，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

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

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为好？请大家研究，议出一个适当的比例来。其目的，就是要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来源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

合作社的积累和社员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今年如果丰

收，积累要比去年多一点，但是不能太多，还是先让农民吃饱一点。丰收年多积累一点，灾荒年或者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就是说，积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阳的光射来叫光波，无线电台发出的叫电波，声音的传播叫声波。水有水波，热有热浪。在一定意义上讲，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戏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没有一口气唱七八句的。写字也起波，写完一个字再写一个字，不能一笔写几百个字。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

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

#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 会议上的插话汇集

(1957年1月)

## 一 思想斗争问题

去年下半年以来，有一股右倾机会主义的风，在地面之上，云层之下流动。党内外有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

对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打的办法，要有说服力，而不是简单骂几句。如果简单粗暴，则歪风越刮越大。

今年五月人代会，七月政协会，怪议论一定会多。一个是法制，一个是农民苦，一个是没肉吃，总的是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要准备打这两仗，在座的代表要出马参战。每人准备一篇，要有分析。

同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富裕中农思想作斗争，要反复斗争很多年。富裕中农的影响很大，特别厉害，应当注意。

光搞业务工作，不搞思想工作，就会闹乱子。

每个省要有一两个马克思，一两个鲁迅。你们应该写文章，六十岁以下的都应该写。

每个省要培养理论家。现在有培养唱戏的、画画的，没有培养

搞理论的，这也是个体制问题，你们靠中央，中央并没有不让你们搞。

## 二 闹事问题

对闹事怕不怕，我看还是不怕，闹更多的事也不怕。年年会闹事，以后会更多，怕有何用？矛盾要揭露，问题才能解决。社会是对立的统一。教授、学生与我们总会有矛盾，总会有吵架。再过二十年，老的死了，新的还会有问题。苏联革命四十年还有闹事的。工厂中有百分之三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大学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他们闹事不要怕，闹到北京来都不怕。应该采取积极态度，不要采取消极态度。格罗从南斯拉夫回到布达佩斯骂群众，一下丧失威信，被轰下台。卡达尔则不同，既不骂群众，也不跟纳吉跑。要准备出大事，可能就不会出大事，出了事要采取积极态度，正确办法，争取分化。有本领的人，就是要在波兹南、匈牙利那样的情况下，搞出一个局面来。

但愿天下太平，但要放在最坏的方面，准备出大事，我们从延安来，准备再回延安。过去没有看过梅兰芳的戏，现在看了七年，第八年准备回延安，无非是打原子弹，打世界大战，犯错误，出匈牙利事件。只要思想上从坏的方面作准备，一切不怕，不准备就会哭鼻子。七大提出十七条，“赤地千里”。现在得了六亿人口的国家，出点事算什么，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无可奈何。

罢工、罢课、请愿，宪法上有的规定了，有的也未禁止。因此，第一，不要提倡；第二，不管合理不合理，要罢工请愿，就让他罢工请愿，提得合理的要纠正，提得不合理的要解释。教授要发

议论让他发，以揭露矛盾解决矛盾为好，不要一棍子打死。如果只是压，结果一定会总爆发，就会变成拉科西。也不能一味迁就，如果一味迁就，又会变成纳吉。

小资产阶级想专政，把你搞下来他专政。想搞匈牙利的，要整一二十年。各省要开群众大会，演讲会，辩论会，展开争论，看谁胜利。但事前要作准备，小会他神气大，大会他没办法。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办。有屁让他放，不放对我不利，放出来大家鉴别香臭；社会发生分化，我们争取大家，大家认为臭，他就被孤立了。

不要怕闹，闹得越大越长越好。七闹八闹总会闹出名堂来的，可以看清是非。不管怎样闹，不要怕，越怕鬼越来。但也不要开枪，什么时候开枪都是不好的。

全国大闹不可能，哪里有脓包、有细菌总是要爆发的。大省五万，中省三万，小省一万，准备闹事。年终结账，如果达不到这个数字，就算工作做好了。

对闹事要开县、区委书记会议作准备，区委书记、区长以上要有精神准备。先太平无事，消极怕闹，结果闹起来了，被动，先思想麻痹，后事事答应。

不打问题不能解决，矛盾要经过斗争解决。河南农民宰牛受限制，起来打干部，一打就解决了。打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就是不合理的也是好的，有脓总得放。

对于坏人的处理，一律开除好不好？我看不要急于开除，也不杀掉（反革命刑事犯除外），要利用他做工作，把他当作政治教材，剥夺他的政治资本。简单处理就是思想上不承认对立统一。

对于肖罗、丁雪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他许多小辫子，在社会上把他搞臭。

对于学校闹事的党员，讨论清楚再开除党籍，不要急于开除党籍，也不能开除出校。

陕西关于工人成分的调查很好。匈牙利没有调查，乱子出来了还不知道什么原因。鉴于这个教训，必须把工人成分摸清楚，了解可靠的、中间的、有问题的各有多少。现在调查可靠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再增加工人的比重，过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逐渐改变这种情况。大学生成分再过二十年才能改变。现在招许多工人、农民，在大学还办不到。

苏共二十次大会，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痛快得很，现在斯大林又活过来了。摇过去是本心，摇过来不是本心。帝国主义一棍子，社会主义几棍子，又摇过来。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不说不是本心。

### 三 哲学问题

懂得分析，就是懂得辩证法。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又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平衡是暂时的，不断地在破坏，有的几天几个月就破坏了，刚平衡，马上又不平衡。统一者即是一致、同一、合一。党内有意见，开个会统一了，过两个月，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又开会。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也是对立统一的，一万年以后，还会有主观主义。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对立

统一的。哲学永远有斗争，讲哲学就要作斗争。有人讲哲学只讲一面，百花齐放只讲放香花，不讲放毒草。我们承认社会主义有对立的东西，斯大林就有形而上学，主观主义。苏联不承认有对立，法律上不允许，实际许多错误的东西，都在社会主义的幌子下面掩盖着。

列宁认为单讲唯物主义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就要同唯心主义斗争，要斗争就要研究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就是研究了资本主义的东西斗争出来的。

哲学领域里两个对立的东西在斗争：世界观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方法论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我们与蒋介石是对立统一，与民主人士也是对立统一。各种事物有矛盾的两个侧面的联系。斯大林在辩证法上有错误，“否定之否定”，十月革命否定了资本主义，但他不承认社会主义被否定。我们认为天下是稳定的，又是不稳定的。社会主义有一天也会消亡。如果说有一个社会上层建筑不会灭亡，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同宗教一样了。

#### 四 农村问题

丰收很重要。苏联去年丰收，许多事情好办了。我们有了一年的经验，今年要来个丰收年。如果今年大家努力丰收了，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意义很大。这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创举，历史上社会主义合作化都减产，我们一九五六年增产不大，一九五七年要大增一下。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是个目标，看三四年能否达到。湖北是丰收，还有百分之十五的社员没有增加收入。应该向党

政军民讲清楚，合作化只有一年到一年半的历史，我们搞了一辈子革命还犯错误，人家只有一年多历史，为什么不能犯错误呢？要有三年的历史，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是可能办到的。

农民有百分之十到十五的人生活苦，笼统地说农民苦是不对的，要有分析。所谓农民苦，就是富裕中农收入减少了，有一部分老干部家里富了，反映地主、富农、富裕中农的思想。

四十条在今年党代表大会上讨论过，宣传一下。亩产四、五、八百斤，争取提前一年完成。十二年计划十一年完成。

头三脚难踢，办事有三折，今年完了才一折，要三个五年计划才能办好。

自古以来，凡是先进的东西，一开始没有不挨骂的。进化论、马克思、孙中山、共产党都挨过骂。一万年以后先进的东西还会挨骂。

只要有一个合作社有优越性，就可以驳倒一切胡说，以此作宣传。

## 五 经济问题

要注意搞粮食，不搞粮食很危险。有了粮食就有了一切。罢工罢课，也有饭吃，天下不会大乱。油粮和猪肉由合作社包干。国家只要不给。收粮食也是这样（经济作物区除外）国家只管统购，不管农村统销，社包社，队包队。

两年后不是与民争粮食，而是怕国家不买，只要统购，不要统销。湖北省孝感县，现在情况就是如此。

新工矿区要开国营农场，解决粮、油、肉、菜等问题。

大的工厂是必要的，但不要太多，小的更是必要的，不怕多，大都是由小长大的。小的要以有原料和销路为原则，大的要以国力有多少则搞多少为原则。

## 六 学校问题

初中要加农业课。

各省市委书记要派干部加强学校，把学校抓起来。整个文教工作都应如此。

省委、地委、县委同志要分区分片向学生进行教育。

各省开一次学生代表大会、教师代表大会，一年一次，先准备好。一天报告，三天讨论解决问题，对学生工作没有安排应当安排。一年开一两次会，讲一两次话，要注意发现问题，不要等问题大暴露了再解决。现在好管了，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就是这么些单位。

## 七 文学艺术问题

百家争鸣有好处，让那些牛鬼蛇神、乌龟王八都出来。各省要注意，对重大的成熟的问题，以一个人为主，组织些人写文章，准备一个月写一篇，把邪气压下去。

种牛痘可以产生免疫力（给你身体内部埋点对立物），为什么文学艺术不可以种牛痘？

宣传部一两个月召集记者谈一两次，两个月谈一次也可以，现在是一年谈不上一次。

## 八 干部问题

干部尽往上提，提上来又没有事做，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现在只准下放，不准上提。领导机关人越少越好，无非是写文章，打电话。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只能出少数人组成国家。六亿人统统变成国家哪能行？大学教授有什么提拔？还不是白发苍苍的当一世教授？工人农民如何提拔？还不是白发苍苍的当一世工人农民？不是不提拔，死了就得补。

极端民主，绝对平均，总是不行的。颜渊没有评级，是第二级圣人。

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要调整一下。县委委员中，可以外来与本地各一半。

## 九 领导问题

中央委员、部长、省委书记每年都要到工厂、农村去跑一跑，了解情况，才不会变成拉科西。

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对各部看到等于没有看到一样，往工厂、合作社里钻。

真正的知识出在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越到上面越没有东西。要解决问题，一是下去，二是调人上来汇报。北京这个地方不好，搞不到很多知识，省里好一点。一定要下去，工业部长下工厂，农村部长跑农村。

中央委员、部长、省委书记，每人一年一定要有一些时间下乡

研究问题。搞一个县、一个乡，两个月可以搞清楚，两个月不看电报还能看懂。现在听说大家都不下去了，机关里事情多了。

省委书记可以兼一个县（市）委书记，把原来的县（市）委书记压成第二书记。省委书记下去了，地县委书记也会下去。市委书记可以兼厂长、校长、党委书记。这样，就可以深入实际，吸收知识。

区委书记会议，一年开两次好，逼得你研究问题。

上边放的屁不全是香的，这里边有对立，有香也有臭（包括北京在内），一定要嗅一嗅。

各省要注意，城市依靠工人阶级，农村依靠贫农，学校依靠左翼，总要有个依靠。

胡志明在依靠贫农的问题上有错误。不是纠“偏”，而是纠“正”，对土改不肯定成绩，光讲错误，发了一个罪己诏——告农民书。地主一变而为农民，民主党派反对一党专政，知识分子反党。有人提出要学中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不让学，说过去学中国学错了，结果一花独放，一家独鸣。现在改变了。

## 十 其他

精简各省自己搞，有出路的先搞下去，尽可能转回生产。无出路的设教养院，听候出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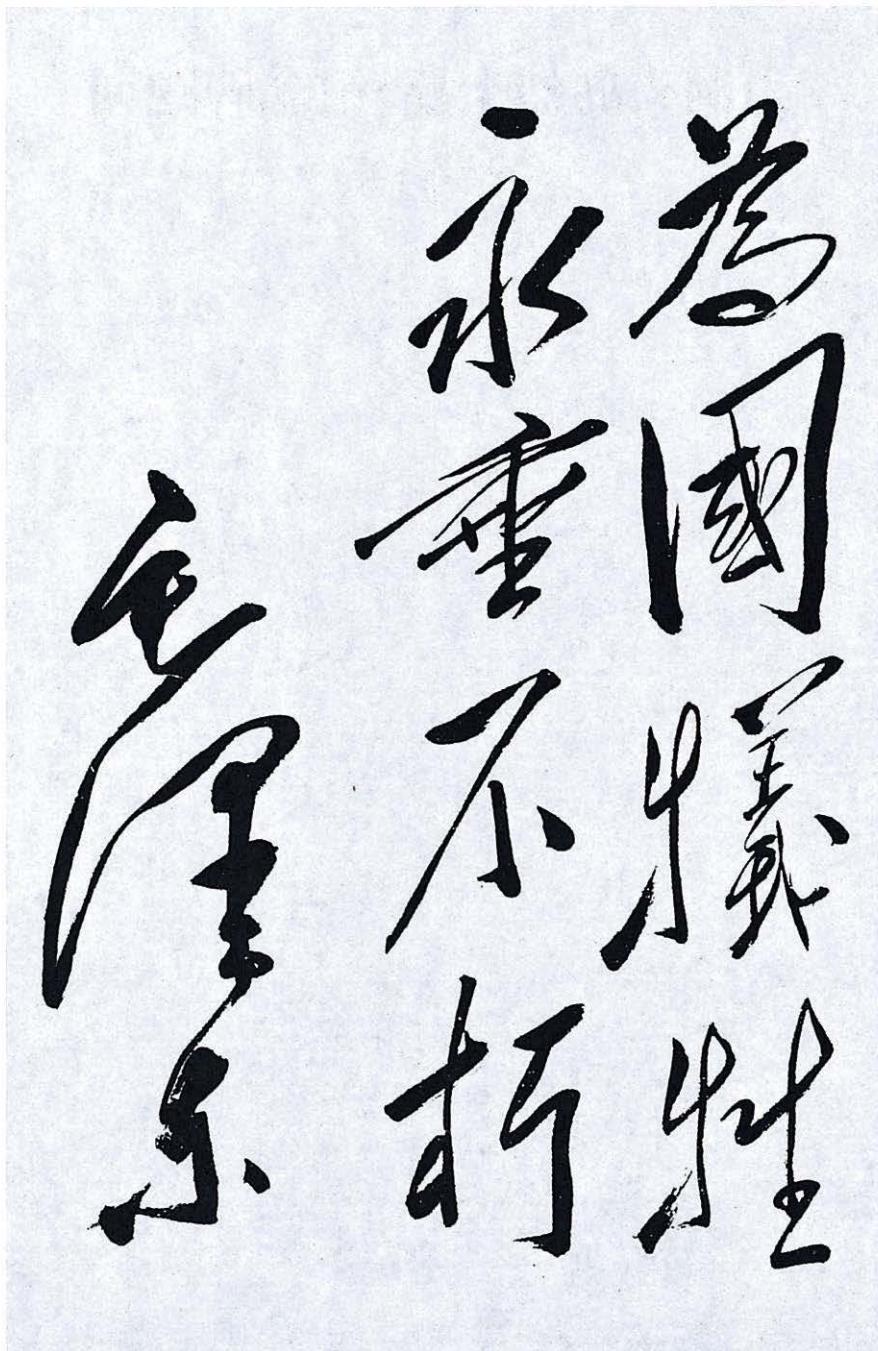
# 为洞头岛烈士墓<sup>[1]</sup>纪念碑题词

(1957年1月)

为国牺牲，永垂不朽。

---

[1] 洞头岛烈士墓建于浙江省东南瓯江口外洞头岛北岱山麓。这座公墓安葬了132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烈士，他们是在1949年8月至1952年1月多次保卫洞头岛一带人民的战斗中牺牲的。



毛泽东为洞头岛烈士墓纪念碑的题词。

# 在公安部关于处理在押病残战犯 报告上的批语

(1957年2月2日)

不但这些人<sup>[1]</sup>应当处理，其他战犯凡犯罪较轻、表现较好的，都应考虑判决释放，因为已关了七八年了。只留下犯罪较重的和最重的两类，待后处理。请公安部将战犯全体审查一下，定出一个处理方案送中央审阅。

毛泽东  
二月二日

---

[1] 指公安部党组1957年1月29日关于处理在押病残战犯给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刘焕东等12名蒋介石集团的战犯。考虑到他们在关押期间患有重病，有的因病致残，而表现一般较好，公安部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商妥，拟准予保外就医。

# 对邓子恢<sup>[1]</sup>关于按原定计划动工修建 三门峡水库的报告的批语

(1957年2月6日)

小平<sup>[2]</sup>同志：

此件<sup>[3]</sup>请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研究，请陈云同志的五人小组<sup>[4]</sup>处理。

毛泽东  
二月六日

---

[1]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指邓子恢1957年2月5日关于建议按原定计划动工修建三门峡水库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三门峡水库是黄河综合利用的水力枢纽，它的建成将从根本上解决千年洪水灾害，保证黄河不改道，使冀、鲁、豫、苏、皖五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得到保障。目前部分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建议不要停止兴建，按原定计划在今年2月开工，以争取在1959年汛期内部分蓄洪。

[4] 指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组成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陈云任组长。

# 给黃炎培<sup>[1]</sup>的信

(1957年2月11日)

任之先生：

惠书盛意可感！那些东西，既已发表，不改也可。游长江二小时飘三十多里才达彼岸，可见水流之急。都是仰游侧游，故用“极目楚天舒”<sup>[2]</sup>为宜。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一日

---

[1] 黃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这是毛泽东1956年6月写的《水调歌头·游泳》中的一句。毛泽东曾在1956年12月4日将这首词录赠黃炎培。

任之光先生：  
画本已收到。此中所写  
取些东西，甚是感谢。前函也  
可。游过江二水，即到。辛酉  
为生计，甚被牵累，真靠不住。  
流亡。都望你游历，但  
前用极目。甚为  
为。

惟宜。  
改日再  
陈。

毛泽东致黄炎培信的手稿。

# 对中央关于一九五七年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稿<sup>[1]</sup>的批语<sup>[2]</sup>

(1957年2月15日)

---

[1] 指示说，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迅速发展，成就是巨大的，但是这一年经济建设的年度计划也有进展过快的缺点，并且在计划执行的某些方面放松了应有的控制。第一，基本建设发展的速度过高，摆的摊子过多，使1956年物资的供需之间和现金的收支之间发生了一些不平衡的现象。第二，职工人数增加过多，其结果不但使企业的工资开支和国家的财政开支增加过多，而且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城市人口增加过快，城市建筑的需要也增加过快。第三，由于过多地增加了职工，过多地扩大了职工工资的升级面，不适当当地支付了一部分福利费用和奖金，一部分人员的工资也增加过多，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大大超过了消费物资的增长，造成了市场上特别是城市中消费品供应的紧张局面。此外，1956年农业生产的年度计划由于遭受自然灾害没有能够完成，对于1957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发展，特别是对于消费物资的生产和供应，以及财政的收入，也有不利的影响。为了和缓物资供应和财政支出的紧张局面，使经济战线在1956年巨大的进军以后，转向稳步前进并且作必要的调整，必须在1957年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作适当调整，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57年1月30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一月三十日修正稿)上。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指示稿时，将括号内“一月三十日修正稿”几个字改为“一九五七年二月八日政治局通过”，移至题下。这个指示于1957年2月15日印发。

退胡乔木<sup>[1]</sup>同志。

此件可用。请用中央名义写一电报，请中央各部委及党组，地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于收到此件后，迅即转发县委，城市的区委和军队的团委，并在党刊上登载。

毛泽东

二月十五日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 给《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的信<sup>[1]</sup>

(1957年2月15日)

编辑部同志们：

记不起了，似乎不像。拉〈腊〉子口是林彪同志指挥打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宜发表。《东海》收到，甚谢！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五日

---

[1] 1957年2月6日，《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寄来读者抄录的说是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为庆贺彭德怀率兵攻取腊子口写的一份电报：“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他们请毛泽东校阅并准予在《东海》月刊上发表。毛泽东看后于2月15日写了这封回信。由于时隔20多年，加之来信把写诗的地点、背景弄错了，毛泽东回忆不起这首诗来，未同意发表。据彭德怀回忆，这首诗是毛泽东在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击败追敌骑兵后写给他的，他把诗的末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后将原诗送还了毛泽东。（参见《彭德怀自述》第206—207页）这首诗最早发表在1957年《解放军文艺》4月号上，1986年9月收入《毛泽东诗词选》副编。

# 在颐年堂的讲话<sup>[1]</sup>

(1957年2月16日)

今天谈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等百家争鸣的方针问题，文艺有了缺点，应当如何对待。

王蒙写了一篇小说，赞成他的很起劲，反驳他的也很起劲，但是反驳的态度不怎么适当。

(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正在讨论，问题在于批评态度。小说揭发官僚主义，很好，揭发得不深刻，但很好。刘宾雁的小说并没有批评整个官僚主义。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正面的积极力量写得不够，要批评。应该有批评，也应该有保护。正面人物林震写得无力，而反面人物很生动。)

我们的官僚主义就是没有整垮，应该批评。过去有一个片子（指《荣誉属于谁》）没有演，那不是因为批评了老干部，要保护老干部，而是在于那个片子里，那官僚主义没有整垮。

《星星》（四川的诗刊）里面有几首诗还是好的，有几首是不好的，要酝酿一下，不要骂。

（《星星》在叫喊，不要忙，沉住气，酝酿一下，不要仓皇应

---

[1] 这是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之前主席召开的一次座谈会，对文、哲、教育界谈文化思想问题，着重谈文学批评问题。这一材料根据三份传达记录稿整理而成，以一份记录稿为主，括号内是根据另两份记录稿插入的。

战，不打无准备之仗，过去的“批评”文章，群众投我们的票少。)

对那些写了坏作品的作者要帮助，要调查。

对起义将领傅作义，对荣毅仁，我们都是帮助、改造。这样做了，他们就同我们合作。

坏小说，无非里面有资产阶级思想，唯心论，只要作者在政治上同我们合作，就和胡风有区别，不能一棍子打死。

王蒙是不会写。他会写反面人物，可是正面人物写不好。写不好，有生活的原因，有观点的原因。

李希凡说王蒙写的地方不对，不是典型环境，说北京在中央，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不能说服人的。

中央里面就出过坏人，像张国焘、高、饶、李立三、王明。坏人多了怎么办？照他们的办法就要用油锅煮。

[李希凡的文章不能说服人，认为中央所在地的区委不会有官僚主义，是不对的。中央都出过高、饶，区委（有官僚主义）更不稀奇了，“难免论”嘛。（对林震也有些“难免论”。）]

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错误的方针，很多同志实际没懂。对这个方针，十个部长大概有九个反对。

[问题是作者（王蒙）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没有搞清楚，所以小说有消极影响。我们也没有搞清楚。因为写北京，（地方）太具体，就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样（批评）不能说服人。]

王蒙的小说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他的经验也还不够，但他是新生力量，要保护，批评他的文章没有保护之意。

是有官僚主义。我们党的威望大，靠党的威望，官僚主义就横行霸道，违法乱纪，是不是应该揭发？

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王国，小资产阶级一共有五亿五千

万之多……这也是客观实际。

(中国是小资产阶级大王国，党内也不可能没有小资产阶级。)

说共产党的缺点不能揭发，这种观点不对。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实际赞成的人很少，真正懂得的人很少，“整”，不能服人。

(干部中真正搞通统一战线思想的人不多——要帮助人家改造，达到真正的团结。怎样帮助改造人家思想，很不够，办法常是整一通。“整”，很容易，但不是好办法，应不用。“整”，不能团结。)

现在王明还是有选票，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而不是一脚把他踢倒。

“一脚踢倒”是老办法，那很容易。喜欢用这办法的人，最好开枪，开机关枪，那是国民党的办法。

.....

(小资产阶级大王国是客观现实。工人阶级只有两千四百万，其中产业工人占一半，干部也占一半，这是一头；另一头是地富和资产阶级，大约有三千万；中间五亿五千万都是小资产阶级。一千两百万干部也并不都是无产阶级化的，真正化了的大约有二百万。所以，看文艺问题要从这现实出发。)

现在是大变的时期，有的人不满。农业合作化，富裕中农就不满。

(大学生中地富和资产阶级子弟占80%，都是非工人阶级，青年问题多，并不奇怪。其中要搞匈牙利事变的极少，多数是拥护共产主义的。)

但是，不满的人过去还是拥护抗美援朝，他们不搞“匈牙利”。当然，个别想搞匈牙利事变的人也是有的。

我们的同志就是怕，怕匈牙利事件。我看匈牙利事件也没有什么不好。要讲辩证法，要懂得事物的两面性，不这么一闹，就没有真正好的匈牙利。

(……矛盾总要表面化，闹一闹还是好的。闹是片面性，我们用片面性去反对片面性，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的同志有教条主义，用片面性反对片面性，用形而上学反形而上学。

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又有反官僚主义的一面，我看他的文章写得相当好，不是很好。

他暴露了我们的缺点，不能用李希凡那样的批评。

(许多批评文章，立场对，但简单化。)

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光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使人读不下去。文章的头半截，使人读不懂。

马寒冰是什么人？也是一个什么官长，总是一个什么军长级的干部吧，他在《文汇报》的文章就写得不好，教条主义。

[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立场很好，《人民日报》也可以发表，但是说服不了人，似乎百花齐放以后都错了，这是教条主义，朵朵香花是不可能的。教条主义是没有力量的，它所以滋长，原因之一是共产党当了政。马克思、恩格斯批评杜林，列宁批评卢那卡尔斯基，所以要下功夫，驳倒他们。斯大林不同，(他当了政)，所以他们批评不平等，很容易，像老子骂儿子。“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批评不要利用当政的权力，需要真理，用马克思主义，下功夫，是能战胜的。]

(用教条主义不能批评人家，因无力量，请看一下列宁是如何写

《经验批判论》的。斯大林后来就不同了，不是平等讨论问题了，不是搜集大量材料发表意见。有些东西写得好，有些东西只坐在山岗上，捡起石头打人，使人看了后不大舒服。)

陈其通、马寒冰等四人联名写的文章，后讲清楚原因，没有办法。陈沂，你写了几篇文章？有没有教条主义？出一个选集吧！全面检查一下。

教条主义的文章干巴巴，简单化，不能说服人。

教条主义滋长，是因为当了政。

马、恩驳杜林，很用了一番心思。但是当了政的斯大林就不一样了，他骂人不平等，没有说服力。

应该研究分析人家的文章。

当了政，骂人像骂儿子一样，不好。

当政党同人民的关系，不应当是老爷同人民的关系，不应该骂。

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过去批评胡适，取得很大的成功，开头我们说，不能全抹杀胡适，他对中国的启蒙运动起了作用。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杀。

胡适说，我是他的学生。他当教授，我当小职员，工资不一样，但我不是他的学生。

现在不必恢复胡适的名誉，到二十一世纪再来研究这个问题吧。

(过去因为是斗争，所以讲缺点，今天也不必平反。今天他是帝国主义走狗，到二十一世纪，历史上还是要讲清楚的。)

(对地富、资产阶级要安排、改造，何况对小资产阶级？我们写文章常常笔下不留情。教条主义的本领是戴帽子、骂人、片面性，不是从团结出发，目的也不是团结。不是帮助改造缺点，达到真正的团结。)

(对人民内部的错误，要同对付敌人的错误严格地区别，错误的杂文也是不区别。对敌人无情斗争，对人民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达到新的团结，否则就容易杀人。)

应当“刀下留人”。

.....

过去延安整风，我们不是说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吗？我们有些同志不喜欢治病救人，而是庸医杀人。对小资产阶级应当用适当的方法将他们改造。（那么多小资产阶级，我们靠他们吃饭，要把他们改造为工人阶级。）我们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同志不了解中央这个方针：批评团结，治病救人。

他们就是怕闹事。

清华有个学生，说要杀几千万人，这太多了。这个学生也不要开除他的学籍。

学生闹事有理由，但也不提倡大罢课。他们反国民党反成了习惯。

不允许工人罢工是不正确的。宪法上没禁止罢工。贴标语是言论自由，开会是集会自由。

对闹事的人不应当通通叫他们写悔过书，也不要写检讨。

因为有问题，还是闹一下好。

学生闹事，不等于造反。

六亿人，一年有一百万人闹事是正常的，六百分之一。

闹事的人根本不能说是反革命，可能其中有个别反革命。

对付官僚主义，最好是罢工、罢课、打扁担，因为老不解决问题哟！

当然，我也不登广告，提倡全国罢工。

这些矛盾是暂时性的矛盾，不是根本性的矛盾。

出了事情，要看两面。（闹事的人也有两面性，警惕我们。有脓疮，出脓就好了。）

说老子是“老革命”不能反对。国民党也是“老革命”，比我们更老。我们不能采取国民党对人民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是同敌人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从资产阶级思想内，取合理的部分，发展起来，这样才形成了马克思主义。

现在的危险是以天下太平了，因此看见王蒙的批评就不高兴。只是打，是锻炼不出文学艺术来的。

是不是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存在？（百花齐放应允许毒草存在，允许风格不同。）

毒草是毒人的，但是香花是同毒草作斗争才发展起来的。

粮食地里有许多野草，庄稼是同野草作斗争才发展起来的。苏联建设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地里一样有野草。有野草不要紧，一翻过来，就是肥料。

是毒草，可以说明，有的人主张写：“此是毒草，不许尝试。”苏联的办法是只要香花，不要毒草。其实许多毒草是借香花之名以生。我们的主张是：毒草与香花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

斯大林有唯心论，有唯物论，他有片面性。（形而上学，有唯心也有唯物，斯大林两者都有，有辩证法，也有形而上学。正因为这样，所以有功有过，功大于过。）

苏联同志转不过来，喜欢采用高压的办法。

教条主义的方法，就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对王蒙作品赞美、骂，都是片面性。

王蒙有两重性，一是好处，一是缺点。

一点里有两点，一个事物包含有两个不同的侧面。

商品有二重性，王蒙也有二重性。

《文汇报》上姚文元的文章好。（《教条与原则》很有说服力。）

不能说以前都是教条主义。国民党曾经一家独鸣，所以打倒他们后，共产党也有一阵一家独鸣，这个一家独鸣是必需的，现在就不同了。

（东欧出乱子，就是这原因。现在情况变了，必须百家争鸣。要争鸣就要有准备。通过鸣来教育改造，而不是自由主义。一切不要一脚踢开，对错误要批评，也要承认二重性。）

可以对大家讲清楚，不要仓促应战，不要仓促写文章。打仗，不是说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没有把握的仗吗？没有把握的也就是无准备的。现在打的仗也就是无准备的。

有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残余，有从那里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思想斗争，有对他的教育责任。

我们现在是以少数教育多数。

不要用简单的办法开除。

他们可以当教员，很难找到这样的教员。

马寒冰、李希凡的文章也有二重性，是教条主义，但可以引起注意。他们实际不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实际，一万年以后还有非马克思主义。

而且，有一天马克思主义自己也要完毕。五百年以后怎样设想？现在五百年当过去多少万年。

将来的世界，阶级斗争完了，马克思主义有些东西就没有用了。

宣布自己是永恒真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将来没有阶级斗争，但有新的斗争。那时社会科学领域内总会有新的学说出来。

当然，有些东西是不能推翻的，如同说地球旋转而太阳不旋转，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而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但是地球有一天还是要烂的。

人类也会被否定。有一天这样的人类不适合了，就一切毁灭，但这样对宇宙进化有好处。

三千年前，人类还用石头，以后进化到用铜铁，一直到用机器。人类历史五十万年，章太炎在“书”里就讲过。铜器时代否定了石器时代，人类在地球上就是挖地皮过日子。谁也没有选举人类当地球的主人，许多动物，野兽没有选，细菌也没有选，大概只有植物才不反对我们。我们死了，可以供给植物养料，我们排泄的东西也可以供它们补用。

人类本身要进化，马克思主义者也要进步。

如何建设这样一个大国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新问题。如何少走弯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六亿人口，马克思没有想到，列宁也没有想到，他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几年。

我们六亿人口，将来有一天上街，在大街上走都得排队。将来在街上会挤杀人，怎样分配报纸，怎样看电影，怎样逛公园，都会成问题。

不能说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还有很多问题要发现，要解决。

不要怕歪风。风总有两种，一歪一正。

吉林今年大水灾，就是下多了雨。两股流，一股寒流，一股暖流，不在黑龙江上空相遇，也不在辽宁上空相遇，偏偏在吉林上空相遇，作战，就下大雨。雨下多了，不好。但是如果不下雨，就是

旱灾。两股还缺不得一股。

越斗争，越丰富，就会出现新道理。

(□□：现在有一种倾向，写爱情多。)

没有爱情，人类就会绝种。

(□□：杂文有“难免论”。)

“难免论”要多登几篇，这样就引起注意了。

掌握政权也有两重性。许多人就是怕“放”，怕“鸣”。

(我们应特别注意到，掌握政权之后，想用简单的办法把人打倒。百花齐放为什么有人怕放？怕饭票子过河。青年人反对官僚主义不那么怕，因为他们还没有当事，官僚主义还未轮到他们头上。)

最近这种压法，缺乏说理，不大妙，应给人家出路、帮助。

(□□：王蒙要求谈。)

谈两点：1. 好，反官僚主义；2. 文章还有缺点。

王蒙很有希望，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难得。

现在就是碰不得官僚主义，好像骂官僚主义就是骂自己，好，你自己既然承认官僚主义，就得骂。

不能讲北京不能批评，不能讲不能写党的缺点。

(□□：说不搞工农兵了。)

不搞了，全国就剩下工农兵加知识分子了。

(□□：工农兵搞得好的，大家还是欢迎。)

是啊，我们反杜林反了许多年，还不知道杜林是怎样的，可不可以找到杜林的书？

(□□：谈到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关系。)

(黑格尔、马赫。《新建设》周谷城论大逻辑，有点道理。)

(学校只听校长意见，不听学生意见不对。)

# 对日本战犯榎原秀夫亲属来信<sup>[1]</sup>的批语

(1957年2月21日)

请周<sup>[2]</sup>办理。此人及其他重病战犯宜予释放。

毛泽东

二月廿一日

---

[1] 指日本战犯榎原秀夫的女儿榎原公子、榎原贵子和妻子榎原房子1956年年底写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1956年11月20日，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报道，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日本冈山县学术文化视察团时曾说：“战犯榎原如果有病的话，可以考虑释放。”榎原过去在国家战争政策的压力下，进行了细菌研究，的确是一个犯了罪的人。但作为他的亲人，是没有一天不在祈望着他的健康和自由的。今得知榎原旧病暂时痊愈，又患了咳血症，恳请毛主席先生宽宥他，让他回国治疗。来信并表示：为了向中国的许多牺牲者表示哀悼之意，一定要尽全力为日中友好和世界和平而努力活动。

[2] 周，指周恩来。

# 关于调查河北涿县尚庄乡 联盟农业合作社问题的批语

(1957年2月24日)

此件<sup>[1]</sup>寄河北省委马国瑞<sup>[2]</sup>同志：

此件所说是否属实，原因何在，请派人去涿县尚庄乡切实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为盼！

毛泽东

二月廿四日

---

[1] 指莫余平关于河北省涿县尚庄乡联盟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生产情况的调查与整社意见的报告。莫余平，任冶金工业部金属回收管理局副局长，当时正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这个报告是他利用寒假回乡探亲时写的。报告说：现在农民的生产情绪低落，社员不愿上工，积肥不积极；1956年灾情同上年差不多，但减产严重，农民收入普遍下降；有的地方出现宰杀耕畜和强行把大车、牲口拉回家的现象。报告认为1956年大量减产是人为的灾害，是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和组织管理不善造成的。主要是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强行盲目推广新技术；耕作粗糙，荒地不少；收割时随便把粮食丢在地里糟蹋了；副业生产搞得不好。报告还反映了社员对社领导和党支部的意见，说社领导强迫农民入社、投资，作风不民主，经济不公开，办事不公平，关心社员少，干部之间闹宗派，党支部包办社的工作等，因而社员思想极为混乱，任其发展下去，合作社有垮台的危险。

[2] 马国瑞，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

# 对彭德怀关于外出检查 军事工作的报告<sup>[1]</sup>的批语

(1957年2月25日)

同意。注意军中思想动态、政治教育。

毛泽东  
二月廿五日

大量裁兵，一定要有出路，不能推出了事。要作至少一个月还乡态度、策略教育，设想各种困难，作好精神准备。又及

---

[1] 指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7年2月21日关于外出检查军事工作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拟于2月25日或26日与陈赓、谭政、陈士榘等10余人到南京军区，检查国防工事和勘察地形，以及了解军事院校工作、军队训练、军内关系、军民关系等问题。

# 对军委关于军事系统向中央汇报工作 问题的报告<sup>[1]</sup>的批语

(1957年2月25日)

军委：

上半年忙，下半年为妥。不要都准备，有四总、空、海即够，看情形酌定。

毛泽东

二月二十五日

---

[1] 指中共中央军委1957年2月22日关于军事系统各部门、各军种、兵种向党中央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汇报工作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军委经过讨论，初步预定：按总参、总政、总干、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后勤部、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通信兵、工程兵、铁道兵、防化学兵的次序，依次汇报，最好都能分别汇报一次，以使政治局同志多了解一些军队工作情况，多给些指示。但是否每个部门都一一汇报，或只抽其中几个重要部门和军种、兵种汇报，请指示。汇报时间可在3月20日至4月中旬以前。

# 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 (讲话提纲) [1]

(1957年2月)

(一) 两类矛盾：敌对阶级之间，人民内部之间  
性质不同，处理方法不同。

首先，分清敌我，分清是非。

人民日报的文章<sup>[2]</sup>，说的是国际方面。

专政制与民主集中制。

大民主与小民主。

早一点取消专政吗？

制（专）政所适用的范围。

民主是目的吗？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具体的『的』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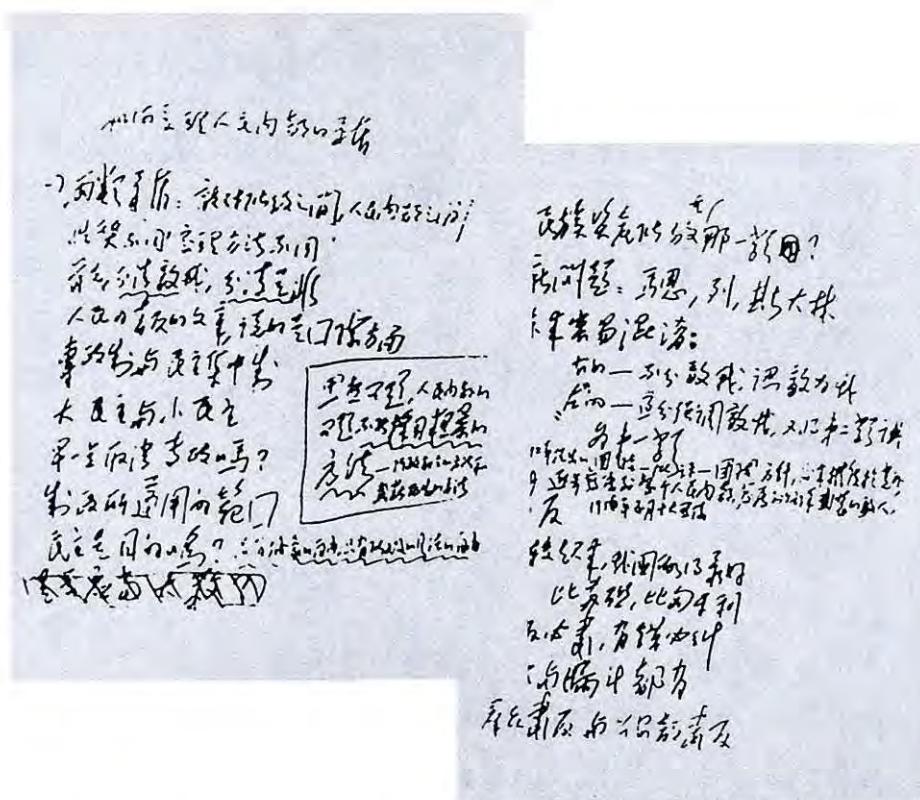
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用粗暴的方法——行政命令  
的方法和武断压制的方法。

民族资产阶〔级〕放在哪一类？

---

[1] 这是毛泽东写的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提纲，题目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后来在这篇讲话的记录整理稿上，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2] 指《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登载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1956年12月29日登载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毛泽东写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的手稿（部分）。

新问题：马恩，列，斯大林。

本来容易混淆：右的——不分敌我，认敌为我；“左”的——过分强调敌我，又将第二类误为第一类。

1942年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方针，后来推广于党外，逐步发展到整个人民内部，发展到解除武装的敌人，1956年五月十大关系。

## （二）肃反

比较起来，我国做得最好，比苏联，比匈牙利。

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过火与漏斗都有。

群众肃反与公安部肃反。

今年和明年应来一次大检查，全面总结一次。中央由人大常委与政协常委主持，地方由省市人委与政协主持。

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

是否应当大赦？

### (三) 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

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吗？

应支持农民，反对歪风。

争取五年内巩固合作社，接近或达到富裕中农水平，习惯于集体生活。

生活已有改善——七年增产1400亿斤，平均60元。

还有百分之几到十几的缺粮户，有的地方已无缺粮户。

几年内不增加征购量，逐步取消农村统销，粮、肉、油自给（一般）。

### (四) 资本主义改造

也有一股风，说是资本家不改造了，工人也有两重性。

工人、资本家已经一样了吗？

### (五)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有很大进步，也有歪风——波动，怪议论，想杀人，想学匈牙利，要大自由，讨厌马克思主义，只钻业务赚薪水。

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改造自己。

### (六) 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四年来的歪风又发展了。

### (七)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这是战略方针——例如：救灾、统销、安排工商就业、统战安排等。

从六亿人口出发，节育。

去年就业近三百万。

广州、上海等处还有一些人失业。

百分之四十、四百万、八十万、九万人不能入学和安排就业问题。

(八)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两方面的斗争。

毒草不是香花，教条主义也不是香花。

老干部不能批评『鸣』吗？

新老干部的关系：一视同仁，又不能一视同仁，领导核心。  
种牛痘。

北京不能批吗？

钟惦棐、陈沂、陈其通、马寒冰<sup>[1]</sup>。

马克思主义是和它的敌〔对〕思想作斗争发展起来。历史上的香花在开始几乎均被认〔为〕毒草，而毒草却长期〔被〕认为香花。香毒难分，马、列、达尔文、哥白尼、伽利略、耶稣、路德、

---

[1] 钟惦棐，当时任《文艺报》编委兼艺术部主任。1956年12月15日，他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在《文艺报》第二十三号发表了《电影的锣鼓》一文。陈沂，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其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马寒冰，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干部。1957年1月7日，陈其通、马寒冰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干部陈亚丁、鲁勒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

孔子、孙中山、共产党、孙行者、薛仁贵。

马克思主义还要发展，如何发展？

从存在出发：六亿人口；小资产大王国，顽强地表现自己，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长期耐心的教育。

许多人实际上不赞成这个方针。

文章要有说服力，不能用形而上学的方法。

人民日报何时答复四个人<sup>[1]</sup>？似乎毫无准备，也不请示。

这是一个人人民内部教育自己和发展自己事业的方针。“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需解放全人类”，“在阶级斗争中，改造剥削者，同时也改造了自己”。治病救人。

统一战线，长期共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治病救人，反对形而上学、教条主义——联系起来。

（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

（十）闹事，出乱子，都不好吗？

罢工、罢课、游行、请愿、闹事的二重性。

匈牙利事件<sup>[2]</sup>的二重性。

批判斯大林事件的二重性。

反苏反共事件的二重性。

生人死人的二重性。

美国不承认我们的二重性。

出现几篇错误文章的二重性。

没有大作品、好影片的二重性。

物极必反，不及则不及〈反〉。

---

[1] 指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

[2] 指匈牙利1956年10月至11月发生的政治事件。

中国人穷与愚（不识字）的二重性。

外国人富与智（文化高）的二重性。

如果打三次世界大战，也有二重性。

国际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

向坏处着想，打大战，怎么办？打败仗怎么办？打败仗就是打胜仗。

目前一个长时间内还不会，可能有十几年，可能更长。

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互争殖民地，互争亚非。

(十一) 少数民族与大汉族民族问题，西藏问题

(十二) 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

工业化的道路，可以和苏联有些不同。

重、轻、农的比例是否可以是六比一？重工业还是优先，但走新的道路是否比苏联那样（二十一年内增加1400万吨钢）工业化速度反而快些？如果给我们二十一年（从1950—1970），是否可以基本上工业化，而不止1800万吨钢（由90万吨开始）？

这个问题我们还缺少经验，总之要有广大市场，要看六亿至八亿人口。

还是要学习苏联。苏联不好吗？别国也要学，但谁给装备和技术呢？

十大关系：

(一) 重与轻、农关系

(二) 沿海与内地关系

(三) 经济与国防关系

(四) 国家与生产单位（工厂、合作社）与个人关系

(五) 中央与地方关系

- (六) 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
- (七) 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其他人关系（长期共存）
- (八) 敌我关系
- (九) 人民内部关系（是非关系），一家与百家关系（百家争鸣）
- (十) 中国与外国关系

#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sup>[1]</sup>

(1957年2月27日)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为了叙述的方便，分为十二个小题目。在这里，也要说到敌我矛盾的问题，但是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

## 一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

---

[1] 这是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后来毛泽东根据原始记录加以整理，作了若干重要修改和补充，1957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

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

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他们的这种希望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

群众支持的。匈牙利的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我国另有一些人在匈牙利问题上表现动摇，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

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一九四二年，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内斗争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我们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时候，就没有采取这

个老方法，而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风的时候采用的。经过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们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了伟大的成功。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可以追溯到更远。自从一九二七年我们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不过到了抗日时期，我们就把这个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之上了。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是一致的。匈牙利事件所表现的那种范围相当宽广的对抗行动，是因为有内外反

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这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暂时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

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这个意思，在我们党的过去的许多文件里和党的许多负责人的言论里，曾经说得很多。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我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里，又说过：“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过去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并且在工作中

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很多干部和人民都在实际上懂得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问题呢？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缘故。

许多人对于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应该承认，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我们在过去工作中也曾经混淆过。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错误地把好人当坏人，这种情形，从前有过，现在也还有。我们的错误没有扩大化，是由于我们在政策中规定了必须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解放前五十多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

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例如，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

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 二 肃反问题

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问题。在人民内部，有些人对于肃反问题的看法，也有一些不同。有两种人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不相同。有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认敌为我。广大群

众认为是敌人的人，他们却认为是朋友。有“左”倾思想的人则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把某些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都不能正确地处理肃反问题，也不能正确地估计我们的肃反工作。

为了正确地估计我国的肃反工作，我们不妨看一看匈牙利事件对于我们国家的影响。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在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有些动荡，但是没有引起什么风浪。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该说，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

当然，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不是由于肃反。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是由于我们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共产党和解放军，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劳动人民。我们的党和军队是在群众中生了根的，是在长期革命火焰中锻炼出来的，是有战斗力的。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是经过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的，不是突然建立起来的。有些民主人士也受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同我们共过患难。有些知识分子经历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斗争的锻炼，许多人经历过解放以后的以分清敌我界限为目标的思想改造。此外，我们国家的巩固，还由于我们的经济措施根本上是正确的；人民生活是稳定的，并且逐步有所改善；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政策，也是正确的；等等。但是，我们在肃清反革命方面的成功，无疑是国家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这一切，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在匈牙利事件时期没有发生波动。民族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更不要说工农基本群众了。

解放以后，我们肃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一些有严重罪行的反

革命分子被处了死刑。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广大群众的要求，这是为了解放长期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恶霸分子压迫的广大群众，也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如果不这样做，人民群众就会抬不起头来。从一九五六年以來，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有些人不了解我们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的情况，过去的政策适合于过去的情况，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想否定过去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人民群众所不允许的。

我们的肃反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有错误。过火的，漏掉的，都有。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们在肃反工作中的路线是群众肃反的路线。采取了群众路线，工作中当然也会发生毛病，但是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会比较容易纠正些。群众在斗争中得到了经验。做得正确，得了做得正确的经验。犯了错误，也得了犯错误的经验。

在肃反工作中，凡是已经发现了的错误，我们都已经采取了或者正在采取纠正的步骤。没有发现的，一经发现，我们就准备纠正。原来在什么范围内弄错的，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宣布平反。我提议今年或者明年对于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在检查工作的时候，我们对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要泼冷水，而要帮助他们。向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泼冷水是不对的。但是发现了错误，一定要改正。无论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司法部门、监狱、劳动改造的管理机关，都应该采取这个态度。我们希望人大常务委员、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凡是有可

能的，都参加这样的检查。这对于健全我们的法制，对于正确处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会有帮助的。

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还有反革命。有人说，已经没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了。这是不合事实的。事实是还有（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都有），还必须继续和他们作斗争。必须懂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但是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如果说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见也是错误的。如果接受这种估计，结果也会搞乱。

### 三 农业合作化问题

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我认为，情况根本上是好的。合作化完成了，这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大矛盾。合作化迅速完成，有些人担心会不会出毛病。幸好，毛病有一些，不大，基本上是健全的。农民生产很起劲，虽然去年的水旱风灾比过去几年中哪一年都大，但是全国的粮食仍然增产。现在有一些人却在说合作化不行，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吹来了一股小台风。合作化究竟有没有优越性呢？今天会场上发的文件里面，有一

个关于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sup>[1]</sup>的材料，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合作社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山地，历来很穷，年年靠人民政府运粮去救济。一九五三年开始办社的时候，人们把它叫做“穷棒子社”。经过了四年艰苦奋斗，一年一年好起来，绝大多数的社员成了余粮户。王国藩合作社能做到的，别的合作社，在正常情况下也应该能做到，或者时间长一点也应该能做到。由此可见，那些说合作化不好的议论是没有根据的。

由此也可看出，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积极拥护合作社的是些什么人呢？是绝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余的人，大多数也对合作社寄予希望。真正不满意的只占极少数。许多人没有分析这种情况，没有对合作社的成绩和缺点以及缺点产生的根源作全面的考察，把局部和片面当成了全体，这就在一些人中间刮起了一阵所谓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小台风。

要多少时间合作社才能巩固，认为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议论才会收场呢？根据许多合作社发展的经验来看，大概需要五年，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现在，全国大多数的合作社还只有一年多的历史，我们就要求它们那么好，这是不合理的。依我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建成合作社，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合作社能得到巩固，那就很好了。

---

[1] 指河北省遵化县西四十里铺村以王国藩为社长的建明农林牧生产合作社。

合作社正在经历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它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例如，在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在合作社内部，在合作社同合作社相互之间，都有一些矛盾需要解决。

我们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上述矛盾。在生产问题上，一方面，合作社经济要服从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的领导，同时在不违背国家的统一计划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参加合作社的各个家庭，除了自留地和其他一部分个体经营的经济可以由自己作出适当的计划以外，都要服从合作社或者生产队的总计划。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许多人说农民苦，这种意见对不对呢？就一方面说来是对的。这就是说，由于我国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压迫剥削了一百多年，变成一个很穷的国家，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还低。要有几十年时间，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来。这样说“苦”就恰当了。就另一方面说来是不对的。这就是说，解放七年以来，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单单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其实，工人农民的生活，除极少数人以外，都已经有了一些改善。解放以来，农民免除了地主的剥削，生产逐年发展。以粮食为例，一九四九年全国产粮只有二千一百几十亿斤，到一九五六年产粮达到三千六百几十亿斤，增加了将近一千五百亿斤。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并不算重，每年只有三百多亿

斤。每年以正常价格从农民那里购粮也只有五百多亿斤。两项共八百几十亿斤。这些粮食销售在农村和农村附近的集镇的，占了一半以上。由此看来，不能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我们准备在几年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统统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至于简单地拿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较，说一个低了，一个高了，这是不适当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而农民的生活费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说工人特别得到国家的优待。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资以及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是高了一些，农民看了不满意是有理由的，斟酌情况作一些适当的调整，是必要的。

#### 四 工商业者问题

我国社会制度的改革，除了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以外，私营工商业改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也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了。这件事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密切相关的。这个阶级矛盾是否完全解决了呢？还没有。还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但是现在有些人说：资本家已经改造得和工人差不多了，用不着再改造了。甚至有人说，资本家比工人还要高明一点。也有人说，如果要改造，为什么工人阶级不改造？这些议论对不对呢？当然不对。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

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当然，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难道资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吗？

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怎么能说已经没有了两面性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如果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两面性，那末资本家的改造和学习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应该说，这种意见不仅不符合工商业者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工商业者大多数人的愿望。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工商业者都是愿意学习的，并且有了显著的进步。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须是在工作中间，他们应当在企业内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但是经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某些旧观点，也是重要的。工商业者的学习，应当以自愿为基础。许多工商业者在讲习班里学习了

几十天，回到工厂，同工人群众和公方代表有了更多的共同的语言，改善了共同工作的条件。他们从亲身的经验懂得，继续学习，继续改造自己，对于他们是有益的。刚才所说的那种认为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改造的意见，并不能代表工商业者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只是少数人的意见。

## 五 知识分子问题

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在知识分子中间也表现出来了。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

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

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

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

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

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这个缺点，今后必须避免。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

管。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提倡勤俭建国。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

## 六 少数民族问题

我国少数民族有三千多万人，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区广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所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比较从前大有改进，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在一部分地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还严重地存在，必须给以足够的注意。经过各族人民几年来的努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绝大部分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

议<sup>⑩</sup>，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

## 七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我们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成绩很大，但是，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

---

[1] 指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共十七条。

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

## 八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

于太阳系的学说<sup>[1]</sup>，达尔文的进化论<sup>[2]</sup>，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

---

[1] 哥白尼（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一书中，证明地球绕自己的轴旋转，并和其他行星一起，围绕着太阳运行，推翻了约两千年来的地球不动学说。

[2] 达尔文（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等著作中，提出了进化论的学说，说明了生物的演变和人类的起源。

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1957年6月19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稿经过修改补充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图为上海市民在购买刊有讲话全文的报纸。

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

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

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

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

以上所说的观点，都是从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做法。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地提出来了。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我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就已经这样说过：“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这里所说的，也就是各党派可以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同各民主党

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当然，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所作的批评，也只有在合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 九 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

一九五六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一九五六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

应该承认：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

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

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了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在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他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对于这种人，

我们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则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 十 坏事能否变成好事？

如像我在上面讲过的，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这是大家清楚的。但是它也有二重性。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间处理得正确，结果匈牙利事件由坏事转变成了一件好事。匈牙利现在比过去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都得了教训。

同样，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发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当然是坏事。但是它教育了和锻炼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这就变成好事。在许多国家里，有一批人在这个风潮里退出了党。一部分党员退党，党的人数减少了，当然是坏事。但是也有一方面的好处。那些动摇分子不愿意继续干下去了，退走了，大多数坚定的党员更好团结奋斗，为什么不好呢？

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sup>[1]</sup>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

[1] 参见《老子·五十八章》。

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 十一 关于节约

我想在这里谈一下节约的问题。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

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

在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中，我们反对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而着重在反对贪污。一九五五年提倡过节约，重点是在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中反对了过高的标准，在工业生产中节约原料，成绩很大。那时，节约的方针还没有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认真地推行，也没有在一般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中认真地推行。今年要求在全国各方面提倡节约，反对浪费。我们对建设工作还缺乏经验。在过去几年有很大的成绩，同时也有浪费。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在去年十一月中共二中全会更着重地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以后，几个月来已经开始发生效果。这一次节约运动必须彻底地持久地进行。反对浪费，同批判其他缺点错误一样，好比洗脸。人不是每天都要洗脸吗？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工人、农民、手工业者，总之，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

勤俭建国的方针。

## 十二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些时间，我国的钢产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即一九四三年的九十多万吨，发展到二千万吨，或者更多一点。这样，城乡人民都会感到高兴。

关于经济问题今天不准备多讲。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

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

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大家看吧，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除了苏联以外，东欧一些兄弟国家也给了我们一些帮助。完全不错，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它们的团结。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

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1957年2月，毛泽东等接见出席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代表。

# 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 作结束语的提纲

(1957年3月1日)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要普及，要提高，京戏原来是地方戏，将来也可能转化。

散花野草也有用处，其中有些可能转化为香花，香花也可能变得不香了。

共产党也总有一天变得无用了。

马克思主义应当宣传，不能强迫人们相信。以工人阶级、共产党、马列主义为领导，是否不妥？

匈牙利要两年至三年才能恢复。错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

批评问题。不要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应允许互相批评，批评政府不犯罪。老干部不怕批评。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没有安排，安排不够。

大民主，小民主——一般适用小民主，局部（不实行小民主地方）允许大民主。

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

在法律范围内（不允许行凶，毁物）。

纪律，为了增进纪律——我们人民是很守纪律的。

以军队民主为例。

遵师爱生。

局部的，个别的，不是一般提倡。

作为『了』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因为官僚主义存在。

发至县级<sup>[1]</sup>，还要研究。

官僚主义——橡胶。

以工人阶级、共产党、马列主义（指导思想）为领导，是否不妥？

曲折、波浪式、螺旋形的前进。

科学。橡胶50—60年。

对唯心主义是否可以批评？问题是要有说服力。

发行参加〈考〉消息40万份（2000，30万）<sup>[2]</sup>，蒋介石选集<sup>[3]</sup>。

不要泼科学家的冷水。参观科学院。

控制在六亿人口（控制一个时期少增长，以待条件具备，再作适当增长）。

单纯技术观点抬头。

美国经济危机，美国同各国的矛盾。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耻！

---

[1] 指将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发至县级。

[2] 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中说，《参考消息》的发行，准备由2000份扩充到30万份，发到县一级。

[3] 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中说他赞成出蒋介石全集，但不公开发行。

#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

(1957年3月1日)

同志们：

我没有多少话讲了，有几点说一下。

批评的问题。这个问题刚才有人谈到老干部批评的问题，还有人提到（在小组会的时候）马列主义能不能批评。马列主义，这个马列主义是不是可以不规定为领导的思想，或者叫指导思想？因为规定它为指导思想，使得有些人有点害怕。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国家现在有个很大的改变。我是讲由过去的那种领导，旧社会国民党，蒋介石嘛，那么一种领导，改变为让位于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为我们的国家制度。这个工人阶级为领导么，它就是有个党。现在还是有党派的时代。这个党、这个阶级，这个党有一种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那么，问题是它如何领导，如何指导。并不是说让一切人都进共产党，都相信共产党的道理，去讲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这些东西，如讲世界观这个问题，只能够是逐步地使人了解，开头是很少的人，以后多一点人，以后又多了一点人，不能一下子要求很多人相信，就是不能强迫人相信这一点嘛！不能强迫人信什么东西，前天我提到了。精神上的东西不能强迫人家相信，也不能强迫人家不相信。比如强迫人不信教就不行咯，强迫人要信这种教不信那种

教是不行的。强迫人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行不行呢？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行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在一天天发展，相信的人一天天更多一些的。但是无论怎样，几十年之后，我相信总还有许多人不相信的，不相信那个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的，有神论者不信。甚至几十年后，多少年后，还有相当一些人不信怎么办？原来就是在马列主义领导里头应该安排的，就是应该认识到有些人不相信，事实上或许要如此，也只能如此。

能不能批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够批评倒它就没有用，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那么这个东西就不行了。马克思主义如果还怕批评，那就不行了。所以不发生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事实上唯心论它就批评马克思主义，宗教界也批评马克思主义，有些人不说就是了。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说成为与他那个宗教结合。老干部如果批评倒了是该批评的。你一批就倒嘛，你是纸糊的、棉扎的，纸糊棉扎风一吹就倒。应该是不怕批评的。所以这时候，提出怕批评，就是有弱点了。这个弱点有没有？我看老干部、新干部都有弱点，弱点方面都应当批评，无论哪种干部、政府，缺点、错误应该接受批评的，并且成为习惯，人民政府成了习惯。批评就没有事，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嘛！人民范围之内的事，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利的，我们不要把这个权利交给反革命，宪法是应该实行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人说我讲得不够。讲的这种也是一种批评，前天没大讲这个问题，今天有朋友讲到咯。什么叫长期？我想这个问题答复比较容易，长期么就是你共产党有多长，它就有多长，照办就是了。共产党有多少寿命么，就是民主党派有多少寿

命。今天郭老说我们这些人统统要向他看齐，无党派寿命最长咯。共产党有天要灭亡的，我们希望这一天不迟不早地到来。大概太早不行，太迟了没有必要。凡发生的事物，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发生的，因此都有它一定的寿命，共产党就是一个事物。如何监督？就是属于批评、建议，用这些方法监督嘛。我们有各种机会嘛，比如今天就是机会，还有各种机会进行批评，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评，批评缺点，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达到团结，把工作改善。

说，你又讲大民主不适当，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但是又说可以罢工、罢课，岂不是自相矛盾吗这样一个问题。所谓大民主就是群众运动，这是我们过去所做的，包括肃反中间的某些做法。现在有人建议不要大民主了，现在的做法已经改了，现在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是老的。工商业改造也不是大民主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不是大民主咯，都是小民主咯，有些一个“小”字还不够，再加一个“小”字，叫做“小小”民主，就是和风细雨比较好。现在所讲的就是那个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那样的地方，那样的工厂，那样的合作社，那样的学校，那样的商店，那样的机关，那样的单位怎么办？它任何的民主都没有，大民主没有，小民主没有，小小民主也没有。简直是官僚主义，一万年也不能解决问题，就是问题不得解决，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对这种官僚主义如果不允许它我看是不好的，应当允许它，虽然宪法上没有罢工的条文。这并不是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提倡罢工、罢课，我们不提倡这个，我们提倡反对官僚主义，提倡人民范围之内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罢工算不算一种斗争？也算一种斗争，用批评斗争，没有办法的时候，对严重的顽固的官僚主义者，用这种方法是应该允许的。那么，先生管不了学生怎么办？应该是

有纪律的，无论工厂、学校、商店都应该有政治思想教育。我们中国人民是有纪律的，是很守纪律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进行工作，政治思想教育很缺乏，很多方面缺乏。官僚主义非常严重，有些地方，相当多的学校不能解决，没有教育。纪律也应该进行教育，应该先生学生打成一片，工厂厂长与工人打成一片，关心他们。那么这样来的时候，还有什么罢工呢？凡是这样做了，就不会有罢工的。所以第一条是反对官僚主义。以后下面三条，就是第二条咯，如果个别地方、局部地方、个别工厂、个别合作社、个别学校，官僚主义十分严重，这个时候，不问事实上有罢工，事实上有罢课，就是因为连小民主也没有，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有些地方的同志，回到各个地方，不要说北京开了会的，从此全国可以大罢工，（笑声）全国可以大罢课，说是我说的，不是这样的。我们以军队为例，军队我们曾经进行过尖锐的批评，战士批评军官，使军官很难受，战士批评连长，干部会批评军长、师长。大批评以后，这个师长、这个军长、这个连长他的工作更好做了。战士们是拿着枪的，可以用这样的批评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你就要检讨，你当连长的要检讨，你犯了错误！不能打人，官长不打士兵。军队这样做了，我们解放军里头有很大的民主，为什么我们学校不能做？我们工厂不能做？我们合作社不能做？我们合作社现在的时候，许多地方命令主义很严重。为什么我们机关不能做？是不是这样做，天下就会造反，天下就会大乱？为什么军队没有乱，还这么打胜仗？那么打胜仗靠什么？一没有原子弹，二没有氢弹，洲际导弹，一个也没有，飞机也没有，那个时候武器不如敌人，如何团结起来？就靠肃清官僚主义，减少官僚主义，跟群众打成一片，走群众路线。

至于要服从领导，工人要服从厂长的领导、指挥，学生要服从先生的指挥，要有学习的纪律，但是先生与学生要打成一片，关心学生，解决学生的问题。现在学校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比如课太多，学生负担太重。我看我们中国人民就是这样，要么一个字不认识叫文盲，要认识字一天给你堆一大堆。所以讲到这个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个事情，我们要作为调整社会秩序的方法之一，一种补充方法，经常的方法应该是克服批评官僚主义，但是如果办不到，用这种方法调整我们的社会秩序作为一种补充方法也是可以的，也是应该允许的，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

要见世面，要了解国际情况、敌人的情况。我们准备发行一个刊物《参考消息》，在座的大概都看到了，《参考消息》过去发多少？发两千份，现在准备扩大到三十万份一个大报纸，比如《大公报》它是发二十万份，这个报纸发行比它多，有三十万份。由两千份准备跃进到三十万份，发到县一级，就是要花钱买咯。凡是愿意购买这个刊物的，党内党外都可以看这个刊物，那么人们就要说替帝国主义出钱办报纸，共产党、人民政府替帝国主义无条件地办报纸。我说这个话也可以这么讲，那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要把你们骂我们的话，如何骂我们，你那里发生了的乱子，登在报上，作为内部刊物，有三十万人可以看到，一份不止看一人，还不止，什么“不得遗失”，那个东西人家遗失了怎么办？那有什么要紧？（笑）（周总理：现在没有了。）没有了，不要那么禁令，就是要我们的人见世面，要懂得外界的事情。至于是不是受他的宣传，受帝国主义的影响而变成他们的人，我看也有可能一两个变，变一两个，我们中国人多，刚才马老也讲了六亿人口嘛，变那么几个有什么要紧。蒋委员长这个问题，蒋介石他讲了许多东西，有许多著作、演说，

听说有这么多长，我就赞成出全集，有人反对出全集，这个当然不公开发行，公开发行行不行？现在还不好公开发行吧，图书馆里头愿意买，愿意看看，你要研究研究历史。他是历史人物，是社会存在的一个反映，他的意识形态，蒋介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我们要批判那些东西，他的文章都没有读过，那怎么批判法？那是读了他的文章统统就要到台湾进他那个党呢？是不是有这个危险呢？我看没有这个危险。有那么几个人要进也可以咯，这一条就是要见世面，要见风雨，不要坐在暖室里头，暖室里头长大的东西是不牢固的。那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就更加懂得咯，为什么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里面总要放出一些祸来就是咯！要鸣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应该怎样看？我前天说了，不好的东西它另外有一个作用，一方面是不好，一方面是好，毒草有它的好处。它不单是一个毒，我举了种牛痘的那例子，这个细菌、病毒是坏东西，有些也有好的作用，能使人产生免疫。

其他的东西还有什么？

比如匈牙利，有人批评我，说我讲得不够，没有讲清道理。匈牙利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什么错误那天也讲了一点，没有时间讲那么多，我们也真不太清楚。过去那个拉科西，那个同志干了些什么事情也不大清楚，苏联许多东西我们也不太清楚，苏联比较好，拉科西那个时候搞得岂有此理。大概有这么几条，无非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那天我不是讲了吗？工业方针没有原料，没有销场，办大工厂，工人的薪水降低百分之二十，资本家简单地打倒。如讲我们的荣毅仁先生，把他打倒，到申新九厂当工人，一个匈牙利事件一起，他就出来组织工人委员会，组织什么会？组织工人委员会。他就那么简单，简单明了。（笑）知识分子

子没有改造，根本不谈知识分子改造，于是乎裴多菲俱乐部，记者协会，学生联合会就出来了。还有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没有群众跟反革命作斗争，而是少数人在那里斗，大批的真正的反革命没有受损伤。匈牙利来了大民主啦！这一次，大民主时间不长，可是恢复要多少时候呢？有人说要三年，他们自己讲，他们的人跟我们讲要三年才能恢复到过去十月二十三日，一两个月的大民主，大民主好是好，可是要三年才能恢复元气。波兰的大民主就减产一半，十月十一月，十月减产一半，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多少恢复一点吧！所以还是搞小民主好。搞大民主，我们在座的相当多的人也受不了，是不是？

人口控制在六亿，一个也不多啦？（笑）这是一种假设，就是讲有一个时期，比如讲条件没有具备，无非是粮食、衣服、房子、教育等等，现在每一年生一千多万，你要它不增，很难讲，因为现在是无政府主义嘛，必然王国还没有变自由王国咯！在这方面人类完全不自觉，没有想出办法来，我们可以研究这个问题，应该研究。政府应该设一个部门，那天我讲了，政府应该设一个部门或一个委员会，人民团体可以广泛研究这个问题，可以想出办法来，人类总而言之要自己控制自己就是了，有的时候使它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子，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笑）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老讲得很好，今天讲得好哇！我跟他是同志，以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时人家反对，说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但这个问题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有一些办法。人民会不会有这个要求，还是我们主观的，人民是要求这个东西的，不是每个人要求，而是很多人要求，比如农民要求这个，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节育。城市里头农村里头都有

这个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邵先生咯，嘿，你们两个坐在一起了。(笑)

不要向科学家泼冷水，这一条好不好？我看，不要泼冷水，科学家怎么能泼冷水？向科学家泼冷水这当然不好。一切家，政治家、艺术家、文学家也不要泼冷水。科学家不要泼冷水，积极分子只要他积极，有时候工作做得不好，我们也不要泼冷水，帮助他改正错误，只有那个别的、极顽固的、无可救药的分子另外处理，无可救药的，科学家不要泼冷水。参观科学院，今天郭老将了我一军，这个恐怕没有办法，你既然将起我的军来了，不然你已经封了我的封号“官僚主义者”。(笑)

单纯技术观点抬头的问题，同志们说了这样一个问题，说得好，应该教育我们的干部、科学家、技术人员、技术干部，学生们不要单纯技术观点，技术观点是好的，应该有技术观点，没有技术观点怎么搞技术？观点还没有哪有技术？就是要发展科学技术，要有科学技术观点，要发展到大家热心。但是单纯就不好咯！可以搞到替社会主义可以服务，替资本主义也可以服务，因为我们现在希望我们的同志们，对于新的政治关心，对于新的大局关心，但是我们要做好我们的工作。这不能完全怪他们，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有些东西他们不能接受，就是我们所谓思想政治工作教育使人不能接受，他就没有兴趣来接受你这个东西，无非是一种教条主义，没有说服力，引起他们的兴趣，所以应该改善我们这个政治工作，在学校里头，在科学研究院，在工厂，一切有科学技术人员存在的地方，学生们中间，加强并且改善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

关于邦有道怎么样？贫且贱焉耻也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确不是个别的问题，这是所谓安排问题。这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有些

人没有安排，一个是安排不适当。所谓不适当者就是有职无权没事做，或者就是安排的位置跟他那个学问才干不适合。人们承认邦有道，这个好，邦有道，那么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是什么东西呢？无非是社会主义嘛！辩证法嘛！（笑）贫且贱焉，贫就是薪水不够，贱就是没有工作，大概是不要讲他不注意劳动呐，没有工作或者安排得不恰当。他是用孔夫子来批评我们。所以孔夫子有时还有用处，（笑）这个是关于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缺点的问题，这个缺点很多，中共中央准备今年开一次会，开一次中央全会专门讨论统一战线方面的问题，希望各党派无党派的同志们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有所准备，提意见给我们，什么话都说。那一些人搜罗起来贫且贱焉的有多少，其人姓甚名谁，何方人士。

还有我们有许多缺点，我们在前进中间有很多困难，但是不要忘记外国也有困难，比如讲美国它有它的困难。红楼梦里头著名人物王熙凤有言“大有大的难处”。因为人家向她借钱，她说（诉苦）“大有大的难处”，刘姥姥借钱，因为她这么一说，刘姥姥就冷了半截。的确大有大的难处，美国的事情并不那么好办，据我看，经济危机要来了，美国、法国、西欧、自由世界、西方世界，西方国家它们都矛盾很大，经济危机要来，这个东西恐怕不可避免的。美国的月亮恐怕也不一定那么好，还是要证明。它现在强点，这一点要不要承认？要承认。我们骂它纸老虎，人们不了解，为什么人家有那么多东西，我们说它是纸老虎呢？就是说它这个东西是建立在不很稳定的基础上，谁人的基础比较巩固？还是我们的基础比较巩固，还是社会主义的基础。社会主义阵营不那么巩固，我们也有毛病，也有缺点，我们的人民对我们有许多不满意，我们的经济还落后，文化还落后，整个社会主义跟它比较起来我们还落后，可是

它是建立在一个矛盾更多更大的基础上的，不要忘记这一点。

最后我这个讲话，前天这个讲话，有些地方补充一点，修改一点，今天讲的同志们提了许多意见，这个东西不准备全部公开发表，因为有些问题比如讲罢工罢课这个问题，一公开发表，那好吧，全国就罢起来了吧！（笑）而我们的干部没有准备，我们的同志没有准备，地方来的同志开过会回去的时候，请你们要使他们有准备，现在这个事情我们好讲，我们坐在这里好讲，首当其冲的是他们，要使他们有准备。局部的、若干个别的，是那些极端的官僚主义长期不能解决问题，是指那些范围。最后如果修改一下子，调整一下子，我讲的这一篇，准备发到县一级，党内党外都可以看到。几天之后我们准备开一次宣传教育会议，宣传会议，宣传工作、报纸的会议，准备跟他们再谈一次，完了！（鼓掌）



1957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



1957年，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一起。

# 关于中央负责同志的 肉食供应问题的批语<sup>[1]</sup>

(1957年3月4日、4月6日)

—

尚昆同志：

内有对中央负责同志肉食供应严重浪费一文，请据此检查，分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看了新华社《内部参考》1957年2月27日第二一三九期刊载的《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肉食供应工作浪费情况甚为严重》的消息后写的批语。消息说，据《大公报》通讯员反映，北京市食品公司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肉食供应，规格要求很高，食品公司需费很大的力气，经过严格的挑选，才能符合标准，因而造成了严重的浪费。根据毛泽东的批示，新华社派记者对此事作了调查，并在新华社《内部参考》1957年4月4日第二一七〇期刊载了《关于对中央负责同志肉食供应有严重浪费现象的调查》。这篇调查说，《大公报》通讯员所反映的情况，经记者复查，有些情况是事实，但不够全面，并有夸大之处。实际情况是：北京市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肉食供应，几年来和特种供应（对象是各国使馆、大饭店、外宾、专家、高级医院等）的标准相同，并没有其他特殊的要求和规定。全市每天特种供应的猪60头，占全市每天供应量的5%，其中只有3头左右是供应部分中央负责同志的（目前约160户），不足全市特种供应量的5%。至于要求严格，是因为此类供应如质量不好或不卫生，极易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毛泽东看了这篇调查后写了第二个批语，即本篇二。

清责任，予以处罚。并将情形告我为盼！

毛泽东

三月四日

—

尚昆<sup>[1]</sup>同志：

160户每天三头猪，如以每头150斤计算，共有450斤，每户每天得肉约三斤弱，仍太多，有一斤或一斤半就够了，可减少一半，请你研究是否可行，我以为是可行的，似应减半执行，以示同甘共苦。现在供应油肉到用户，实际上有很大浪费，至少有三分之一浪费掉了。请酌办。

毛泽东

四月六日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 复班禅额尔德尼<sup>[1]</sup>电

(1957年3月6日)

亲爱的班禅额尔德尼：

你从印度回到日喀则时给我拍来的电报和火鸡年<sup>[2]</sup>元旦给我的贺电，我都收到了，谢谢你的祝贺。

这次你和达赖喇嘛<sup>[3]</sup>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sup>[4]</sup>涅槃二千五百年纪念会，在加强中印友谊方面做出了有益的贡献。祝你在新的一年内在西藏地区各项工作上取得新的成就，祝你身体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

---

[1]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

[2] 火鸡年，藏历纪年。藏历采用干支纪年，以“阴、阳”与“木、火、土、金、水”五行相配代替十干，以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代替十二支，再以十干和十二支相配，如阳木鼠年、阴木牛年等。以此计算，1957年是藏历阴火鸡年，也称火鸡年。

[3]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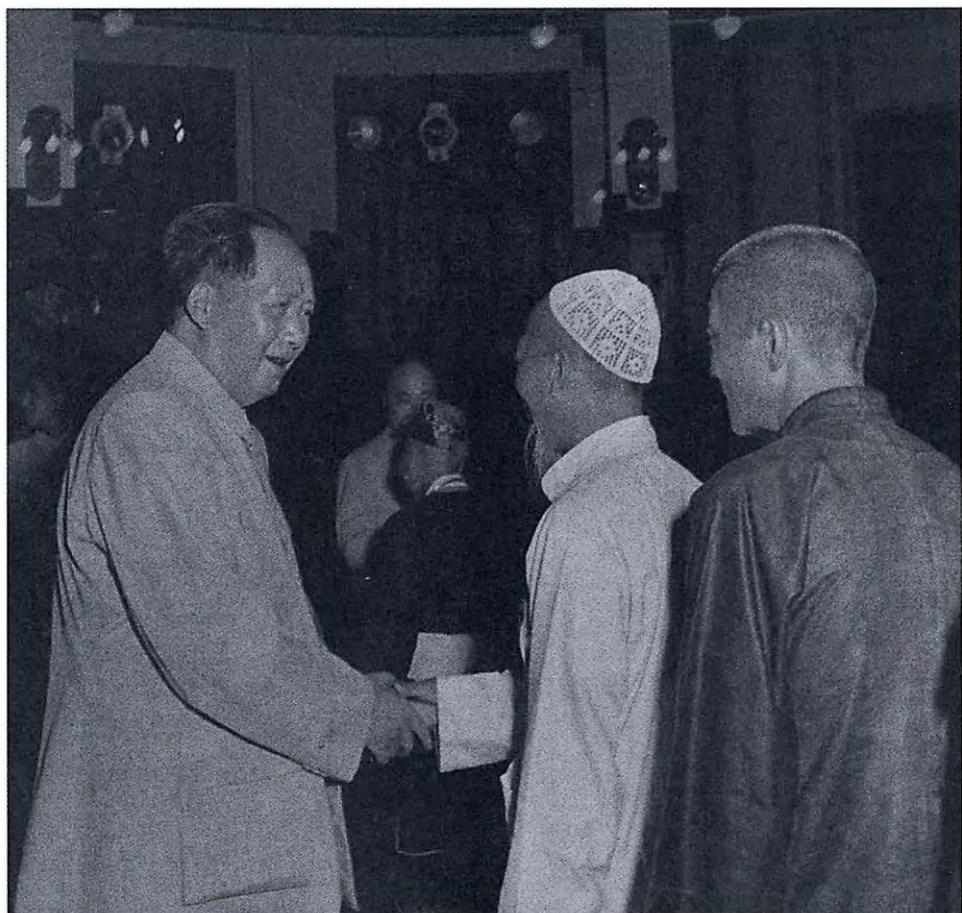
[4] 释迦牟尼，古印度释迦族人，佛教创始人。



1957年3月2日，毛泽东接见内蒙古自治区参观团和贵州各民族参观团全体成员。



1957年3月2日，毛泽东接见辽宁省少数民族代表。



1957年3月2日，毛泽东接见四川、广东等省少数民族代表。



1957年3月2日，毛泽东接见贵州少数民族参观团代表。



1957年3月2日，毛泽东接见蒙古族代表。



1957年3月2日，毛泽东接见少数民族代表。



1957年3月2日，毛泽东接见西藏自治区各族青年代表。



1957年3月2日，毛泽东接见裕固族代表。



1957年3月，西藏农业劳动模范白马登珍向毛泽东献哈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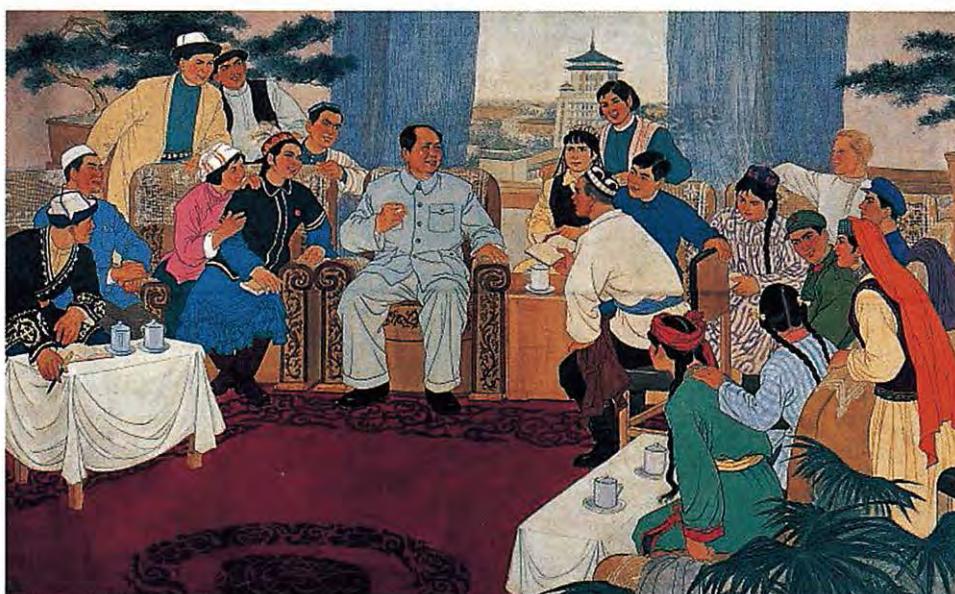
1957年3月，毛泽东和少数民族妇女代表玛依努尔等人一起祝酒。



全国人民心一条 永远跟着共产党（宣传画）



《群山起舞》(油画)



《向毛主席汇报》(油画)



《毛主席接见少数民族代表》（油画）

# 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 座谈会上的谈话

(1957年3月6日)

(关于会议开法，听了主席录音报告，内容很丰富，要好好消化，最好多开小会，少开大会。)

好，开一星期，不够，再多开两三天，开到解决问题为止，多开些小会。

(各地到会有党外人士，我们来的是清一色。)

党内也不会是清一色。

(对陈其通等四人文章，听报告录音与前次省市委书记会议所传达精神，不同。)

他们是以卫道君子的面目出现的，教条主义的方法，宗派主义的情绪，是达不到卫道的。过去讲的是插话，可能听漏了什么了。

(关于党委各部门应分管政治思想工作及政府各业务部门不抓政治思想工作问题。)

第一书记要抓思想，回去告诉他们，希望第一书记把思想工作抓起来。第一书记才行，第二也不行。光是宣传部，孤单单的不好办。管业务管得很好，不管思想工作，结果来了大民主，就会把你搞掉。各部门、各党组一定要管思想工作。省委要抓好思想工作，特别是第一书记，各司局都要管思想工作。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问题很多。)

问题是多的，要放手，有好处。

(批评工作没做好。)

打大仗往往不可避免先要打几次败仗，有了经验就会胜利。

(康生：团结，批评，团结，但往往一批之后，没达到新的团结，是批回去了，急得很，主要是仓促应战。)

领导要对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才能解决问题。

(上海反映，党员与党员在报上斗。)

党内思想也很混乱，不要害怕，要放手，怕什么，难道地球会炸了？！

(康生：党外也怕，怕宗派主义，不让人争鸣。)

(有人反映老教授对“争鸣”还有顾虑，写文章不容易，第一天文章一登，第二天给人一批，学生对自己也不尊敬了。)

那第三天再写一篇批回去就是了。

(有人提出，陈其通文章问题是否省市委书记会议强调一面，国务会议又强调一面，因国务会议有党外人士?)

党内党外要一起谈，关起门来，对外又一套，或单独对党外谈也不行，要党内外一起谈。

(闹事问题。)

特殊的、个别的犯法分子当然要按法律处理。一般闹事的不要开除，总开除不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去，他总要有个立脚点，还不是到学校、机关、工厂、合作社去。西安抓了一百多个流氓，社会很高兴，但学生中“流氓”跟社会流氓不同，知识分子不是社会那样“流氓”法，如不犯法，仍不要开除……

(希望讲讲上层建筑与基础关系问题。有图画家说，花草没有阶

级性，还有自然科学问题。)

自然科学不是上层建筑，但它要靠人去搞，就可能渗进一些人的阶级意识进去。

(当前思想斗争，是否可概括为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马寒冰文章是教条的，钟惦棐则是右的，两派我们都要批评……《电影的锣鼓》文章基本方向是不对的。

(周口：所提的一些缺点，的确是有的，但“中申”一些同志情绪不对头。部里是不同意该文的。)

无产阶级思想要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是不错的，但必须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百花齐放中，资产阶级思想出现会多起来，但并非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并非无一可取，扣帽子会把人家吓倒，不必每篇文章一出现就马上驳倒。

(陆口口：大将不要先出马，不要打冲锋，先让党外人士发言。)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中国知识分子少，要他们信马克思主义不容易的，如三个五年计划，有三分之一知识分子信了马列主义，就是很大的胜利。知识分子可以接受社会主义，因他没办法，不能不接受，但思想上不是很服。

(口口：北大哲学系主任公开说相信唯心论。)

他们政治上可以跟我们走，但要信马列主义不容易，有的搞康德、黑格尔几十年，可以逐步改变；有些一辈子也不会变的。

(口口说：百家争鸣还有顾虑，怕把是非问题变成敌我问题。) 怕升级。

(有的人看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暴露出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好像过去工作白费了。)

不暴露好像没有，暴露就很多，是否过去工作白费了？解放才六七年，资产阶级思想就没有了？他们说出来是好的，我们得到机会去教育。问题是我们现在有些文章还没有说服力，企图压服。压是压不服的。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要几十年，批评人家一定要有研究，想打几棍子不是办法，不能解决问题。过去思想改造是有成绩的，那是大风暴，是粗枝大叶，基本解决分清敌我，分清拿刀子杀人的，这是有数的。现在是分清是非，就要具体地讲，仔细一件一件地讲，如数学、物理等等……还有一派派，必须具体讲是非。

（有人问：这个是非怎么分？如新闻工作等就有争论，请主席讲一下。）

我不是新闻家，你们是内行，□□就是专家，我们要讲的是大是大非，要分清敌我。不是特务，有选举权的，宪法就规定他有言论自由，我们就得让人家讲话，我可以批评他，他也可以批评我，这就是言论自由。有人问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批评得倒，也该倒，证明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用的。

（湖北反映初级党校科级干部酝酿上街游行有五条理由，反对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改了，人家就不游行了，因此要加强党员教育。

（现在思想混乱，究竟原因何在？有的说是官僚主义，有的说是要民主、自由、个性，不要集中、专政、共性，领导要纪律、共性、集中，被领导的要另一面，有的说是资产阶级思想等等。）

如果动不动就说“反对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是不妥当的，因为学校存在问题没解决，所以闹事，如湖北党校是什么问题呀？要分析。

(思想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还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还是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的斗争？官僚主义？)

不能用一个简单口号去套一切。现在与过去反对帝国主义不同了。合作化要搞好几年，个人与集体是矛盾的，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还要改造，这就叫过渡时期。

(……)

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兰州原要开除几十个学生，现在不开除了，又有点草率收兵。)

开除几十个学生是国民党办法，事情结束如不解决问题，将来还是要闹事的，如讲到兰州林业学校、护士学校招生骗人家，学生闹事，我是站在学生这方面的，你欺骗人家嘛。

(康生等：欺骗就是犯法，可以告到法院，有罪的。)

像这样的学校，你说是什么问题？这两校都是官僚主义，欺骗，又有官僚主义……共产党员工作这样，要整！不罢课怎能整掉官僚主义？学生中很多成分不好，但他要说：“对，我是地主成分，但你为什么骗了我？”我们要向党内外宣布，在人民内部无所谓专政，在人民内部讲专政是错误的！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人民自己专自己的政？个别犯法是例外，不犯刑法就不能法律制裁！

(党校讲课都用大纲，党内关于马列主义教育能否争鸣？)

马克思主义就是一家，如果有不同解释，就是曾经有第二国际，列宁的第三国际，斯大林有马列主义，也有教条主义。

(教学大纲以前叫“法律”，后改为“参考”了。)

以前叫“法律”，现在叫“参考”，可见这“法律”就不太严肃了吧。

(四川曾想封《星星》杂志社。)

《星星》还是不要封。这次会议一开，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又会冒出来，不要急，我们不忙于理它，它大有劲头了。你们不是反映有些教授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诱敌深入”吗？我们对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有两条：（一）必须批评，（二）必须批评得好，因此必须要有准备，要有说服力，毒草在中国长了几千年，再长七八年也不要紧，而且我们还是要做事情的。他们一肚子气，可以让他们讲，毒草不可怕，如用压下来的办法，还是要翻的。

(有人说，《星星》所谓七君子中两个有杀父之仇的。)

这样，《星星》出现那些东西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如何对付不正确思想？要有办法，不要急躁，不要简单，应该研究方法。中国有几千万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高等学校80%学生是他们的子弟，那些有杀父之仇的，能不恨、不骂我们？但应估计到，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可以争取的，现在高等学校工农子弟还不多，在中小学。匈牙利高等学校60%学生是工农子弟，照样闹事，反苏反共，我们80%是那样子弟还没闹事。专业学校官僚主义为主，还有欺骗。在工厂里也有官僚主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毒草是有的，但不是多数，占百分之几？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是小资产阶级……现在是转变时期，大变化时期，在观念形态上一定有所表现的，但99%或还要多一点是能够教育过来的，问题在方法，在于有说服力的文章，学校的教员、工厂的干部能讲得清道理，能说服学生、工人。光压，压得服人？

(百家争鸣中党内外有人动不动就说庸俗社会学。)

简单口号压不了人的，我们应当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要有

说服力的文章。如果大家看来都对，只有一人说是教条主义，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多数人都说你是教条主义，那就不成了。地、富、资产阶级及其子女、知识分子是可以教育过来的，问题在于方法。极少数的人会教育不过来的，大约只有千分之几，但如果他们不拿起刀子来也不要紧。《星星》的《草木篇》是应该批评的，如不批评真是让毒草长起来了。钟惦棐的文章也是毒草，是机会主义之花；马寒冰的文章是教条主义之花，马寒冰文章中有这么一种气味——你是什么人？江山是老子打来的，你就乱放？！我们要取得经验，要学会如何掌握。我们对付蒋介石、帝国主义是有经验的，掌握得好的，匈牙利的问题我们也掌握了。因此对问题必须研究，要用脑子，要学习，重要的是在斗争中取得经验。有两点：（一）对毒草估计过分了，几千年来，人民就这样容易毒倒啦？人民是有分辨能力的，不怕！让他放一下吧！党员（领导干部）不要先讲话，先让民主人士写文章，让党外充分讨论。（二）过去搞阶级斗争，我们是有办法的，现在是思想斗争，不能再用老办法了，打倒蒋介石，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土地改革等的办法，现在是思想斗争，是不同了。思想斗争是动口不动手，而且动口要恰当，不是采取专政的办法。不要将敌人夸大而低估自己，没有什么可怕的。去年一些专业学校采取欺骗办法，有17个学校7000人罢课，全国有500万中学生，中学校长和党委书记要好好研究如何办好学校，500万学生闹起事来，也不好办啊。

领导思想斗争的方法要研究，过去是对敌斗争，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现在问题是复杂的，有科学、文艺、高等学校，还有《草木篇》，他能写，我就不能写，《诗经》《楚辞》是什么呀！大部分是草木篇。他们和我们作对，不怕，四川是大省，有几

千万人口。陈其通四人文章，老干部十之八九是同情的，但党外不赞成，党就孤立了。

要发动知识分子讨论“再放”。

(航空学院副支书张云凤写反动标语问题。)

他写“苏军滚出匈牙利”，我们要他“滚进”，他要“滚出”，学校里同意这意见的究竟有多少？千分之一大概是会有的。

(有人提糊涂思想还很多。)

这是显明的敌对问题，大概就是千分之一，糊涂思想不算，世界上多得很。

(□□：支部表决开除张党籍问题，五人赞成，四人主张留党察看，是在负责同志讲了要开除以后表决的。)

九个党员，五个赞成四个不赞成，说明时机未成熟，何必急？张有意见可在支部中公开讲，为什么要秘密写标语？这是恶劣！我们还可以研究经验，是否要开除？如要开除，什么时机开除？

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的儿子也有资产阶级的思想，说来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是少了些，像张云凤这样的少。

(□□：像张东荪那样的人，几年了，现在还放在那里教书，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害。许多教授公开说：“共产党会胜利是无天理！”我们也还是采取严肃批评与耐心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最近他自己公开检讨了，这说明还是有效的，对党无损害。去年他还参加了知识分子会议，还加了薪呢。)

思想斗争是“文”的，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统一战线，团结批评团结，我们是当医生，开刀是为了把人救活。

(有些教师认为不需要继续改造了。)

不要改造？我60岁了，还要改造，一万年还要改造。人要前

进，就要改造，这是合乎规律的。如果还是老一套，像过去骑在马上打蒋介石那样，就不行，就要改。共产党还是有点人情，是做事的。说到学术，人家说我们“不学无术”，我们这方面的确也是不多，所以很需要学习研究。

（有高级知识分子说你们政治是为业务服务的。）

对，政治是为业务服务的。

（□□：在一定范围内是应当这样说的。）

政治是上层建筑，为基础服务的。我们提出“向科学进军”“十二年规划”，至于半导体、原子能等就应该由你们去搞，我就不懂，过去我们是阶级斗争，是种攻势，他们没办法，但不舒服。现在要建设，知识分子就以改造之身出来讲话，批评我们的官僚主义。他们批评是好的，为什么不可以把尾巴夹起来呢？要学习，要研究。

（知识分子中的新老问题，老的怕新的批评。）

规律就是如此，后一代的人学过前人就批评前人。马克思就是如此，如果后代跟我们一样，有什么好处？

（他们不公开宣称唯心，而是把唯心唯物搞在一起，搞乱了，借反教条主义之名，以抬高唯心，是他们百家争鸣之目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有各的目的，但结果是我们的目的能够达到。

（□□：有人提出，“百家争鸣”没有“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那么明确，是否加上“去伪存真”或“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的方法，唯心主义者是虚中求是。

（有的科学家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

党能不能够领导科学？能够，办办看，如领导不起，还是不行，我们是从政治上来领导科学，搞十二年规划，向科学进军，这

个我还领导不得？

(□□：去年我们搞照顾等等，做了总务长的工作。)

我们，总务长加李富春，第一给饭吃，第二计划。现在科学的研究，我们就没那么多党员去充当所长，难怪人家说，这点不要去争，自然科学我就不懂，要请他们当先生，李富春加总务长，我一点都不领导？自然科学，先生还是你。

(苏联是否过渡到共产主义？)

还没有。

(陈伯达同志在知识分子会议上讲话所提知识分子通过两条道路达到马克思主义问题。)

自然科学家是通过自己业务实践道路来达到马克思主义的，这是指他个人通过的道路，并不是说不要领导。有些知识分子口头说党不能领导，但实际上我们领导了。列宁懂得半导体？但还是领导了。自然科学部门那么多，科学家自己也是懂得这个不懂得那个的。梅兰芳能领导京戏，还能领导话剧？他是旦角，难道能领导丑角，他领导得了程砚秋？结果还是外行领导内行，政治就是领导。他们事实上是说这么一个问题——“共产党还没有科学家”。苏联情况和我们不同，它已有大批党员科学家。

(教授说：政治为教学服务。)

政治为教学服务，整个人民政府就是为工农服务，也为科学技术服务的。也是的，搞得好一点就发展得快一点，就是为其服务，并且全心全意地服务。

(对闹事学生、工人中共党员该怎么办？有困难。)

有困难，应当看有理无理。如果有理，党员应该站在群众方面，对十分坏的官僚主义，要反对。当然首先要极力争取和平解

决，不罢工罢课。对于无理的，就不卷入。有理的，党员、工会、学生会应该站到群众方面。

(报纸要不要干预生活?)

报上的宣传要看对人民有利不利。没有抽象的言论自由，只有什么阶级的自由，阶级中集团的自由，有阶级的时候，是阶级办报，如果把报纸当作没有阶级性，将来是对的，现在可不。

(有人提出省里传达说，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是对的。)

我是先后插话谈过“这几个同志对党是忠心耿耿的，为了党的事业的，但文章则不堪领教”，下面这句话没了。

(康生：可能反映到会同志的一些思想，上一截容易接受，后一句就容易忽略。)

他们的文章反映出对敌对思想的仇恨情绪，没有这也得了，也要保护。问题是他们是教条主义，方法是错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应该再放。当然在放之中任何错误的东西都应该批评。现在放够了吗？鸣够了吗？不够的。人家还在猜我们的意图，认为我们是“诱敌深入”，因此必须再放。现在开宣传会议，大家同意这方针，要很好研究这方法。(一)党员不忙于写文章，让党外先写，当然要领导。(二)党员也应该写，但必须是要有说服力的，有研究的，有分析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方法，有分析就有说服力，我们应采取帮助人家改正错误的态度，而不是一棍打死的态度。

(关于八大决议，制度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所引起的争论。)

矛盾有，但不大。但保护生产力发展的，不能拿将来与今天比，也不能拿美国与中国比，这是不妥的，50年后的中国会有不同，生产关系在50年内变动不多，苏联已经过了40年，现在还是适

应的。矛盾嘛，现在有，将来更大，现在小一些。这一句话在决议中本来已经删去，但还照原样印发了，临开会才知道。

# 关于同意甘孜藏族自治州 继续进行民主改革的批语

(1957年3月7日)

刘、周、朱、彭真阅，退小平（或尚昆）办。  
我认为应当同意这个方针<sup>[1]</sup>。

毛泽东  
三月七日

---

[1] 指中共四川省委1957年3月5日关于甘孜藏族自治州民主改革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继续进行和完成改革的方针。报告说，甘孜藏族自治州除牧区、农牧区之间的缓冲地带和早已完成合作化的泸定县（汉族）外，农业区（约32万人）的民主改革，14万人的地区已经完成，其他地区正在进行和准备继续进行。省委认为，这样做符合整个藏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理由是：1. 有利于巩固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保护和发挥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发展生产，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大量培养和提拔地方干部；2. 坚持改下去，将会教育藏族上层，认清前途，消除顾虑；3. 完成改革的地区，对寺庙迅速实行包起来的政策，给以长期维持，有利于社会治安和生产发展；4. 可以巩固公路交通，利于进藏物资的运输；5. 坚决完成这一地区的改革，必将促进整个藏族地区的发展和进步，增进民族团结，也可减少云南后顾之忧；6. 如果不坚持改下去，势必伤害干部，加深群众痛苦，助长上层右倾，甚至造成更加混乱的局面，脱离群众，前功尽弃。

# 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1957年3月7日)

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感到受限制？

各省是不是还有私立中学？私立中学还是可以办的，办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私人办了，又被接收，私人办学的积极性就高不起来了。

办戴帽中学<sup>[1]</sup>还是一种好办法。中学办在农村是先进经验，农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学，毕业后可以回家生产。如果说教师比较差，可以从好的中学抽调一部分来支援，抽肥补瘦，抽多补少。如果说办学质量差，孔夫子还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呢。这是要解决农民子女就近读中学的问题，唱戏也还有草台班子<sup>[2]</sup>嘛。在农村，教育要强调普及，不要强调提高，不要过分强调质量。课程也可以简单些，有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农业生产知识、政治等八九科就可以了，其他的今后还可以自学。这些学校主要是解决农民生产劳动中需要的知识，如要升学也不限制，成绩好的学生可以升学，有的就不一定升学。苏联著名文学家高尔基没有进过中

---

[1] 戴帽中学，指小学增设的初中班。

[2] 草台班子，指演员较少、设备简陋、经常在乡村或小城市流动演出的戏班子。

学，还不是自学出来的！萧楚女<sup>[1]</sup>也没有进过什么正规的学校，办报还不错嘛。戴帽中学的这个帽子不要摘掉，有条件的要多戴一点，学校应该分散在农村里头，摘掉是不好的。

助学金现在是多少？助学金应该加以调整。农村合作社要搞好，还得三年到五年，现在大多数地区合作化只有一年的历史，去年副业搞得很少，农民收入增加不多，生活还是苦的，子女入学不容易解决吃饭问题。按照当前的经济情况，准备两三年内将助学金扩大一些，使百分之七八十的农家子女能享受助学金，帮助农民解决一些困难。经过三年，农业合作社的困难减少了或者没有了，助学金就可以逐渐减少。当前，助学金应按照学生困难情况发给，不能作为奖学金的性质。

为了解决高小毕业生升学紧张的问题，中学招生可以增加一些。小学也同时增加一些学生。社办和民办的问题，有条件的都可以办，但不好下命令。现在的困难情况，主要是由于去年有大灾荒，今年收入不能有很大的增加。去年挖了节余，挖了老本，物资储备用空了，钢材、木材、竹材用空了。轻工业生产，主要是棉纱和布，今年不能同去年相比，税收也没有去年那么多。应当对学生讲清楚，让他们了解国家的经济全局。国家只有这些钱、这些东西，就只能办这么些学校。

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学生要能耐艰苦，要能白手起家。我们不都是经历过困难的人吗？社会主义是艰苦的事业。我们以后对工人、农民、士兵、学生都应该宣传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学校中要提倡一种空气，教师与学生同

---

[1] 萧楚女（1893—1927），湖北汉阳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蜀报》主笔、《中国青年》主编。

甘共苦，一起办好学校。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不要使他们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今后无论谁去招生都不要乱吹，不要把一切都讲得春光明媚，而要讲困难，给学生泼点冷水，使他们有思想准备。学生谈恋爱的风气应当加以扭转。婚姻法有关结婚年龄的规定不必修改，但要劝青年晚点结婚。教育部应当编写一些课文，专门论述艰苦奋斗的，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讲。

要加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每省要有一位宣传部长、一位教育厅长亲自抓这项工作。

中学应当有政治课。政治课要联系实际，生动有趣，不要教条式的，要使中学生知道一些为人在世的道理。讲猴子变人的社会发展史如果同历史课有重复，历史课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讲起，讲胜利，讲困难，不过猴子变人还要讲，阶级斗争也要讲。课本要两三年修改一次，使之不脱离实际。董纯才<sup>[1]</sup>可少做点行政工作，多抽出点时间编教科书，还可请张际春、胡乔木<sup>[2]</sup>协助，共同编好教科书。

党委应当指导青年的思想，指导教师的思想。为什么县委书记一年内不能找中、小学校长谈一两次话，开一两次会呢？最近中央要发指示把这件事情讲一讲。这件事情，省、地、县三级第一书记要管一管，书记不管，宣传部长就很难管。上半年管三四天，下半年管三四天，一年管七八天就够了。要责成省委、地委、县委书记

---

[1] 董纯才（1905—1990），湖北大冶人，教育家。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

[2] 张际春（1900—1968），湖南宜章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1912—1992），江苏盐城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管思想工作，管报纸、学校、文学艺术和广播。

苏联的教材，应当学的就要学，不应当学的就不要学。你们要来一个改革，不要照抄外国的，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并且还要有地方的特点。农业课本要由省里编，地理可以编地方地理，文学也要有乡土文学，历史可以有各省自己的史料。课程要减少，分量要减轻，减少门类，为的是全面发展。“关关雎鸠”这几句诗<sup>[1]</sup>一点诗味也没有，《楚辞》《离骚》没有人懂。语文课可选《水浒》《三国演义》、唐宋八大家<sup>[2]</sup>的作品。现在作文太少，至少每星期作一次，如果有困难少一点也可以。

---

[1] 参见《诗经·周南·关雎》。全诗为：“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2] 唐宋八大家，指唐代文学家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文学家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

# 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sup>[1]</sup>

(1957年3月8日)

你们的会议开了几天？开得怎样？汇集的那三十三个问题<sup>[2]</sup>，我都看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人提出作家对官僚主义者恨得不得了，能不能把他们的结局写成失败，写成死？官僚主义当然应该批评。有个电影叫《荣誉属于谁》，里面有一个铁路局长，是个官僚主义者，可是他的局长还照样当，这样的干部应该撤职。为了治病救人，可以送他去学习。这部电影里那样写这个局长，叫做不彻底，缺乏彻底性，反官僚主义应该彻底。

党内提过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现在还没有展开。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sup>[3]</sup>，今年准备，明年开始，这也要有一个酝酿时期。决议要在今年上半年做出来。现在党内还没有统一思想，什么是官僚主义，如何批评，认识还不一致。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和文艺界部分代表谈话的一部分。

[2]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1957年3月6日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共汇集了33个问题。

[3]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整风开展起来，那时候就好批评了。现在刚刚批评一下，陈其通等就发表文章<sup>[1]</sup>，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整风，整主观主义，重心放在教条主义；整宗派主义，他们总是想一家独霸，他们总是觉得六亿人口太多了，少一点才好；整官僚主义，多得很。好几年没有整风了。

在座的，有些是党内的，也有党外的，共产党的道理你们也懂得一点，就是要推动，要统一思想，要有共同语言。不然你说官僚主义，他说不是。你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不放；放了一点，有些不好的东西出来，就慌了手脚。总而言之，很怕放就是了。我们主张百花齐放，有的人很怕百花，现在百花齐放的环境还没有造成。

从汇集印发的那三十三个问题，可以看出来问题很多。要求答复，一个人怎么答复得了？我看还是大家自报公议，一个人念，大家讨论，大家答复。

有一种看法，实际上认为思想不能指导创作，这种看法跟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正确看法有关系。要求所有的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大概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在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时间内，只要不搞秘密小团体，可以你写你的，各有各的真实。这里边，当然还要有帮助。对马克思主义有真正赞成的，有勉强赞成的。对改变社会制度也是这样，比如民族资产阶级，你把他的生产资料拿来共产了，他心甘情愿吗？总有些勉强，当然也有不大勉强的。改变社会制度，从私有到公有，从个体到集体，几亿人口，总有勉强的。

[1] 指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勤在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

总而言之，制度的变化，是一个大变化。迫于全中国的大势所趋，有些人不得不勉强赞成。现在思想这样混乱，汇集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就是社会基础变动而来的反映。我国过去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把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打倒以后，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和几亿人口的小资产阶级，要改变所有制。知识分子，按出身说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子弟，当然还有大、中、小的区别。按全国六亿人口计算，如果说其中百分之一是知识分子，那就有六百万人。知识分子也不一定都是进过大学的，萧楚女就什么正规学校也没有进过，他是靠自学的，也是知识分子。全国知识分子就算五百万吧，五百万里面究竟有多少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十分之一没有？十分之一就是五十万。他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并且相当懂得，用来指导行动。搞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不算是懂得马克思主义。若有十分之一，那就是好事。文艺界有多少这样的人？有十分之一就很好了。还有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抵触的，其中有些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敌对情绪的，不只是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但他不是特务，又不拿刀子杀人，他就是发牢骚，有时也写点文章。这样的人是否也有十分之一？这些人多数不说话，沉默地抵抗。恐怕这两头都没有十分之一，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没有十分之一，挂名的不算，教条主义的不算，抵触马克思主义的也没有十分之一。对马克思主义，党内有不信的，党外倒有相信的。现在两头去掉，剩下中间的还有百分之八十左右，还是大多数。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但不一定相信马克思主义，用它来指导创作的就更少了。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能强制人家接受。那末，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怎么办呢？只好让它发行，只要不是对社会主义

制度抱敌对情绪的。马克思主义作家的作品，如果是教条主义的，人家不要看。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要好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哪怕少一点，有那么几部，写得较好，用几十年工夫，去影响那百分之八十的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作品是为工农兵服务的。

有人说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不要了，我看为工农兵服务是不错的。你不为工农兵还为谁？资产阶级也要改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是工人阶级，你说不要为他们服务，中国就没有其他人了。

有人说文艺不要目的，一有目的就概念化。我看，不要目的的文艺作品，也可以出一些吧。出两种，一种要目的的，一种不要目的的，行不行？总之，对人民的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办法，要人服，就要说服，而不能压服。文学艺术家恐怕也要经过一个锻炼的过程，有些人还是不自觉的，没有经过锻炼。有些主张文艺不要目的的，其实是要目的，只是不要你这个目的，在无目的掩护下，有他的目的，就是要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目的。

有人问资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我就分不出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若论出身，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反动起来，也很厉害。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蛮革命，我也是算在这个范畴之内的。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而资产阶级是按照它的利益来教育人的，有的人后来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如何区分法，我看很难。

报纸、广播、文工团、剧团、文学艺术都是教育人民的。有人说，“不讲教育，说娱乐好了”，这也可以，但是你演戏，总要影响人。所以教育者首先应当受教育，这是马克思讲的。<sup>[1]</sup>我们这些人应当受教育，说不用受教育是站不住脚的。这些教育人的人，他们从事的工作，整个说来，是教育人的过程，要几十年，把六亿人口教育好。

苏联十月革命后，教条主义也厉害得很，那时的文学团体“拉普”<sup>[2]</sup>曾经对作家采取命令主义，强迫别人必须怎样写作。但听说那个时期还有一些言论自由，还有“同路人”，“同路人”还有刊物。我们可不可以让人家办个唱反调的刊物？不妨公开唱反调。苏联那时有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同路人”，可见这一点同我们今天是不同的。开头几年还可以唱反调，有些言论自由，以后就只许讲党和政府的好话，不许讲坏话，不能批评，搞个人崇拜。斯大林常常把两种矛盾混淆起来了。我们的文化教育政策不采取他们的办法，我们采取有领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还没有造成放的环境，还是放得不够，是百花想放而不敢放，是百家想鸣而不敢鸣。陈其通他们四人的文章，我就读了两遍，他们无非是“忧心如焚”，唯恐天下大乱。应该估计到中国的情况，两头小中间大，小资产阶级那么多，无非是思想混乱，要求解答问题。

[1] 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原文是：“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2] “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简称的音译，成立于1925年。1932年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定》，解散“拉普”，成立苏联作家协会。

我说这些话，是想和同志们交换意见，看看客观情况是否如此。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在知识分子中占十分之——五十万，有没有这么多？不信的，那么多，这不能强迫。假如经过三个或者四个五年计划，有三分之一的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又不是教条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那就好了。

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我没有讨过饭。要革命，不准备杀头是不行的。被敌人杀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错杀了就很不好，所以我们党内有一条：一个不杀。但是坐班房、受点整也难说。上次我曾讲了薛仁贵<sup>[1]</sup>、孙行者的事。薛仁贵害了病，打胜仗，功劳挂在别人身上。对孙行者也不公平，他自然个人英雄主义蛮厉害，自称齐天大圣，玉皇大帝只封他“弼马温”，所以他就大闹天宫，反官僚主义。我看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都有，张士贵<sup>[2]</sup>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都有。

---

[1] 薛仁贵（614—683），即薛礼，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唐代将军。

[2] 张士贵（？—约656），本名忽峰，虢州卢氏（今属河南）人，唐代将军。

文艺批评怎么样了？这也要看到知识分子是两头小、中间大这个基本状况，这就是为什么要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缘故。为什么有人怕放呢？就是没有看到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希望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好、文化提高，要经过他们去教育中国几亿人民。如果查成分，大学生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子弟，中学生也有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你不要他们要谁呢？这些人是可以教育过来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信心。文艺批评问题，我想提出来谈谈。这篇文章我读得不多，读了一点，感觉恰当的批评不多，经过研究的，有分析的，事前跟作家谈过的，真正是对作家有所帮助的，不是骂一顿的，不很多吧？有些批评粗暴得很。对待这类批评，鲁迅有个办法，就是不理。现在文艺批评可以说有三类：一类是抓到痒处，不是教条的，有帮助的；一类是隔靴搔痒，空空泛泛，从中得不到帮助的，写了等于不写；一类是教条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碍文艺批评开展的。是不是这样？

我看到文艺批评方面围剿王蒙<sup>[1]</sup>，所以我要开这个宣传工作会议。从批评王蒙这件事情看来，写文章的人也不去调查研究王蒙这个人有多高多大，他就住在北京，要写批评文章，也不跟他商量一下，你批评他，还是为着帮助他嘛！要批评一个人的文章，最好跟被批评人谈一谈，把文章给他看一看，批评的目的，是要帮助被批评的人。可以提倡这种风气。

《新观察》上有一篇《在惠泉吃茶记》的文章，你们看过没有？

---

[1] 王蒙，1934年生，祖籍河北南皮，生于北平（今北京），作家。当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三区（东四区）委员会工作。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受到错误批评。

就在一月份第二期上，可以看看，作者叫姚雪垠<sup>[1]</sup>。我对他描写喝茶的人有些兴趣，他的文章说在那里喝茶的群众不会喝茶，可是他们还喝得很有一股劲。他还批评这个茶馆合作社经营得不好，有缺点，这个批评是对的，有很多这样的事情，经过公私合营与合作化以后，把原来的许多优点都丢掉了，这以后应当整顿。但是他轻视那些喝茶的群众是不对的，这就是“君子”“小人”的观点。“君子”在那里喝茶，“小人”也来了，文章就显得这个作家在群众中落落寡合的样子。驳他的文章，我也看了一些，有个姚文元<sup>[2]</sup>，写得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我还看得下去。还是要帮助姚雪垠。无论资产阶级思想也好，小资产阶级思想也好，在知识分子中还是占大多数的，他们还没有跟群众打成一片。我看还是跟工农兵打成一片才有出路，不能打成一片，你写什么呢？光写那五百万知识分子，还有身边琐事？不能永远只写这些人，这些人也会要变的。文艺作品，总是要写点这一部分人跟那一部分人的关系。上海的作家，也可以写写申新九厂，写写那个资本家荣毅仁<sup>[3]</sup>，你要写荣毅仁，就得写他跟工人的关系。也可以允许一部分人就写他自己的身边琐事，他又不去跟工农兵打成一片，他又能写，你有什么办法呢？这么一个国家总会有这些人的，这也是客观存在。但我们还是要帮助他，影响他，他不接受也没有办法，可以出他的书。

体验生活也有各种各样的，搞不好，老百姓就是不把心交给知识分子。现在有些知识分子下去体验生活，老百姓感到是灾难，特

---

[1] 姚雪垠（1910—1999），河南邓州人，作家。当时在武汉市作家协会工作。

[2] 姚文元，1931年生，浙江诸暨人。当时在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委工作。

[3] 荣毅仁，当时任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

别是有名的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就怕你来调查我什么，我就是不告诉你。老百姓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对付你。有些地方“记者成灾”。

中国自觉的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曹丕<sup>[1]</sup>的《典论·论文》和曹植<sup>[2]</sup>的《与杨德祖书》开始的吧！以后有《文心雕龙》等。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古文，道理是没有什么的，只要文章是新的。人家说好的，他说坏，人家说坏的，他说好。《昭明文选》里也有批评，昭明太子萧统<sup>[3]</sup>的那篇序言里就讲“事出于沈思”，这是思想性；又讲“义归乎翰藻”，这是艺术性。单是理论，他不要，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艺术性。

大家反映作家职业化后，有些书因纸张缺乏印得很慢或印不出来，影响作家的生活。作家协会能不能自己搞个印刷厂？拨一些机器给你们，再搞些原料。教授、科学家的著作，一时不能印出来，他们还有大学和科学院发的薪金可以维持生活。作家则不同，他们是靠版税稿费生活，若是书籍杂志没有纸张印不出来，他们没有稿费收入，就无法生活。我说作协自己办一个印刷厂，当然不是要老舍、巴金先生去办，而是周扬、沈雁冰<sup>[4]</sup>他们筹划去办。

[1] 曹丕（187—226），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之子，魏文帝，三国时期文论家、诗人。

[2] 曹植（192—232），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之子，三国时期文学家、诗人。

[3] 萧统（501—531），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南朝梁武帝萧衍之子。公元502年被立为皇太子，未及即位而卒，谥号昭明。编有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后人习称《昭明文选》。

[4] 周扬（1908—1989），湖南益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当时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去年，我们一年摄制三十多部故事片，太少了。日本八千多万人口，去年出三百多部故事片。中国六亿人口，才出三十多部，你们最好也出他三百多部。

赵丹<sup>[1]</sup>、孙瑜<sup>[2]</sup>没有安排好吧？你是和他合作过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评，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

这次宣传工作会议的精神，你们回去就传达，就要贯彻，不要等三中全会<sup>[3]</sup>作决定。地委书记、地区专员以上的干部约一萬多人，其中是否有一千人是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都很难说，其余十分之九还是不赞成的，这些都是高级干部呢！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问题，这次会议一时不能搞清楚，不能做结论，也用不着紧张，可以研究讨论。

关于继承文化遗产问题，我并不赞成牛鬼蛇神，可以让它演出 来，批评一下。文化遗产中有许多毒素和糟粕呢！对一些传统剧目过去我们禁了几年，别人有些反感，现在开放了，也可以批评，但批评要说理。一些有牛鬼蛇神的戏，看看也可以，我们看的《封神演义》不是牛鬼蛇神吗？社会上有牛鬼蛇神，剧本里有也不稀奇。中国人不一定很相信鬼，演来看看也没有什么可怕。许多青年都不懂什么是牛鬼蛇神，让他们看看也不要紧。拿个更好的东西来代替

---

[1] 赵丹（1914—1980），山东肥城人。当时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曾主演电影《武训传》。

[2] 孙瑜（1900—1990），四川自贡人。当时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曾编导电影《武训传》。

[3] 指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于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在北京举行。

它当然很好，但还拿不出来，就让它演吧！对牛鬼蛇神，戏是看，鬼不一定相信。

放一下就大惊小怪，这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鉴别的力量。不要怕。出一些《草木篇》<sup>[1]</sup>，就那样惊慌？你说《诗经》《楚辞》是不是也有草木篇？《诗经》第一篇是不是《吻》<sup>[2]</sup>这类的作品？不过现在发表不得吧？那《诗经》第一篇，我看也没有什么诗味。不要因为有些《草木篇》，有些牛鬼蛇神，就害怕得不得了！

---

[1] 《草木篇》，流沙河写的一组散文诗，发表在《星星》1957年1月创刊号。

[2] 《吻》，白写的一首诗，发表在《星星》1957年1月创刊号。

# 对《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 罢课问题的指示》（修正稿）<sup>[1]</sup>的 批语和修改

（1957年3月8日）

—

退小平办。略有修改<sup>[2]</sup>。

毛泽东  
三月八日

—

凡是犯了错误的都应该指出他们的错误，使他们得到教训。但是一般地不要挫伤广大群众的情绪，也不要挫伤好干部的情绪。对于闹事群众中的领导分子，如果行动合理合法，当然不应该加以歧视；即使犯有严重错误，一般也不应该采取开除办法，而应该将他们留下，在工作和学习中教育他们。对于抱着恶意煽动群众反对人民政府的坏分子，应该加以揭露，使群众彻底认识他们的面目。对

这些分子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应该给以适当的处罚，但是不应该开除他们，而应该不怕麻烦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至于确实查明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严重侵犯刑法的凶犯，则应该分别情况，依法处理。

### 三

各级党委，特别是省、市和自治区一级的第一书记，对于了解工厂、学校以及报纸、刊物的思想政治动向，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解决这些方面的具体问题等项任务，应该立即抓起来，并且教会地、县两级和城市区级第一书记抓起这些工作。不应该只委托宣传部长、文教部长、教育和文化厅、局长这些同志去做而自己不去管它们。

---

[1]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修正稿）的主要内容是：（一）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值得我们严重地注意。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是有矛盾的。但一般说来，这种矛盾属于人民内部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和应该在民主集中制的范围内，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不需要采取罢工、罢课、游行、请愿一类的方式。采取这种方式，一般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提倡，而且应该力求防止这类事件发生。（二）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的

发生，根本的办法是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首先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在工厂方面，应该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同时，实行和加强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在学校方面，切实保证学生会、教职员工会、青年团和党的支部会议能够充分地自由地对学校工作提意见，在有民主党派的学校，应尽量吸收他们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随时征求他们的意见。（三）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的发生，还必须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近年来思想政治工作薄弱，而工人队伍又增长很快，一部分工人忽视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倾向有了发展；在学校和知识分子中，埋头业务不问政治，斤斤计较个人生活、地位和其他不正确的倾向也逐渐抬头。要针对这种情况进行教育，使群众懂得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过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领导人员必须认真注意同群众同甘共苦，在艰苦奋斗方面起模范作用。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根据这个精神，指示对闹事问题的处置作了一些要求和规定。

[2] 即本篇二、三。本篇二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审阅这一指示的修正稿时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三是他为指示修正稿加写的第五点。这一指示正式印发前，中央还作过一些文字修改。

# 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sup>[1]</sup>

(1957年3月10日)

你们说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低，在社会主义社会办报心中无数。现在心中无数，慢慢就会有数。一切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心中无数的。打游击战，打以前，我们就连想也没有想过，后来逼上梁山，非打不可，只好硬着头皮打下去。当然，打仗这件事情不是好玩的，但是打下去慢慢就熟悉了。对于新出现的问题，谁人心中有数呢？我也心中无数。就拿朝鲜战争来说吧，打美帝国主义就和打日本帝国主义不相同，最初也是心中无数的，打了一两仗，心中有数了。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像过去搞阶级斗争（当然也夹杂一些阶级斗争），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无数并不要紧，我们可以把问题好好研究一下。谈社会主义的书出了那么多，教人们怎样去具体地搞社会主义的书，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还没有；也有些书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东西什么都写出来，但那是空想的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有些事情还没有出现，虽然可以预料到，却不等于能够具体地提出解决的方针和办法。

说到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这是普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好好地学。当然，学是要自愿的。听说有些文学家十分不喜欢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和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谈话的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这个东西，说有了它，小说就不好写了。我看这也是“条件反射”。什么东西都是旧的习惯了新的就钻不进去，因为旧的把新的压住了。说学了马克思主义，小说不好写，大概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跟他们的旧思想有抵触，所以写不出东西来。

在知识分子当中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必要的，要提倡大家学他十年八年，马克思主义学得多了，就会把旧思想推了出去。但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形成风气，没有风气是不会学得好的。

目前思想偏向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是否定一切，教条主义则把凡有怀疑的都一棒子打回去，肯定一切。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地孤立地观察问题和了解问题。当然，要完全避免片面性也很难。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同没有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系。我们要用十年八年的时间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抛弃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那样，我们的思想面貌就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这次对电影的批评<sup>[1]</sup>很有益，但是电影局开门不够，他们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倾向，人家一批评，又把门关得死死的。我看大多数批评文章提出的问题，对于改革我们的电影是很有益的。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批评凡是合乎事实的，电影局必须接受，否则电影工作不能改进。你们报上发表的文章，第一个时期批评的多，第二个时期肯定的多，现在可以

---

[1] 指上海《文汇报》上开展的电影问题讨论中提出的一些批评。这次讨论开始于1956年11月，持续近3个月，涉及电影艺术的指导思想、电影工作的领导方法和作风、电影审查制度、演员的使用和积压、电影艺术传统的继承及电影与观众等方面的问题。

组织文章把它们统一起来，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评。电影局不理是不对的。这次争论暴露了问题，对电影局和写文章的人都有益处。

你们的报纸搞得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也爱看。青年不爱看可以不看，各有各的“条件反射”。一种东西，不一定所有的人都爱看。

群众来信可以登一些出来，试试看。政府和有关的业务部门有不同意见，报馆可以和他们研究商量一下，在报上加以解释，再看结果如何。一点不登恐怕不大好，那样业务部门会犯官僚主义，不去改进工作。

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马克思主义是按客观情况办事的，客观情况就包括客观效果。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有正确的领导，有不正确的领导。正确的领导按客观情况办事，符合实际，群众欢迎；不正确的领导，不按客观情况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使编报的人感到不自由，编出来的报纸群众不爱看，这个领导一定是教条主义的领导。我们要反对教条主义。我们过去用整风方式搞了好几年，批判了教条主义，独立自主地按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办事，才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报纸有一些专业化也好，好像《大公报》<sup>[1]</sup>那样，开放自由市场的时候，我就爱看它，因为它登这一类的东西多，又登得快。但是，太过于专业化，有时就容易枯燥，人家看的兴趣就少。搞专业的人也要看专业之外的东西。

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总比资本主义的报纸好。香港的一些报纸

---

[1] 指上海《大公报》。

虽然没有我们说的思想性，但也没有什么意思，说的话不真实，好夸大，传播毒素。我们的报纸毒少，对人民有益。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写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但鲁迅还是写。现在经济方面的杂文也可以写。文章的好坏，要看效果，自古以来都是看效果作结论的。

新华社的新闻受不受欢迎？听说你们那里有人提出通讯社的消息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通讯社或报纸的新闻，都有阶级性。资产阶级所说的“新闻自由”是骗人的，完全客

观的报道是没有的。美国的通讯社和报纸，现在也报道一下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情形，它是想做生意，所以做些姿态出来给人看看，因为经济危机压迫着它。

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反对官僚主义也是这样。“三反”的时候，有许多部长就是中央给他们端了梯子接下楼来的。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伤人太多，我们应该接受教训。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

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延安办报，历史也很短，全国性办报就没有经验。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全国有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其中的共产党员不过是一个小指头。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半真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至于具体的科学技术，比如地质学，共产党是不懂的。但是国民党也不懂。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只造就二百多个地质人才，我们解放七年造就了一万多。这种行政领导的状况，在现在的过渡时期，只好这样，将来是要改变的。现在要争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个初步了解，而不是要求他们一下子贯通。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马克思本人，也不是一下子就全部贯通的。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出版，只是马克思主义体系形成的开始，还不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完成。要求知识分子一下子都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要求是不现实的。说懂得马克思主义，其实懂得的程度也

不相同。我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也不多。作为专家是要读多一点的，我们没有那么多工夫，读少一点也可以，重要的是要注意研究方法。现在很多干部没有读书的习惯，把剩余的精力放到打扑克、看戏、跳舞上面去。大家不应该把时间浪费掉。

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新闻的快慢问题也是这样。有的消息，我们就不是快登慢登的问题，而是干脆不登。比如土改新闻就是这样，我们在报上不宣传，免得传播一些不成熟的、错误的经验。前年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

对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

关于百家争鸣问题，完全学术性的，在报上争来争去不会有影响。至于政策性的，恐怕就要分别一下情况。但是划范围也有困难，因为政策那么多。比如，你们说的节育和晚婚的宣传，报上文章一多了，有人就以为要修改婚姻法，赶快去结婚。这样，报纸也难办。在旧社会，报纸上的东西老百姓看了等于不看，现在报上一登可不同了。如果发现宣传上产生一些不良后果，可以写文章来解释说明，但是我们报上的文章往往不及时。至于范围怎样划法，各报可以自己回去研究。

# 在宣传会议上讲话（提纲）<sup>[1]</sup>

（1957年3月12日）

在这次会上不能将一切问题都解决，只能提起一个纲领和解决某些问题。

## （一）新问题

社会大变动时期，几亿人口进入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存在决定意识，各种不同意见反映出来，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大变动是基本上健康的，须要几年才能巩固，从此将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建立一个伟大的工业国。

（二）我国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除了少数人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有敌对情绪，认为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会失败、希望回复到资本主义时代去的以外，都是爱国主义者，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但有许多人对于在新制度下如何工作，许多新问题如何解答，不大清楚，对于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许多人还有怀疑，他们抱有各种错误观点。在500万左右知识分子中，大约有10%左右是比较熟悉了马克思主义的，另有大约百分之几的人是反对或者不愿接受马克思主义的，80%以上的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还不多，但

---

[1] 这是毛泽东1957年3月12日写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提纲，题为《在宣传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于1957年3月6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出席的有党内外思想文化工作者800人左右。

是愿意研究它。我们的任务，就是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争取在今后两个五年计划内，使我们的知识分子普遍接受基本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使他们通过实践懂得较多的马克思主义。

(三) 教育者先要受教育，大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一面教，一面学。

#### (四) 整风

先在党内整，党外自愿参加，批判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克服错误，造成自由批判的环境和习惯。整风方法，像延安那样，研究文件，批评错误，小小民主，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人的方法。

#### (五) 为人民服务，工农兵方向

下厂下乡，调查研究，交朋友。

任何知识分子，不同工农打成一片，不知工厂、农村情形，要指导工农事业，是不可能的。

不调查没有发言权。

我们希望有70%的人下去，另有30%的人不能或者不愿下去，也就可以了。

要造成风气。延安曾做过，很有效果。不然，单在书本上看了马克思主义，还是没有共同语言，很多问题还是不能解决，作品还是写不好。科学家有实验室，工厂农村是一切知识分子的大实验室。

#### (六) 两种片面性

教条主义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都是形而上学，都是毒草，都要批判，都要以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判。

工作中，文章中，不可能不带片面性，但是我们应当要求：辩证法逐步地多一些，形而上学逐步地少一些。

“是否能领〔导〕科学”，只要能领导阶级斗争，就能〔领导〕向自然的斗争，会有大批的科学家加进党里来。

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两者都有，都要注意，但今天突出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应作具体分析，不要不适当当地扣大帽子。

“杂文一定有片面性”吗？这是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学通的人讲的话，列宁和鲁迅就没有片面性。

“不敢写文章”。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并且我国的环境也不算太坏。是文章的好坏问题，真正的好文章，会受读者欢迎。

诚心为人民服务，立志改革的人，应当能写敢写。

#### （七）“放”，还是“收”

“放”，有百利而无一害；“收”是错误的。

真、美、善、香与伪、丑、恶的对立统一，前者才能分辨，才能发展，马克思，孙中山，共产党为例。

两个方法（政策）领导中国，还〔是〕“放”的方法好，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不要怕乱，不要怕牛鬼蛇神，不要怕毒草，我们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发展真理，少犯错误，将一个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先进的中国。

各省传错了对四人文章<sup>[1]</sup>的批评问题。

电影事业应当进行彻底改革问题。

（八）希望地方召开有党员与非党员都参加的会议，将会议中提出的问题继续讨论。

---

[1] 指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在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

#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sup>[1]</sup>

(1957年3月12日)

各位同志！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会议中间提出了很多问题，使我们知道了很多事情。我现在就同志们所讨论的问题讲几点意见。

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来说，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有几亿人口进入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经济制度变化了，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样的

---

[1] 这是毛泽东继1957年2月27日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之后，于同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作的一篇重要讲话。这篇讲话记录整理成文后，于1957年3月30日报送毛泽东。同年6月，毛泽东对这篇讲话整理稿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并曾批示将稿子印送中央领导同志及其他有关的同志征求意见，批语是：“即刻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田家英、胡绳、陈正人。另发翻译十二份。”“各同志：此件请即看一下，于你认为需要修改的地方，动笔加以修改，在六月二十日上午十二时以前，退还陈伯达同志，为盼！毛泽东六月十八日。”这篇讲话整理稿当时没有公开发表。

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大变动，因为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应该说，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稳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中国究竟有多少知识分子，没有精确的统计。有人估计，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有五百万左右。这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

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在这些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的中间，有许多人对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工作，许多新问题如何了解，如何对待，如何答复，还不大清楚。

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就五百万的总数来说，这些人是少数，但是他们是核心，有力量。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在五百万总数中占大多数的这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抱着仇视态度的人，是占极少数。有一些人虽然不公开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不赞成。这种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有的，我们应该允许他们不赞成。例如一部分唯心主义者，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是这样。他们是有神论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能强迫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总而言之，可以说这样，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状况是：赞成而且比较熟

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是不熟悉，赞成的程度又很不相同。这里有三种立场，坚定的，动摇的，反对的三种立场。应该承认，这种状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如果不承认这种状况，我们就会对别人要求过高，又会把自己的任务降低。我们作宣传工作的同志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是逐步的宣传，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不能强迫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接受。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

第三点：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在为旧中国服务的时候，知识分子中的左翼是反抗的，中间派是摇摆的，只有右翼是坚定的。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就反过来了。左翼是坚定的，中间派是摇摆的（这种摇摆和过去不同，是在新社会里的摇摆），右翼是反抗的。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我们的报纸每天都在教育人民。我们的文学艺术家，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我们的教授、教员，都在教人民，教学生。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

务。在这个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期，尤其要先受教育。过去几年，他们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有些人并且很用功，比以前大有进步。但是就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是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暧昧，后者明朗。因此，如果认为教人者不需要再受教育了，不需要再学习了，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只是要改造别人，改造地主、资本家，改造个体生产者，不要改造知识分子，那就错误了。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农下中农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据我看，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我们的任务是，在他们自愿学习的基础上，好心地帮助他们学习，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学习，而不要用强制的方法勉强他们学习。

第四点：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知识分子既然要为

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一辈子都不同工人农民见面，这就很不好。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有些人可以到工厂农村去看一看，转一转，这叫“走马看花”，总比不走不看好。另外一些人可以在工厂农村里住几个月，在那里作调查，交朋友，这叫“下马看花”。还有些人可以长期住下去，比如两年、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在那里生活，叫做“安家落户”。有一些知识分子本来就是生活在工人农民里面的，例如工业技术人员本来就在工厂，农业技术人员和乡村学校教员本来就在农村。他们应该把工作做好，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我们要把接近工农群众这件事，造成一种风气，就是说要有很多知识分子这样做。当然不能是百分之百，有些人有各种原因不能去，但是我们希望尽可能有比较多的人去。也不能大家一下子都去，可以逐步地分批地去。让知识分子直接接触工人农民，过去在延安时期曾经这样做过。那时候，延安的许多知识分子思想很乱，有各种怪议论。我们开了一次会，劝大家到群众里面去。后来许多人去了，得到很好的效果。知识分子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在没有同实践结合的时候，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和工人农民交朋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也有一些人到工厂农村去，结果是有的有收获，有的就没有收获。这中间有一个立场问题或者态度问题，也就是世界观的问题。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

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工人农民也不会把心里的话向他们讲。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

第五点：关于整风。整风就是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共产党内的整风，在抗日时期进行过一次，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进行过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又进行过一次。现在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这次整风的方法同抗日时期的整风一样，就是先研究一些文

件，每个人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缺点和错误的方面，发扬优点和正确的方面。在整风中间，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错误和缺点，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

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们还有缺点，这个事实也要肯定。不应该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同时，也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在我们的工作中间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和错误也还不少。因此我们要进行整风。我们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的党丧失威信呢？我看不会。相反的，会增加党的威信。抗日时期的整风就是证明。它增加了党的威信，增加了同志们的威信，增加了老干部的威信，新干部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这两个党比较起来，谁怕批评呢？国民党害怕批评。它禁止批评，结果并没有能够挽救它的失败。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我们过去说过，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整风中间，我们一定可以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在从前，

在旧中国，讲改革是要犯罪的，要杀头，要坐班房。但是在那些时候，有一些立志改革的人，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出版书报，教育人民，组织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给我国的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我们的政权的建立还不过短短几年，人们可以看到，不论在经济方面，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都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对于什么困难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所以我们也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斗争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的条件，要同他们建立同志式的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要团结他们一起奋斗。

第六点：片面性问题。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这样看问题的人，现在在共产党里面还是不少，党外也有很多。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

扬，不能批评。说我们的工作似乎一切都好，这不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也不是一切都坏，这也不合乎事实。要加以分析。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伟大事业，几亿人口所进行的这个伟大斗争，似乎没有什么好处可说，一团糟。许多具有这种看法的人，虽然和那些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敌意的人还不相同，但是这种看法是很错误的，很有害的，它只会使人丧失信心。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者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对于这些片面地看问题的人，应该进行批评，当然要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评，要帮助他们。

有人说，既然要整风，要大家提意见，就必然要有片面性，提出克服片面性，好像就是不让人讲话。这种说法对不对呢？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带一点片面性，这是困难的。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发表意见，有时候就难免带上一些片面性。但是，可不可以要求人们逐步地克服片面性，要求看问题比较全面一些？我看应该这样要求。如果不是这样，不要求一天一天地、一年一年地有较多的人采用比较全面地看问题的方法，那末，我们就停滞了，我们就是肯定片面性了，就是同整风的要求背道而驰了。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我们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应该逐渐减少。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你参加革命的时间虽然长，讲了错话，人家还是要驳。你的架子摆得越大，人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爱看。

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

有人说，发长篇大论可以避免片面性，写短篇的杂文就不能避免片面性。杂文是不是一定会带片面性？我在上面讲了，片面性往往是难免的，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要求所有的人看问题都必须很全面，这样就会阻碍批评的发展。但是，我们还要求努力做到看问题比较全面，不管长文也好，短文也好，杂文包括在内，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不敢写文章怎么办？有的人说，有文章不敢写，写了怕得罪人，怕受批评。我看这种顾虑可以消除。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第七点：“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志们在讨论中间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

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我们准备用这个放的方针来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现在的面貌。像我在上面所说的，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在这里，我们所采取的方针有很大作用。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对付敌人可以这样，对付同志，对付

朋友，绝不能用这个方法。不会说服怎么办？这就要学习。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人们历来不是讲真善美吗？真善美的反面是假恶丑。没有假恶丑就没有真善美。真理是同谬误对立的。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现象存在。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不怕批评，它是批评不倒的。共产党、人民政府也是这样，也不怕批评，也批评不倒。错误的东西总会有的，并不可怕。最近一个时

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有些同志看到这个情况，心里很着急。我说，有一点也可以，过几十年，现在舞台上这样的牛鬼蛇神都没有了，想看也看不成了。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当然我并不提倡发展牛鬼蛇神，我是说“有一点也可以”。某些错误东西的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也是用不着害怕的，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学会同它作斗争。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教条主义作过很多批判。这是应该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

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最后一点，第八点：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应该把思想问题抓起来。这一点是在座有些同志希望我讲的。现在许多地方的党委还没有抓思想问题，或者抓得很少。这主要是因为忙。但是一定要抓。所谓“抓”，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要研究。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思想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只有重视了和研究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各地方要召开像这次宣传会议一样的会议，讨论当地的思想工作和有关思想工作的各方面的问题。这种会不但要有党内的同志参加，而且要有党外的人参加，要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我们这次会议的经验证明，这对于会议的进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 对《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sup>[1]</sup>的批语

(1957年3月16日)

---

[1] 《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指出：我国大约有五百万知识分子，他们是人民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人，是教育人民的人，离开了他们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他们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极少数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他们之所以反对社会主义，是因为他们受剥削阶级的影响甚深；有少数人，包括党内党外，是不但很积极地赞成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掌握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的；大部分的人，是愿意接受社会主义的制度，但世界观还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状况，将会长期存在。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目的，是用说服的方法、自由辩论的方法，而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向知识分子进行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促进我国的科学、文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迅速地繁荣起来。现在，党与知识分子关系中，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状态，原因是党内存在着两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必须在党内党外反对这两种错误思想。指示还肯定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吸收党外人士参加的重要经验，要求各省市召开同样的宣传工作会议，吸收教育、文艺、科学、技术、新闻、出版界的党外人士参加，充分发扬民主，让他们讲出内心的话。各省委的第一书记必须亲自领导思想工作，并指导会议的进行。毛泽东审阅这一指示稿时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如将指示稿中“现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一句，改为“现在，大规模的群众行动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

即送周、陈、彭真、定一<sup>[1]</sup>阅，尚昆<sup>[2]</sup>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如前示。

毛泽东

三月十六日四时

我今天乘车去天津，明天去济南。

---

[1] 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 关于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问题 给周恩来等的信

(1957年3月17日)

恩来、陈云、彭真、定一<sup>[1]</sup>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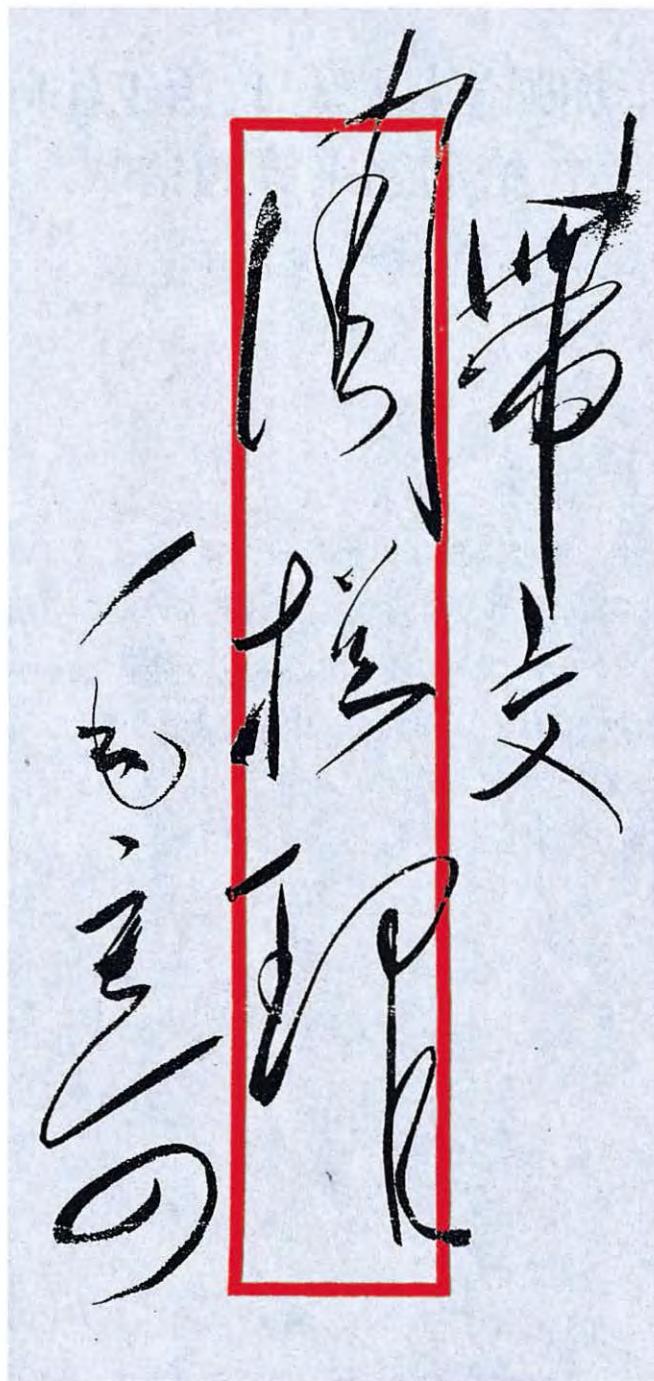
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削减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治〈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要下决心从党政两系统抽调几批得力而又适宜于做学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学校工作，要赋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以上各点，请中央讨论一次，并作出决定。我已到天津。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

---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毛泽东致周恩来等信的信封。

一、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的复电  
周、朱、陈、彭、李、任、高、孙、付  
大学、中专都已采取加强思  
想政治教育的领导，改革教  
学方法，恢复学生方面的改  
革，取消政治课，加强政治理  
论课，加强思想工作，加强思  
想政治教育，高薪减低工  
资。我已将大改方案提出  
了中央讨论，一次会议已出  
来。

毛泽东致周恩来等信的手稿。

# 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57年3月17日)

(黄火青、吴砚农、□□□、李耕涛四同志陪同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全体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

黄火青：同志们，现在请毛主席给我们讲话。(鼓掌)

毛泽东：你们有什么问题？

黄火青：你们有什么问题需要主席解答的，可以写出来，现在主席先给大家讲。

毛泽东：讲什么东西？同志们，你们有什么问题？

很多同志没见过面，今天和同志们谈一点事情。希望同志们提一点问题给我，你们的问题还没有来，那么，还有时间，我就先讲几句咯，就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吧！好不好啊？(鼓掌)

因为这个问题是我们全党关心的问题，是社会上大家关心的，社会上民主人士、各界人士是关心的。对这个问题在我们同志中意见不完全一致。有些同志觉得这个方针可以，赞成，有一些同志看样子还可以，但是心里总有那么一点不舒服：“百花齐放”，那么多花，恐怕有不好的东西出来了怎么得了啊！“百家争鸣”，咱们共产党员只算一“家”，九十九家包围我们，怎么得了啊！有没有这个问题，同志们？就是有比较了解这个问题的，有了解一些但是又不很多的，还有怀疑的，有不赞成的，有各种意见在我们党内。

过去我们党做的工作主要是什么工作呢？现在不是有建设工作吗？在过去我们几十年，主要的工作就是阶级斗争工作。阶级斗争，还不是建设工作。阶级斗争就是要推翻几种制度，就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那些制度。那是一场革命，社会主义就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些都是属于阶级斗争范围。打蒋介石、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城市里还有一个民主改革，还有社会主义改造。这些都是属于阶级斗争范围。那个声势很大，是不是？

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这个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前年下半年跟去年上半年这个高潮，那个时候锣鼓喧天，热闹得很。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是放在这一方面。这个斗争时间很长，它从我们祖宗鸦片战争那个时候算起，一八四〇年，从那个时候反帝国主义算起，算到一九五〇年，就一百一十年了，到去年一九五六年，就有一百一十六年之久，才把上层建筑、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旧的生产关系改变为新的生产关系，旧的上层建筑改变为新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主要是讲所有制，现在我们的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上层建筑就是政府、国家权力机关、军队，都改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斗争。在过去作这个斗争的时候，人们对于我们，在开头也是不相信的。谁人相信共产党能够成功呢？开始有共产党的时候是不相信的，中间也是不相信的，因为中间我们经过失败。经过北伐战争时候的失败，后头，土地革命的失败，经过两次很大的失败，人们都不相信的。现在呢？现在人们就相信了，说共产党行了，行在什么地方呢？说政治你们行、军事你们行，你们有这两门。人们说共产党有这两门，还可以考羸了。还是帝国主义考羸了？跟我们考，跟我们比，蒋介石，国民党跟我们

比，谁比赢了？谁胜谁败？我们赢了。你赢了嘛，那就算嘛，赢是好的嘛，你赢了嘛，还有什么话讲，那好嘛，建设呢？历来人们就是说共产党恐怕是不行的，现在怎么样呢？我们一面革命，一面建设。我刚才是讲为“主”，阶级斗争为主，不是讲没建设，还是有建设，这一方面，我们是不会。要讲不会，也会一点，因为过去作阶级斗争的时候，在根据地也多多少少学了一点。但是盖大工厂，什么设计、施工、安装，那一套东西，我们就不会了。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要教大学生，大学教授我们就很少了。在座有没有多少大学教授？（起立向台下问），有没有？大学教授请举手！一个都没有？有没有大学教授？总得有几个吧？（台下有同志举手）一个，那里有一个，少得可怜啊！同志们，（黄火青：有的没举手。毛主席又回原座继续说）有几个没举手？是啊，你们势力不大，你就不敢举手。

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共产党大学里头教书不行，医院里头当医生不行，工厂里头搞工程，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不行。有几个不行就是喽！这个话怎么样呢？你们听得到没呢？同志们！我听到了一些这样的话喽，我说这个话讲得对，讲得合乎事实。就是我们没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大学教授。中学里头当教员的也少。文学艺术方面有点儿也是三七开；就是像斯大林犯错误一样，斯大林不是有三分错误有七分正确吗？我们有三分会七分不会。文学艺术方面。优势还是共产党以外，大学教授几乎全是共产党以外的，医生几乎全部都是共产党以外的。是不是？教育界有二百万人，大、中、小学，所谓公教人员的“教”有二百万人之多，共产党干什么事情呢？共产党就是在学校里名为领导，实际上就是不能领导，因为你不懂嘛！所以应该承认，这是我们不

行的一方面。他们讲得对，但是他们这个话也是不全面的，我说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不对。共产党不能领导，这是对的，共产党也能领导，他们没给讲。为什么也能领导呢？我说就是我不懂请你们干嘛！国民党也是不懂，“蒋委员长”蒋介石他也不懂，国民党那个党对刚才讲过的这几门也是跟我们差不多，他也是作阶级斗争的这个党，他是专搞阶级斗争的，他就不搞建设。我们一面搞阶级斗争，这七年搞了点建设。他搞二十年，只有几万吨钢，我们搞了七年，今年八年，有多少吨钢呢？可能达到五百万吨钢，按照计划四百一十二万吨，可能超过。也许不到五百万，就四百多万吨。那么他二十年只有几万吨，我们八年有四百万吨，这就是说我们搞计划，此外，财政部给饭给这些人吃。国民党一无计划，二不给饭。同志们！不吃饭我也不能讲话，你们也不能听，科学家也好，大学教授也好，医生也好，是要吃饭的，国民党有饭不给那些人吃，他专搞阶级斗争，给军队吃了，给那些政客吃了。我说李富春，一个李先念，世界上还有这两个人嘛，一个管计划，一个管财政，把这些科学家、大学教授、工程师、医生统统放到计划里头，做出什么长远计划，年度计划，在这上面领导他们，以计划去领导他们，此外，还有一条什么可以领导他们呢？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他们，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去领导他们。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是不会的，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是可以学会的。我们现在要学，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所谓基本上结束就不是完全结束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八大”上面说了，我们全党要求搞这个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大学里头当教授，要学会在科学机关里头做试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跟自然界作斗争，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

把中国这个面貌加以改变。政治面貌加以改变之后，必须要使经济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要改变经济面貌，大体上改变一下，跟过去有所不同，也要花几十年时间。像我们过去不会作阶级斗争一样，阶级斗争谁会呢？没有哪个人会的，比如说我就不会，我是当小学教员的，进共产党也没有想到，相信资本家对我们宣传的那一套，进的是资产阶级学校，相信那一套，后头，大概是逼上梁山了。你们各位呢？老早就打定主意了，母亲生下来，就当共产党？是不是？交代任务就是共产党，我妈妈没有交代这个任务给我，那么是学的，是不是？什么土改，也是不会，各种都是不会的，打仗也是不会的，打了多少败仗，经过多少变化，跟着经验的增多，我们学会了，善于作阶级斗争。是不是？经过许多失败，现在我们搞建设也要几十年，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学习阶级斗争时所付的代价少一些？因为我们付的代价很大，有几次革命失败，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万里长征以前的南方根据地都失掉了，白区也没多少工作了，那是因为“左”。一九二七年的失败是因为右。阶级斗争右了，后头是因为“左”。有了这两条我们就学会了。所以陈独秀，王明（陈独秀就到敌人那方面去了，后头这个人也死了。王明还没有到敌人那方面去）不管怎样，这样的人，都给我们很大的益处。不是他们个别的人，而是他们领导的这个运动，在一个时候失败了。这给全党以很大教育，给全国人民以很大的教育，那么代价是很大。现在我们的建设，是不是也付那么大的代价？如匈牙利从前的领导者，它的阶级斗争也是失败的。它的建设工作也是失败的，因为一闹嘛——去年十月一闹嘛，我说是闹得很好，有些人很不高兴这个匈牙利，我是很高兴。坏事就是好事。匈牙利还是闹好还是不闹好？无所谓闹不闹，总而言之是要闹的就

是了，一个脓疮总是要穿的喽，我看可以争取，因为我们曾经学阶级斗争要付很大的代价才能学到，那么现在我们如果是不搞右倾机会主义。为什么曾经付很大的代价呢？不是搞左倾机会主义吃的亏嘛，搞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吃了亏嘛，如果我们现在不重复以前的错误，在建设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比较少的少付代价，可以避免像匈牙利那样的事情。<sup>[1]</sup>

现在我们好好的想想，很需要想一想，有这么一种情况，作阶级斗争结束，这么一件事。过去阶级斗争高潮的时候，比如社会主义改造，镇压反革命，高潮的时候，我们的缺点，人们不大看得见，我们的缺点，我们还懂，我们在建设方面，科学，办学校，这些事情人们要原谅，人们比较原谅我们。社会上现在那个戏不唱了，□□□，有没有？那就是镇压反革命，他的戏不多了，有还是有，在座的有军官，有军事干部，如果没有戏唱，还要他们干什么呢？当然还是有戏唱的，但是现在不唱，故养兵千日，现在还没有听见炮响，于是就把现在社会上许多问题暴露出来了，这个问题是有，因为这个锣鼓，阶级斗争的锣鼓，热闹得很，自从去年上半年锣鼓喧天，以后“八大”作了结论，那么这个东西就浮到上面来了，就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摆到我们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人们就更加要求我们了，你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我们说：“同志，我也有一套本领叫阶级斗争喽！哈哈！你们不要老是看我们不起吧！老子也是干了几十年的哟！”但是我们老是讲这个话，就不那么好了。因为人们，承认你这条。他说你政治行，军事行，你是干了几十年，你是辛辛苦苦，那是没问题，功劳簿上有我们的名字，但是，同志

---

[1] 本段有些语句不通，均按原文排印。

啊，现在大学教书是怎么教啊，医院里头是怎么开刀啊，我是没学呀，中学怎么办呀？什么科学问题怎么解决呀，原子物理，什么东西，工程师、设计、施工、安装、运转，这一套我们就不会，我们才开始学习，这种情况的改变，得要有一个时间，大概要远需三个五年计划，至少还要有十五年的时间，才会有一个改变，更大的改变，时间还要多一点，因为这个东西需要学，需要时间，那么能不能学到，我看是一定能学到，没什么巧，自然科学，开刀之类，你没学就不会开，我去开刀，就是像一个相声讲开刀一样的，一定会当那样的医生就是了。但是只要学就可以学到。现在有没有人学呢？现在有人学，我们还要派人去学。比如现在的大学生，现在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他们就在学，过十五年，他们就是大学教授，就是工程师，也许不要十五年，有十五年他毕业的时候，还有现有的科学家，工程师，大学教授，中学教员有一部分人，他们愿意加入共产党，条件适合的也可以接受他们加入共产党。所以再有三个五年计划是可以学到的。阶级斗争，哪个容易学习呢？我看还是这个东西比较容易学习。总比那个打仗，比那个肃反，像那个肃反，看都看不见，你说没有，又有，你说有，他又没写名字反革命。抗美援朝打美国人那样的仗，事实没有多少把握，美国这样大堆，我们拿这么一个指头去打他。我看还是就是要中学毕业以后进五年大学以后出来做五年到十年工作，就可以当大学教授，就可以当工程师或工程技术人员，开刀也可以。所以有些人看不到这些变化，大概共产党永远学不到。我看是可以学到的而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到。那么先生是谁？先生就是现在的党外民主人士。他们是我们先生，我们要跟他们学点东西，只要我们态度好，不摆官架子，不摆那个老子多少年，革命时候你在什么地方啊？不把这一

套摆出来，我们把这套装起来，因为那套摆得没有意思，什么几十年嘛，那个是历史家去写的。我们每天见面就把两句话讲完了，老子革命几十年，此外，就没有了，就等于没有干一样，因为那个事情完了嘛，那个事情基本完了嘛，阶级斗争的问题。咱们现在来讲科学，你有什么长处，我跟你学习。我懂不懂呢？我是一窍不通。首先承认自己一窍不通。那你过去干什么去啦？那么就是因为过去搞阶级斗争喽，就是忙一点喽。这样子答复一句那可以的了，就是少年失修嘛！少年失修，所以不懂。现在你可不可以教呢？有些教员还不那么爽快的哩。但是只要我们好好请教，他会教的。我说从前拜师傅的时候要烧香，又磕三个头，现在天津还有没有啊？恐怕也还有吧！还有磕头的？（黄火青：不磕头了。）不磕头了，（黄火青：订师徒合同。）订师徒合同。现在磕头这一灾难免了，我说假如要的话，怎么办？一定要那个规矩呢？还有要磕三个头才教我们，磕不磕？这个时候发生问题了，我说咱们应该磕三个头。你要学本领嘛，那他的规矩是要你磕头嘛，头现在是可以不磕，但是诚心诚意向他学，要尊重师傅啊，要尊重他啊，要努力学啊，这也相当于磕头了。这个精神还是要的。现在我们党里头是有种风气是不大好的，就是脑筋里头还是装满了过去那个几十年，新的风气没有养成，没有事情就是，你们这里是打麻将还是打纸牌啊？或者是看戏，或者是跳舞，横直是没有事情做，没有养成阅读看书的习惯。没有把我们剩余精力放在学习里面去。这是一般喽。至于在学校里头，在工厂里头，在科学研究机关，在医院里头，我们的工作人员凡能学的，你能学那么一部分也好，了解一下内容也好。你完全不懂，你又要在那里做领导工作，就是难怪乎人家说我们不行了。你完全不懂，你学，你又要摆那么一套架子，这就不好了，应该学

习。百花齐放，关于艺术方面，这样的方针也是这样一个时期则特别显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竞赛。放出坏事来怎么办？现在有许多坏事，有许多怪议论。我说不要紧，这些怪议论批评它就是了。人们很怕开出来的花不好看，这个花有毒。百家争鸣，说是共产党只是一家，其他九十几家把我包围了。当然不是这样的意思。在社会科学，在世界观这一方面的问题上，不是什么百家争鸣。是两家争鸣。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这百家里头按其性质分类，可分为两家争鸣。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这两家的思想斗争。在社会科学领域，小资产阶级算不算一家？当然也可以算一家。但是小资产阶级在基本点上，它是同资产阶级是一家的，它属于资产阶级那个范畴里头的。在共产党这一家里头，有没有争鸣的？事实上有，历史上第二国际这是一家，头上顶着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修正主义，现在还有修正主义——南斯拉夫，我们国家有没有呢？我们国家也有这样，可以找到这样的人，这种人可以叫做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国讲有修正主义，不必去讲，好像我们是有个修正主义派别一样，现在没有。但是过去有，陈独秀就是。陈独秀就是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后头王明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错误，同志们知道不知道？第二次，就是打日本初期，抗日初期那就是修正主义。现在钟惦棐不是写了篇文章吗？关于电影问题，否定一切，对于过去的成绩。另外有些同志就肯定一切，看不到缺点错误，人家批评不得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是什么人呢？就是陈其通、马寒冰，一月七日《人民日报》有篇文章，陈其通、马寒冰，我说这些同志好心好意，忠心耿耿，追求正义，他们是保护党的，看到外面锣鼓喧天反对我们，就是不得命令自动出去作战，这

个自动出去作战的这些人们，他们是有一股精神，他仇恨那些看不惯的那些东西，应该承认他们这点是好的，但是他们的方针同方法是错误的。天津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可以找一找。“左”的右的，肯定一切的否定一切的，这是两种片面性，把我们的工作一切都肯定不加分析，这个东西不对，以前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拉科西就是这样，斯大林就是这样，斯大林，说他完全是教条主义者？也不能讲。这个人，他做了许多事，但是他有教条主义，他这个教条主义影响中国，使得我们一个时期革命就是失败，如果照他的办，后头的革命也办不成，现在我们就不在这里开会，这个房子什么人盖的，也还不是我们盖的，我们就没有这个机会，因为这还是国民党帝国主义统治嘛。他是两方面都有，又有教条主义。一切搬苏联，我们必须学苏联，苏联的东西很值得我们学，错误和成绩这两方面，我们现在提的口号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没有讲要学习他的落后经验，哪一天提过这样的口号呢？但是虽然没有提，有那么一些东西跟着搬过来了，在最后七年里头，但是大体上说，我们不算是完全不加选择，这就是硬搬，因为我们曾经对教条主义有所批评，而教条主义的来源就来自斯大林。

对于社会上各种不同意见，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显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不满意共产党，说我们不行，这个是我刚才讲了的，本来不行的就应该承认不行。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就具体的业务来说，我们是不能领导；就整个科学的前进的这方面我们能够领导，就是政治去领导吧！国家计划去领导他们，所以我们有学习的任务，对这些错误的议论，社会上有许多错误议论，我们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究竟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不对，我们

只有这样一个方法，别的方法都是不要，而现在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呢，就是记着继续过去那种方法，或者叫做军法从事，你不听话呀，那么就正军法了，拉出去简单地砍了。（正军法嘛。因为我们习惯这种简单的方法）□□□的办法（指镇压反革命）这个办法不行了，这是对付阶级敌人的，对付阶级敌人呀，对付那些有血债什么东西的那些人们，就拉出去砍了吧，正军法嘛。因为我们习惯这种方法，我们习惯了。搞了几十年了，在阶级斗争里头，其实也不那么简单，还有许多细致的方法喽，但是因为是对付敌人，我们很有一股劲，在现在呢，不是对付敌人，而是对付人民内部的问题，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民族资本家，这么许多人，大学教授、医生，这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行了。这是另外一套。我们要经过学习，他们是对的，譬如科学、技术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向他们学习，而学习是完全可以学到的。有十年到十五年，就可以学到，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他们，而且在技术上领导他们。至于各种不同意见，分两类，一类是科学方面的，不论我们懂不懂，我们现在不懂，将来懂了，也是这个方针，不能“军法从事”的，□□□的那个办法是不行的。只能采取“百家争鸣”这个方针。大家讨论，一门科学可以有几个学派，去争，以后会得出真理，社会科学的问题，也是这样，凡属于科学的，都是用辩论的方法，而不是用我们看不顺眼就去整一下的办法，而要改造这样一个情况，需要经过说服的过程。这些议论完全没什么可怕，有什么可怕呀，胡风怎么样呀，胡风不是抓起来了吗？那是国内他搞秘密的小组织，胡风这个人还活着的了，总有一天要把他放了的了，坐班房坐了一个时期，他的错误，他的罪就满了嘛。但是呢，胡风的思想并没有死，在社会上，胡风的思想活在许多人里头，这就是资产

阶级思想。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的问题，譬如宗教，马列主义，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艺术方面的问题，这些东西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两个方法，一个叫压服，一个叫说服，这两个方法里头取一个，是采取压服的方法？还是采取说服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去想要压一下，这个压么就不服了，压不服的人，只会把问题压得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再来个，他挂笔账共产党犯了错误。你对美国人打过三八线，你用压服的方法，那是对的，反革命你用压服的方法，是对的。对国民党蒋介石、地主阶级使用压服的方法，你为什么用压服的方法对付科学呢？如果我们用压服的方法，我们就没理，就站不住脚，我们就输了，所以应该采取说服的方法。那么说服我们又不会说怎么办呢？问题是那么就学嘛。我们南方有一句话叫化子打狗，叫化子你们叫要饭的，他打狗是专门技术，“叫化子打狗，操习一门”，我们乡下有这么一句话。现在我们是不了解的，不会应付，不会说理，我们要学会说理，要学会写说理文章，学会做说理的报告。老子就是一冲。曾经有过一个同志跟我讲：“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是搞不惯，老子就是一冲。”他说就是一冲，我说你一冲呀，不能解决问题，你三冲两冲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要加以分析，要研究，写出文章来有说服力。至于各种错误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开座谈会，评论，会不会把我们的天下搞乱，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说完全不会，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他们不是特务，他们愿意跟我们合作，大多数，也就是极少数人是仇视我们的，也不是特务，但是他是仇视我们的。许多人还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学了一点，但实际上不相信，再有一些人，相信了一些，不完全，这里头包括共产党员，我们党里头的同志有一些，但是没有

完全学通马克思主义的，还不懂，你看两种片面性的人都有嘛，教条主义的，肯定一切的，别的人说不得坏话，本来我们有缺点，不许人说一说；也有另外一种人，什么都是坏的，否定一切。这两种片面性，这两种形而上学，可见得是存在的。

现在我们发行《参考消息》，在座的同志都看过这个东西吧，没有这么多吧，有呀。这个东西人们就会说了，是共产党、人民政府替帝国主义尽义务，一个铜板都不要，给他出份报纸来骂自己，共产党无代价替帝国主义出份报纸骂共产党，是不是这样的？看样子是这样的。我每天都看，许多东西就是骂我们呀，现在要扩大发行三十万份，可能有一百万人看，发到县一级范围看的，城市到什么一级呀？来锻炼我们，党内党外都应该受锻炼，应该见世面，锻炼知道一点世界上的事情，敌人怎么样骂我们，敌人家里的情况是怎么样。说会乱，不会乱的。这就是把我们关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来，把耳朵封起来，那就很危险，所以有人这么说，这个《参考消息》一扩大发行，那就会使反动气焰嚣张，因此那位同志（这是你们市委黄火青同志告诉我的），希望每一条国际消息都加一按语，那就麻烦了！同志！都要加按语？我们就是叫人们自己去思考，去开座谈会，可能有许多怪言论出来的，怪言论我看是越多越好，就是不要把自己封锁起来，马克思主义，是同他的敌对力量作斗争创造出来的，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发展，譬如我们中国办事情，如果我们不发展，那么我们事情就办不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到中国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就要按具体问题的情况来解决。对百家争鸣没信心，对百花齐放怕放出毒来。我看完全不是这样。若采取压服的办法，不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

去学会说理。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说没一样不可以批评的，只要谁愿意批评。什么人怕批评呢？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党，蒋介石那样的法西斯主义。我们是马列主义，他们是国民党，我们是共产党。蒋介石那样的“老干部”，他们也是“老干部”，那些“老干部”可是批评不得呀，因为他们的脚是站不稳的，我们本钱大。这个地方没有摆一摆，摆一摆几十年，我们做工作的时候，不要天天挂在面上，说老子干了几十年，但是人民还是知道的。老干部就是那样容易批评，一批评就批评倒了，吹一口气就倒了？你们都是老干部啊，有没有新干部啊？大概也有吧！现在专讲老干部，我看是吹不倒的，普通的风；除非是十二级台风，十二级台风可以吹倒树，吹倒房子，但是要吹倒老干部我看也还是不行。十二级台风要吹倒共产党，人民政府，马克思主义，老干部不行，新干部也不行，只要他是正确的。至于你有错误，正是要有点风吹一吹，要刮点风。这房子没有风扇哪？这是因为冬天喽！到夏天得搞点风扇，大概夏天人就要有点毛病吧。我们用洗脸打比喻，你们是三天洗一次脸还是一天洗一次呀？这样一件事情谁也不去研究它，不去研究为什么人们要一天洗一次脸，有的甚至一天洗两次，这个就是因为有灰尘嘛！既然这个皮肤不仅与外面是一条界限——“三八线”，它是与空气接触，它是“黄河为界”，它搞了一副面孔，它而且是个排泄机关，皮肤是个很大的排泄机关，它排泄那么多东西，人的面部我看周身就是它最脏，因为它有七个洞，除了这些东西，另外还有许多小的排泄机关，因此每天要洗。那么党就不要洗吗，党也要洗脸。毒草不可怕，反马列主义思想暴露出来不可怕，而且正有作用，我们需要那些东西跟我们来见面，以便和它作斗争。

争，使我们发展起来，这就等于我们种牛痘一样。刚才讲的《参考消息》，要扩大发行。现在不是提倡种牛痘吗？牛痘是一种什么东西呢？是一种病毒，还是一种微生物，种那么点东西放在人里头，使你两个人打架，就产生一种免疫力量，以后就不出痘子啦，出了麻子就不出麻子了，因为他产生了“免疫”了；一辈子不害病的是很危险的。有个人写文章说我讲什么东西，说是小毛病什么东西，我是讲这一辈子不害病的人，就是有一天他要害病了，就是危险，就是了。因为细菌病毒钻他钻得太少了。经常害病的人呢，那些人比较牢固，因为他作斗争嘛！无产阶级思想它跟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各种艺术的发展，需要百花齐放互相竞争，来比较。百家争鸣，互相竞争，批评讨论，正确的东西才能发展起来。因此我们不要怕这个东西，不要怕，我们要到空气里头去，不要老在有暖气设备的房子里头。

# 在山东省级机关党员干部会上的报告

(1957年3月18日)

刚才舒同同志给我出了题目，要我讲些什么事情。出了题目就要做。但是他出的题目很多，那怎么办？那么多题目，我只讲一个题目：思想问题。

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有一些乱，比如讲：批评共产党的人多了，党外人士比过去敢于讲话了，敢于讲我们党的缺点了（同志们最好不要记录，记录就妨碍听，我倒不是要守什么秘密，我给你们交换意见，你们记人就忙了，不记舒服些）。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对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也发生怀疑，有一些人讲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社办得不好。也的确有些合作社办得不好，共产党也的确不大懂科学。还有苏联过去是比较好的，去年以来就比较坏了，不晓得是个什么道理，总而言之今年比较好，去年比较坏。今年又好起来一点，苏联还是那么一个苏联。有些知识分子讲美国比中国好，美国比苏联好，美国的钢比苏联出得多。此外，人民闹事也发生得不少。去年这一年，特别是下半年（不晓得山东情况如何，听说也有一些），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纪律有些松弛。工厂里头、学校里头的纪律，合作社出勤的纪律，不是一般不好，一般还算好，只有一些不好。报纸上，不晓得你们山东报纸怎么样，北京、天津、上海的刊物上、报纸上，小品

文，讥笑、讽刺文章多起来了，批评缺点、冷嘲热讽。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看得出像舒同同志所讲，对合作社有些人就看得是不好，没有优越性，一片黑暗；有些人员觉得很好，很好就不注意它的缺点了。这些情况下，就是有一些共产党人也跟着别人走，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些跟着资产阶级走，就否定一切，不加分析，把情况看得比较坏些。另外一些共产党人就不服气，说这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条闹出来的，你们这里有没有这个事？搞不搞这个“百花齐放”？别的地方是搞了一下子，“百花齐放”，刚刚只放了十几朵花，还没有放齐，“百家争鸣”，大概有一二十家出来争一争，放的中间，争的中间就说一些事情不那么好了。有一些同志就看不顺眼。他们就想收起来，说放得多了，要收一下，就是不要放了，或者少放一些，“百家争鸣”也收一下，主张收的这么一种思想，所以我们党里头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外面讲什么我们也讲什么，跟着人家走；一种人就想收，不听话的时候就想压一下子。这是现在的情况，是个内因。当然外国的事情也影响我们。二十次代表大会把斯大林批评了一下，波兰、匈牙利的事件，国际上有反苏反共的风潮，铁托的演说，卡达尔的演说，（山东的报纸登这篇文章没有？）引起一些思想上的混乱。还有，我们工作中有许多错误，无论是肃反、土改、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工作中间，我们有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官僚主义的错误，也有宗派主义的错误，这样引起思想上有一些混乱。什么大混乱没有，我们中国，我说没有外国那么乱，当然就没有波兰、匈牙利那么乱了。比起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他们那么乱，譬如越南就很乱了一阵子。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原因，就是有外国的。但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处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下。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

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八次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些结论是合乎情况的。我们过去全国反对蒋介石，解放战争，这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这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也是阶级斗争。这是向什么阶级作斗争？向资产阶级作斗争，向跟资产阶级有联结的那个个体经济。我们要消灭资产阶级同那个资本主义发生基础的那个个体经济，这么一场大斗争，到去年上半年基本上结束。这个大斗争的结束，那么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基本的原因还是这个原因。人民内部的问题就多起来了，就暴露出来了，就暴露出许多思想问题了，思想上就有一些乱了。过去是不是有思想问题呢？我说过去有的，特别是我们新进城来，解放大城市那个时期，同志们都经过，一九四九年、五〇年、五一年、五二年、五三年那几年，那几年还不乱？还是那几年乱些？还是现在乱些呢？实际上，是那几年乱些，你像资产阶级那个时候他们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就是心里不安。但是过去那些不同的意见分歧就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所掩盖，吓住了，被解放战争、剿匪、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那些东西所吓住了，许多人不敢开腔了。并非没有问题，那个时候问题还很多，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比如，民主人士这六七年有很大进步，就是因为在这些斗争里头我们跟他们合作，应该承认他们是有进步的。去年上半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

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是基本结束，不是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一个尾巴也掉得很长的，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一家是无产阶级，我说不是“百家争鸣”，而是两家争鸣，这百家里头有两家，一家是

资产阶级，这个争鸣是要争几十年的。

所以现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面来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那个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刚才讲的，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里面的，我们是把它当做内部矛盾来处理。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把他当做内部矛盾来处理，不把他当做一个国民党特务那样的一个问题来处理。资本家呀，你们这里苗海南呀，我们把苗海南跟蒋介石区别，跟特务区别，我们说他不是特务，也不是蒋介石，他就是苗海南。我们跟他合作，这一来，他说可以，他说愿意跟我们合作，咱们两个人就好办事，我们也愿意了，你们也愿意。前面刚才谈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有“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样的方针，在我们党里头还有相当多的同志不甚了解。有一些同志就是不大赞成这样的方针，究竟在座的同志赞成不赞成我也不清楚。因为我刚刚来，平时我们又不在一道工作。我在别的地方看的时候，比如北京，许多高级的同志，部长，我说十个人里头可能有一个人赞成，一个人想通了，真正其他九个有些相当赞成，但是不那么十分赞成，各种程度不同。至于什么厅、局长，什么科长，这样几级的同志，开头是表示怀疑的多，什么“百花齐放”，放那么多花，百家争鸣，那个是危险得很，咱们共产党就是一家，其他九十九家把我们包围，出来怎么得了，要请解放军帮忙，杀开一条出路，杀出一条血路，才跑得出去哩。长期共存也是不赞成，那个民主党派大概有个什么七八年也就差不多了嘛，让他挖一个坑埋下去嘛，究竟谁监督谁，还要请他监督共产党呀！你有什么资格监督共产党呀？这些同志，你说他没有道理？民主党派有什么权利监督共产党？究竟江山是谁打下来的呀？还是工人阶级、农民打来的，共产党领导他们，还是你们民

主党派打来的？所以听他们的话是有不少道理的。但是还是要采取这样的方针比较好。哪有什么道理有什么理由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种方法，也是一条方针。它是一种使得文学艺术，使得科学能够繁荣起来的一种方法。不管你多少花，你就得开嘛，那么其中有好看的花，有不好看的花，有很丑的花有毒草都可以开。那么毒草开出来怎么得了呢？世界上是有毒草的，人怎么样呢？是不是碰了毒草就死了？这样就有比较，有比较就好办，不是那么简单的，而是很复杂的。各种的花都可以开（各种的艺术）。人们就说，是否这样一来鬼就出来了，牛鬼蛇神就跑到戏台上来了。你们这些地方戏演得怎样？有没有牛鬼蛇神？别的地方就有，特别是上海，曾经演许多的落后的东西，在戏台上打屁股，演包公的时候一定要在戏台上打屁股，现在我们不是讲废止肉刑吗？但是我们的包公仍然在台上要打屁股的。这些东西慢慢地会要淘汰的了。现在让他演一演可以不可以呢？让他演一下我看也可以。这些东西多了，人们就会说话，说话的多了，看戏的人就少了，他那个东西就不演了。过去我们生硬地禁止一下，以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他们演那些戏，就不如让他们互相竞争，“百花齐放”这样的办法比较好。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就是说：我们党就是因为功劳太大的原因，工人、农民的政党，我们党主要成分是工人同贫农的党，按他们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因为在中国威望很大，这个威望太大，就发生一个危险，容易包办代替，以简单的行政命令，反正是人多嘛，社会上的威望也大嘛。所以我们特意请那么几位来监督我们，并且长期共存，我们有一天，他们也有一天。我们就不必说，我们假使共产党有一百年，只准他们五十年，共产党还有五十年，只准他有二十四年。总而言之是要他们先死，先死几十年就是了，

有没有那样的必要？它早死了我们事情就好办了？是不是呢？粮食就多了？钢铁就多了？木材就多了？水泥就多了？礼堂就砌得更好了？并不见得。民主党派灭亡了，我们礼堂砌得更好了，不能证明这个道理。就是有一些民主党派跟我们唱对台戏比较好，就是说怪话，一年有那么几次找一些怪话来说，专门指出我们的缺点，这么一个道理。所以现在不是收起来，而是还要放，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把它压下去，而是不要压。思想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和压服的方法能够解决的。我们应该大家展开民主的讨论，平等地讨论，互相争辩，这样的方法就是用说服的方法，不是用压服的方法。两个方法采取哪一种？一个是压服，一个是说服。这个压服的方法是对付敌人的方法。我们打过仗的都知道，从井冈山那时候就打起嘛，什么大别山、什么各地方，对付敌人只能用这个方法。对付美国人在北朝鲜，就是抗美援朝，用压服的方法。对付反革命、特务用什么方法？我们就是压服它嘛，以后再来说服，先把它搞出来。压服这个办法是对付敌人的，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就是动手，人民内部就不是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人民内部就是讲道理，就不讲打，武力解决就不是个办法。或者是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强迫禁止，实际上是把一个解放军摆在这边，名为不用武力，实际上是它在这边我们用强迫命令，如果没有解放军，这个行政命令也就不行的。谁听你这个行政命令？还是借他们的声势来搞行政命令，我们后面有个解放军，几百万，还有那个老百姓，我们有了基本群众，就是工人、农民。第一我们有基本群众，第二我们有武装力量，所以那些民主人士吃不开也就是这个道理，他们没有这两个东西，一没有基本群众，二没有武装力量。如果我们是采取了开放的方法，而不是把它收拢来，采取说服的方

法，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会兴盛起来。因为现在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采取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人民内部，不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对付人民，要把这两个东西分开。专政是什么呢？我们不是讲无产阶级专政吗？专政是对付敌人的，而民主就是对付人民的。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是种民主的关系。当然民主要集中领导下的民主，不是讲不要领导。现在有些地方纪律松弛，缺乏纪律，这就有些过分。要克服这个问题，要用说服的方法，同他们好好地讲，开会，一次开不清楚开两次、三次会。跟学生们、工人们、农民们能不能说服呢？我们是能说服的。只要我们有理，就是用说理的方法，讲理的方法。如果我们搞错了，把专政的范围扩大到人民内部，用压服的方法，凡是有矛盾，有问题的时候就用压服这么个办法，那么我们国家就要受到损失，就要受到很大的损失。而且总有一天要回过头来，压服不了的时候。君子动口不动手，你要动手，总有一天这个手要收回来的。因为这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那是解决敌我斗争的办法。是不是可怕？人民内部的矛盾发展起来了，又不要压服，不要行政命令，这样一来，是不是很危险？由我看，没有什么危险。不同的意见只会因为辩论、民主的讨论而正确地解决，得出真理，艺术方面会更活泼，会发扬创造性，文学艺术、科学方面会发展起来。这种功效不是一年、两年看得出来的，或者几十年内，十几年到几十年内看得出他的效力来的。这里就要准备着真正的坏人坏意见，就是讲：艺术方面有毒草，有毒的草，很不好看的花开出来了，开出来怎么办？我们说那东西也有用处，因为让世人看一看有这样的草，有这样的花。一个人硬是每天只都是看见好的不看见坏的，真理是跟错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不让错误的意见说出来，我们就不知道他的意见。这个美是跟丑作斗争发展起

来的。好人是跟坏人作斗争发展起来的。一万年以后都有真理跟错误，都有美跟丑，都有好人跟坏人。有一些坏人，他是坏人，是不好，但是，又是好人的先生。有了坏人，人们就有了榜样了，就不学他们的坏了。有好人就学好人，单有好人没有坏人比较，人们分不清楚好坏。几岁的小孩子看戏的时候，他首先要问好人坏人。所以不怕那个坏人，什么错误的道理那些东西，用不着怕。这样我们党跟政府的错误也比较容易克服。相反呢，倒是不好的，倒是很可怕的，就是用压的办法。

我们党习惯了对敌斗争，我们党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我们会搞这一套，结果证明我们是会搞的，是我们胜利了，几十年嘛！所以人们也佩服我们这一条。觉得共产党有什么行呢？你们政治不错，军事也可以。我们有这两条人家佩服的。那么，是不是一开始就佩服呢？那就不见得。我们刚成立党的那个时候谁也不佩服我们，我们那个时候提出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军阀，人们只是听了一下，根本不理。后头又犯了错误，搞万里长征，稀稀拉拉剩下几个大人，我们那时候提出打倒帝国主义那一套，人们也是不大理。以后就搞出名堂来了，到一九四八年那个时候，社会上许多人就变了。共产党似乎兴起来了，共产党就了不起了。特别是到了一九四九年胜负分明了，那佩服的更多了。但是，同志们，建设人家不佩服，共产党能够搞建设呀？人家还要看一看，看来是行的，这些人就会搞那么几手，有那么一股蛮劲。谁佩服我们会搞建设啊！现在在建设问题上面慢慢立起了一些信任，看你这个样子搞了六七年也还有一点本领。但是讲到科学那是另外一回事，物理、化学、数学之类，他说你们不行，还是我们来。这个东西怎么办？你们看怎么办？你们在座的都是科学家，是不是？

我们党科学家不多，其原因就是科学家不多，大学教授不多，工程师不多，各种艺术家有一点也少，就是这些方面不行。大学校长是党外人士当得多，山东大学什么人当校长？（问下面，回答：晁哲甫），晁哲甫是党内党外的？（问下面，回答：是党内的）党内大学校长还是要听党外人士的话。你没有教授，有些当了副校长，人家党外人士不佩服。我们的党员就是学生、助教多，讲师里面有一点也少，教授里头很少。那么究竟是学生领导先生，还是先生领导学生呢？是助教领导教授，还是教授领导助教呢？所以这个问题发生得很自然。我说这个道理是有，他们讲得对，共产党就是不行，就是在教授、科学家、工程师这方面我们人很少，甚至没有。还有许多文学艺术这一方面。什么原因？就是我们过去忙坏了，我们干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忙于搞阶级斗争，没有机会搞这个。过去你这个东西要有个地盘嘛，过去济南这些地方人家不许我们来嘛，什么山东大学、齐鲁大学他不许我们来嘛，来都不许来嘛。北京我是住过的，三十一年我是不能来的，就是不能进城，进了城他就要请我到班房里面去。所以我们承认这些，但是可以不可以学会呢？阶级斗争我们学了二十四年，到了七大，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五年，二十四年才作总结，我们才基本上学会了这个东西。犯过许多错误，又加上七大以来的这么多年。那么，我们搞建设、搞科学，学当教授，医院里面当医生、开方，是不是可以学会呢？比阶级斗争哪样困难些呢？阶级斗争那个东西我看是比较困难的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你一打它就跑了。这个开刀好开，那个病人他不能跑的。自然科学，五年大学毕业，再干五年就是十年，再干五年就是十五年，他不变成工程师呀，这些人他不能当大学教授呀？可以当的，有个十年到十五年可以学会的。现在设计、施工、安装我们已经学

会相当大的一部分了，管工厂也相当学会一些了。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呢？就要转入到学这些，搞建设。所以整个社会与自然作斗争，所以六亿人口与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可以学会的，不要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批评是好的，没有批评，压制批评就不好。斯大林就是犯这个错误。斯大林做了许多好事，但是他做了一些坏事，他混合这两者，拿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人民，人民内部的矛盾，说不得政府的坏话，说不得共产党的坏话，一说坏话，风吹草动，就说你是特务，把你抓起来。所以现在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示威游行、请愿。但是我们要反对官僚主义，要克服官僚主义，那什么罢工、罢课这些东西就会少的，但是怎样也要有。那怎么办？有就用对付人民内部的方法来对付。那么还要不要解放军？那么就把他解散，是不是？那行不行？“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准备对付帝国主义，解放军是用来对付帝国主义的，不是为了对付人民的。解放军就是人民的儿子，那么人民的儿子对付人民父亲啊？你总不能讲吧，人民的儿子对付人民啦！人民打人民啦！那不行。解放军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他是专政的武器。我们要跟国民党有区别，什么人比较怕批评，还是共产党怕批评还是国民党怕批评？我看就是国民党，他那个党最怕批评了，什么“百花齐放”这类东西，他们怕得很，只有我们敢提出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我们说要跟他们共存几年他都不干。那个时候他们开一个什么国民党参政会，我也是个参政员，共产党有几个参政员，我们是以什么资格呢？不是以共产党的代表，而叫做社会贤达，好听就是了，又贤又达了。他不承认我们是共产党的代表。你还说长期共存，短期共存他都不干。所以这样的口号“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只有我们讲。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比较大的公无私的，因为它的目的是要使全人类解放，要使整个人类解放，它自己才能解放。共产党是应当最不怕批评的，我们是批不倒的，风吹不倒的。十二级台风我们都不怕，十二级台风可以把一个大礼堂吹走，可以把这么大的（手势约二尺直径）树吹走，但是要吹走共产党，人民政府，马克思主义，老干部，我看是吹不走的，吹不倒的，十二级台风都吹不倒，何况是什么五六级、六七级。你们到过青岛没有？我没有去过，我想去一下，我到过北戴河，七级风在海里游泳很舒服，平时没有风浪很吃力，要一步一步地爬，起台风一个浪头就有一两个人高。十二级台风我没见过。批评不倒我们的，批评不倒共产党，工人阶级、农民是批评不倒的。因为真理在我们手里，我们手里掌握着真理，比较任何阶级我们的道理是更正确的。我们有工人、农民、基本群众，有工人、农民基本群众作基础，这样的党，这样的政府怎么能批倒呢？马克思主义又怎么能一批评就倒了呢？吹了一口小气就倒了，那就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大概是不要台风，这么招一下手就要倒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那一套东西吹倒一点我看也好嘛，那套东西是要吹倒嘛，把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这些东西吹掉一些。

刚才舒同同志提到社会主义优越性这个问题，因为有些人怀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讲优越性尽是优越性，缺点一点都没有。一讲没有优越性就一点好处也没有。这是两种片面性。我们党内存在着，党外也存在着。两种制度作斗争，哪一个胜哪一个败，就是讲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谁胜谁败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呢？你们看，分了胜负没有呢？按照我们八次大会所说的，应该说基本上是分了胜负的。谁胜谁负，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胜利

了。基本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就没有。作为社会制度，这两个制度的竞争，社会主义基本上胜利了，但是还没有最后胜利，还没有巩固，还要看，人们还要看，资本家要看，农民还要看，资产阶级要看，小资产阶级要看，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还要看，我们共产党里头有一部分人也还要看。两种制度作斗争谁胜谁负，哪个胜哪个败，基本上可以说胜利了，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大概有两三个五年计划。合作社至少要有五年才可以巩固，现在一般的合作社才只有一年多一点的历史。至于两种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这样两种思想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谁负谁胜那么就更要差一点的。所以现在相当乱呀，思想方面，我今天讲的总题目叫作思想问题，这是有理由的。尽管社会制度起了变化，但是，思想还是相当顽固地保守着。特别是关于世界观这一方面，就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还是辩证唯物论，还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或者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这样两种思想方面的斗争，那么这个时期还要更长些。

现在我们全国有多少知识分子呢？大概有五百万这样一个数目，其中学校里头：大学、中学、小学就有二百万人。此外，党的系统，政府的系统，军队的系统里头的知识分子，经济系统，商业系统，工业系统里面的知识分子，文学方面的，艺术方面的知识分子，合起来有人说有五百万这样多。其中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只占少数。我们国家是文化落后的国家，但是五百万人也就不少了。因此，我们要好好利用知识分子的队伍。这批知识分子可以说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过资产阶级学校，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过资产阶级学校，受过资产阶级社会的影响。

至于本人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后来的事。我想在座许多同志们中间的知识分子，也是这么一种情形。你母亲生下来的时候并没有交付你一个任务：要当共产党，要信马克思主义。我也有这样的经验，我母亲生我的时候，她并没有讲这一句话的，她就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有共产党。这是因为后头社会斗争逼上梁山，我那个梁山叫井冈山。你们各有各的梁山。这个梁山就在你们山东。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是少数，大概百分之十左右，五百万里头大概有五十万左右，也许多一点，这是讲真正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另外总有百分之几是根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跟我们采取敌对的态度的，但他们不是特务。这一些人是民主人士，但是他心怀不满，根本反对我们，有没有呢？我看是有的，这也是少数。中间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中间派，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过寥寥，叫他下乡没有兴趣，到工厂里面看看，溜一溜就回来了。跟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他们打成两片。我们说打成一片。他们说打成两片好，搞不成一片，就因为感情不融洽，知识分子跟劳动人民感情不融洽，隔那么一层。这些人世界观没有改，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这个思想的乱，就是这样。他们为什么思想乱呢？他们动摇着，墙上的草，风吹两边倒，不风吹就站在那里，一风吹就倒，匈牙利一股风，苏联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一股风，还有什么地方一股风。世界上总是要刮风的嘛。他们可以倒过去，也可以倒过来。又很骄傲，那个尾巴翘得相当高，他认为他是知识分子，相当了不起。在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是值钱的。所以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真正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是他们，这些还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的范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人叫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可以，你叫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不愿意，但是基本范畴还是资产阶

级范畴。这个时期大概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已经过了几年了，大概还要经过十几年，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要争取他们。要知道现在教书的是谁？就是他们。他们都是教员，他们办报纸，他们在学校里头教书，他是我们经济机关设计、办各种事情的人，他们是工程师，我们是一天也离不开他们。在座的同志们，你们里面也有知识分子，但是你们里面的知识分子比较少，你们如果说，知识分子我们可以离开他们，那就不行，我们离不开他们，没有人教书，大学、中学、小学里头有二百万人工作、教书，有各种报纸，有文学，有艺术。山东唱武生的，山东大鼓，那不算知识分子吧，但梅兰芳要算，梅兰芳是知识分子。你们有个山东梅兰芳（叫什么名字，你们山东人，不知道山东梅兰芳吗？）

我再来讲一讲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工人阶级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已经初步地争取了一批知识分子为自己服务，马克思就是这样争取过去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替工人阶级服务。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现在有一批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刚才不是讲过了，五百万中百分之十左右，就是五十万左右，这是知识分子里面的核心力量。

各种阶级，哪一个阶级有前途呢？只有工人阶级有前途。我们现在有多少工人阶级呢？革命以前，解放以前只有几百万人，这几年增加到一千二百万人。现在在工厂里头工作的产业工人有一千二百万人，六亿人口，只有一千二百万人，就是五十分之一多一点，五十人里头只有一个工人，人数这样少，但只有他有前途。其他的阶级都是过渡阶级，就是走路，走路走到那里，走到他那个地方去。比如农民，农民将来要机械化变成农业工人，集体化，集体化将来进到社会主义，就要变成国有化，全民所有制。现在的农业合

作社所有制，将来几十年之后，要改成跟工厂一样，就是农业工厂，这个工厂里头种包谷、种小米、种大米、种番薯、种花生、种大豆，资产阶级这大家都知道的，资产阶级现在正在过渡，他们也要变成工人。几亿人口的农民，手工业工人现在已经变成集体农民，将来变成国有制的农民，农业工人，使用机器，现在除了少数人以外，这五百万人知识分子里头，其他的知识分子，虽然是动摇的，在世界观问题上，在思想问题上。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这个问题上面也赞成，他们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一般地说，除了少数人他们拥护，他们都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那么好嘛。工人阶级已经把他们争取，经过中国共产党把知识分子争取到自己一边，跟我们合作了，但是这个合作，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一件事，世界观、灵魂世界又是一件事。要他们换掉世界观，改成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就要有一个时间。

现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变，或者还没有大变，小变了一些，我刚才所讲的，他们和劳动人民有些格格不入，没有打成一片。文学艺术家不愿下厂下乡，下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了，他的注意力不在那里，他们对农民的兴趣不大，对工人的兴趣不大。他们愿意回到家里面和知识分子搞到一块，我叫这些人是半条心。有半条心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半条心是好的。因为有半条心啦，剩下那半条心可以慢慢来嘛，那半条心还是资产阶级的王国，资产阶级思想。我跟这些知识分子一讲，他们就会跳起来，“你说老子半条心啦！”我说我就这样讲，你跳到屋顶上去，我还是这样讲，因为你还是这样动动摇摇的，你们是愿意为工人阶级服务，但你不是全心全意，是半心半意。有什么证明？就是你们跟工人、农民打成两片，不是打成一片。你们在工

人、农民里面没有朋友，你们的朋友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跟知识分子交朋友，就不如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但是他们不干，你把他赶也赶不下去。赶下去没有几天就回来了。但是工人阶级要求知识分子全心全意为他自己服务，他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要他们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面来一个改变，丢掉资产阶级世界观。我在报纸上讲：要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一个破一个立嘛，它那个东西不破，这个东西不能立的。于是乎就发生了一个任务要破，破嘛有点痛，那你资本家现在都提出来嘛。资本家里头有大批知识分子，我们要使用他们，工人阶级要求大量知识分子，全心全意为他自己服务。不是百分之百，应该是大多数，相信马克思主义，跟我们有共同利益，我们现在有共同利益。他们听到合作社办得不好就高兴，合作社倒霉他们就舒服，共产党出了乱子他们就开心，有这样一小部分人。但是，多数人还是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吊在半天上，还是愿意跟我们合作的。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他们。

我们党现在提出准备整风，我们要争取知识分子，要争取党外人士，我们先要把自己的作风整顿一下。中央准备今年开一次会，现在还没有决定，今天我也可以稍微讲一下：我们多少年没有做整风这个工作了，“三反”“五反”很激烈，那个东西没有在思想上面解决问题，准备进行一次整风，这样我们就估计可以争取共产党的作风整好了，可以争取广大的党外人士。谈到这个民主人士就有了这样一个问题：合作还是不合作。这个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不是他们跟我们合作不合作的问题，而是我们跟他们合作不合作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合作是好讲，我们跟你们合作，民主人士，苗海南，但是就是使用不使用的问题。有些人讲，他们没有多少用处，甚至讲是废物，废物也可以利用嘛，废物为什么不可以利用

呢？我今天不能具体讲苗海南是废物，苗海南大概是一个很有用的人。就是有些用处不多的人，也可以利用，有些人起了一个名字叫废物，废物也可以利用。一开会不是应付了一下，无非是每年开那么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应付一下，过了关就没有事了，大概一年有那么一两个礼拜吧。这种态度是消极态度，我说要采取积极的态度。这些民主人士大体上都是党外知识分子，这一些人是老知识分子，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

现在大学生有多少是工人农民出身的呢？全国的统计有百分之二十，一百个大学生里面只有二十个是工人农民出身的，百分之八十都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女。中学生就不大清楚了，大概是四六开，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的有百分之六十，工人农民出身的有百分之四十，或者是一半一半。你们有这个统计没有？我在这方面没有统计，中学生升了高中恐怕还是他们的人多，还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多，什么年间大学生百分之百是工人农民出身，高中生百分之百是工人农民出身，至少要过三个五年计划以后，至少还要过十一二年，这个情况才能起根本变化，也许时间还要长一些，再有两个五年计划还不够，也许还要三个五年计划。他那个种是要绝的，那是没有问题的，他是个绝种问题。这个资产阶级还有什么种呢？地主阶级还有什么种呢？他就没有种。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他们绝种嘛，就是以后没有资本主义制度了，没有地主封建制度了，以后一万年都是工人、农民的制度，就是都是工农子弟。

最有前途的是无产阶级，现在这个时候青黄不接，同志们要知道，我们一步也离不开他们，离开他们没有人教书，没有人当工程师，没有人研究科学，大学教授，中学、小学教员，大都是他们，文学家，艺术家，大都也是他们，离不开他们，离开他们我们一步

也不能动。所以应该好好跟他们团结。几个五年计划才能起变化。那个时候他们也变了，资本家变成工人了，地主变成农民了，他们的子弟也变了，现在正在变。

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这次整风，就是整顿三风，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像样子，痛哭流涕。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吗？两只眼睛里面有水，叫眼泪。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眼泪也不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听说还有三天不吃饭的事情。我说，三天不吃饭，没有什么要紧，一个星期不吃饭就有点危险了。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为个人的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也算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

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这个风也要整一下吧。有泪不轻弹是对的，伤心处是什么？就是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危急存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弹几滴眼泪。至于你那个什么级，就是评得不对，你也要吞下去，眼泪不要往外头流，要往里头

流。世界上是有许多不公道的事情，那个级可能评得不对，那也无须闹，无关大局，只要有饭吃就行。革命党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今年准备，今年是准备阶段，出告示，说要整风了，各地可以试整。有些贪污分子，他今年就要赶快收手。本来要抓到一些东西的，现在我赶紧放到这里，那么我们就不算贪污犯了。明年正式整的时候，你今年把他吐出去了，今年不贪污了，或者贪污了的怎么吐出去。那么已经吃下去了、消化了，变成屎了怎么办呢？变成屎了看其情况分期吐出。那个农民，合作社里面不吐可是不行，有什么三十块，就是大问题，那么你就分三期吐，今年吐十块，明年吐十块，后年吐十块，今年吐好了的整好了的，明年就不算贪污犯了。所以今年出告示呀，官僚主义整好了，跟人民的关系，跟下级的关系。当个厅长也好不容易啊！厅长底下有好多人，平时不是不大管的，等到你一整风的时候，那些人就会说话的，你们在座总有厅长，局长，科长嘛。是不是扔一千炸弹就要整风了呀，我看不，我看不应这样做了，改一下就是嘛，我们的缺点，人民内部的缺点，不用民主不搞大运动，那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我们是搞小民主，如果一个小还要少，再加一个小字就是小小民主。总而言之，是和风细雨，台风一定不刮，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微微风吹个不停，我们来吹他二年。今年准备，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什么东西吹掉，主观主义吹掉。我们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讲完了，同志们。

# 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 讲话的提纲<sup>[1]</sup>

(1957年3月19日)

(一) 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许多人还不认识，还企图用过去的方法对待新问题。

分清两类矛盾：不能用解决第一类矛盾的方法去解决第二类矛盾。

公开承认矛盾，列宁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

林〈斯〉大林不承认，混淆两类问题，直到死前才在理论上承认，但实际做又是一件事。

(二) 如何解决矛盾，人民闹事如何处理？

第一类矛盾还存在，右的观点要妨〈防〉止，但不要夸大。

第二类矛盾显著起来了，同志中观察也有“左”有右。

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看作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

(三)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

---

[1] 这是毛泽东1957年3月19日写的一篇讲话提纲，他自拟的题目是“讲话”，按照这个提纲，毛泽东于1957年3月19日和20日分别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作了讲话。

六亿和500万<sup>[1]</sup>——左、中、右。

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中争取三分之一——150万人真心接受马克思主义就很好了。

使中间派进一步。

我们必须使用他们，否则一步也不能动。

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

我们必须学文化（科学、技术），学建设。我们是否可以学会科学技术？如过去一样，可以学会的。

（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放还是收？

说还是压？要善于说服，要学会以理服人（四人文章<sup>[2]</sup>）。

会不会乱？

会不会被批倒？

毒素怎么办？

（五）为工农服务，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两片。

考验知识〔分子〕的主要标准，一条心、半条心（党内党外）。争取70%下厂下乡。

我们干部要经常下厂下乡。

（六）要展开讨论，整风，团结、批评、团〔结〕公式，它的发展史。谁怕批评？阿Q<sup>[3]</sup>。

党内党外，并和党外一起。

---

[1] 指当时中国全国6亿人口和500万知识分子。

[2] 指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写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发表在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

[3] 阿Q，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的主人公。

要使用党外。

要讲真心话，很多事不要两套。

要艰苦奋斗（调整工资）（革命意志衰退）（争名夺利）（白手成家）。

要养成学习习惯。

原则性与灵活性（闹事，毒素有好处）。

向新任务前进，不要忘记敌人，不要忘记政治（政治是人的灵魂）。

如果不注意，很可能在几年以后，政治兴趣低落，政治觉悟不高，因此要加强。

谁怕批评？共、国、民主党派。

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

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学无止境》(中国画)

# 在南京部队和江苏、安徽二省 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57年3月20日)

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现在这个时期，有些问题需要答复，就游说到你们这个地方来了。这个地方嘛，南京，从前也来过。南京这个地方，我看是个好地方，龙蟠虎踞。但有一位先生，他叫章太炎，他说“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是古人讲的假话。看起来，这在国民党是一个虚言，国民党在这里搞了二十年，就被人民赶走了。现在在人民手里，我看南京还是个好地方。

各地方的问题都差不多，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就过去的一种斗争——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基本上完毕了。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对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的斗争，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也是阶级斗争；后来呢？我们又搞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改造，它的性质也是阶级斗争的性质。

那么，合作化是不是阶级斗争呢？合作化当然不是一个阶级向一个阶级作斗争。但是合作化是由一种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制度，由个体的制度过渡到集体的制度。个体生产，它是资本主义的范畴，它是资本主义的地盘。资本主义发生在那个地方，而且经常发生着。合作化就把资本主义发生的地盘，发生的根据地去掉了。所以

从总的来说，过去我们几十年就干了个阶级斗争，改变了一个上层建筑，旧的政府，蒋介石的政府，我们把它打倒了，建立了人民政府，改变了生产关系。改变社会经济制度。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来说，我们的社会面貌改变了。你看，我们这个会场的人，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从前，我们这些人，这个地方是不能来的，哪一个大城市都不许我们去的。这样看来是改变了，而且改变了好几年了，这是上层建筑，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改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在最近几年了，现在也可以说是基本上成功了。这是过去我们几十年斗争的结果。拿共产党的历史来说，有三十几年；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干了个阶级斗争。同志们，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跟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现在，遇到了新的问题。过去那个斗争，就我们国内来说，现在基本上完结了，就国际上来说，还没有完结。为什么我们还要解放军呢？主要是为了对付外国帝国主义，恐怕帝国主义要来侵略，它是不怀好心的，国内也还有少数没有查出来的反革命残余分子，有一些过去被镇压过的，比如像地主阶级、国民党残余，如果我们没有解放军，它又会起来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现在守规矩了，资本家还不同些，我们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来处理。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跟农民接受合作化不同，他们可以说是一种半强迫，就是说有些勉强，而且是在对他们相当有利的条件下接受改造的，所以，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时期：由阶级斗争到了向自然界作斗争。要改善生活，要搞建设，就要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我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关于思想工

作，我们这个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有机器，就要有科学，这个方面，我们过去是用手工，用手使用的工具来做桌椅板凳，用手去种粮食种棉花的，一切都是用手。现在要改为用机器，使用机器，那么一种技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种革命，我们这个国家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这种情况的变化，我想大家也就懂得了，也就意识到了。但是，似乎还有一些人不大清楚，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现在发生一些新的问题，科学技术的问题，文化的问题，人民中间向我们提出一些要求，发生一些人民闹事。这些问题在什么地方？临时工、农村的困难户，学生方面，合作化方面，都发生新的问题。有一小部分工人发生罢工，有一小部分学生发生罢课，或者游行示威，请愿，复员军人也有想闹事的，也有一部分合作社社员，富裕中农，人数不多，但是他们不满意，要脱离合作社，还有些别的事情，他们不满意，向我们闹。怎么办？人民闹事怎么处理？我们就有必要讲清楚这个问题。矛盾应该分为两类：第一类，就叫做敌我之间的矛盾；第二类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过去几十年就解决了第一个矛盾，现在要解决第二个矛盾。这里面表现在各方面。比如现在从农业国到工业国，这也是矛盾。

我们技术不够，没有机器，没有文化，生活不好。有些人讲：“到了社会主义，大概是要过好生活了。”“不是讲社会主义已经成功了吗？去年共产党开了大会，说社会主义基本上完成了大概就要过好日子了。”这就是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它作为社会制度，就是生产关系。我们建立了一种关系，跟过去的关系不同，人

民进行生产，过去是资本家和工人的那么一种关系，地主和农民的那么一种关系；现在，我们建立为一种社会主义的关系，用这样的一种相互关系去进行生产，也就是用一种社会主义的关系来进行生产。因为过去旧的方法不适宜，不利于生产，不利于发展，比较差些，弄得中国人民长期地又穷又是文盲，在世界上是人们看不起的。现在这种关系刚改变，还没有生产，没有生产就是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是没有好的生活。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一百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就不能享福了。那当然不要那么长，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要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那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一百年，是很短的时间，就是搞一万年，人总要生活下去的。

刚刚革命，刚刚搞社会主义，这个生活怎么会好起来？粮食怎么会多起来？粮食多了没有呢？是多了，一九四九年，人民政府成立的那一年，我们只有二千二百亿斤粮食，去年我们就有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亿斤。但是多少人吃呢？我们这个国家好处就是人多，缺点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一千四百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一九四九年没有粮食，现在还是没有粮食，还是不够。要过好生活，现在我们搞出十二年的生产计划，科学计划，农业计划，工业计划，一步一步来工作、生产。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这个问题容易懂，青年人可不容易懂。好像他来到了世界上，样样要像个样子，因此要向他们进行教育，要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教育，特别是对青年进行教育，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

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我们祖宗给我们很少。我们的祖宗是谁

呢？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蒋介石，它是我们上一辈子，我们上一个政府。他们给我们的就是把人民身上的肉刮去了，但是，他们走了，也就好了。他们走了，空出一块地方来。我们这块地方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东边从海边起，西边到昆仑山、帕米尔高原，北边到黑龙江，南边到海南岛，就是这么一块地方，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它个几十年。长期不说，干它个五十年。

要分清两类矛盾，第一类敌我矛盾不能和第二类人民内部的矛盾混淆在一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有矛盾的，是存在着矛盾的。这一点列宁曾经指示过，他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的，斯大林在开头，在列宁死了以后的一个时期，苏联的内部生活，还是比较生动活泼的，跟我们现在差不多。也有各党各派，也有一些比如托洛茨基那么样出名的人物，他有很多人，不过他大概是共产党内部的民主人士，而且是调皮角色，跟我们闹。此外，还有一些人，社会上也可以说各种话，可以批评政府，那个时候曾有那么一个时期。后来不行了，后来就搞得很专制了，就是批评不得，谁要批评，百花齐放，那是很可怕的，只能放一朵花，百家争鸣也怕的，风吹草动，就都说是反革命，就抓人，就杀人。这就是把两种矛盾混淆了，把人民内部的矛盾误认为敌我矛盾。你们南京许家屯同志说，很多学生向他来请愿，队伍很整齐，省长彭冲也说，纪律很好，在路上都是很好，一到他那个衙门里头，就喊“打倒官僚主义”，要解决什么问题。这样的问题，如果拿到斯大林，我看就要抓他几个，难免有几个，头要落下地。你打倒官僚主义，不是反革命？其实一个反革命都没有，是很好的青年学生。而是那个问题应该解决，确实有点官僚主义，因为，那些华侨学生闹事，这个问题

没有解决好。学生这么一请愿，就帮助了我们，学生也得到了教育，很多干部也得到了教育，华侨学生也得到了教育。闹事的、打人的，也不打了，何必一定要天天打呢？因为我们过去没有对他们很好地进行教育，没有发动群众批判他们。像这类问题，还有什么复员军人闹事。曾希圣同志，他在你们附近的安徽省，他那个地方复员军人闹事，找到他，他讲了四十分钟的话，问题解决了。开头还有一股气，后来这一股气不晓得哪里去了。总之问题是没有好多了，问题就解决了。其中已经查出一个冒充革命军人的人，也很坏，他是个领袖。

对于人民闹事，就是不能采取对地主阶级、对国民党、对帝国主义的那种做法，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除了那个犯了法的人以外，比如讲，他拿刀杀人，打伤人，跑到办公室把桌椅打得稀烂，这就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其他的人，哪怕他犯了错误，他是领袖，率领人闹事，应该说服教育，不要开除出工厂，不要开除出学校，不要开除出机关。你开除他，他跑到哪里去呢？你开除出这个学校，他就进那个学校，那不是一样吗？你开除出这个工厂，他就跑到那个商店，他总要落一个地方。他不能跑到中山陵上去活，那个地方没有粮食，没有房子，他不能在那个地方活的，不能在野外活的，总要落一个地方。你这里开除，是以邻为壑，可以舒服一点，我说你这样太舒服了不好，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工厂，有这么一点闹事的人，是不坏的。

我们再谈到第一类矛盾——敌我矛盾，敌人同人民，人民同敌人反革命的矛盾。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一种就是右倾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依法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不依法处理，这个不好，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这方

面，现在各省都有发生，各省应该注意。民主人士中间，民主党派中间，有一些朋友，他们对于这个问题，也是有右倾的观点，他们比我们右倾观点有时还右得厉害一点。因为有些反革命，就是他们的老朋友，现在有些关在班房里，有些杀掉了，他们有点伤心了，因为杀了他们的亲戚，杀了他们的朋友。有的观点，我们要讲清楚，在党内这种观点是不好的。第二，也有夸大的观点，也有“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这可不对。现在还有暗藏的反革命，要肯定。过去肃反根本上是正确的，如果不肃反，那可不得了。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而匈牙利没有肃清。所以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这个观点就是不符合情况了，夸大了。

对于第二类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现在比较显露出来了，比较暴露出来了。对于这类问题，我们同志中间的意见也不一致，有各种不同的意见。还要经过说明，经过讨论，经过研究，使得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统一起来。对于人民还跟我们闹事，没有精神准备。因为我们过去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看不见敌人了，那么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有事情，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过去是向敌人闹事，那就叫革命，现在这个就不叫革命了。你把我革掉，怎么办呢？又请蒋介石来呵？但是事还是要闹的。因为事情你没有解决得好，凡是解决得好的，十个地方九个地方解决得好，十个问题九个解决得好，有一个地方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得好，那个地方就要闹。这个闹事是正常的。你没有解决得好他为什么不闹呢？请问：他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向“蒋委员长”去闹吗？他到台湾去了。他们就要向工厂的厂长闹，向合作社的社长闹，向乡政府闹，向市政府闹，向人民政府

闹，向学校的校长闹了，因为你没解决得好。我们工作中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我们人很多，意见也不齐，因此存在官僚主义。这里也是有“左”有右的观点，对于人民闹事，也有主张用老的办法来对付，横竖我们办法是有一套，我们是搞了几十年，你晓得老子干革命干了多久呵！是不是？总是有一套办法，就是拿我们对付敌人的办法，有时候也用一下，压一下，叫警察。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学生罢课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国民党就用这办法。也有束手无策的，那完全是没有办法。过去对付帝国主义很神气、很威武，就是不怕。小米加步枪，你帝国主义、蒋介石、飞机大炮，不怕。不怕帝国主义，可有点怕人民闹事。我说，帝国主义你不怕，你还怕老百姓？可就是有那么怪，就是怕老百姓，帝国主义他是可以不怕，老百姓一向他闹事，他可没有办法了。因为他没有学过这一条，他还没有学好。过去学的是对付帝国主义的，对付蒋介石的那一套，要讲打土豪、分田地，他是好手；要讲对付人民闹事，他没有学好，这一课没有上过，所以，很值得研究。要跟党内党外公开地提这个问题，开展讨论，办法就出来了。

同志们！究竟是对付帝国主义容易些，还是对付老百姓容易些？对付敌人难办些，还是对付人民难办些？敌人，你撵了多久，他就是不走，赖皮得很，特务钻到机关里头、学校里头、工厂里头、农村里头，他就不走。老百姓无论如何不是特务，他不是帝国主义，他不是地主、资本家，他是老百姓，他是劳动人民，很容易讲清道理，所以我们许家屯同志、彭冲同志对于华侨学生打人，很大一批学生不满意，向他们请愿，他们就来了一个说服，结果是很好地解决了问题。

我说，对于全国，我们的方针是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

强思想教育。这个方针可以说是战略方针，因为这是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里包括地主、富农、民族资本家。没有杀掉的反革命分子，你总要去安排他；失业的各种人，都要做适当的安排，总要使他们能够生活，有事情做。其中，有大约五百万知识分子。中国这个国家，知识分子太少，但是也有一批，大概有五百万左右。其中不到一百万进了共产党，还有四百万在党外。他们干什么事情呢？他们在我们政府系统做工作，军队里面也有一小部分，教育系统有二百万人，大学、中学、小学都算，财政经济系统有一百万人，还有科学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文学家、诗人、艺术家、画画的、唱戏的，还有新闻工作者，办报纸的，等等，上海很多。

这么一大堆知识分子，有些是工农化了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进了共产党，有些没有进，但是很接近我们。积极拥护马克思主义，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占一小部分，大概占百分之十或者多一点，据江苏说有百分之十七。另外一点，他们是有敌对情绪的，但是，不是特务。他同我们敌对，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勉强地接受，没有办法，大势所趋。这样的人，也是有的，可能占百分之几。中间的有百分之八十，或者没有这么多，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他们是中间派，动摇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有些赞成，也读了几本书，但是，没有读进去，就是读在这个上面（指额头上面），没有进到里头去。考知识分子有个办法。人们说要分别一下，究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思就是说，戴一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比较资产阶级的要舒服一点。可是我说不然。我就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的资产阶级学校。那个社会的空气是资产阶级的空气，搞的那一套，就是唯心论的什么东西，康

德的唯心论我就信过，你说那是小资产阶级的？读的是资产阶级，信的是资产阶级，你还能说是个小资产阶级？有的时候，是可以分的，也应该分的，但是讲到世界观，可就难分了。你说，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什么东西呵？是半唯物主义吗？我这个人马克思主义是后来钻进去的，后头学的，而且是经过很长的时间，跟敌人作斗争逐步改造的。有一件事情，可以考知识分子，就是跟工人、农民一道，看谁跟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知识分子有一部分人可以打成一片，大多数知识分子，他还离开得这么远，想要打成一片，打不拢来。他跟工人、农民没有感情，不是朋友，工人、农民有话也不跟他们讲，他也看不起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有一条尾巴，要泼它一瓢冷水。狗，泼它一瓢冷水，尾巴就夹起来了，你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它就翘得很高，它就有些神气。因为他读了几句书，确实有些神气。劳动人民看见你那个神气，看见你那个样子，他就不舒服。

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动摇着的中间派。他们一般地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他们还没完全接受。我说，他们不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而是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他们有半条心想为人民服务，这是好的。但是，还有半条心，不晓得放在哪个地方。你要说他拥护台湾，他也不拥护台湾，但他一讲外国，恐怕还是美国好。“你看，美国有那么多钢，美国科学很发达”。我说，外国好，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国家好，是不是好呢？是好。他们有那么多机器，那么多钢铁，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好是他好，不是你好，美国有那么多钢，是美国人的钢，并不是我们中国人民的钢。我们天天吹他那个好，有什么用处？他每年生产一万吨钢，我们没有。我们每年能多几万吨钢，我们就高兴。我们现在只有四百万吨钢，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可

以完成四百一十二万吨钢，可能超过，可能多一点，可能有四百几十万吨钢。一九四九年只有十几万吨钢，最高年产量是一九三四年，主要是日本人的，那才有九十万吨。蒋介石搞了二十年，我说蒋介石该倒，是有道理的，并不是糊里糊涂我们把他赶走了。他搞了二十年，只有几万吨钢，其中还有一部分是清朝末年张之洞他们搞的。我们搞了七年，今年来讲八年，可以搞四百多万吨钢。所以我们增加一吨钢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就高兴。你美国增加几百万吨钢，我也不高兴，你越多我越不高兴。你增加那么多钢，干什么呢？你增加那么多钢就很危险，要打我们的。我们有些知识分子，还在那里吹美国钢！钢！钢！那么多！这是我们要说服他们的，我们要说服知识分子。

有些知识分子在做教员。科学家都是教员，大学教授都是教员，中学、小学教员都是教员，教育人民；新闻记者，办报的教育人民；广播员、文学家、艺术家都是人民的教员；技术员，工程师，是我们工厂所必不可少的。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如果看不起他们，“我们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如果以为可以不要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离不开他们，我们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就不能活动。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我们学校就不能办，我们有许多报纸就不能出，我们的文学艺术，共产党就没有出梅兰芳，就没有出周信芳；现在有个袁雪芬进了共产党，总还没有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大学教授就没有，工程师现在开始有一点，很少；技术人员开始有一些进了共产党，大批的还是党外人士。

所以，我们几百万知识分子，不管他多么动摇，但是，是有用之人，是我们人民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现在只有他们当教员，没有别的教员，因为他是上代遗留下来的，是社会遗留下来的。他

们的出身都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但是可以教育过来，我们不要搞唯成分论，鲁迅也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马克思就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列宁也是，那怎么得了呀？这就不能讲唯成分论。因为现在，他们——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没有社会根子了，他们的社会基础，他们的社会根子，我们已经挖了，现在他们落在空中，就像降落伞一样，吊在空中了，所以就便于改造，并不要怕他们。

有些工农出身的同志，工农干部，看到知识分子，有点恼火，恐怕吃不消，咬不烂。知识分子有点麻烦是真的。因为，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他们的麻烦也就是读几句书，我们就是少几句书，你少几句，他的尾巴就翘起来，事情也就好办，有的就难办。所以讲难办也就是难办。但是讲好办也还是好办。这七年，这几百万知识分子还有进步，应该肯定这一点。你们江苏省可以证明，你们这里知识分子最多，是不是？总算是还有进步。

民主党派是什么呢？民主党派他们还都是知识分子。民主党派里面工农干部很少，有什么工农干部？民主党派——民革、民盟、民建、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都是一些知识分子。所以，我们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江渭清同志说，要我讲讲这个问题。

提出这样的方针是有理由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是要“放”，还是要“收”？现在党外人士就说我们“放”得不够，他们就深怕我们“收”。而我们同志呢？看那个样子似乎不对，就有一点想“收”。有一点想收兵。那么我们呢？中央的意见，也和各省的同志谈了，去年十一月开了二中全会，今年一月开了省委书记会议，我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

是应该坚持下去。应该“放”不是“收”，不对的应该批评，错误的意见，错误的作品，或者一篇文章里头，一个作品里头有一部分错误，那就要批评那一部分，但是要用说服的办法。所以还是用“说”，还是用“压”？还是用“说服”，还是用“压服”？这两个办法里头，采用一个办法。还是“放”，还是“收”？这两个里头取一个。我们认为还是要“放”，不要“收”。那么“放”，就放出许多东西来了。有许多东西就不对头，怎么办？那么就“压”？还是采取另外一个方法，说服它？有些同志，手就有些痒，想去“压”，把对付阶级斗争的那一套搞出来，军法从事，用简单的办法，或者是不调兵，用行政命令，看不顺眼的，就把它“压”一下。中央认为，这样不好，压是不会服人的。从古以来，就没有压服过人的。我们对敌人那是要压，压了之后，还是要“说”。比如俘虏一解除武装，我们就说服他。反革命，只要不杀头的，我们还是争取、教育、改造他。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这么一“放”，又是用“说服”，不要用行政命令来高压，会不会天下大乱？我们说不会乱。会不会从各方面进行批评，在报纸上、刊物上、会议上批评我们的缺点，会不会把我们批评得不得下地，把人民政府批倒，像那个匈牙利一样，会不会那样？我说不会。中国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大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大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老干部也批评不倒，所以，老干部不要怕批评。老干部批评一下很有好处，如果我们身上有官僚主义，有缺点，首先让党内批评，然后党外批评，批评我们的缺点，把我们的官僚主义改一改，把缺点改一改，不就好了吗？会不会倒呢？不会倒的，人民政府怎么吹得倒呢？上海去年刮了龙卷风，把个什么大东西吹起了，房子还有什么装石油的，吹上天去

了。起那么一股风，但是上海人民政府没有吹走，不管刮多大台风，我看人民政府，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老干部、新干部，只要是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的，吹不倒，半心半意替人民服务的，那要吹倒一半；那一点心思都没有，跟人民政府敌对的，那么该吹倒。

毒素怎么办？百花齐放这一来，放出许多毒素，蛇口里吐出一朵花来。我说对于有毒素的东西，有篇文章叫《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同志们大概都看过了，这个里头有这样几句话，说民主集中制，如果有缺点，就应该批评。毫无疑问，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必须建立在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党的领导必须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些方面如果发生了缺点，就必须坚决地加以批判和克服。但是对于这些缺点的批判，只能是为着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而绝不能像敌人所企求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的“涣散和混乱”。这个对不对？这个对了很好。你们拿这个东西，跟民主人士讨论，要大学生去讨论。这篇文章上讲了的：批判是可以，但是批评的结果，批评的目的，就是要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绝对不能像敌人所希望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混乱。

这些原则性，原则必须如此。但是有一种灵活要注意，让人家说话的时候，会说出一些很不好听的话来，百花齐放，会放出一些很不好看的花。有些什么罢工、罢课、请愿、游行示威，中间可能出一些乱子，它的目的不一定跟这个相符。群众闹起事来，那些知识分子，百分之八十都是没有学会马克思主义的，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他怎么会了解这一条？开起会来，批评的时候，会出一些乱子。这时候，如果到处都拿这一条去压，“你看，我有一本书，你看过没有？”也不行。你是要学我们彭冲同志、许家屯同志他们解决这

个问题的样。他们在这个时候，如果就搬出这一条来念，就是念这两句，别的话都不讲，保证他这个市长干不成了。因为要解决具体问题，他们有时候搞得过火一点，这是难免的。

文学作品里头，有些是不对头的。上海唱“狸猫换太子”，我是没有看过那个戏，说是各种妖魔鬼怪都上来了，我说上来一点也不要紧。妖魔鬼怪，很多人就没有看过，不要天天搞妖魔鬼怪，今天也搞，明天也搞，尽搞。搞那么一点，见见世面，见识那个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艺术化了的意识形态。这跟神话不同，比如“大闹天宫”，是大家赞成的，没有哪个反对，还有什么“劈山救母”“水漫金山”“断桥”之类，那些都是神话。也没有哪个反对。就是有另外一些东西，也不必那么急，让它搞一个时期，会有人批评的。出了几篇小说，写了几首诗，演了一些什么“狸猫换太子”，心里就那么急？我们可以慢一些，让社会评论，逐步地使他们那些作品，那些戏剧，加以适当改变，而不要用行政命令来禁止。同志们！不要误会我在这里提倡妖魔鬼怪，我不是提倡这个东西，而想消灭它，而消灭的办法，要让它出现，让社会上大家公评，总有一天它会慢慢要丧失，要逐步改造的。我们过去就是用一个命令禁止，禁止了七年，现在人家又慢慢出来了。可见得，我们的那个禁止是不灵的。

最后我讲一下要在党内党外把我们党提出的这些问题开展讨论。讲一样的话，在党内讲，也跟党外讲。比如半条心这样的话，也要跟他们讲“我就是讲你半条心，你怎么样？”“那就不行！你讲我半条心，就不行！”不行，我要打架，打架也不怕。你是半条心，我说你半条心，你还不舒服？你有半条好嘛！你还有半条心，这是讲世界观，我不是讲你对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你是拥护的，但是有一些也不见得，譬如合作社这个制度，有些是怀疑的。

但一般讲社会主义，五年计划，你要问他赞不赞成，他说赞成。宪法赞成不赞成，他赞成。共产党一般他拥护，但是讲到世界观，辩证唯物论，这一套就不赞成了，或者只有一部分赞成。我们讲半条心，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你还有一个任务，还要改造。你有二重性，一重是赞成社会主义，二重是不彻底，所以是半条心。想跟人民接近，但是又不能完全接近，不能打成一片，从乡里遛一圈回来，还是差不多。

听说，你们南京曾经出了一件事，在“三反”的时候闹出来的。有一位作家，是作家协会里头的秘书长什么人，下去体验生活，带了城里的饭到乡里去吃，回来的时候，预先就有报信的到南京，南京作家协会接了信之后，就排起队伍来欢迎，站立两厢，我们这位体验生活的作家，走中街而过。总而言之，很神气就是了。还有一位在“三反”中间，他这个人结婚，一定要在结婚的那一晚，睡总统府蒋介石睡的床，他要去睡一晚。总之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怪事就是了。来了“三反”“五反”，把这些事都暴露出来了。南京方面这些材料送到北京，我们也看到了，那种人心情状态，总是有他的兴趣，这是总统睡过的床呀，这个总统姓蒋，蒋介石呀，我今天结婚，一定要在那个地方睡一晚。我们要使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刚才讲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就是些知识分子。我们要用他们。人们说用是好，可是他们没有用处，是老废物。废物也要利用，废物也有好处。应该用他们，应该开会，这回北京开政协会议，我也跟他们讲过一回，每年不要开会就是应付一下，应付一下过了就算了，而要是利用开会，每个省一年开一回、两回，利用这些机会，给他们做工作，说服他们，使他们替我们去做工作，因为他们联系一些人，经过他们去说服那些人。这样的态度，就是一种

积极的态度，而不是一种消极使用他们的态度。就是“利用”“限制”“改造”嘛。我们同志喜欢后面两条，一条叫“限制”，一条叫“改造”，就不喜欢头一条那个“利用”。我就“改造”你，我就“限制”你。当然那是对资本家讲的，现在对民主人士不好这样，对民主人士不好讲“利用”“限制”“改造”，可是，我们的同志事实上就是一个限制，就是不去“改造”，不去“利用”他们，他们可以做一些我们不能做的工作，要同他们讲真心话，有很多事情不要用两套，不要党内一套，党外一套。像我跟同志们讲的话，我都可以跟他们讲，当然任何一个党，他有一部分事情是不跟党外讲的。民主党派他们也有一部分事不跟我们讲，我们也有一部分事情不跟他们讲，但是，关系政策的事情，都可以讲，党内是这样讲，跟党外也是这样讲。材料都可以看。有一材料，比如讲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暴露我们官僚主义的这样一些材料，可以印发给他们看，他们平时看不到，这样一来，反而比较好。有时可以开两个党的共同的会议，党内党外同时参加。最近，北京开宣传会议，开得比较好，有一百五十多个党外人士参加，占五分之一。你们如果开的时候，可以多一些，可以让他们占五分之二。我们在政策这些问题上，艰苦奋斗这一点上，做很多工作。

艰苦奋斗，江渭清同志也讲了这一点，我先前也讲了，要有多少年我们人民的生活才能改善？现在要提倡艰苦奋斗，但是不等于女同志不穿花衣服的，花衣服还是可以穿，据他们研究，花衣服便宜，现在做两套，里面穿花衣服，外面穿兰布褂子，那花钱太多，我们要节省，穿花衣服是个节省的办法。各种事情，我们都要从节约这点上，艰苦奋斗这点上，做很多工作。

现在已经可以看出，有些同志精神不振作，就是做那么一点事

情，没有事情就是打扑克、打麻将，听说打扑克成风，有时一打打到天亮。要养成读书的习惯。我不反对打扑克，也不反对跳舞，也不反对看戏，就是不要太多。我们的长处使用不上了。我们的长处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政治军事。我们现在的缺点，就是缺乏文化，缺乏科学，缺乏技术。我们要在这方面学习。这些话我在一九四九年《论人民民主专政》那一篇文章里就讲到过，说我们过去的长处，我们所会的东西，我们所了解的东西，快要不用了，而我们所不懂的东西，现在摆在面前，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就是学习。过了七年，更加觉得要提倡学习，要养成看书的习惯，使看书占领工作之外剩余的时间，把剩余的精力用在那上头，这样想打扑克的那个味道，就没有那么多了，味道钻到书里去了，钻到学习里去了。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每一个人有一条生命，或者六十岁，或者七十岁，或者八十岁、九十岁，看你有多长的命。只要你还能工作就多多少少应当工作。而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热情，就要有一种拼命精神。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一闹一评级，有些人闹得不成样子，像什么三天不吃饭，我说四天还可以。你三四天不吃饭，人送饭去，我说送早了，你让他饿四天、五天，一个星期不吃饭，就相当有问题了。三天不吃饭有什么要紧？急于送牛奶、鸡蛋，何必那么急呢？有些人痛哭流涕，比级别高低，比薪水多少，比衣服漂亮程度。

工资恐怕是要加以调整，中央还没有作出决定，去年不是提出

工资改革，增加了工资？工资是应该增加的，但是有些是增加多了一点，如行政系统，也许还有教育系统。这不是讲工人、讲工厂，而是讲行政系统。我们有一百七十万行政工作人员（包括乡干部，不包括合作社），教育系统有二百万人，另外有商业系统以及工厂以外的事业系统，还有三百八十万解放军，合共有一千万出头一点。这就是我们组成为国家的这么一个人数。产业工人过去几百万。现在增加到一千二百万人。因为我们国家大，工作人员也是要多一点。所以准备在有条件的时候，就是讲有出路的时候，把一部分人回到工厂里头去，回到合作社里头去。主要的生产是两个部门，一个工业，一个农业。就靠这两个部门来生产。现在看起来工资有一些不很适当，引起人们不满。我说这个问题，如果社会上讲话的多了，倒是好办，因为讲话的多了，我们就有根据来一个调整，要保持过去我们革命的时候，阶级斗争的时候，那样一种精神，那么一股劲儿，那么一股热忱。革命热情，就是要把这个工作做到底。每一个人，有一条生命，看你能活多久，或者六十岁，或者七十岁，或者八十岁，或者九十岁。有一个画家齐白石，他有九十八岁。看你有多长的生命，到那个时候，你真是不能工作，你就不工作，当你还能工作的时候，你多多少少应该工作。而工作的时候，要有一种热情。缺乏热情停滞下来，这些现象不好，应该做教育。有些人就是因为机关庞大，许多人围在一起，没有工作，打扑克，毫无出路。你堆上一大堆，只有那么几件小事办，他不打扑克？

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今天军队的同志到会的很多。军队里头怎么样？平时的政治工作跟战时的政治工作是不是有些不同？在战时，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官兵打成一片，军民打成一片。战时，我们有一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现在是平时，又不打

仗，就是训练，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地就难于原谅了。现在实行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但是，上级跟下级还是要打成一片，干部跟士兵还是要打成一片，还是要准许下级批评上级，士兵批评干部。比如开个党代表大会，给他们一个批评的机会。陈毅<sup>[1]</sup>同志在“三反”的时候讲得好，他说，我们发号施令多少年都可以，现在让下级批评我们一下，批评一个星期，可不可以？他的意思是说，应当是可以的。我赞成这个话，就是让下级批评我们一个星期。在大家批评之前，先准备一下，作一点报告，讲一讲自己有什么缺点，无非是一二三四，有那么几条。然后同志们发言，补充一些，批评一下。群众是公道的，他们不会把我们的历史丢掉。连排长也要给战士们一个批评的机会，最好一年有这么一回，开这么几天的批评会。军队里头的这种民主，我们曾经搞过，结果是有益的。不要因为有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而使上下级、官兵、军民、军队同地方的密切关系受到损害。毫无疑义，上下级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是一种同志的关系。干部跟战士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打成一片。军队跟人民、跟地方党政组织的关系，也应当是密切的。

全党应该强调思想工作，我们今天讲的总题目就是思想工作，思想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近来比较突出，特别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人们就说，是不是要“放？”恐怕危险。长期共存，为什么要怕长期共存？“你那个民主党派，我们革命的时候，你在哪里？”只要搬出这一条来，那他就没话说，他就遭殃，我们说这个时候还不要搬这一条。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说资格老，多少年革

---

[1]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命，这个资格也是可靠的，但同时我们不要靠它。你资格老，几十年，那是真的。可是，你有一天办了一些糊涂事，讲了一篇混账话，人民还是不谅解你。尽管你过去做过多少好事，职位有多么高，你今天的事情办得不好，解决得不对，对人民有损害，这一点人民就不能原谅。因此，我们的同志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靠正确，不靠资格。靠资格吃不了饭，索性不靠它，等于还是什么官都没有做，就是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这一条，我们的干部要注意，特别是老干部要注意。一般来说，新干部没有这种包袱，比较自由。老干部对新干部要处在平等的地位。有很多东西，老干部不如新干部，要向他们学习。他讲“老并不是你们好呀，你们就是革命几十年，我就是那个时候，你们革命的时候，我还在地上爬呀！”这一条他讲我们不赢，因此他就没有这个包袱。

那些新干部，我们要对他们要处在平等的地位。有很多东西，我们不如他们。比如讲知识，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现在这一代，只有他们能够在知识上教育工人阶级、教育农民。因为现在我们还有什么知识分子呢？没有嘛！现在的大学，约有百分之八十是地主、资本家、富农的儿女；中学据江苏省统计高中百分之六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儿女；初中也有百分之四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儿女；只有小学倒过来，大概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儿女占百分之二十、三十，工人、农民子弟可能有百分之七十、八十。这种情况，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要一二十年，才能改变。所以，现在的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要耐心争取他们，一面要说服他们，使他们进步，使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是说教育他们，他们要做教员，必须学习，另一面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要向现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习，因为，除他们就没有知识分子了。

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只有他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向他过渡的。比如说农民，将来要变成农业工人，合作社几十年之后，就要变成国营农场，社员要变成农业工人，资本家现在正在变，再过若干年，他们也变成了工人。整个社会都是工人，所以只有工人才有前途，其他都是过渡的阶级。无产阶级要有他的知识分子，要有全心全意为他服务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半心半意。大概估计，三个五年计划完成，我们可能从五百万知识分子中间，由现在的百分之十几或百分之十五，或者百分之十七（这里包括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而不算在里头的），因为进了共产党，他并不一定等于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共产党。有一部分人倒是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比如过去鲁迅就是这样的人。鲁迅好？还是陈独秀好？还是张国焘好？还是高岗好？我说还是鲁迅好，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非党人士，就个别人而论，进了共产党，并不等于比党外人士好（有一部分党外人士比共产党员好），争取扩大到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他们或者是进党，或者在党外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跟工人农民接近。还有三分之二，在这十几年当中，也会有些改变，由半心半意改变成再多一点，三七开，尾巴掉一点，有些进步。我们要争取这个前途。因为讲思想问题，就联系到知识分子问题。

至于合作化许多问题，我就不讲了，合作化是个好事，是确定它有优越性的。因为我们许多合作社证明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但是有一部分同志，还有疑问，党外人士还有异议。这一点要向他们作解释。

# 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57年3月20日)

刚才柯庆施谈到，现在是一个转变时期，过去我们是长期从事革命战争，从事阶级斗争。而这个斗争，在国内来说，现在基本上结束了。阶级敌人的统治已经被推翻，社会制度的改革已经基本上代替了过去的旧制度。在我们面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全国人民同自然界作斗争，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报告和大会决议都说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用过去老的方法对待新的问题，应该说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央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做详细的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去年四月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讲到一条敌我问题，一条是非问题。在那时候还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到了去年上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

确定地讲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详细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方法对待新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这个问题，列宁曾经说过，他认为矛盾是存在的。但是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内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在斯大林的后期，人们说不得坏话，批评不得党，批评不得政府。斯大林实际上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把说坏话的，说闲话的当做敌人，所以就冤枉了许多人。斯大林在一九五二年所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也说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还有矛盾的。并且解决得不好，矛盾也会转化成为对抗。虽然如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斯大林还是说得很少。我以为我们今天应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做出适当的结论，比较好。

比如说人民闹事这样的问题。这当然不会是普遍的，只是一些个别的，但是会经常有，因为官僚主义这个东西总会存在，我们要整风，要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凡是出了官僚主义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人民就可能闹事。闹出了事，我们怎么看？应该看成是普通的事情，不应大惊小怪。应该看到这是在特殊情况下调整社会秩序的方法，如果按照正确的方法，问题长期不得解决直到群众一闹才解决了，那么，群众为什么不闹呢？当然我们不是要去提倡闹。不闹而解决问题，经过民主集中制、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问题，这才是我们的主张，实行这个主张，就需要反对官僚主义。如果有某一个单位的领导者，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十分顽固，群众不可去提意见，而上级又没有及时发现、纠正，不把这个

领导撤掉，那么，那里的群众就会闹。在这样特殊情况下，闹一点事有什么要紧呢？无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我们党内都有不同的观点，有右有“左”，在敌我矛盾的问题上，右的观点就是看不见敌人。现在不是说国内的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了吗？有些人，就把基本解决看成完全解决，因此他们对那些人民痛恨的很坏的人，真正的特务，真正的坏人，也不去处理，这一种思想当然不对。夸大了也不对，夸大了是“左”的观点。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有些人却说还没有，说阶级矛盾很大。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些人忽视了这个事实，以为太平无事。我们共产党就是代表人民跟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斗争的，后来又跟资产阶级作斗争，人民怎么会回过头来反对我们呢？过去没有设想过人民会有不满意，没有设想过群众会对我们游行、请愿、罢工、罢课，现在也还是不大相信。这是一种情绪。另外一种情绪，就是怕。出了一点乱子就是不得了，天下就要大乱，人民政府就要倒了，就算起了龙卷风，我们共产党会不会吹走呢？人民政府会不会吹走呢？马克思列宁主义会不会吹走呢？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不会的。所以没有什么可怕。如果在客观上真有非闹不可的形势，让闹反而比压着不让闹好些。这样一种看法，同志们考虑考虑。是否比较妥当一点，这是一个问题。

其次，我想谈一下知识分子问题。全国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从他们的出身来说，从他们受的教育来说，从他们过去的服务方面来说，可以说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知识分子。其中大约有十分之一多一点加入了共产党，这些人大约有百分之几。这两部分人合起来，据有的同志估计，大概有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十七。在另一方面，也有少数跟我们有敌对情绪的人。他们并不是反革命分子，而且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在反对帝国主义问题上跟我们还能合作，

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是怀疑的。这样一种人大概有百分之几。其余百分之七八十是中间状态的。他们了解一点马列主义，但是了解不多；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也容易动摇，至于接受马列主义世界观，就还有困难。他们常说，“你们我们”，不是把我们的党当作他们的党，像多数工人贫下中农那样。从他们跟工人农民的关系上，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世界观还不是马列主义的，他们到工厂里头、农村里头去看的时候，跟工人、农民不能打成一片。看是看了，但是有距离，互相不能成为朋友，不能谈知心话，也还是“你们他们”的关系。他们也在为人民服务，但是还不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跟工人农民不是一条心，但也不是两条心，而只有半条心在人民方面。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争取他们。要在比如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还有十一年）使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方面，在跟工人、农民结合方面，前进一步，其中大概要有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或者进了党，或者成为党外积极分子。然后再进一步，争取其余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这样分步骤地来改变知识界的状况，改变他们的世界观。

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对于一部分知识分子，现在似乎还是一个问题，这也是知识分子新的人生观还没有建立起来的一种表现。我们要向他们说明在我们国家里，除了工人、农民就没有别的人了。资本家要变工人，地主已变农民。除了这两种人，第三种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替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的本身性质在变，要逐步地变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因此，文艺当然是工农兵方向，没有别的方向。你们还能提个地主方向，资产阶级方向，帝国主义方向？那些力量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丧失了社会基础。至于几亿小资产阶级分子也已经进入了集体化，现在还叫小资产阶级就不行，

他们已经变成集体农民，集体手工业者了。

当然他们的思想还拖了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特别是那些富裕中农和上中农，他们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还很严重。现在怀疑工农兵方向的知识分子，正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富裕阶层思想。但是无论如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现在都只剩了一条尾巴，尾巴无论有多长，终究是要消灭的。因此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团结争取过来，条件是完全充分的，但是也需要时间，要有十几年二十几年那么长时间，不能快，不能忙。马克思主义只能逐渐说服人，不能强迫灌进去，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现在还流行着一种舆论，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他们这个话有没有理由？我们说有一半理由。在现在，党员工程师、教授、医生和其他高级技术人员确实很少，一般地说来，我们现在还确实不懂科学。我们的人不但没有时间也没有钱进大学，到外国去留学。还有，帝国主义、国民党也不让我们留在城市里研究科学。许多知识分子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搞政治可以，军事也行。其实，这也只是现在的话。在以前我们没有胜利的时间，在我们打游击战争的时候，他们可不这么说，他们那时认为我们什么都不行。总之是成不了气候。人民是要看事实的，因此在我们在科学上还没有占领领导地位的时候，要他们承认我们可以领导科学，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的道理也只有一半对，另一半他们就没有看到。我们现在显然不懂科学。但是我们还是在用国家计划领导着科学事业，用政治领导着科学事业。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中国的工业发展了，科学也发展了，这是不是事实呢？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如果不是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工作，又

是在谁的领导下工作呢？而且科学也是跟政治、经济一样，是可以学习的。我们既然可以学会政治和军事，也可以学习科学。如果说我们进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经过了二十八年才取得了胜利，那么学习科学达到一般专家的水平，就不必用这么长时间。进五年大学，再加十年工作，有十五年的工夫就差不多了。

同知识分子问题、科学技术问题有密切联系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的问题。关于这个方针，我们还要在党内做许多宣传解释工作，有些同志觉得这个方针太危险了，百花齐放，放出鬼来怎么办？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人说“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和我们长期共存？还是短期共存吧”，“你监督我，我还用你监督吗？你民主党派哪年打的天下？”所有这些意见都是反对“放”，主张“收”。这些想法对不对呢？

中央认为主张“收”的意见是不对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于发展科学事业，是一个基本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在目前的过渡时期对于团结教育知识分子，这个方针更有特殊的意义。这就是说，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的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说话，对于说错了的怎么办？用压服的方法，还是用说服的方法？中央认为压服的方法不好。压服就是压而不服，不可能压服。人民内部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用说服的方法不应该采取压的方法，无产阶级实行的专政只适用敌对分子。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这里有一个重大的界限。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对待人民内部问题动不动就想“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纠正的。

不会说服怎么办，这就要学习。我们一定要学会说道理，是可以学会的。用了说服的方法人家还要闹怎么办？会不会搞的天下大乱？我说不会，只要我们坚持说理、充分说理，不会乱的。而且也不要尽是怕乱，出一些小乱子有好处，我们可以取得经验。对于那些有毒素的文章，或者别的有毒素的东西，我们要批判、要斗争，但是用不着怕。我们同那些有毒素的东西作斗争，会使我们自己发展起来，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同敌对思想作斗争而发展起来的。

我们要同敌对思想作斗争，我们自己的缺点首先要整顿。我们有很大的成绩，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们也有许多缺点，这个事实也要肯定的。不应该肯定我们所做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最主要的，正确的东西。同时也绝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一部分错误和缺点。否定一切就是机会主义，肯定一切就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也是形而上学，它肯定一切而不加分析。如果把我们的工作加以分析，就会知道，我们的工作中间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是有缺点，所以，我们要进行整风。

关于整风，中央还没有作出正式的决定，准备这样做：今年准备，明年、后年实行。采用延安那时候的方法，从容不迫地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来学习一次马克思主义，对我们作风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缺点，用适当的方法加以批评。批评是在小组内，不开大会，有多少毛病就是多少毛病。不要缩小也不要扩大，自己反省反省，同志们加以帮助。总之，是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这就是说，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用这样的态度来进行整风，提高马克思主义

的思想水平。从延安整风以后，实际上有十几年没有进行全党范围的有系统的思想整风了。这次整风的结果，估计会使我们党得到相当大的进步。我们自己来批评我们自己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丧失威信？我看不会丧失威信，会增加威信。延安那次整风就是证明。增加了党的威信，增加了同志们的威信，增加了老干部的威信，新干部也得到了教育。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这两个党比较起来，谁害怕批评呢？国民党害怕批评，禁止批评，结果并没有挽救了自己。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在我们方面。我们把风整好了，我们在工作中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东西就更多，我们的本事就更多。同时也就会更谦虚一些，原来不会说服人的就会慢慢地增加说服人的能力。党外人士，可以让他们自愿参加。我们先整，他们后整。如果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知识分子参加整风就很好了。

整风的任务之一，就是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的革命的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的热情有些不足。注意待遇，注意享受的人多起来了，要经过整风使这些同志重新振奋起来。经过这么长久革命斗争，有一点疲劳，需要一些休息，这是可以理解的。看一点戏，跳一点舞，穿一点花衣服，这并不需要反对。我们所反对的是追求地位，追求特权，铺张浪费，脱离群众。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凡是能够节省，应该节省的都要节省。阶级斗争，几十年革命，都是为建设开辟道路。而要建设，就必须珍惜人力、物力。建设的时间长得多，这是另外一场战争，我们希望在不很久的时间之内，中国比现在要好，比现在要富，比现在要强。革命就是为了这个目标，那一仗就是为了这一仗，那个战

争就是为了这个战争。这个战争更艰苦，时间更长，比方说至少一万年。为了建设得更好更快，就必须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铺张浪费、追求特权、摆架子等一切坏习气。

跟党外的关系，应该比过去更进一步，这也是整风的任务之一。党与非党有一点界限是必要的，没有区别是不好的，应该有区别。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有一条深沟。现在的情况就是许多地方党内党外这个沟太深了，应该把这个沟填起来，要跟他们讲真心话，不要讲一半，还留一半在家里讲，这样他们会进步得更快些。

我们采取以上所说的方针，会不会妨碍党的领导？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里头有这样几句话：“但是对于这些缺点的批判，只能是为着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而决不能像敌人所企求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混乱。”我刚才讲的一些话，说是闹一点也可以，登一点错误的文章也可以。我们慢慢来批评教育，讲道理。这两种提法是不是互相冲突？文章上讲的原则性，我们现在说的是属于灵活性。要灵活地运用原则。不然，一个地方罢了工，我们就去嚷：“嗨，你破坏党的领导！”知识分子批评了我们，我们就责问他：“你要涣散无产阶级的队伍吗？你要破坏党的领导，破坏民主集中制吗？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吗？”到处拿这文章做挡箭牌。这行不行呢？这就不行。我们在原则上不提倡罢工罢课，不提倡错误的文章，不提倡有毒素的戏等等，但是事实上发生了一些个别的罢工罢课，报纸上登了一些个别错误的文章，戏台上演了一些个别不好的戏，对于这些现象采取放的方针，采取说服教育的方针，没有大害，反倒有利；采取压的方针，反倒不利。这样的方针比较容易调整社会秩序，调整领导者跟被领导者，政府跟人民，党跟人民的关系。这种调整的结果，正是巩固了党，

巩固了民主集中制。

我们希望把我们国家造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提，不要使人不敢说。我们这些人有错误缺点必须改，不改就不行，因为没有道理，无论党政府<sup>[1]</sup>都不实行官僚主义，不能强制人们做那些没有道理的事。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我相信，人民的政治情况，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就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这样，我们的文化、科学、政治、经济，我们整个国家，就一定可以比较快地繁荣发展起来。

---

[1] 原文如此，疑有缺漏。

# 中国外交方面的某些政策问题<sup>[1]</sup>

(1957年3月、9月)

—

我还想同你们谈谈我国外交方面的某些政策问题。

台湾的情况现在有变化。美国现在想搞垮蒋介石。它正在扶植一派人，想用这派人来代替蒋介石。现在我们需要帮助蒋介石来反对美国。因为问题是：蒋介石好些呢，还是美国所扶植的更亲美的势力好些？台湾像目前这样作为美国的半占领地好些呢，还是台湾成为美国完全的占领地好些？

美国、英国这些国家要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它们想一方面承认我们，一方面又承认台湾。我们的方针是：承认我们就不能承认台湾。我们不怕它们不承认。美国愈晚承认愈好，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清理内部。它要是在我这里有使馆，它就要在我们内部搞各种破坏活动。这是我们实际的政策。在对外方面，我们同美国也进行谈判，这是为了在外交上采取攻势。这个谈判已经搞了一年多，到目前之所以一直没有破裂，是因为双方都想把谈判破裂的责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二是毛泽东和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及布拉格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任加在对方身上。只要它愿意谈下去，我们就陪它谈下去，谈几十年也可以，看样子有可能长期拖下去。

同英国，我们不同它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只同它建立半正式的外交关系，同它采取若即若离的方针。

关于参加国际组织问题，如奥林匹克委员会、联合国的附属机构等，有些兄弟国家不大了解我们，一片好心，总希望我们参加这些组织——我不知道包括不包括你们在内，认为我们太左。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这些组织内有国民党代表在，我们就不参加；如果参加了，那就是承认“两个中国”。我们说，我们可以依靠同苏联、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合作。我国是一个大国，我们同亚非国家也进行着合作，没有这些西方国家，我们一样可以发展经济和文化。美国现在搞禁运，我们愿意它搞。它不禁运，我们就要同它搞贸易，就要同英国、法国、西德等等国家都搞贸易，但是由于经济落后，我们还拿不出东西同它们搞。当然我们的口号是反对禁运，它搞禁运我们就骂它，这也是外交攻势。到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后它解除禁运时，那我们就会有些东西同它搞贸易，到那时我们可以同它建立关系。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二

我们的外交政策原则：首先是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第二是和亚、非、拉丁美洲及北欧的一部分国家建立关系；第三是对西方主要国家，现在主要是和他们斗争，不忙于建交。所以这和杜勒斯的方针相同，他们怕我们去闹事，不同我们建交。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 在中宣部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上的批注<sup>[1]</sup>

(1957年3月)

一、科学家（特别是自然科学家）中认为党有一半对不能领导科学工作的人不少。他们还认为党的领导对科学的发展没有好处。“在美国没有人管科学，科学家很自由，所以有李政道、杨振宁那样的成就，在我们这里就做不到”，要求党“无为而治”。有的科学家想挑比较容易取得个人成就的工作做，不愿意切实地为国家需要服务。党应当怎样来领导科学工作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二、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还存在着阻碍。一方面有些党员负责干部把最近一个时期科学家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现，都算在“百家争鸣”、“向科学进军”的帐上。（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许多思想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也是原因，例如“副博士”问题，闹了已将近一年，但有关部门还没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1957年3月6日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是供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同志参考的，共编入了33个问题。毛泽东在审阅时，对其中20个问题作了22条批注。

有认真研究过。在我们的国家条件下，学位制度到底应该怎样来设立，特别是社会科学方面，副博士必读书目和学位论文写法之类的流行，更助长了教条主义的风气）。另一方面，党外科学家中间的宗派主义也还没有彻底解决。

他们是有些理由的

三、不少科学家认为，如果工作条件没有很好解决，就拿不出什么科学成果，因此“百家争鸣”对他们的实惠不大。这个看法在社会科学〔家〕中有（特别是经济学家认为得不到调查统计资料，不能切实地做研究工作），而在自然科学家〔中〕更为显著一些。他们对“工作条件”的兴趣，比对“百家争鸣”的兴趣高。纸张供应紧张后，关心科学成果能不能发表的人就更多。现在我们没有一套发表和评定科学成果的健全的制度，对贯彻百家争鸣也是一个不小的阻碍。

应当弄清这种关系

四、人们常问：“百家争鸣”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家的指导思想”两者间的关系怎样。同时关于允许哪一些文章出来争鸣，不允许哪一些文章出来争鸣，有各不相同的议论。有人认为科学界已有定论的事情就不再允许争鸣。有人认为不是实事求是研究问题而是狂妄自大夸夸其谈的文章不应允许出来争鸣。有人认为讨论问题态度不好的文章不应允许争鸣。有人把这些问题归结为“百家争鸣”与“学风”问题。

戒律太多

五、哲学家提出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哲学

遗产的继承性问题。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文学界、法学界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要不要研究资产阶级社会学中那些对我们有用的问题也已经提出。目前在社会科学中几个理论性最强的方面（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中怎样进行研究的问题也未解决。

目前不要去找主要危险，而应按具体问题处理

六、目前文艺界一方面“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仍然很严重，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又确实有些抬头。哪一方面是主要危险，在一些同志中间看法不一致。对这种状况，应该怎样估计？

七、在文学作品中应该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的矛盾，揭露和批评生活中的缺点，应当注意什么原则，如何掌握分寸？

不对。但可以允许少数人这样做

八、目前有些作家认为文学的目的就是写真实，因此，“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感受即真实”，至于作品对人民有什么教育作用，作家用不着考虑。对于文学的真实性与思想性的关系，应该怎样看？

九、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在文艺界看法不一致。有些人认为文学既然是反映现实，只要现实主义就够了，现实主义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当然就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现实主义，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些人认为作家反映现实离不开他的立场观点，具有社会主义

思想的作家，他的现实主义就不同于过去的现实主义，因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旧的现实主义是有性质上的区别的，它不应该被否定。对这个问题，应该怎样看？

十、应该如何正确地进行文艺批评工作？

十一、报刊上是否允许发表和党不同的主张？就是说党的政策和党、政府的工作方针能否在报刊上“争鸣”？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去年八月，在中央批示《人民日报》改进工作的方案中，有这样的指示：“除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特别自从“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后，各地在实际工作中在这个问题上的了解不同，并且有些误解，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有些地方的党委对和党的政策不相同的意见主张少发表或不发表，要有掌握。而报刊方面受到读者、作者的冲击力很大，主张多发表一些。

有些报刊发表了关于讨论某些国家工作的文章，还发生了一些副作用。例如：有的报纸发表了关于“劳卫制”问题的文章，讨论“劳卫制”在中国适合不适合，很多学生受了讨论的影响，就不愿参加“劳卫制”了，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就不赞成在报刊上进行这种讨论。诸如此类问题

很多。

十二、同上述问题有关的另一个问题：中央政府各部有些措施不当，在没有经过中央和地方政府商妥以前，地方报纸能否批评？  
同前

十三、有人说：“报纸是宣传工具，但它也是商品”，“不把它当作商品，报纸必然不会受读者欢迎。”这种言论引起了报界的注意。在讨论中，有些人否认报纸是党教育人民的工具，否认党的领导。例如，有的编辑说：“报纸应有权力，不应跟在党委屁股后面走”；“心目中一有领导，版面就编不好，心目中有了读者，报纸就编得好。”还有人主张办反对派的报纸，说：“在野报”、“民间报”可以“大胆敢言，切中时弊，讲人民要讲的话。”不少党内办报的人也提出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应该如何统一？如何理解？  
同前

十四、有人指出党校是有特殊性的，即学员都是党员，因此，这里的“争鸣”，只能限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不同之爭，不能容许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来争鸣。有人说，“党校中不能给唯心主义设‘讲坛’”。有人说，党校已经有一个方针了（即“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怎么又来一个“百家争鸣”，究竟是一条方针，还是两条方针？有人说，“百家争鸣”的精神就是“理论与实际  
似乎不很  
对，何必怕争  
鸣？”

联系”，所以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包括在党校的原有方针中了，在党校中何必另外强调百家争鸣呢？

不许怀疑  
吗？

为什么不允  
争论呢？

前者是肯定  
的，后者是否  
定的

就是允许批  
评、争论

应当改变

十五、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学习经典著作有无矛盾呢？有人说提倡百家争鸣和独立思考，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有妨碍的，因为这样一来，大家不先去接受经典著作的内容，而是首先去怀疑经典著作了。有人说，“经典著作是不许怀疑的”。

十六、党的政策是否允许怀疑？对党的政策的怀疑的意见是否允许争论？有人说，根据党章规定，党员对党的政策是可以在党的会议和刊物上讨论的，怀疑的意见也可以提出争论，有人说，党员争论党的政策只限于对政策的不同的理解和执行方法问题，如果有反对或者怀疑党的政策的意见，是不允许争论的。

十七、党员在理论上怀疑或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原理是否允许？如果根本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理论，可否留在党内？（例如有人入党后仍然相信凯因斯学说，如何办？）

十八、如何克服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学中的教条主义？

目前许多理论课程教员，埋头准备讲稿，照念讲稿，不关心国内外大事，不学习党的重要文

献，不研究现状。

两者都不对

十九、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独立思考”“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等口号提出后，高等学校的党和行政的领导干部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放弃领导，对群众的错误思想行为不进行教育批评，以致产生若干混乱现象；一种是在党的这一重大的方针政策面前，迟疑观望，甚至有抵触情绪，对各方面的工作不敢放手，群众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的积极性未能很好地发挥。因此，在教育方面如何正确执行这一方面的方针政策，仍旧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二十、针对少数中等专业学校和个别高等学校中发生过的罢课、请愿事件的情况，今后应该如何对广大青年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此点值得重新研究

廿一、党章规定，学校党组织具有领导和监督行政机构和群众组织的职能以后，党内党外都有一些人认为学校的党员领导干部对科学和教学都没有什么研究，领导教学和科学的研究工作困难较多，部分党委书记和党员校（院）长对此也缺乏信心。这个问题应该如何从思想认识上和具体作法上求得解决？

都是不对的

廿二、自从提出“向科学进军”以后，高等学校教师偏重于搞科学的研究工作，不愿多作教学工作，从而发生了教学工作与科学的研究工作如何适当安排的问题；同时，党的干部和政治工作干

部多希望作科学的研究工作或教学工作，不安心政治工作，忽视政治思想工作的倾向相当严重。

都是不对的

廿三、过去学校对于学生管理得死死的。自提出百家争鸣方针和讨论全面发展、因材施教以来（还有外国的影响），已开始表现出另外一个偏向，学生强调自由、民主、个人专长的发展，不遵守学校纪律，对教师不礼貌，缺乏艰苦耐劳的思想；而在学校和教师方面，则变得束手束脚，不敢管理和教育学生。

前者是错误的，后者应当改革

廿四、有些教育行政领导部门和学校当局不重视学校的政治思想领导，有单纯搞业务的现象。还有学校课程多，教材分量一般较重，因此，形成学生的负担重（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但有人说主要原因不在这里，而在别的方面。

廿五、提出讨论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教学方针以来，许多人积极参加讨论，截止目前，仍为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全面发展是完整的方针，不需要加因材施教；一种认为需要加因材施教。目前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前一种意见，多属教育领导部门和某些教育机关人员的意见，后一种主要是下级教育领导部门和学校干部的意见。在这个方针的讨论中，也表现出，一种人对过去教育上的成绩肯定的太多了一些，只承认有很小的缺点；另一种则似乎对教育成绩又否定得多了一些，而对缺点则看得多了一些。

廿六、前一时期卫生部把中医政策概括为“先系统学习，全面接受，然后加以整理提高”十七个字下达，在医学界中引起了一些误解，有人觉得贯彻中医政策与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有矛盾，也有些西医在学习中医问题上不服气。另一方面，在中医工作的领导思想上，也存在着拒绝一切不同意见的毛病。

廿七、卫生系统应如何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卫生行政部门怎样抓政治思想问题，各级党委怎样加强对卫生工作的领导？医院党组织的任务是否应该与学校、企业、工厂相同（即实现党的领导与监督）？

廿八、目前，对农村矛盾的分析有些混乱。有的说：“当前主要矛盾是新、旧思想矛盾”；有的认为是“经营管理的矛盾”；有的说：“主要是富裕中农斗争”；有的则认为“资本主义思想已是残余的了”或“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残余的了”。应该怎样才全面？

是一个东西

廿九、目前，在党内思想斗争中，对资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含义，区别得不清楚，有时叫这样，有时又叫那样，怎样划分这个界限？

卅、目前，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有几类，什么是当前主要矛盾？

卅一、目前主要应反对哪几种官僚主义？目

前有些地方群众反对官僚主义划不清界限，如认为领导上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即是官僚主义。

卅二、过去各业务部门下达任务时，只规定生产任务、指标、上缴利润等，今后是否可以规定政治任务？如何解决业务挤掉政治的矛盾？各业务部门如何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业务部门和地方党委的双重领导如何协调？

卅三、目前在文教单位做党委工作的干部能力弱，水平低。另据有的省委负责同志反映，前有人强调校长制，对党委制有抵触。在文教系统中如何健全党委制？

#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 十二周年的电报

(1957年4月3日)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伊斯特万·道比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亚诺什·卡达尔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伊姆雷·霍瓦特同志：

当匈牙利解放十二周年的時候，请允许我们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和匈牙利人民表示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十二年来匈牙利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和平方面作了重大的努力并且取得了成就。不久以前，匈牙利人民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的领导下，在伟大的苏联真诚无私的援助之下，粉碎了帝国主义者和匈牙利反革命分子所策划的反革命复辟的阴谋。匈牙利人民的这一伟大胜利不仅捍卫了匈牙利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而且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在团结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一切民主力量、实行有效的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国民经济等方面作了许多巨大的努力。我们相信，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挠英勇的、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匈牙利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的决心。最近中匈和苏匈之间的会谈和取得的协议，进一步加强了中、

苏、匈三国的团结和合作。我们谨祝匈牙利人民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的领导下，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胜利。

祝中匈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更加发展和巩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四月三日

# 欢迎和感谢波兰政府代表团 访华的讲话<sup>[1]</sup>

(1957年4月8日、9日)

—

毛泽东主席在宴会上致词，对以西伦凯维兹主席为首的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表示热烈的欢迎。

毛主席说，波兰是同中国有着深厚友谊的国家，波兰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中波两国之间的友谊一天天在增进。祝波兰一切都好，祝社会主义国家日益团结，祝中波两国的友谊日益发展。

毛主席举杯祝代表团的全体同志身体健康，祝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同志身体健康，祝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身体健康。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1957年4月8日在中南海勤政殿设宴欢迎波兰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为首的波兰政府代表团的新闻稿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1957年4月9日在西伦凯维兹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

—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感谢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同志和他所率领的波兰政府代表团为中国人民带来了波兰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我们请波兰政府代表团把中国人民同样的友谊和最良好的祝愿带回给波兰人民。

祝波兰人民共和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

祝苏联、波兰、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更加巩固地团结在一起。

祝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同世界上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起，更好地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努力。

我请大家同我一起，

为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同志和他的夫人，为波兰政府代表团其他同志们的健康，

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同志的健康，

为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同志的健康，

干杯！

# 对整风运动决定草案的批语 和中央关于试行这一决定草案的通知稿

(1957年4月)

—

彭真<sup>[1]</sup>同志：

此件<sup>[2]</sup>请商周<sup>[3]</sup>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发出。

毛泽东

四月九日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2] 指中共中央1957年4月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主要内容是：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1957年进行准备工作，并在适当范围内试行，1958年全面开展，大约在二至三年时间内完成。这个决定（草案）原题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准备在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后下发。毛泽东审阅时，将题目改为“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在文内作了一些修改，并起草了中央关于试行这一决定（草案）的通知。后来，决定（草案）和通知都没有下发。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始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

[3] 周，指周恩来。

此件以早发出为有利。

二

各级党委和党组：

现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发给你『你』们，请即试行，取得经验，报告我们，以便修改，在中央全会通过，然后〈后〉正式施行。你们试行的时候，必须作出部署，并且根据地方特点发出省市一级的指示。然后在试行中密切注意随时纠正运动中发生的缺点。文件以能阅读者为限，不能阅读者以讲演代之。农村整风，由省市级另定办法。

中央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sup>[1]</sup>

---

[1] 这是毛泽东起草通知时写的一个待定的日期的符号，原准备按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个通知的时间填写，后来这个通知没有下发。

# 关于请胡乔木<sup>[1]</sup>阅读《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一文的批语

(1957年4月)

送胡乔木同志阅。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sup>[2]</sup>。

毛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2] 指1957年4月13日《大公报》社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文章说，我们的国家目前正处在大变动的时期。第一，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发展，我国的社会制度起了根本的变化。第二，经济制度的剧烈变化，必然会反映到广大人民的思想意识中。第三，我们的经济事业和其他工作不能停留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上，它们应当而且也必然会有高度的发展。在这个大变动的时期里，时代带给我们巨大的历史任务。在经济建设战线上，我们要把人民的经济事业组织好、管理好，这就要求我们学会经营管理社会主义的企业，也要求我们学会逐步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在思想建设战线上，人民的思想状况应当符合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且能推动经济事业的发展。

# 给张维<sup>[1]</sup>暨夫人的信

(1957年4月15日)

张维同志暨张夫人：

来信收到，深为系念。病情虽重，可能痊愈。尚望安心休养，争取好转。家属诸同志努力上进各节，自当遵嘱帮助，以尽故人应尽之责。请张夫人随时以情况见告。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五日于北京

---

[1] 张维，早年和毛泽东有较多交往，当时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任教授。

# 欢迎、欢送伏罗希洛夫的四次讲话<sup>[1]</sup>

(1957年4月、5月)

—

敬爱的伏罗希洛夫主席同志：

你这次来我国访问，是中国人民的光荣，是我们两国日益发展的友好关系中的重大事件。我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向你和随同你前来看望的同志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兄弟的敬意。

伟大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道路，为整个人类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榜样。中国人民正在苏联人民的鼓舞和支持下，沿着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努力前进。

中苏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兄弟友谊。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1957年4月15日在北京南苑机场迎接伏罗希洛夫的欢迎词；本篇二是毛泽东1957年4月17日在欢迎伏罗希洛夫的国宴上的讲话；本篇三是毛泽东1957年5月3日在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为伏罗希洛夫访华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本篇四是毛泽东1957年5月26日在伏罗希洛夫结束对中国的访问时的欢送词。此外，据新华社1957年4月16日报道，伏罗希洛夫在周恩来为他举行的欢迎酒会上见到卫立煌，周恩来作了介绍，并说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毛泽东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

中，苏联人民给予了我们最大的同情和支持，请允许我向你，并通过你向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表示衷心的感谢。

主席同志，你是伟大苏联人民的代表，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我们深信，你的访问一定会进一步增进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并且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

中苏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万岁！

伟大的苏联人民万岁！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

亲爱的伏罗希洛夫主席同志，

亲爱的苏联同志们，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同我们伟大盟邦的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和其他苏联来宾们欢聚一堂，感到非常高兴。

伏罗希洛夫同志是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几十年来，他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苏联国防力量的增强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且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伏罗希洛夫同志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他这次来到我国访问，给我们带来了伟大苏联人民的兄弟友谊。我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向我们的贵宾们表示热烈的

欢迎。

四十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作为新世界的开路先锋，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四十年来，苏联人民不但在国内进行了辉煌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和平和进步事业作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全世界劳动人民从苏联人民的身上看见自己解放和建设人类幸福社会的光明道路。我们中国人民正是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取得今天的胜利和成就的。中国人民一贯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并且以此为莫大的光荣。

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获得了苏联人民兄弟般的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胜利之后，苏联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给予全面的、巨大的援助。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我愿意在这里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再一次向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

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长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的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巨大财富。中国人民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和目前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都从苏联学到许多宝贵的东西。今后，中国人民还要继续加强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以加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伟大的中苏两国人民是最亲密的兄弟和最可靠的战友。在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中，我们中国人民同苏联人民是坚决地站在一起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挑拨和破坏我们两国之间的团结友好关系。但是事实证明，他们这些阴谋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会得逞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我们分开。中苏八亿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牢

不可破的。

让我们举杯，  
为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  
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伟大团结的进一步巩固和  
加强，  
为一切爱好和平和自由的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的日  
益发展，  
为世界的和平，  
为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更辉煌的成就，  
为伏罗希洛夫主席的健康和长寿，干杯！

### 三

亲爱的伏罗希洛夫同志，  
亲爱的大使同志，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当伏罗希洛夫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在中国各地进行了友  
好访问以后，我们又同他们欢聚在一起，感到特别亲切和愉快。

伏罗希洛夫主席以巨大的热情和不倦的精力，在将近二十天的  
时间内，访问了我国许多地方，同我国广大的工人、农民、学生和  
各界人士作了亲切的会见，把苏联人民的兄弟感情转达给千百万的  
中国人民。这一切，对中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并且给中国人  
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在这些日子里，全世界再一次看到中苏两国人民坚如磐石的团  
结一致和亲密无间的深厚友谊。这种团结和友谊，不仅是我们两国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有利因素，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各国团结的重要部分，也是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可靠保证。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一样，将继续尽一切力量，为不断巩固和发展我们两国的团结友好和合作关系而努力。

伏罗希洛夫主席不久就要结束他在中国的友好访问了。我愿意借此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再一次向他表示深深的感谢，并且衷心地请他把中国人民最诚挚的友情带给全体苏联人民。

让我们举杯：

为我们伟大的盟邦苏联的日益繁荣和富强，

为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建设共产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新的成就，

为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同志们的健康，

为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谊，

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伟大团结，

为世界和平，

为伏罗希洛夫同志的健康和长寿，干杯！

## 四

亲爱的伏罗希洛夫同志：

同志们、朋友们：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和他的随行人员在我国各地进行了二十多天亲切友好的访问以后，继续前往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了友好的访问。现在他们就要离开我国去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我们怀着深深惜别的心情来欢

送他们。

伏罗希洛夫同志在中国的访问给中苏友好关系的光荣历史写下了新的、灿烂的一页。他带来了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兄弟友情，他同中国广大人民的热情会见，再一次生动地体现了中苏两国人民之间久已存在的深厚友谊。我们希望伏罗希洛夫同志把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最诚挚的友好愿望带给全体苏联人民。

伏罗希洛夫同志！当你即将离开我们的时候，请允许我再一次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向你，并且通过你向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表示最大的感谢。我们虽然暂时分别了，但是中苏两国人民的心将永远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亲爱的主席同志！我祝你身体健康，一路平安，并且在增进苏联人民的繁荣幸福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中苏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伟大团结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1957年4月15日，毛泽东在首都机场迎接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1957年4月15日，毛泽东等在机场迎接伏罗希洛夫。



1957年4月15日，伏罗希洛夫在毛泽东陪同下，乘敞篷车从机场到宾馆，沿途受到北京市民热烈欢迎。



1957年4月17日，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在欢迎酒会上。



1957年4月17日，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在欢迎酒会上。

##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37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 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